

PEKING UNIVERSITY

北大讲座

第一辑

《北大讲座》编委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素质教育项目

北大讲座 第一辑

《北大讲座》编委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讲座. 第一辑 / 《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

ISBN 7-301-05356-8

I. 北... II. 北... III. ①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②自然科学-中国-文集 IV. 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932 号

书 名: 北大讲座 (第一辑)

著作责任者: 《北大讲座》编委会

责任编辑: 刘乐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356-8/G · 0689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发行部 62754140 邮购部 62752019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开本 12.125 印张 34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1.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北大讲座》编委会

主 任：许智宏

副 主 任：王登峰

成员单位：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

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

北京大学教务部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

编 委：张 彦 沈千帆 王 干 姜 宁

冯 超 罗 康 吴彦彬 张 晶

何 敛 聂稻波

AMAA 3/105

序

何谓“讲座”？学者台上讲，学子座下听。有人曾“戏言”：在北大课可以不上，但讲座决不能不听。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海报栏上有各种各样的讲座预告，讲前教室里挤满了学生，课桌上都是占座用的物品，讲时则是醍醐灌顶般的醒悟，讲后则是诘问、辩论与深深的思索。这一切成了北京大学最别致的一道校园风景。透过这景色，你既能看到传统上认为的象牙塔内不甘寂寞的“居民”收回目光里的清高，开始对校园内的自我进行省思；你也能看到，塔外的世人，用羡慕、好奇和探询的目光注视着行色匆匆的塔内学人，甚至开始驻足校园、流连忘返。讲座不仅增添了北大这块神圣土地的内涵，而且让这个古老的校园更加生机盎然、青春焕发，并因此而成为北大学子的宝贵精神财富。

大学培养综合型人才，拓宽学生知识面，改变教学模式和课程安排自然是最根本的。但短期内完成的难度很大，通过众多的讲座使大学生了解其他学科的情况，激发其学习兴趣，引导他们多学习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了解当代科技的进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热点，使同学们更好地了解社会，融入社会。讲座，也就成为校园文化中最为活跃的组成部分之一。讲座，就是一个素质教育的开放课堂。

学生们是贪婪的，单一的专业学习丝毫不能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求。这个时候，讲座以一种“知识快餐”的形式出现了。它可以让学生们了解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诸学科的最为基本的东西，也可以让他们深入研究与探讨某一方面的学术前沿。比如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以“新世纪，新北大”为主题的系列讲座在校园里渐成气候，成为诸多讲座中的佼佼者。该系列讲座包含数学、物理、计算机、生命科学、考古学、文化现象等各个学科领域，内容都是世纪之交的前沿问题、热点话题，极大地丰富了广大同学的课余生活，也为北大校园学术文化增色不少，成为北大迎接新世纪的重要学术活动。再比如，几乎每一个学期，在中文系、历史系都有学术讨论会，多位中外学术泰斗剖析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学生在座，常有如沐春风之感。

学生们是爱求索的，他们热血沸腾，年轻气盛。怀疑、思辨便成了他们思想的标签。所谓“理不辩不明”，这个时候，讲座便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辩论的讲坛。在思想的激烈碰撞中，迸发的火花或许就成为照亮他们一生学术生涯的明灯。比如在我们的电教报告厅曾举办过一系列关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讲座。在那里，海德格尔、康德、尼采等人的思想被理性地思考着，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发生与发展被审视着。辩论时常在讲堂上发生，讲者听者都能从中获得启发。

学生们是不甘寂寞的，小小的校园难以阻止他们去放飞理想的翅膀。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因为有前辈成功的足迹。这时候，讲座便成了前人与后人贴心交流的场所。比如北大团委举办的“素质教育一百讲”系列讲座，邀请了一大批各个学科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上、企业界的成功人士，就其个人的成长历程、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及如何成才等方面进行介绍，给以启迪和鼓励。

邀请到了包括王选、姜伯驹、甘子钊等院士、教授和英特尔、微软等信息产业的巨头们来演讲，深受广大同学好评。很多青年学生和一些创业精英的鼓励下也开始尝试，去亲身体验创业过程中的一丝苦、一点甜。

我想，讲座如果在大学里消失，校园文化便会成为戈壁上的涓涓细流，虽澄澈，但孱弱且短暂。并且，课堂上智慧的闪光不应只局限于校园，而应该走出去，给所有爱智慧的人以聆听大师教诲的机会，去亲身体会细流是如何变成汹涌的波涛奔腾至海的。于是，便有了这本收录一年来北大校园内精彩讲座的书。本次出版的是《北大讲座》系列丛书的第一辑。书中的主讲者既有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的顶尖学者如叶朗、李伯谦、厉以宁等教授，也有生命科学和医学、心理学领域的韩启德、张礼和院士和王登峰、蔡志基等教授，他们广博的学识、儒雅的风度一定会令大家耳目一新、受益匪浅的。

北京大学校长

许智宏

2001年9月于燕园

目 录

序	许智宏/ 1
面向 21 世纪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文内涵	叶 朗/ 1
科学与人文	吴国盛/ 14
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薛汉伟/ 24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	马 戎/ 44
就业、民营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启动	厉以宁/ 57
世纪之交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回顾与前景	晏智杰/ 71
中国人口未来发展态势、问题和对策	张纯元/ 83
经济学家看法、文化与历史	张维迎/ 97
权力回归社会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根本方向	宁 骚/ 121
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民法	刘凯湘/ 129
法学漫谈	贺卫方/ 146
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西著东译与本土化研究	毛寿龙/ 160
似与不似之间	
——金庸和大仲马小说的比较研究	严家炎/ 173
说古典诗词创作的“奇思”及其艺术表现	葛晓音/ 186
女性诗歌：“误解小词典”	周 瓚/ 198
《大话西游》、后现代文化和“新新人类”	夏学奎/ 210
中西文化比较略论	辜正坤/ 226
诗、音乐和国民性：路德改教的日耳曼传统	朱孝远/ 253
帕斯与《太阳石》	赵振江/ 263
马斯洛人本主义艺术心理学述评	丁 宁/ 272
多学科联合攻关 断定夏商周年代	李伯谦/ 286
21 世纪的生命科学	许智宏/ 299

现代医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韩启德/ 307
中国人的人格结构.....	王登峰/ 320
21 世纪新药研究的前景与展望.....	张礼和/ 337
近年全球毒品问题动向.....	蔡志基/ 345
互联网经济与创业机遇.....	方兴东/ 354
走进创业	黄 斌/ 366

面向 21 世纪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文内涵

叶 朗

叶朗,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38 年 10 月出生于浙江衢州,1955 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本科,1960 年毕业留校工作至今。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宗教学系主任、艺术学系主任,中华美学学会第四届、第五届副会长兼高校美学研究会主任(1993.10—1999.5, 1999.5—现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90 年起),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1990 年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原理、中外美学。

我为今天的讲座拟的题目是“面向 21 世纪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文内涵”,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有不妥当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我一共讲四个问题。

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十项指标

大家都知道,江泽民主席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构想。我认为,实现这个构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 21 世纪的伟大复兴有重要意义。根据江泽民主席讲话的精神,我想,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北大至少要达到以下十个方面的指标。

第一,学科体系完备。这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条件。过去我们学校是校系两级的体制,后来我们又建立起学院,建成校院系三级体制。但院和系的情况也不平衡,整个学校各个学院总的规划还没有出来。我觉得,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详细的我不用多说,因为这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

第二，教学设施、物资设备先进齐全，同时有一流的、精干的、高效率的行政管理系统。这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条件。大家都知道过去清华大学一位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句话：“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他为大学下了个定义：不是有“大楼”就叫大学，要有“大师”才叫大学。然而虽说不是有大楼就有大学，大楼还是大学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现在北大也盖了许多大楼。我们已经盖了理科大楼，我希望学校下一步还会盖文科大楼、艺术大楼。光有理科大楼是不完整的。听说学校领导正在计划要盖文科楼群，这是令人兴奋的。

第三，要有最良好的学术环境。这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条件。所谓“良好的学术环境”，我的理解，主要特点一是要有很浓厚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的空气。大家知道，每年全国各地有很多兄弟院校的老教师们到北大来进修或做访问学者，他们走的时候最大的感触，就是北大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这是任何其他大学所不能比拟的。这种学术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是非常重要，因为人就是在这种空气中受到熏陶，受到影响，这样成长起来的。这种学术氛围大概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同特点。有人曾经这样来描绘牛津大学：牛津的教授是怎样教学生的呢——这当然是过去的情况——他们就是每周把几个学生召到家里，教授抽着烟斗，向学生喷烟，就这样，被系统地喷了四年的学生，就变成了成熟的学者。（笑）这就是一种熏陶，最本来意义上的熏陶，而学术空气就是这样一种熏陶。再有，要在教学领域和科研领域建立一套完整的学术规范。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还做得很不够。另外还要有好的学风，就是我们提出的“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要有一套由校内外著名学者开设的必修课、选修课和学术讲座。要有经常性的、高水平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活动。这些就构成了我所说的“良好的学术环境”。

第四，要成为向世界开放的、国际化的大学。这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条件。我感到，和世界一流大学比起来，我们北大的国际化程度还是比较差的。如果不进一步增大国际化的程度，我们就很难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学。所以我们要扩大招收留学生的规模，特别是欧美留学生的规模。要建立大量聘请国际知名学者来北大讲学

和研究的机制。要大大增加北大学者在国际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数量。要推动北大知名学者到国外的一流大学讲学。在国际科学论坛上要有北大学者的声音。另外我们还要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翻译家,以便以过去所没有的深度和广度,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国际社会。因为西方的学术界、文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太差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是封闭的,所以对外界情况不太了解,但开放以后,我们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地了解西方的文化,包括大量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相比起来,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实在太少。这其中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文字的障碍。我们中国的一些著作很难翻译成外文。比如说老子讲的“道”,这个“道”就很难翻译,只有用音译。但不能所有的词都这样翻译——这不是等于没有翻译嘛。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这四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有人就翻译说,诗歌有一种联想的作用,有一种认识的作用等等。外国人一看说,你们说孔子很了不起,我看很简单呀。为什么,一翻译,把丰富的内涵都翻掉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迫切需要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翻译家,把我们中国文化介绍给国际社会。在座的同学如果有这方面的志愿,我觉得这个工作很值得做。世界对我们的了解确实太少太少。一次我在洛杉矶参观迪斯尼乐园,里面有一个“小小乐园”。坐上船从中间穿过,两岸都是“童话世界”,把世界各国的童话都做成很精美的小人,我于是注意看中国的在哪儿,终于找到了,就站了三个小人。其他国家的童话世界都很丰富,中国却只有三个小人,穿着清朝的服装。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怎么就变成三个小人了呢?我觉得他们对我们中国太不了解。所以要大大加强我们国际化的程度。

第五,学生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应该处于全国的前列,并且就可比部分来讲,要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这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条件。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人文学科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这点我待会再重点谈。北大一百年来在人文学科方面一直有传统的优势,我们应当重视和发展这种优势。没有一流水平的人文学科和人文环境,要办成一流的大学是难以想像的。

第六,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一流学科,培养和拥有一

批在学术上有原创性的知名学者、学术权威、世界级大师，包括一大批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以及今后可能设立的人文社会科学院的院士。现在我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有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但却没有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我想，将来总有一天会设立这样的院士。另外我们还该有若干名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前面我讲的五条，都是一流大学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而这一条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一流大学应该培养一批像蔡元培、马寅初、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大学者。

第七，为国家各个方面、各个部门培养输送高级的领导人才，包括政府机构的领导干部，大学、大公司、大企业的领导人才，以及能对国际国内重大战略问题进行科学分析的高级研究人才。这一条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培养我们自己的、像基辛格这样的战略家。我听过基辛格几次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我深感他确实是一个战略家。

第八，应当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地，或者说动力。这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推动以信息产业、生物工程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二是推动文化产业、艺术产业的发展。这个问题我后面还将重点阐述。

第九，成为国家的“思想库”，或者说“脑库”。思想库有两类：一类是作为基础理论研究的基地，要孕育、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学派；另一类是围绕国家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重大课题进行调查研究，为国家各个领导部门或决策部门提供战略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建议、咨询和设计。世界一流大学应该兼有这两种思想库的功能。

第十，应该拥有一个世界一流的图书馆，一个世界一流的艺术展览馆，和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学生艺术团。有了这三件东西，一所大学就不仅是全社会的教育中心，而且是全世界高雅文化的中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明的象征。这样的大学，就能赋予大学生以深刻的历史感和文明感，这对学生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有了图书馆，藏书还是不错的，我们也有了赛克勒博物馆。但我们还缺一个艺术馆。我们应该建立一

个艺术馆，收藏国内国外的艺术品。而且这还有个很大的好处。北大过去一些大学者，家中都藏有很多很好的艺术品。当他们岁数大了之后，他们很愿意把这些艺术品捐献给学校，使它们成为一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营养。但是我们没有艺术馆，而这些学者的后人有的并不搞这方面的研究，这些艺术品就流失了，这非常可惜。

这十个指标是我对江泽民同志讲话的一点体会，作一点发挥，也未必对。当然，要做到这十个方面很不容易，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二、人文学科的性质和作用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因为长期以来，社会上有一种轻视人文学科的风气，在很多人心目中，人文学科是没有用的。我学了电脑，我能用；学了法律，学了外语，也有用；可我学了文学，读了《红楼梦》，有什么用？我去找工作，别人不会因为我读了《红楼梦》而要我。但我会电脑、会开车、会三门外语，这都是肯定有用的。实用性学科受到重视，而人文学科都被忽视，这种倾向十分危险。不仅一般人，有些部门的干部也这样认为。有一次某一机关干部到北大来审查“211 工程”的经费，发现有一笔经费是文科的，说：“文科还用花钱呀？”文科就不要花钱吗？我们学校盖了很多理科大楼，但文科大楼却至今未盖起来，可能也多少反映了这样一种观念。这种倾向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人文学科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人文导向，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塑造。国际上一些知名学者早就发出警告说，如果忽视人文学科，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精神水平的下降以及整个社会的庸俗化。

这种倾向，据我分析有两个认识上的根源。一是社会上对大学教育普遍存在一种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核心是把大学教育看做单纯的职业教育，与之相联系的是把中小学教育看作单纯的应试教育或升学教育。在很多人心目中，上大学就是学一门专业，掌握一门技能。毕业之后能找到一份好的职业。另一个根源是社会上很多人对人文学科的社会功能也存在一种错误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核心是用直接的功利性来衡量人文学科的价值，因此他们认为，人文学

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没有用的。这两种观念是互相联系的。我觉得，要纠正轻视人文学科的倾向，必须首先破除这两种错误的观念。

大学教育绝不等同于职业教育。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传统的观念都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不能仅限于给学生一种职业的训练，而是要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文化品格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大学教育不仅要注意专业的教育，还要注意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的教育。与此相联系的是对人文学科的性质和功能看法。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精神世界是内在的，文化世界是外在的，二者是统一的。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从内容上来说，就是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是一种客观的陈述，它回答“是什么”，而人文学科要回答“应当是什么”，包含有一种价值的导向。人文学科总要设立一种理想人格的目标或典范，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去追求人的完美化。它不是使人学到一门技术，而是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文化品格。人文学科没有直接的功利性，但不等于说它没有用。它的功用，最主要的就是教化。黑格尔说过：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能够脱离直接性和本能性。因此人需要教化。教化的本质就是使个体的人提升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精神存在。所以他说哲学正是“在教化中得到了它存在的前提和条件”。所以，人文学科虽然没有直接的功利性，却不是没有用的；它的作用主要是教化，当然又不限于教化。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我认为人文学科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功能。第一，提供一种正确的价值和意义的体系，从而为社会提供一种正确的人文导向。当前，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便是价值导向的混乱，这对社会发展非常不利。第二，要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人文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文化品格，塑造一种文明、开放、民主、科学、进步的民族精神。有了这种不断提升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有了这种民族精神作为支柱，我们才能不断增强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才能加快现代化的进程，推动社会的进步，实现民族的振兴。第三，使我们整个民族，特别是我们的科技工作人员和各级干部得到正确的世界观和

理论思维的训练,使我们的科技发展、现代化建设获得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且从哲学的、历史的、审美的层面激发我们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原创性。爱因斯坦是大科学家,但他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很小时便开始读康德的书,大学时又选了康德的哲学。他说:“陀斯妥也夫斯基给我的东西,比任何人给我的都多,比高斯给我的还多。”建筑大师贝聿铭也说:“我经常读老子,我相信他的著作对我建筑想法的影响可能远胜于其他事物。”很多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的大师都说过类似的话。他们从人文学科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第四,为国家在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提供人文咨询、人文设计和人文论证。国家决策不仅需要科学咨询、科学设计、科学论证,还需要人文咨询、人文设计和人文论证。现代化决不仅是技术问题,它还有文化的、价值的层面。忽视人文咨询和人文论证,往往是造成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第五,推动中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展望 21 世纪,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伟大复兴,必将改变西方文化片面主宰世界的格局。这不是说西方文化不好,它有很多先进的东西。但如果整个世界都以西方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举个小例子,过去电视上有句广告词:“真正美国口味,我爱吃。”这里面的价值内涵是什么呢?美国口味是最好的。口味怎么是美国的最好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吃这方面是中国的最好呀。(笑)法国人就告诉我:“美国的东西不是人吃的。”(笑声、掌声)美国的食物都是甜的,所以美国人才那么胖。他们不知道糖是破坏味道的。一位台湾教授写了一本《烹调原理》。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有原理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它总结出来。现在我先来总结一下烹调的原理。他说,“烹”和“调”是两个概念,“烹”是把食物做熟能吃,“调”才是调出味道来。西方人是只“烹”不“调”,只把东西做熟,却不讲究味道。而我们是把各种东西放在锅里去“调”,使它产生美味。中国的“和”这个概念,我想就是从烹调里来的。所以中国有重视“烹调”的传统,甚至把治理国家比作烹调,把宰相称作“调鼎”。可是现在却说“真正美国口味,我爱吃”,岂不是搞颠倒了?抛弃了自己的好东西却把最没有文化的东西拿进来,这是不对的。所以西方文化片面主宰世界的格局,对世界文化的发

展并不好。当然，西方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它不是一切都好。“狗不理包子”不吃了，都去吃汉堡包；筷子不用了，都去用刀叉，我想，这是不应该提倡的。在这方面，人文学科担负着重要的任务，这包括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原创性的研究，以过去所没有的广度和深度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国际社会。

第六，要推动文化产业和艺术产业的发展，这个我后面还要论述。

人文学科对我们大学生来讲，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会提高我们的人生境界，使我们除了具有各门具体学科的智慧之外，还具有有一种人生的智慧。这只有通过人文学科的学习才能达到。

三、关于文化产业

人文学科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已讲过，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一个重要标志是要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包括高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高科技产业的重要性大家都已看到，而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很多人还没有看到。国外很多学者都认为，21世纪全球最大的产业有两个：一个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一个是文化产业。

为什么说文化产业是21世纪最大的两个产业之一呢？可能有这么几点。

第一，在高科技、数字化的条件下，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平衡，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大家知道，高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更多物质、技术手段的支持，可以缩短人和人的距离，但另一方面却可能起相反的作用，可能压缩人们精神生活的空间，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人与人的关系疏远化。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电脑普及了，人们可以电脑办公、电脑购物、电脑上学，但电脑决不能取代一切。比如上学就不仅是学一点知识，而且是为了发展人性、丰富情感、完善人格，所以老师和同学们之间需要面对面的交流。美国有人写了个小故事说，21世纪的一个小女孩做好了作业，让电脑给她批改，她自己坐在一边

叹息。她想，我祖母那时候多好，她可以上学校，有很多小朋友在一起，而我现在一个人在房里，对着一台电脑，冷冰冰的。人机对话代替了人与人的交流，社会就可能彻底瓦解。实际上，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失衡已成为我们人类当前面临的重大危机。我想过去有的荒诞派戏剧，的确有先见之明。两个人在车站见了面，开始聊天。聊着聊着发现我们原来住在一条大街上，觉得很亲切；再进一步谈话，发现我们原来住在一栋大楼里，觉得更亲切；再进一步谈话，原来我们俩是夫妻呀！（笑）老跟电脑打交道，谁能保证不忘掉自己的妻子呢？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文化产业，用更丰富的文化产品来满足人们越来越多、越来越紧迫的精神需求，就成为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二点，很多学者认为，“闲暇时代”即将到来。拿中国来讲，一年有 114 天是法定休息日，也就是一年当中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休假。而且，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增加，人们退休之后的生活时间也在增加。当代医学认为，正常状态下，人的寿命可以达到 120 岁，如果算 60 岁退休，这剩下的 60 年怎么过？这是个大问题。空闲的时间只有做两件有意义的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追求审美享受。这两件事都会大大增加文化消费、精神消费。过去人们花钱购买物质产品，现在人们用越来越多的钱购买精神产品，买一句话，买一次审美体验，买一次视觉和听觉的享受。即使是物质产品，人们也越来越注意它的精神内涵，商品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符号价值，越来越超过它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据说 40 年代的好莱坞影星一定要具备三件东西：一是狐皮大衣，二是一辆 Rolls Royce 车，三是家里一定要挂一幅印象派画家的画，（笑）表现他有文化。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增加了，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国外许多学者研究休闲问题，一些著名大学已经成立了“休闲文化系”，休闲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成为和每个人的生存质量息息相关的领域，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休闲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人们完成工作后的一种行为方式、生命状态，是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休闲的本质和价值在于文化，使你在精神的自由中进入一种审美的、创造的、道德的、超越的生活方式，非常值得我们研究、重视。美

国人说到 2015 年，他们的全部产业中，和休闲有关的产业可能占到 50%，而休闲产业中很大一部分正是文化产业。

第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资本形式已发生重大变化，单一的货币资本逐渐转化为货币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等多元资本的形式。文化资本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实力的重要指标，文化资本的加入为一些经济资本薄弱而文化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据我理解，文化产业可能成为 21 世纪最大的两个产业之一，至少有以上三个原因。拿中国来讲，中国即将进入第十个五年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全面实行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我想，这种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文化产业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战略位置上来，使它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 21 世纪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文化产业有许多别的产业不具有的优越性。比如，文化产业无污染，是环保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不同，文化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文化产业是特色产业，是在我国独有的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开发的，这使我们在全球化竞争中具有优势。遗憾的是，我国虽有极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它的商品转化率却极低，文化产品的精神内涵、精致程度也很低，很难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竞争。在第十个计划期间，我国要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宏伟战略，西部大开发首先要加大其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快教育发展，但同时文化产业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也应该有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今年 5 月我曾参加中央组织的西部开发考察团，到云南和贵州考察。我觉得这些地区已开始重视文化产业，但我感到重视的程度还不够，还应把它放在一个更高的战略位置。西部的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大部分没有开发，有的是低层次开发，有的甚至是破坏性开发。应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当作西部开发的两个翅膀。在西部大开发的讨论中，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旅游产业，而比较少谈到文化产业。其实照我看，这两者是交叉的概念。旅游产业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产业，因此它必须依赖文化来支撑。旅游景点、旅游设施、旅游产品都要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否则旅游产业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我一向很向往大理，可这

次去看了看，大失所望。除了祖先留下的大理三塔，其他景点，加大理古城、蝴蝶泉都明显缺乏文化内涵。还有“虎跳峡”，现在据说在旁边雕了一只老虎。“虎跳峡”本是一种想像，现在雕了一个老虎，想像的翅膀就被剪断了，何况雕得很不好。（笑）这叫画蛇添足。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开发，简直举不胜举。我们的旅游产品也很糟糕。到外地旅游并总想买纪念品，但买不着，带了钱来花，却花不出去。那些东西做得很粗糙，没有艺术感，很多是从深圳贩来的，叮叮当当的东西，没有任何地方特色、文化内涵，也没有艺术性。这一点国外比我们做得好得多。

为什么在北京大学谈文化产业的问题呢？因为我觉得，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应当成为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学的文科如何同市场接轨的问题。北京大学的特点和优势之一，是有深厚的人文传统和人文资源。而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北大这一块资源并没有开发。也就是说，北大的人文学科如何与市场经济联系，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而发挥作用，仍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而文化产业可能是个比较好的切入点。如果我们的人文学科在继续坚持进行纯学术研究的同时，分出一部分注意力面向市场，把我们的智慧和思想转化为文化产品，用智慧和美感来丰富老百姓的生活，同时参与整合和开发我们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这将有力地推动我们的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会有助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文化品格，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所以我认为，北大应该举起“文化产业”这面旗帜。

四、关于北京大学的人文传统

北大有深厚的人文传统。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三点。

第一，北大从蔡元培开始，就强调学生的人文教育。所以北大从蔡元培以来，一直有一种浓厚的人文氛围。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人文素质都是比较高的。

第二，北大从来重视人文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当时西南联大结束回到北京的时候，有位教授说，北大的理科在全国是最前列的，

而北大文科则是全国第一的。从历史上看，北大有一大批人文学科的大师，如哲学方面，现代历史上，我们国内哲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几乎都在北大哲学系任过教或从这儿培养出来的。1952 年院系调整，全国其他大学的哲学系都停了，只留下北大哲学系。所以当时最著名的哲学教授几乎都集中到了北大。到今天为止，我们人文学科的教师阵容在全国范围内仍是最强大的，而且还在不断产生拔尖的人才，因为我们有气氛，有土壤。

第三，北大有一种对文化的关切，一种对中华民族伟大文化的献身精神。这是一个传统，在北大随处可见。我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朱光潜先生在“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文革”结束时已是 81 岁高龄，但他仍然不断地进行着写作和翻译，不到三年时间出版了 120 万字的著作（包括译著）。这是何等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是北大的精神。悼念朱先生时，我引用了丰子恺的一幅画：一颗大树，被拦腰砍断，树的四周长出了许多枝条，旁边站着两个小孩，姐姐伸手把这棵树指给弟弟看。画下题了四句诗，我至今记得：“大树被砍伐，生机并不息，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这幅画和这首诗，作为朱先生人生态度、生命力、创造力的象征是非常恰当的。还有一位是冯友兰冯先生。他在九十多岁高龄还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他眼睛看不见，耳朵也不太好。他是通过口述让别人把自己的话记下来，然后别人再念给他听，再修改。他说：“我现在不能看书，想翻书找新材料是不可能了，但我可以在已掌握的材料中发现新问题，产生新理解。我好比一条老黄牛，懒洋洋地卧在那里，把已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重新咀嚼，不仅其味无穷，其乐也无穷。古人所谓‘乐道’，大概是这意思吧！”这就是一种对文化的关切，对中华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献身精神驱使着他。冯先生又说：“人类文明好似一笼真火；古往今来，对于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人，都是呕出心肝，用自己的心血、脑汁作为燃料，才把真火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凡是在任何方面有所成就的人，都需要一种拼命的精神。为什么要拼命？就是“情不自禁，欲罢不能”。冯先生说：“这就像一条蚕，它既生而为蚕，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吐丝。‘春蚕到死丝方尽’，它也是欲罢不能。”

这“欲罢不能”四个字说得非常好，这是我们北大的一种传统精神。我们要继承这个传统。

在座的大多数是同学。进入到北大以后，你们就肩负着继承和发扬北大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贡献的任务。在当前来讲，就是要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自己的努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和创新能力，使自己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民族有重大贡献的人。北京大学的传统是好的，但每个同学最终能取得多大成就，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日本企业家松下幸之助讲过：“现代人才有很多条件，其中一条，是要超强度地使用脑力。”这话很有道理。现在你们既然进入了北京大学，就要超强度地使用脑力。冯友兰先生说：“看西游记的人总会问：孙悟空既然有那么大的神通，为什么不带上唐僧一个筋斗翻上西天，而要跟着他一步一步地走，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答案很简单：唐僧的路只能靠他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否则他就不能成佛。”那么我们任何一个同学也是这样：进入北大之后，路要靠你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其间必然会有许多艰难曲折，必然要吃很多苦头。但我们只要有一个坚定的目标，那么我相信在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中，一定会涌现一批第一流的学者和第一流的领导人才。北大历史上有个遗憾：我们培养的领导人不是没有，但也不是很多。特别是和清华相比，我们有些逊色。培养第一流的人才，这是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注重大学的人文内涵，发扬北大的人文传统。今天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掌声）

科学与人文

吴国盛

吴国盛,男,1964年9月出生于湖北武穴(广济),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自然哲学、科学思想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

科学与人文这个题目在今天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话题。人们通常最感于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我们想知道的是:在什么意义上,它们是可以统一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论题就是:“科学”与“人文”在什么意义上是统一的。我们首先就要知道:科学在本质上意味着什么?人文在本质上意味着什么?

我们首先说“人文”。西方人称“人文”为“humanities”,它显然来自“humanity”。在中文里,“人文”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的方面,一个是“文”的方面。也就是说“人文”这个词一向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它代表了一种理想的人性。这个“humanity”,这个“人性”,标志着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理想的人,什么样的人性是值得我们活的,否则活着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方面是“文”的方面,这个“文”的意思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实现这种理想的人性”。“humanities”,表示实现这种理想人性的方式是多样化的。那么有没有一个标准的、超越世界各民族的,超越各文化传统的一个人文传统呢?那当然是没有的。我们今天可以提两个,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人文,另一个就是希腊、欧洲的人文传统。我个人认为,在希腊人、欧洲人那里,在他们看来,“理想的人性”就是自由。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许多人文学科的词根都是“Liberal”,“Liberal education”是“人文教育”,并不是“自由教育”,还有“liberal art”,它也不是“自由艺术”的意思,而

是“文科”。所以希腊人一开始就把“理想的人性”等同于“自由”。那么实现这种自由的方式呢，是理性。

我觉得，希腊人有两个伟大的发明，一个就是演绎几何学，另一个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两大发明本质上都是建立在人与世界的自由的关系上，是出于非功利的目的的。“演绎几何”我们知道是非功利的，关于欧几里得的历史著作里头都谈到了一个故事：有个学生问他学几何学有什么用？向来是很温和的欧几里得这时候勃然大怒，马上让他“走人”，意思就是说“跟我学几何学你居然还会问它有什么用，这简直是侮辱我”。还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的奥运是一个竞技运动会，是一个包含了许多功利目的的复杂的运动会，而在希腊人那里并没有这些东西，在他们那里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一个愉快的游戏，所以很多人讲希腊人是人类的儿童阶段。希腊人的世界观里一开始就确立了这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关系也称之为“审美的关系”，“审美”的关系是一种非功利的关系，为了实现这样的一种“自由”，希腊人在知识形式上强调的是理性，只有有理性的人才能实现“自由”的关系。这种“理性”的形式，后来也称为“科学”。

中国的“人文”与西方的“人文”有什么不同呢？对中国人而言，这个理想的人性就是“仁”，从这个“仁”升华而来的中国的人道精神、人文主义，是以这个“仁”为代表的。那么中国的文是什么呢？是“礼”。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人看来，这个“礼”是为了实现这个“仁”而服务的。所以，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研究对象，所产生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人产生了科学，中国人产生了礼教。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天文学。中国古人与希腊人面临着同样的一个星空，但是产生的学问却是不一样的。希腊人产生了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是以天球的组合为特征的天文学，这套天文学发展成为现在的科学体系。而我们中国人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数理天文学”这样一个目的，中国的古代天文学实际上是“占星术”，当然，在今天“占星术”已经被贬义化了，“占星术”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原始的、愚昧的东西。那么“占星术”与天文学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占星术”是要通过

研究天上的事情来预测地面上的事情。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尽管很细致、很精确，但是它不是提供一套数理体系，一套非功利的体系，相反呢，它是为人民群众的起居行路、文化礼仪服务，特别是为皇家庆典和礼仪服务，就是皇帝什么时候该出行，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由天官说了算。所以说中国的天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为“礼”服务的。所面临的尽管是同一个星空，但是产生的思维形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科学一开始就是希腊人的人文学说。也就是说，科学从一开始就是希腊人、欧洲人表达“理想人性”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话题。

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科学”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首先指的是近代自然科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个定义即使从西方来讲也是很狭隘的。我们知道，一些德国思想家经常使用“科学”这个词，但是他们所指的范围广得多。比如，黑格尔说哲学也是科学，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等等，都是科学。那么这里的“科学”显然不是指牛顿开创的那套近代自然科学，他们指的是由希腊人开创的那套理性的学问。我们今天所说的“欧洲科学危机”也不是指自然科学危机，而是指欧洲人那整套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出现了危机。也就是说“自由”出现了危机，欧洲人孜孜以求的那种“理想的人性”在今天出现了问题。

我们先回去看一下人文的问题。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有一个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潮，那么这个“人文主义思潮”跟我们讲的“人文”有什么关系？跟我们讲的“科学”有什么关系？我们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人文主义的兴盛时期，他们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世界的中心，人是我们的价值原点，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一套传统。那么这个“人文主义”，他们称之为“humanism”，“humanism”有好几种翻译方法，“人文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听起来很好啊，以人为中心，人有什么问题吗？但现代许多思想家谈到这个问题时却提出：这个“人文主义”恐怕要出问题。很多人把欧洲科学的危机、欧洲理性的危机，也就是说整个欧洲文明的危机，归结为

这个“humanism”，比较有名的如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他有一篇文章叫《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他这里显然是带有贬义地来谈这个人道主义。这种讲法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像“人道主义”这样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经过多少代人争取才得到了，我们80年代的启蒙运动追求的不就是人道主义吗？也许你们这一代人不太清楚，在80年代的好几场政治运动中，“人道主义”这个词甚至提都不能提，一提就是反动，那么我们今天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人道主义，那么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评价它呢？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评价当代西方思想家对人道主义的置疑呢？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回避的。

很显然，在文艺复兴时期成长起来的“humanism”首先是讲人的全面发展，讲人性的培养，因此译成人文主义很好。但它带来的另一个思想后果是人类中心主义，即一切以人的价值作为评判的标准，一切以人类利益作为行为准则。这两种含义要区分开来。特别是“humanism”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第二种含义，就是把人作为价值原点。那么我们现在把“humanism”理解为人道主义呢就有混淆之嫌，没有抓住重点。“humanism”本来讲的是一个哲学上的东西，而我们把它理解成道德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呢就没有抓住要点。我觉得可用采用一个新的翻译方法，叫“唯人主义”，这样翻译就比较中性，既没有褒也没有贬。如果翻译为“人类中心主义”，就明显带有贬义的意思，翻译为“人道主义”又有褒的意思。“humanism”翻译成“唯人主义”与“materialism”翻译成“唯物主义”，其道理是一样的。

翻译上的问题一旦解决，我们就可以看出很多问题。“唯人主义”意味着什么？“唯人主义”意味着我们今天对待人与世界的关系要以人的利益作为中心。世界通过它与人的关系而被表达。世界上的事物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其存在的必要，完全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的。我们知道，人本身是一个自我建构的存在者，但这个建构的过程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如果世界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效用的原则被建立起来的话，那么人类的自我建构必定也会被这一原则所规定。效用的原则实际上是某种技术的原则，是技术理性。

当人以一种“唯人主义”的眼光看待世界的时候，其结果不是人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而是人的某些准则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这个准则由于在唯人主义思潮中被过分地强调，使得人本身倒成了一个被动的适应物。当我们夸耀人类伟大成就的时候。我们夸耀的也许并不是我们人本身，而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技术，当我们要求自然界适应我们的技术的时候，同时也就贬低了自然，而抬高了我们的技术。我们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要求自然界屈从于我们的技术的时候，也就相当于我们要求自己屈从于自己的成就。这样一来“唯人主义”走向了其反面，实际上它不再是“唯人”了，而是“唯技术理性”了，或者唯人造的东西了。所以人沦为自己产品的奴隶。这是我们时代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家苦苦思索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人怎样在自己的产品当中丧失了自己。人由于坚持“唯人主义”的理念，结果导致被动地屈从于自己的产品，屈从于自己的技术，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危机。当代西方思想家反思人道主义的缺陷，其落脚点也在这里。“唯人主义”本来是以弘扬人的自由为前提的，而其结果却损害了人的自由。所以“唯人主义”对欧洲的整个人文结构构成了一个挑战。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背景，就是近代人文传统，有博爱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两条线索，其中人类中心主义的线索实际上是一个支配性的线索，而这个线索在今天看来是遭到怀疑，怀疑的背景就是因为它把人把技术结构或者说人类通过理性建构的一套结构，一套规则强加给自己，人类越是强调“唯人主义”的原则，他们就越是屈从于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

接着我们就进入近代科学了。在讲近代人文之前我们提到近代科学在哪一方面是不同于希腊科学的，在哪一方面又是相同的。我们知道近代科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第二个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个翻译还不够准确，我们知道“power”还指权力。这句话意味着掌握了知识的人同时就拥有权力。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传统是怎么回事。“我思故我在”代表了科学的笛卡儿形象，或者说笛卡儿传统，按我的看法，笛卡儿传统实际上是希腊传统的一个自然延续。刚才我们提

到希腊人一个天才的发明就是演绎几何学。它就是从一个前提，按照一些绝对的程序推演出更多命题。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讲的实际上是近代科学的一种理性奠基活动，他们试图把整个近代科学的全部思路和线索通过一种理想奠基活动还原到“我”那儿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和“唯人主义”是有关联的。首先它继承了希腊人的演绎传统，第二它强调了“人”。这样一种理性传统事实上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主线，并为许多科学家所津津乐道。科学最喜欢的就是数学上的发现在物理学上的验证。因为这是演绎科学的最大成功之处。我们知道海王星的发现就不是“看”出来的，而是两个年轻的科学家“算出来”的。比如说非欧几何，在它刚出现的时候没有任何用途，但是后来广义相对论用上了。再比如说椭圆，希腊人很早就研究了椭圆，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用途，但是开普勒发现，行星的轨道就是椭圆的。所有的这些都反映了希腊人非功利的演绎科学的巨大力量。有一个故事，是关于爱因斯坦的。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有一个预言，就是光线经过引力场的时候会偏转，在那之前人们一般认为光是沿直线传播的。为了验证他的这个预言，科学家就想了一个办法：在日全食的时候观察太阳附近的星空，看能不能找到太阳后面的恒星，如果能看到太阳正后方的恒星，则说明光线经过太阳的引力场的时候确实偏转了，后来英国的科学家爱丁顿率领一个考察队观察到在日全食的时候看到了太阳正后方的星座。这个事件当时轰动了全世界，爱因斯坦从此名声更大了。当这个消息的电报发到爱因斯坦那里的时候，他的学生问他：“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爱因斯坦说：我早就知道这是对的。学生又问：“假如他们没看到这个现象怎么办呢？”爱因斯坦说那它还是正确的。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近代科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数学传统，另一个是实验传统。实验传统是一种外部的证实，数学传统是一种内在的完备。爱因斯坦也强调，科学理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完备，另一方面是外在的证实，但是爱因斯坦本人却似乎更强调内在的完备。许多科学家都认为科学最美的部分是演绎。所以说在近代科学中希腊的基因还起着很大的作用。

近代的另一根主线，就是培根传统。培根强调的是力量。希腊时代的科学是一种理解型的科学，通过理解达到一种最高的目标；近代科学就不一样了，它由一种理解型的科学变成了一种力量型的科学。力量型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呢？培根讲得很清楚：科学一定要为人类造福，一定要为人类的利益服务。这样的传统就导致了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就是对实验的注重，对外部事件的仔细观察，特别是那种可控制的、可重复的观察，那么可控制、可重复的观察意味着什么呢？具体地说就是我先碰它一下，看它有什么反应，我通过了解它的反应从而控制它。所以说近代实验和观察都是可控制的实验。古代也有观察，也有实验，但是古代的实验是在一旁看着，通过观察了解自然。而我们今天的看已经是有目的的了，就是要总结事物的行为从而预测事物的行为。预测事物的行为就是为了控制它，控制它的行为其目的就不言而喻了，就是要让它为人类服务。所以在培根的传统下，一方面强调物质的部分，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之间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所以说知识之所以能成为力量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形式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知识开始变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新型关系的方式。

笛卡儿传统与培根传统并非没有矛盾。刚才我们提到了，像爱因斯坦这种大科学家，当然他承认外在的证实很重要，但他内心却认为内在的完备更重要。虽然我们要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冲突。但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本来一个是重实验、重力量，另外一个重演绎，但是它们之间确实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培根传统和笛卡儿传统实际上有一个融合，它们在技术理性这个意义上是合为一体的。什么叫“技术理性”呢？这个技术理性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服务于力量的；第二个是它引入了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儿传统也不是纯粹的希腊传统，他把无限引入了新的科学体系中。希腊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的理性，“有限”这个词在希腊人眼里是一个褒义词，有限即完善，而今天却倒过来了，“有限”成了贬义词，“无限”是褒义词。希腊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有限理性实际上是假定人因为有了这种理性才趋近于神，趋近于至善，通过这样一个不断的完善自我的过程可以体会到人类自身

的不完善性。但是近代不同了，有限与无限地位的转变体现在近代科学的各个方面。在古代科学里物体的基本运动形式是圆周运动，是一种有限运动，而现代科学里基本运动是一种直线运动，也即无限运动。古代的生命模式是一种循环模式，他们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循环观念，而今天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单向线性的时间观念。总之今天无限的模式已经取代了希腊人有限的模式，此外，近代数学与古代数学根本的区别在于：近代的数学是无限的，而古代的数学是有限的。我们的微积分就是处理无限问题的，而微积分在近代科学的构建过程中是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微积分就没有近代科学。所以近代无限理性最终是表现在对理性的无限性的肯定的方面。这种肯定表现在许多方面，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相信：科学能研究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是可以通过科学来解决的，一切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通过科学的发展都是可以解决的，这就是一种无限的思想，这是一切理论的核心要素，这个要素已经浸透在我们所有的科学思维当中，浸透在我们近代工业文明的血液当中。

当代科学家面临一个非常难堪的境地，那就是追求真理与追求力量的矛盾，这个矛盾到了 20 世纪显得更加明显了，其中最突出的是核物理的发展。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是二战前夕，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欧洲，当时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就意识到：核物理可能应用于战争。当时一个有名的科学家希拉德就发起一场运动，叫“科学家自我出版检查运动”，就是希望欧洲核物理学家不要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知道：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本来是近代科学得以良性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任何人都不能破坏的，但是由于当时欧洲的核能开发可能会带来负面的结果，只好被迫破坏这一个基本原则。而且他们内心是激烈冲突的，最基本的原则都破坏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到了今天这个问题更加明显了，由于今天的科学家隶属于许多利益集团，有些为了国家利益，很可能要保守自己的秘密，就像今天这个基因技术，为了商业利益，为了政治利益，为了军事利益，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目标已经完全消失了，“科学为全人类造福”已经成了一句空话。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方面。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第五个方面，就是通常认为的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分裂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的看法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裂在今天看来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自然科学的学科分化与扩张使得人文学科的领地逐渐狭窄，今天人文学科在大学里的位置越来越低了，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大部分由自然科学维持。第二个方面就是学问普遍地功利化、科学化的倾向，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社会科学也开始从人文那里分裂出来，我们知道今天社科和人文是分开的，现在北大分了四个学部：人文学部、社科学部、理学部和工学部，当然加上医学部有五个学部。第三个方面，就是重视培养专业人才这样一种教育体制，人为地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疏远。这一点在中国特别突出，中国的这种“应试教育”、“专才教育”更加严重，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方面在中国更突出。许多著名的教育家指出，如果一个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只会用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去评价事物的话，那他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高等学校毕业生，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不但要学生掌握内部标准，也掌握外部标准。也就是既能用自己学科的知识评价事物，也能用超越自己学科的眼光评价事物。第四点就是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性，使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科学家也许并不反对博爱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但是它们能更加深刻地认同“唯人主义”。“唯人主义”的目标是技术理性，是力量型，而力量型恰恰是科学家最愿意接受的。而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相冲突的时候，科学家很可能毫不犹豫地批评后者。如果科学家当年只受过自然科技教育的话，那么当他面临科学与特定文化相冲突的时候，科学家很可能毫不犹豫地批评后者而维护前者。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在一个科技称霸的时代，传统文化很容易面临着毁灭的境地。因为许多传统的文化不符合力量的原则，不符合效率的原则，像北京旧城妨碍交通，所以拆了。当力量原则与传统文化相冲突的时候，一些技术官僚，一些没有人文背景的科学家们很容易认同效率的原则和力量原则。

我们很容易看到，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实际上是受制于力量的原则。力量的原则，高效的原则就是要求企业化、统一化、流水线，这是效益最高的。所以技术在力量原则上与唯人主义是完全统一的，

近代的人文传统与科学传统是同一的，包括我们以上列举的科学与人文学分裂的四点其背后支配的还是力量原则。这个“Modernity”，现代性，在我看来就是唯人主义加技术理性，现在常听人说技术理性违反了人道主义，这实际上是用词不当，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合流的。这是第五个问题。

最后我们讲一下科学精神的问题。这是当前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在今天，弘扬科学精神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现在这个思路，就是讲效率的原则，讲现代化的原则，讲力量的原则，因此我们办事都必须从这个原则出发。第二个思路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的问题：自由。科学的精神从它产生那一刻起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就是要在人与自然之间构成一种自由的关系，也就是非功利的关系。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说过：“不计利害，但求真理”，这就是科学精神。但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文化传统中是不容易培养的，我们的传统里没有自由这个维度，我们很容易走到利益原则的思路上去。爱因斯坦曾多次在公共场合提到：科学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个科学探索的过程中与自然建立起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关系也就是审美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科学家坚持自己审美的理想。英国有一位科学家狄拉克，他认为不美的东西肯定是不真实的，这是他的科学精神在起作用，而不是艺术精神。但我们今天的许多想法已远远背离了这个思路，我们今天脑子里所想的都是力量型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弘扬科学精神就首先要回到希腊思想中去，让自由的精神重新被重视，抛弃那种单纯算计性的功利思想，这才会达到我们弘扬科学精神的目的。

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薛 汉 伟

薛汉伟，1935年2月生，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和实践》、《时代发展与中国特色：当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在初级阶段的体现》（主编）、《革命与不断革命研究》。以上著作均分别获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或二等奖。2001年出版《当代中国与邓小平理论》（合著）。有关报告两度获北京市灵山杯优秀报告一等奖。

今天讲三个问题：（一）苏联模式及其由盛到衰；（二）苏联模式的衰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三）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

一

先讲第一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以苏联模式的衰败促发的危机为条件的。要说清楚苏联模式的体制，首先要说清楚它的发展战略；要说清楚它的发展战略，首先要了解形成这个模式的时代。苏联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模式。

苏联模式的发展战略有三大特点：第一，以高速度的发展国民经济为首要任务。这是为了在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产品的数量上尽快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为了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而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但它忽视效益。“不是灭亡，就是加速马力前进”是当时的中心口号。

第二，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社会主义国家，仅仅迅速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是不够的，还需要迅速增加国防实力，为此就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是人们把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发展战略当作社会主义的一般，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当作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当作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客观要求。

第三，以粗放发展为主实现经济增长。在一个经济落后的资源大国，要以尽快的速度发展经济，特别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然要求大批上新项目，主要依靠投入新的资源、依靠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来发展经济，从而采取粗放的发展战略。

这是一个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特定条件下选择的一套发展战略。但人们曾经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条件变化以后仍然坚持。

与这种发展战略相对应，在经济体制方面也有三大特点。第一，所有制的过分国有化。在苏联的城市中，1959年以前还有少量的手工业合作社，在这以后合作社合并到国有企业中，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98%。在农村，集体农庄实际上是准国有制的，它既不拥有拖拉机等大型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无经营自主权，和国有企业一样按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

为什么要建立这样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有人认为这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建立的。这个看法不对。的确，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逐步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首先是收归国有。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国有化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高度发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警告过人们：不要认为国有化程度越高越好。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

请问当时苏联和中国搞国有化，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结果吗？是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的结果吗？不是的。恰恰相反，它是在经济发展水

平很低的情况下建立的。建立这种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是为了便于利用国家的权威进行积累，集中全国的人力和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加速建立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加速提高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而实行的一种制度安排。苏联模式的准国有制的集体农庄也并非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加速发展工业、尤其是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不得不选择把农业剩余作为提高资本积累能力的主要手段，不得不设置工农业剪刀差。苏联模式的集体农庄是为了实现这种发展战略的一种制度安排，以便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进行生产，不能因为剪刀差造成务农比较效益差而放弃农业生产。

第二，在经济运行中，排斥市场机制，国家主要用行政手段来协调经济，实现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和管理，依靠各级行政组织直接领导和管理企业。

为什么要建立这种忽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人以为这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建立的。这个看法也不准确。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消灭商品经济，而且是因为在马克思同斯大林之间有一个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发现俄国的经济离不开市场。列宁说，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的错误就在于：“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新经济政策则是以商业为特殊环节的。列宁去世以后，布哈林根据列宁的思想，提出了“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原来斯大林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布哈林的上述观点都是同意的。但是随着恢复时期的结束，大规模建设的展开，他就抛弃了新经济政策。为什么？因为在恢复时期并不涉及到大量投资的问题。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资金从哪里来，往哪里投的问题引发了尖锐的争论。斯大林作出了通过扩大工农业剪刀差来积累资金、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这就不可能利用市场机制。重工业在轻工业发展起来以前并不是一个赢利的部门，而市场机制使资金流向利润高的部门；用扩大工农业剪刀差来积累重工业所需的资金，也破坏市场经济要求的等价交换原则。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的诸如此类的要求，推动斯大林取消列宁制定的

重视市场作用的新经济政策，转而采取主要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

第三，在经济管理上高度集中化，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对企业 and 生产流通分配等各个方面进行控制和监督。高度集中是苏联经济体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并非是它的根本特征，它的最根本的经济特征是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所有制过分单一是这个体制的基础，高度集中是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客观要求。建立了忽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就必然会导致高度集中；离开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去解决高度集中问题，必然以失败告终。

与上述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相对应形成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

尽管今天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改革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它的历史作用。在这种模式下，苏联迅速地扩展了经济的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的基础，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如果我们联系当时人类面临的尖锐挑战，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模式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 30 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 30 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 年到 1950 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

“60 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备受折磨的大衰退。”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

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地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垮。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

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

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但是，苏联模式有其历史的局限。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时代的主题，与战争和备战相适应的发展战略和体制的积极作用逐步弱化；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粗放发展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体制的潜力也逐步耗尽。这一模式的弊端日益突出，终于导致苏联模式的衰败。其经济上的明显表现是：苏联持续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突然中断，进入6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按照苏联的官方统计，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反弹到7.8%，1971—1980年再下降到4.3%，1981—1985进一步下降到3.6%；按照苏联一些学者的计算，1951—1960年为7.2%，1961—1970年为4.4%，1966—1970年为4.1%，1971—1975年为3.2%，1976—1980年为1.0%，1981—1985年为0.6%。

由于苏联曾经是经济落后的资源大国，粗放发展的潜力巨大。因此，从沙皇俄国到社会主义的苏联都采取粗放发展，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不管资源多么丰富，资源都是有限的。随着苏联粗放发展的潜力的耗尽，这种发展战略的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发。要避免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

不能说苏联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增加科研费用等。科研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为3.5%，1971—1985年进一步上升到

4.8%。这一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

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更根本的原因。苏联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是同工业化初期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这个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许多新的产业，其中不少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苏联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苏东国家无法扭转同西方国家在经济竞赛中处于劣势的局面。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

二

现在讲第二个问题，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衰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苏联模式的弊端促发的危机，在总结经验教训和模式转换中有重要的作用。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地并且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打破了人们认识体制的弊端所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传统观念的产生并非偶然，并非没有事实作为根据。只是人们把

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体制的积极作用作了非历史的理解。没有危机的发生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传统观念。最后，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千万不要以为这种障碍仅仅是指少数特权者的利益造成的障碍。例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吃大锅饭，企业没有效率，但没有失业的威胁，人们有安全感；打破大锅饭，就会有人下岗，有失业的威胁。今天，我们在打破大锅饭的过程中，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触及的既得利益的广度和深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企业没有活力，但企业负责人不承担风险，微观管理部门的利益又同这种政企不分直接相连。这次机构改革中，我们再次深深地体会到改革所触及的既得利益的广度和深度。正因为如此，危机的发生、忧患意识的形成是体制转换及相应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

现在来看，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各国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建立的体制，待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时，必须要进行改革，从而发生模式的转换。这种改革是十分困难的，它会遇到既得利益和陈旧观念等等造成的障碍。危机和危机意识是克服这种障碍的重要条件，因而是这种改革的重要条件。“危机”既包含危险，又包含机遇。正是危机的出现，强烈的危机意识的形成推动人们去克服种种障碍，从而把握住机遇，实现体制的转换。美国学者布莱克等在《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回顾现代化的历史，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过渡，几乎都经历了严重的危机。美英等国是在30年代大危机以后才走上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法国50年代以来的变革是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失败引发的民族危机促成的；德国和日本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而带来的民族灾难，促成了体制的转换。亚洲“四小龙”的体制转换和经济起飞也同强烈的危机意识有关。

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同样

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不经历严重的危机，很难实现理论的新飞跃和完成体制的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三次危机，才逐步萌芽、形成和发展起来。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苏联模式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兴起的。第一次，是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发生的波匈事件；第二次，是我们自身的“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危机的存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

第一次危机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发生的波匈事件是苏联模式的第一次严重危机，它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中的错误和体制的弊端，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历史局限。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中也觉察到这个模式的弊端。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总结经验教训、尝试突破苏联模式的机遇。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正是在波匈事件以后，他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1956年召开的八大接受了陈云的“三主体三补充的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自由市场为补充。这里涉及到经济体制中的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调节机制和市场结构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试图改善所有制过分单一的、忽视市场机制的高度集中的体制。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地下工厂可以合法化，消灭了资本主义以后还可以搞资本主义，华侨投资一百年也不要没收。这些是后来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生长点。

薄一波说，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具体地说始于毛，就是始于1956年，不早也不晚。这是同这场危机的推动有关。

第二次危机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

1986年9月2日，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一文中，邓小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对思想解放和改革的推动作用时说：

“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左”的错误发展到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并不多见。但这种极端的错误恰恰推动我们进行比较彻底的思考，不仅使我们思考“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使我们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行拨乱反正，而且进一步思考建国以来的全部经验教训。建国以后的头八年，发展是比较好的。从1958—1978年，总的来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耽误了整整20年，人民生活没有多少改善。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认真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调整发展战略的同时，实现了三个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正是在调整发展战略和这三个转变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并在理论上不断有所突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把这些理论概括为十二条，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较为完整的理论轮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第三场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党的十三大以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遇到了空前尖锐的挑战。80年代末发生了东欧剧变，90年代初发生了苏联解体。这些震撼世界的事件，是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以来遇到的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在国内，我们也遇到了困难：政治上，发生了“六四”风波；经济发展上，发生了经济过热，进入了治理整顿阶段；体制改革上，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重大突破，国家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价格改革的滞后，形成了双重体制长期并存、摩擦很大、漏洞

很多的状态。形势是严峻的。

中国向何处去？是再次“以俄为师”，走苏东演变的道路？还是回到我们熟悉的老路，再搞计划经济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抑或是继续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并把它推向前进？第一条路是某些西方国家和某些人希望的，但这将意味着比苏东更大的动乱，对中华民族、对世界都是巨大的灾难。第二条道路是很容易跌入的陷阱。1957年我们面临着国际国内的挑战，没有作出正确的反应，从此逐步跌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陷阱，导致了第二次危机的发生。我们党否定了前两条道路，选择了第三条道路。1992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说：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这句话恐怕只有在经历了苏东剧变以后才能说得出来。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理论上，这一阶段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进一步明确了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思路。在实践上，1992年确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更加系统地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从此，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新阶段。

三

现在讲第三个问题，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特别是在走向市场经济道路的实

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进入 80 年代以来,随着苏联模式的衰败和苏东剧变的发生,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过渡,其中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改革最复杂,内容最丰富,取得的成就也是最大的。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辟了一条成功地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道路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阻力最小的农村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取得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推动力。

从 50 年代提出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来,经历了 20 多年,改革一直没有取得突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并没有立即认识到需要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认为过去的问题在于:只讲“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认识到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改革的目标模式应当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补充,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当时选择的改革突破口,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先在四川试点,后在全国推广。这个改革尽管对后来的改革有重要作用,但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更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但改革在 1980 年秋天以后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就是大规模地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以此为突破口,中国的改革越出计划经济的框架,走向了市场取向改革的道路。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真正起点和第一推动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成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并非偶然。资本主义在欧洲首先发展,并不是因为封建主义在这里最发达,而是因为发展资本主义的阻力最小;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俄国和中国等地发生,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最发达,而是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中国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并不是因为农村比城市先进,而是因为统治力量最薄弱。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并成为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推动力,最重要的原因也是阻力最小。

农村是旧体制最大的受害者和最薄弱的环节,农民改革的要求最迫切。以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又是符合中国农村实际并在农民中阻力最小的改革方案。它没有遇到既得利

益集团，包括城市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步，幸运地集合了一系列有利的条件，从而造就了几乎可以称得上中外改革史上罕见的“无代价的进步”，几近达到了“帕累托效率改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不仅带来了连续多年农业的大幅度增产，而且促使 80% 以上的劳动者从事新型的经济活动，发展新型的经济关系，从而成为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力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又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恐怕在国外的经济学词典上很难找到乡镇企业这个名词，因为这是中国特有的。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国情，支持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一方面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使得大量农业人口能够迅速进入工业和服务业；另一方面，它带动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大发展，从而启动了一条中国式的渐进改革道路。

第二，在市场要素最多的某些沿海地区，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加速全国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

如果说，改革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农村；那么，改革的第二推动力则来自对外开放。中国原来是一个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国家，建国后又经历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市场力量十分薄弱。但是中国也有发展市场经济的有利条件。中国人有能商善贾的历史传统。在现代以前，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他们都具有显著的商人精神。但这种商业精神的分布并不均匀。在有些沿海地区这种传统已深入骨髓，形成某种近乎“天然”的禀赋。这在海外华人中有突出的表现。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指出：“华人，主要是指中国本土以外的遍布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温哥华、洛杉矶和伦敦等地的华裔。正是这群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家团体，把亚洲经济推向巅峰。”“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企业家群体。”为此，约翰·奈斯比特称华人是最优秀的两个经商民族之一。另一个是众所周知的犹太人。中国还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两个有利条件，这就是：第一，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香港等地，那里有从事市场经济成功的经验和人才；第二，还有善于从事市场经济活动并具有相当资本实力的广大海外华人。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中国

找到了一条加速市场经济发育成长的道路，这就是：实行对外开放，选择原来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毗邻港澳的侨民之乡的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作为改革的试验区。邓小平在谈到为什么要确定这四个特区时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多”。

把这三个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要素集中起来，在这些地区进行如何培育市场经济的探索，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初步市场经济体系。把这些地区建成“由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区域性外向型经济形式”。首先把一部分沿海地区同世界市场对接，以加速市场经济的成长。尽管中国改革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农村，农村改革首先发生在安徽和四川等地，但它们只能启动改革，而不可能在这些地区首先建立初步的市场经济体系。因为在中国农村，尤其是内陆的安徽和四川等地的农村市场要素较少。上述沿海地区的初步市场体系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取得巨大的成功，不仅是因为沿海地区对外交流方便，也不仅是因为这些地区原有的基础设施较好，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里集中了中国发展市场因素的人力资源优势。沿海开放区市场取向改革的初步成功，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从沿海向内地推进，大大地加快了中国的市场发育和成长的过程。

第三，通过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从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方针，改革从体制外到体制内逐步推进。这是中国成功地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的主要之点。中国改革之所以能迅速地取得巨大成就，有两个重要的要素：一方面，是由于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另一方面，是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

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一方面在农村改革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化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中形成了一批

非国有企业有较高比重的开放地带，从而在原有的过分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上打开了两个大缺口。这些非国有企业是以市场导向为主的，一出现就表现出很大的活力，在改革中迅速壮大。随着非国有企业的壮大，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有力地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从而形成了改革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推进。国有部门是传统体制的堡垒，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困难重重。采取体制外大力发展非国有企业的办法，可以趋易避难，较快地发展起一批有活力的企业，带动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大多数人在改革中得益；它化解了改革中不可避免的经济震荡，成为经济持续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支撑力量；它通过竞争压力，推动国有经济的改革。但绝不是说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是无关重要的，甚至是消极的。恰恰相反，国有经济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既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可以说，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国有经济承担了体制转轨的成本，在维持自身运转的同时，培育了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并以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这些增长又创造了今天我们把国有经济的改革放到核心地位进行攻坚的条件。

这一点同苏东改革有根本的不同。苏东在发生剧变以前，始终围绕着国有经济做文章，没有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直到发生剧变前，国有企业的产值在工业产值中仍占有绝对优势，而国有企业的改革又迈不出步子，终于使改革陷入困境。在苏东剧变以后转而又把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了极大的经济震荡。一方面，出乎激进改革的设计者的意料之外，私有化并没有立即培育出市场经济的主体；另一方面，在政府需要在培育市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时刻，政府却变得两手空空，失去了调控经济的能力。日本经济学教授宫本胜浩在《俄罗斯与中国经济转轨之比较》一文中说，在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俄罗斯在1990年到1996年经济负增长方面不断创造新纪录。“虽然俄罗斯与中国同样是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为什么现在两国在世界上表现出了两个极端的经济特征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经济转轨时期的过程不同”。俄罗斯“实行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迅速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休克疗

法’，便产生了不适应迅速市场经济化的诸多问题。”“不仅没有让人看到市场经济带来的益处，反而暴露出通货膨胀、生产效率低下等弊端。”而“中国把国有企业作为骨干产业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的同时进行改革。

第四，中国式的渐进改革主张先进行小规模의试验。因为在探索新体制的过程中，大量的东西需要学习，大量的错误不可避免。通过试点，可以使人们迅速学到在旧体制下无法学到的、在西方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验中无法借鉴到的新知识，避免激进改革缺乏足够信息就去制定改革详细蓝图的致命缺陷；可以边试验、边纠错，避免激进改革无法逆转而带来的巨大风险；可以把大胆和谨慎结合起来，大胆地试，谨慎地推广，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可以避免抽象的争论，在实践中统一大家的认识。在改革之初，人们也不可能完全搞清楚改革的终点在哪里，尤其不可能完全搞清楚通过什么道路到达终点而对经济和人民的利益带来最少的伤害，只能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认清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

这条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是 80 年代以来 20 多亿人走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同时，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1997 年间 GDP 增长年均高达 9.8%，为同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的前两步。到 1987 年，中国提前三年实现了 GDP 比 1980 年翻一番，到 1995 年提前五年实现了 GDP 比 1980 年翻两番，到 1997 年达到了人均 GDP 比 1980 年翻两番，基本上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1981 年到 1997 年我国人口增加了 2 亿 5000 万（这与美国和前苏联的人口大体相当！），只用了 17 年的时间，在人口增长这么多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均 GDP 翻两番，创造了“中国奇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转轨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我国告别了生活必需品凭票证定量供应的短缺经济，全国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正在实现小康。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并不是有利无弊的路，仅仅是利大弊小的选择。中国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

问题。有些矛盾解决起来还相当棘手，有些问题还使人感到困惑。其中最主要的是存在着两个老大难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没有摆脱困境的问题，另一个是腐败蔓延的问题。

要正确评价和认识这些成就和矛盾、问题，都需要放到中国正在经历的两大历史变革（一个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一个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阵痛之中去考察。这两大变革无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都没有无痛分娩法。当然，在不同的国家，走不同的道路，这种痛苦持续的时间和程度是大不一样的。

西方国家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用了几个世纪，曾经历了十分痛苦的过程，发生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失业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阶级对抗。1895年，英国政治家塞西尔·罗得斯用十分露骨的口吻谈到，必须把第一个走向工业社会的英国当时面临的矛盾转嫁到落后国家。他说：

“我昨天在伦敦东头（工人区）参加了一个失业工人的集会。我在那里听到了一片狂叫‘面包，面包！’的喊声。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看到的情景，结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

“为了使联合王国 4000 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后起的现代化国家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没有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所享有的种种领先的好处，也不仅是因为它们面对的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建立的不公正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而且是因为它们要面对更加急剧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计算，19 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年变化率的主要指标只有 0.01%；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其社会年变化率的主要指标高达 1%。这些急剧变化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更加复杂。

体制变革也没有无痛分娩法。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还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和 30 年代大危机。为此，人

们把危机的发生看作是体制转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在已经工业化的条件下,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向市场经济过渡,也经历了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保加利亚经济学教授贝·伊列夫等人指出:“东欧国家的改革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例如:生产持续下降,失业增加并波及所有居民和各个阶层,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下降,通货膨胀率上升。”英国工党议会党团经济顾问约翰·罗斯说:“东欧 1989 年开始的经济变革、俄罗斯 1992 年 1 月开始的经济变革却导致了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他们的初始条件远远优于中国。就俄国来说,据世界银行估计,在改革之初,人均 GDP 相当于中国的 6.4 倍;俄国的农村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26%,而中国高达 82%;俄国成人文盲率为 2%,而中国高达 31%。但俄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竟发生了经济崩溃。

我们是在一个超过 12 亿人口的东方大国进行这两大历史变革的,更有特殊的难度。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一书中说:全欧洲和南北美洲住着 10 多亿人,这十亿人生活在约 50 个主权独立国家。而 10 多亿中国人则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管理和解决十几亿人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世界上几乎是个特例,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都没有接触过,更没有处理过。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谈到这一点时说:“不用说,要统治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协调各种集团(政党、军队、官僚、农民)的关系,取得进步而不产生社会的和思想的动乱,困难是很大的,对于哪怕最灵活、最明智的领导人都是一个考验。”世界银行《2020 年的中国》的报告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这两种转变的合力将产生强大的旋涡和逆流的浪潮,它们可能破坏稳定,而且总是难于预测。这种担忧不是凭空产生的。

在这两大历史变革的总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中国取得的成就,有助于认清这些成就来之不易。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说得好:“中国和它的 12 亿人正处在两大历史变革的阵痛之中: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和从农村和农业社会向城市和工业社会的变革。目前这两大变革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里谈到了中

国众多的人口，谈到了两大历史变革的阵痛，在这样的总背景下来看中国的成就，的确是惊人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在这两大历史变革的总背景下来考察当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两大历史变革同时并举，情况是最复杂的，内容是最丰富的，困难是十分巨大的，存在许多令人头痛的矛盾和问题是不足为怪的。

有矛盾，有问题，甚至有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不仁。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向东方侵略，同时向俄国、日本和中国挑战。日本和俄国都及时地作出反应，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而清王朝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与迟钝，终于错过时机，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有矛盾，有问题，甚至有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国民经济已到了破产的边缘，还高唱“到处莺歌燕舞”，使这次危机延续了十年之久。正是在这十年中，亚洲“四小龙”利用新技术革命造成的产业结构大调整提供的机遇而起飞，我们则在埋头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再次错过了一次重要机遇。

有矛盾，有问题，甚至有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惊惶失措。面对国际国内的种种风浪，面临改革攻坚的种种困难，不敢勇往直前，甚至想走回头路。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倒退是决没有出路的。

有矛盾，有问题，甚至有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忧患意识。如果不能激发起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就不可能克服传统观念和既得利益造成的种种障碍，两大历史变革中的一些坎就会迈不过去。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发展

马戎

马戎,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系系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研究、人口迁移研究、城市化研究、民族关系研究、西藏研究。参加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优生科学协会(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国际人口科学学会(理事)。

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社会学。因为这个讲座是面向全校同学,有些其他系和专业的学生对于社会学可能并不了解,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社会学这个学科和它的作用。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1. 什么是社会学?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点?

2. 社会学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人类社会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它所能提供的哪些启示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提供的?

3.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思想中也产生了许多疑问。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当前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为我们思考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社会学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一、什么是社会学?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的说法,“社会学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以及更广泛的群体、阶级、民族、文化乃至人们通

常所说的全部社会的宏观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2000:6)。换言之,凡是与人的社会性(而不是自然性,如医学、生理学等)相关的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等,也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那么社会学与这些学科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社会学与这些同样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学科相比,之间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它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而在于社会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当社会学用自己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来分析人类社会中与经济、法律、政治、历史等相关的现象时,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分支,如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民族社会学、人口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等。

二、什么是社会学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

1. 首先,社会学主张从综合和系统分析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现象,主张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机构、功能。人类比无机物、植物、动物要复杂得多,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现象也远比自然界要复杂得多。人类社会当中的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各种现象,都不是各自孤立发生、存在和变化的,所以不应该人为地用一些各自限定自己特定对象的学科(经济、法律、教育、文化等)把人类社会切割为几个似乎可以划分开的领域,而每个学科似乎只需要对其中某个领域予以关注。

例如:研究一个国家中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内容、教学方法等)是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政府关于教育的立法、历史上形成的民众对于教育的态度等等。

2. 社会学重视人类社会的“多元性”,我们在谈到当今社会的“全球化”时,必须要注意到,在这个地球上自人类出现以来直到今天,各个国家、地区长期存在着“社会多样性”(如同自然界存在着“生物多样性”一样),不仅仅存在着白种人、黄种人、黑人、澳洲土著这些肤色、体质方面的差别和种族多样性,还存在着在几

千年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个族群、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其中最主要的是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与文化多样性。欧洲的社会组织和宗教文化，与中国、印度的社会组织、文化很不一样。正是由于对于这些差异的认识，使得今天在一些国家里，“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思潮是并存的。

在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年代，空间和地理上的距离和旅行的困难，为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的人员和文化交流造成了障碍，人们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形成了在文化习俗、社会制度上的差别。应当说，在地球的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既存在共性和普遍规律，也存在着各自的特性、存在着多样化。

人类社会不但就地区、国家、群体而言，存在着多样性，每个个体也都有自己的特征，除非将来“克隆人”出现，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在我们分析具体个人的时候，也存在着一个多维角度的问题。

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社会学常说的“角色论”，即一个人可能同时具备多种社会角色。这个分析视角，比单纯强调其中的一个角色、一重身份，在解释人们行为的时候会更科学、更有说服力。比如在解放前，一个资本家，他凭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存在着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他与工人之间是阶级矛盾，这当然是很本质性的矛盾；但同时他可能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会拿出一部分钱做慈善事业帮助穷人；同时他可能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反对当亡国奴，为抗战而奔走活动；在政治上他可能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重要职务，反对共产党；但同时他可能还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发现儿子是共产党后，没有做到“大义灭亲”，而是掩护儿子逃走或保释他出狱。在这个人身上，实际具有多重角色，他的观念和行为，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下，根据各种不同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形成的。这应当说比简单地从他的“阶级成分”、“政治身份”这些单一的（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来对他下结论、做判断要更符合实际情况，在解释人们做出的看起来相互矛盾的行为方面，也更具有说服力。

3. 社会学重视社会变化过程的**动态分析**。社会的结构和人们的观念行为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不断在变化，它绝不是用**静态**的视角所能够解释与分析的。一个政策出台，在制定时，决策者是有他的种种考虑的，有一些原因促使他关注到这些相关的因素；当这个政策在社会中实际推行时，社会成员会做出一些决策者预料到并且期待的反应，但是也会出现其他决策者没有预料到的反应；最后政策执行所造成的综合性结果，很可能与决策者最初的预期不完全一致。我们看到了实际出现的结果，但是只有深入观察、跟踪政策推行全过程中社会里各个群体的反应、他们之间的互动、控制或影响这些互动的机制（官方体制的或民间传统习俗），才能理解和解释这些结果，分析最后结果与最初设计的预期目标之间发生差别的原因。

举一个例子，我们前几年在研究乡镇企业时，不仅仅注意政府对于乡镇企业的政策、这些企业印在书面上的规章制度和上报的各项统计数字，我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些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组织和协调机制，以及企业职工中各类群体对于企业决策过程和日常工作运行的评价。

三、社会学在方法论方面有什么特点？

1. 社会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和“实证研究”，反对一切教条主义

社会学在其创始时，主要的精神就是想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和实证方法**引入到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真正建立起“社会科学”。

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只能通过深入社会实际的亲身调查，从感性知识入手，经过归纳分析，使这些零散、反映现象的感性知识系统化并找出其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上升到理性化的知识，成为对社会变化规律的总结。这一点，是一切真正以科学态度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都会坚持的。当年毛泽东同志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各个阶级对于革命的态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为了了解北伐时期农村中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演变,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说,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大量深入的实际调查中总结出来的,凡是不符合中国国情、冒进或极“左”的方针政策,都是在缺乏调查研究、脱离实际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

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也是根据中国农村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总结了农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本着实事求是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精神而制定出来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改革事业得以不断发展的保障。这也正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精神。

2. 结合微观(个人)研究和宏观(群体)研究

经济学中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分别研究宏观经济现象和具体个人的经济行为。社会学不但研究这两个层次,同时十分注意把两者结合起来。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利益与个体也是密切相关的,群体的情绪也时常可以影响和感染个体的情绪。比如在北京有大约 250 万流动或暂住人口,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要分析他们来北京的原因,在北京从事的职业,他们收入来源的结构、数量与稳定程度,他们的消费,他们自身的组织和与北京市民之间的交往,等等这些情况,都只能通过对其中抽样选择出来的一定数量的个人进行调查才能够得到。通过个体的行为来认识群体,通过群体的行为来检验得自于个体的知识。

3. 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

这里有两点,一是作为科学的实证研究,所使用的各项指标必须能够量化,否则无法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只能满足于模糊的“印象”。比如有人告诉你说,一个地区的民族关系很好,过去很好,现在也很好,我们对于这个回答不会满意,因为这只是个“印象”,无法证明。如果他告诉你,1970 年这个地方两个民族之间只有 10% 学习并掌握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有 1% 的婚姻属于族际通婚,而 1995 年有 50% 掌握了对方的语言,在登记的婚姻中有 15% 属于族际通婚,如果这些数字准确,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个地区的民族

关系在这个时期内确实得到改善。因为根据国际上民族社会学大量实证研究的经验，这些指标可以说明民族之间交往和相互融合的程度。

第二个方面，就是通过科学的抽样方法，来确定微观层次的调查结果能否说明宏观群体。抽样方法来自数学的概率论，一个工厂生产 10 万个瓶子，如何检验产品质量的合格率？当然不可能把每个瓶子都测量一遍。数学概率论的发展向我们提供了抽样理论和技术，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和程序，抽选出 50 个瓶子，我们就可以有比如说 95% 的信心，认为这 10 万个瓶子的合格率有多高。这是数学证明了的方法，我们社会学的人拿来使用就可以了。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大量的数据已经完全用计算机来统计分析了。大量和及时地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是社会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也是社会学得以不断发展的一个关键。

4. 强调“比较研究”

大和小，高和低，冷和热，这些相对性的概念只有在具体事物的比较当中才存在，才有意义。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全球化”和“本土化”，事物之间存在着的共性和个性，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模式的特点，都只有经过相互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鉴别和确定。这种比较，可以是横向的，在不同地域空间和群体之间进行比较，如我们常说“要符合中国国情”，什么是“中国国情”？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有哪些共性，有哪些特点？我国的国有企业与其他国家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企业相比有哪些特点？这些方面的比较可以提供许多启示。“比较研究”也可以是纵向的，比较我国今天的国有企业，经过了一系列体制改革之后，与 80 年代初期的国有企业相比，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

通过实证性的比较研究，我们才可能获得可以体现在具体指标上的共性和个性的确定，提出有说服力的分析和研究成果。

四、社会学的应用

下面我们试图通过一些例子，来具体说明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之

间在视角和方法上有什么差别，在理解和分析实际社会现象中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帮助。

第一个例子：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政府开始重视经济生产，而且也重新反思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于“物质刺激”的极“左”批判。为了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工厂开始给一部分工人发“奖金”。从经济学的原理和在其他许多国家和社会中的实践来看，为一部分工作努力、成绩显著的职工发奖金，都可以起到“奖勤罚懒”的激励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国社会，人们普遍保留着“文革”运动中被强化了了的“平均主义”观念，所以奖金发下来之后，是什么结果呢？那时工人们当中通常是两种办法，一是大家商议好了轮流评“优秀”拿奖金，最后的结果是人人都有份；二是拿到奖金的工人把全班组请到饭馆里，大家一起把奖金全部吃掉。如果拿到奖金的人，不这样做，而真的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他就会在班组受到孤立和打击报复。所以这个在其他社会通常能够起到“奖勤罚懒”作用的发奖金制度，在那时的中国企业里对生产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只是徒然地增加了生产的成本。

如果对当时人们普遍的观念比较了解，通过“试点”考察一下在发奖金过程中人们的反应和实际效果，可能就不会大规模地采取这种激励的办法。

第二个例子：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以来，沿海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得很快，经济效益也很好，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到差不多三分之一，在出口中几乎占到一半。后来被邓小平同志称为“异军突起”。没有乡镇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的经济实力，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很难下决心的。人们长期讨论一个问题，当时许多原材料还没有在市场上完全放开，乡镇企业在购买这些原材料时比国有企业付出的价格要高，它们也不能像国有企业那样得到大量无息或低息贷款，它们向国家缴纳的税金也比国有企业要高，在进口设备原料等方面在审批、价格等方面也得不到政府给国有企业的优惠待遇，那么为什么在这种种不利的竞争条件下，乡镇企业产品的销售价格还能够低于国有企业产品，而且还能够赚钱、有积累和发展，而尽管各级政府千方百计支持和补贴国有企业，国有企

业还是严重亏损?

这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是很难解释的。因为经济学重视抽象的概念,见数字不见活人。而社会学最关注的是对活生生的人群的研究。我们1992年在江苏和山东调查了30个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乡镇企业,详细了解了它们的创立过程、日常管理、分配制度和推销产品的办法。通过这些个案的剖析,我们发现,这些乡镇企业以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不能真正称之为现代企业,它们是社区所有的经济实体,在土地的获得、贷款的争取方面得到了基层政权组织的全力支持,在分配制度方面也非常灵活。农民计算自己的劳动与城里工人是不一样的,作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他们没有其他的就业机会,而饭总是要吃的,所以到本村的厂子里干活,能挣到一点钱,他们就认为比在家里闲呆着要好。而乡镇企业如果破产,他们就连这个挣钱的机会也失去了。所以我们发现,当一些厂子在财务上面临困难时,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可以给乡镇企业工人少发工资甚至不发工资,而企业照常开工运转,这在城里的国有企业或其他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乡镇企业可以廉价得到本地的土地和其他资源(如粮食加工),可以说服职工少拿工资,这样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形成资本积累。

这些情况,不到实地去调查,不与当地企业职工具体交谈,是不可能了解到的。经济学家如果根据经济学的定理出发,根据“经济人”假设(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很难理解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现象,因为人们除了经济考虑(收入额)之外,还有其他考虑,如社会人际关系、道德形象等等。

第三个例子,我国自80年代以来,深感“文化大革命”时期法律秩序的破坏,提出“法治”建设的问题。这些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无数的法律,但是许多法律条文的名义、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西方国家的现有法律制定的,这些法律产生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之中,带有其传统政治观念的内涵,而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很不相同的传统。西方的法律注重的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作为个人有过什么权利?以保护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法律和法治精神,要在几千年传统的中国社会扎

下根来，是单凭全国人大通过几个法律就可以完成的吗？

可能有些法律条文，它们指的是什么？它们在西方国家被制定出来是为了限制什么？我们对此还没有搞清楚，就匆匆忙忙地拿过来并且通过了。大家也因此认为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了。但是事实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可以通过在基层社区、法院的调查来分析一下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你可能会发现，群众当中的纠纷，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按照老传统，在社区内通过地方权威人物或中介人寻求调解，调解不成才告到法院，而到了法院，法院的人员也首先是试图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在宣判的时候也必须充分注意当地民众传统的“公平”、“公正”观念，尽管这些观念与正式法律不完全吻合。民众当中，传统上有自己的“乡规民约”，有民间的习惯法。汉族有，少数民族也有。在执行政府官方制定的法律时，可能在公文上走的是官方规定的程序，实际调解、判案的过程还是参照了当地的习惯法，否则就会与当地大多数民众的预期相脱节，而带来社会上的其他问题。电影《被告山杠爷》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我们在考虑中国基层社会的“法治”问题时，不但要观其名，更要察其实。

第四个例子，民族关系问题。民族意识并没有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族群之间交流的加强而弱化，而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交流的增加而强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族群之间利益的再分配，一些民族原有文化的逐步消失，国际力量对于一些国家民族矛盾的利用与介入，在不同程度上都促进了民族矛盾的强化和发展，危及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治局势出现重大变动的时候，民族矛盾甚至会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民族之间的流血冲突。苏联和南斯拉夫就是典型例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藏、新疆等地的民族问题始终存在，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深入调查这些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以及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种因素，分析这些因素的作用，对症下药地制定各种可行性措施来切实改善当地的民族关系，实在是当务之急。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为种族问题所困扰，在政府

的鼓励下，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发展得很快，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一系列计量一个地区民族关系的指标体系和分析方法。如在居住地和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程度、相互学习语言和接受对方文化的程度、族际通婚的比重、分配方面的各种族之间的群体差异，等等，这些都可以为我们在研究中国各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和预见未来发展趋势时予以借鉴。这样的系统化的、可用具体量化指标测度的研究结果，与简单地听取当地干部的工作汇报和部分民众代表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相比，无疑是更符合实际、更深入和可信的。

第五个例子，教育问题。教育学的研究，一般把眼光集中于现有的学校（学校体制、教师、教材、教学方法等），通常是就教育谈教育。但是社会学在研究教育时，是把学校放到社会中，作为社会运行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来研究。

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是为了升学和升学率？还是为了使学生真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能够发挥作用的人才？我们的教材在什么程度上重视了基本素质的教育？农村初中生毕业以后，回村参加劳动，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在生产活动中哪些能够发挥作用？哪些完全用不上？这两部分的比重各占多少？为什么有一些农民不愿意送孩子上学，或者在小学三年级学会认字和简单算术之后就让孩子辍学？政府规定了职业中学的比例，这些“职业中学”实际上如何在运转？在什么程度上达到了政府设置职业中学的目标？这些也都需要社会学家通过基层学校的实地调查，根据第一手资料来回答。

而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为现代化培养新一代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目标是难以真正实现的。

第六个例子，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以政府体制改革和精简为例。我国许多地区的政府财政是“吃饭财政”，即是说，当地政府预算中的几乎全部或绝大部分是用于支付国家雇佣人员的工资和事业的基本开支。全国两千多个县，如果每个县的政府能够真正裁减下来5%—10%的人员，全国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的围困当中不得不实行“精兵简政”。今天中国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怎么减，减哪一部分人？开开一般的座谈会

是议不出结果的，只有对于一个乡镇政府、一个县政府的下属各个机构和人员以及他们的工作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实地调查，进行量化分析，确定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哪些工作是应当从政府机构转出来给社会的管理机构的，哪些是完全不需要管理的，哪些是现有机构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人为“创造”的？在这些对于工作职责和工作量的具体调查和计量之后，才有可能提出有充分说服力的机构改革方案。

最后一个例子，腐败问题。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贪污腐败成为我国社会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检察院设置了“反贪局”，制定了一系列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律，民众对贪污腐败更是深恶痛绝。但是许多年过去了，似乎腐败分子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为什么？政府干部队伍是十分庞大的，腐败分子（揭发出来的）与公认的廉洁自律的干部之间，存在哪些不同？他们各自有哪些特征？反腐败十几年了，这些问题并没有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过去常常用来审查干部的一些指标，如“家庭出身”、“阶级成分”，虽然有些“政审表”中还保留这些填写项目，在建国 50 年后已经不能说明问题了。成克杰、胡长青似乎出身都不错，也都在党旗下宣过誓，为什么沦为腐败分子？

要分析腐败的产生，要从制度因素、单位小环境、个人因素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调查。“权力”的行使能够使得其他某些人在经济上获利，那些人为追求利润就有足够的动力来行贿，在制度上逐步缩小“权力”作用的空间，也因此势在必行。这是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多年来进展不大，为什么？

现在许多单位（政府各部，地方上的省、市），都在以各种名目发奖金福利，而且明显地向领导干部倾斜。许多做法是“抢黄灯”，“踩线作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领导干部在自己管辖的单位、部门里明显地占有许多额外的好处（金钱、住房、公费旅游等等），这种大量长期存在的现象，无疑使一部分领导干部不大清楚什么是“合法的干部福利”，什么是“违法的腐败行为”。“间接地”接受（如吴文英自己没有拿钱，儿子拿了；成克杰自己没拿，情妇拿了），他们认为没有责任，如果装钱的信封上写的不是“贿赂款”，

而是“介绍费”、“董事津贴”、“股票分红”，似乎在“市场经济”中也无可厚非。各个单位向领导干部倾斜的滥发福利现象，今天仍然比比皆是，营造了向腐败迈进的环境和气氛。这一点，政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此外，还可以对揭发出来的腐败分子进行更深入的调查、分析和比较，仅仅总结为“学习不够，党性不强，放松思想改造，被资本主义思想侵蚀了原来健康的肌体……”是很不够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话，等于什么都没说。当然，这个方面的调查研究，是很难开展的，因为腐败现象、“准腐败现象”太普遍了，人们往往会“对号入座”，十分警惕。

前几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重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问题，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文化被“五四运动”和革命所摧毁，而共产党一度提倡、在“文革”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共产主义道德文化”，随着对“文革”的批判和“伤痕文学”的流行也失去了事实上的威信，在这样的“道德真空”和文化氛围中，大力提倡经济致富，很容易使人们“见利忘义”（甚至没有了“义”的概念），这是社会腐败的文化土壤和群众基础。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口号、措施（反贪、严打、扫黄、质量万里行、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中国社会在过去一百年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社会的许多基本制度（经济体制、政治体制）都在发生重大的变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在变，变得用传统的理论（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公有制绝对比私有制先进的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中国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不对体制进行变革，不及时吸取国外的发展经验，中国就会落后挨打。正是这种非常实际的考虑、非常负责任的考虑，使得我国的领导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体制在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也必然随着各种激励机制的改变在变化。国家在改革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经验，是在摸索中前进，“摸着石头过河”。民众在面对新的体制（所有制结构、企业

破产重组)和新的激励机制(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时,也没有经验,也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很多人,特别是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少的年轻人,“跟着感觉走”。

这样大规模深刻的社会变动,为社会学提供了研究社会变迁的最好的研究对象,既可以通过这些研究在学术上做出极有价值的成果,也可以用这些成果为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应用性价值。我们可以研究的重大专题有:国有企业改革、乡镇企业改制、产权制度变化、土地制度的变化、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学校体制改革、农村基层组织变化、城市流动人口、民族关系演变、犯罪问题的演变、宗教组织变迁,等等。这些研究专题都是与我国的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在这些重大专题的研究中,社会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使民众的认识和政府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更加符合社会实际。

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事业在呼唤社会学,改革事业也将造就中国的社会学,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在这样一个天地里是大有可为的。

谢谢大家。

就业、民营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启动

厉以宁

厉以宁,男,1930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任教。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第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等职务。厉以宁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证书、“金三角”奖、教育部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最高奖)等。

一、发展民营经济和城镇化将缓解就业压力

撇开农村外流的劳动力不计,单以城镇劳动力而言,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城镇居民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来自各级学校的毕业生,包括大学专科、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以及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还有初中、高中毕业而未能升学的、寻找职业的人。另一部分则来自国有企事业单位,他们是被裁减下来的人员,或者是因为企业破产、倒闭,事业单位撤消而寻找职业的人。其中,有些从国有企事业单位分流出来的人员,年已较大,他们有时被认为是“提前退休者”或“买断工龄的人”(尽管这一称呼既不妥当,也不准确),但他们仍在继续寻找工作。

那么,这些寻找工作的人将在何处找到工作呢?应当承认,国

有企事业单位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是有限的。它们或者在压缩编制，不需要添人，或者自身经营状况不佳，连现有的人员都感到难以安排和支付工资，因此不准备再增加人。如果由于开展业务的需要而必须招聘职工的话，那么在学历、年龄、技术标准方面的要求是较严格的，并且名额通常有限。于是，劳动力的就业去向显然是在民营经济方面。

民营经济的覆盖面是相当广泛的。私营企业、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无疑属于民营经济的范围内。已改制的、多元投资主体组成而且并非国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也属于民营经济。此外，农村的承包大户，包括种植大户、养殖大户等，同样应被列为民营经济。由此可见，民营经济实际上是和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相对而言的。民营经济作为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去向，是指来自各级学校的毕业生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分流出来的人员，大部分将在私营企业、合伙企业、多元投资主体组成而且并非国家控股的企业中就业，还有一部分人有可能作为个体工商业户而自营自立。哪个城市的民营经济发展得越快，城镇就业压力就会越小；反之，哪个城市的民营经济越不发达，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少，那么城镇就业问题就越不容易缓解。

民营经济按照经营内容和生产要素组合方式来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科技型的民营企业，一类是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科技型的民营企业的特点是其产品技术上先进，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作人员；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的特点则是能容纳较多的劳动力，而且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并不很高。这两类民营企业都有增加劳动力的需求。科技型的民营企业希望能招聘到高学历的、在技术上有专长的员工，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主要吸纳一般的劳动力。因此，各级学校毕业生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分流出来的人员，将因自己的学历、专长的不同而分别流向科技型的民营企业或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

为了缓解中国的就业压力，必须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除了依法保障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应当针对科技型民营企业的特点和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

促进科技型民营企业的发展的主要措施有：

1. 要营造一个有利于科技型民营企业建立与发展的环境，简化成立科技型民营企业的手续；从税收政策上提供税收优惠，及早健全与完善有关创业投资的法律法规。

2. 为科技型的民营企业的融资创造条件，特别是要建设一个多层次的证券市场体系，包括主板市场、二板市场、柜台交易等。为创业投资者的进入与退出提供便利，为科技型民营企业在不同层次的证券市场上融资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

3. 为知识产权入股和科技型民营企业的股权奖励制提供较宽松的条件，以促进出口高素质人才向科技型民营企业流动。

4. 保护知识产权，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要依法惩处。

促进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的发展的主要措施有：

1. 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建立与发展的环境，简化成立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的手续；对某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可以按照吸纳劳动力的数量，实行递减的税收措施，以资鼓励。

2. 为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取得银行的贷款提供便利，包括设立主要为中小企业贷款的地方商业银行，为便于中小企业取得银行贷款而建立贷款保证基金。

3. 为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的职工自愿入股提供法律、法规、政策的依据。只要企业投资人和职工双方都同意，就可以容许企业实行职工持股制，而不要輕易地指责为“乱集资”加以取缔。

可以相信，无论是科技型的民营企业还是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只要都有较快的发展，不同层次、不同技术水平的城乡劳动力都有机会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工作岗位。而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这两种类型的民营企业都有发展前景，也就是说，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前景将是较好的。假定不采取发展民营经济的办法缓解城镇劳动力就业问题，我们几乎看不到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能减轻城镇的就业压力。

城镇中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但可以缓解城镇劳动者急盼就业的压力，而且也有助于扩大城镇规模，例如使原有的小城镇因就业人数

的增加和工商业的发展而逐步变为中小城市，同样的道理，民营经济会使中小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于是就涉及城镇化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问题。

城镇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在全体人口的比重都会逐年下降。农村人口迁向城市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包括原有城镇规模的扩大和新城镇的建立。计划经济时期都如此，何况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经济越是转上市场体制的轨道，城镇化越会加速。对中国而言，采取多种措施加速城镇化，也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为缓解就业问题所必要的。下面，让我们专就缓解就业问题的角度来考虑城镇化的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了城镇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来自民营经济。接着，让我们再对农村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作一些分析。农村劳动力的供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农村中已达到就业年龄而指望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以外找到工作机会的青年人。二是农村中已经不满足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之上劳动而想到外面去工作的人，或者，由于承包的土地面积有限，已经无法再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上谋生的人。三是近年来一直在乡镇企业中工作，而由于乡镇企业不景气甚至倒闭而不得不离开乡镇企业，但又不愿回到自家承包的土地上劳动，或者承包的土地已经转让出去而无法回到原来承包的土地上劳动的人。这三方面的劳动力构成了寻找工作岗位的农村劳动力基本队伍。他们人数众多，并且会逐年上升。

那么，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来自何处呢？大体上来自以下方面：一是农村的承包大户；二是设在城镇的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单位，从事筑路、兴修水利等劳动。此外，还有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自行外出，到城镇或其他农村从事个体工商业活动，如摆地摊、开小店、做货郎等。其中，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农村谋生，大多数人将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进入城镇，在城镇中寻找工作的机会。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农村人口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不断降低的过程，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意味着城镇化的进展。

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从农村吸纳劳动力，使他

们成为城镇人口的一部分。不管在户籍管理上，这些人是不是依旧保留着农业户籍，但从生活方面看，他们已经融化在城镇生活之中了。城镇化程度越高，城乡过剩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越多。因此，需要研究的是，究竟什么样的城镇最有利于吸纳城乡的过剩劳动力，如何建设这样的城镇。

从城镇规模的角度看，城镇规模小，吸纳的城乡劳动力总是有限的。小城镇对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固然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吸纳城乡过剩劳动力方面，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主要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同城市的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小城镇虽然也有一些商业、服务业务设施，但这些设施的规模不大，所吸纳的就业人数也很少。而大中城市，由于规模大，人口多，交通便利，不但是商业中心，而且往往是文化教育中心、信息中心，甚至是金融中心，第三产业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在第三产业中工作的人数也就多得多。加之，靠近农村的一些小城镇里的居民，在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上通常没有摆脱农村的影响，对生活服务方面的需求不多，所以第三产业的市场有限，而大中城市的居民在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上则已经城市化了，他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生活方面的需求，从而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也就有可能成为劳动者就业的场所。

因此，要缓解城乡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在现阶段，不仅要继续发展小城镇，更要发展大中城市。不能认为中国的城市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无法再扩大了。只要规划很好，配套措施相应地跟上来，即使是大城市仍有继续发展的必要与可能。假定再考虑到大中城市同小城镇相比，土地利用率要高得多（小城镇建筑占地过多），能源使用效率也有效得多，所以在经济上是划算的。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大城市给居民带来不少生活上的不便，如果规模继续增大，岂不是给居民更多的不便么？对这个问题，当应从动态的角度来考察。要知道，大城市中居民生活的不便，正是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准备了极好的条件。这表明社会生活服务方面的市场很有帮助。只有发展第三产业，才能使大城市居民的生活日益方便。比如说，要使大城市居民生活方便，社区服务、老年人福利设施、儿童教育

设施、病人照顾服务等都可以吸纳许多工作人员。城市交通、通讯、信息服务等设施的发展，又会增加就业。

城市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如果仅仅把城市当做工业中心，即认为城市是工厂集中的场所，那么第三产业的发展是有限的；如果把城市作为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看待，并据此制定发展规划，那么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有很大的余地。第三产业中的许多行业将应市场的需求而兴起，这些领域内可以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也是未可限量的。由此可以了解到，城市应当朝综合性城市的方向发展，这样既能更好地发挥城市的功能，而且也能使第三产业发展得更快，从而缓解城乡就业压力。中国最近数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工矿型城市有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居民生活不便、就业问题难以缓解，特别是某些采矿业为主的城市在矿产资源趋于枯竭后，城市财政发生危机，就业压力也会越来越大。由于工矿型城市的建设已是历史事实，所以当前这些城市正面临着较迫切的转型问题，即使之朝综合性城市转变。显然，这种转型并非易事，但转型不管会有什么困难，都势在必行，否则一些城市就会从此衰落下去，而就业问题也会越积越多，更难以解决。

二、农村市场启动同就业之间的关系

中国农村目前究竟有多少过剩劳动力，很难估计。据有些刊物披露，至少有1亿人，多则1.6亿、1.7亿，甚至1.8亿人。他们在农村中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或者一年之中只有几个月有事可做。他们不安心农村生活。他们向城市的流动是阻挡不住的。这同农村劳动力的收入状况直接有关。可以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预期收入三个方面进行考察。绝对收入偏低，农村人口为贫困所逼，外出谋生。这就是农村劳动力外流中“推力”的作用。相对收入偏低，是指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的现期收入同在外地工作相比后，感到自己的收入偏少。相对收入偏低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的现期收入的多少不一定有关。比如说，某些农民家族在当地农村中已经不算是贫困户，甚至他们的收入在当地农村中已属于较高

水平，但只要相对收入偏低，他们仍会外出寻找工作。这就是农村劳动力外流中“拉力”的作用。预期收入主要是指：农村劳动力考虑到留在农村与外出工作相比，今后可能得到的收入的比较。如果外出的发展机会多，将来有可能成为业主或收入较丰厚的技术骨干或经理人员，那么即使现在留在农村中的收入并不算少，目前外出所赚得的收入也不会较多，但将来的收入会大大增加，那么在经过比较之后，农村劳动力仍会选择外出的道路。这可以说是涉及到个人前景的“推力”与“拉力”的共同作用。

假定要设法延缓农村劳动力的外流，那就有必要从上述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变动来着手分析。延缓外流，不等于不外流，而只是避免外流的势头过猛过急。

从绝对收入的角度来看，只要让农村人口的收入增长，消除他们因贫困而无法谋生的压力，农村劳动力外出的“推力”就会减少。

从相对收入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绝对收入上升后，外出取得收入的“拉力”多少有所减轻；另一方面，如果外出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偏多，在外地寻找工作的机会下降，外地工作的收入会因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而出现降低的趋势，那么仍有可能延缓农村劳动力的外流。

从预期收入的角度来看，要延缓农村劳动力外流，关键在于让这些劳动力在农村同样有成为业主、技术骨干或经理人员的机会，使他们有获取较丰厚收入的机会，特别是要使他们感到即使留在农村，前景同样是美好的。

从这三个角度分析的结果表示：提高农业生产率在这里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农民的绝对收入水平肯定会上升，农村市场会因此而真正启动起来，农村的各行各业都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从而农民留在农村中，就业的机会，赚取较多收入的机会，成为业主、技术骨干或经理人员的机会，也会逐渐增多。于是，外出寻找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仍会有，但外流的速度都会减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将在农村中发挥自己的才能，走致富的道路。

那种认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只会促使更多的劳动力外流的

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片面的，也是肤浅的。它之所以是片面的、肤浅的，因为只看到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同样产出的条件下所需要的劳动投入较少，或者说，每一亩耕地上所需要的劳动投入减少了，于是就会出现更多的过剩劳动力，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外流，而没有看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会启动农村市场，会导致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从而会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上述观点之所以是片面的、肤浅的，还因为它没有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可能引起的农业投资的增加考虑在内。要知道，现阶段不少地区的农业投资是不足的，富裕起来的农民不愿继续于农业，城市的工商户不愿到农业中投资，一些民营企业也认为向农业投资无利可图。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情况就会发生变化。愿意投资于农业的个人和企业都会增加，农业中资本不足的状况将逐渐改变，而投入农业的资本越多，农业劳动生产率就越有可能提高，农业的投资收益率也就会相对地上升，这样又会吸引更多的人和企业来农业投资，形成良性循环。结果，农村过剩劳动力在农村中和农业中就业的机会也会增加。

在一些会议上我曾经说过，全世界最大的“金矿”在哪里？在中国农村。试问，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今后有这样广阔的农村市场？9亿农村人口，约2亿多农户，每户添一台电冰箱，需要多少个电冰箱厂为此生产？每人每年添两件新衣服，要多少家纺织厂为此提供衣料？每户买一部客货两用的汽车，市场该有多大？到那时，农村需要多少加油站？要多修多少公里的公路？光是筑路工人、汽车检修人员、家用电器维修人员，需要多少？这样大的市场，除中国以外，全世界哪里有？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多方面的变化，使农村劳动力不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供选择，而且还有更多的自行开业、创业的机会等待着自己去争取得到。这就是我们可以期盼到的农业前景或农村前景。农民想致富，农民也能够逐渐富裕起来。公司加农户是行之有效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模式，应当进一步推广。

对前面谈过的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讨论，这就是需要把就

业前景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考察。在相当多的地区，特别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说法，再延伸一点来说，那就是“靠地吃地，靠林吃林”。一个“靠”字，实际上包括了对自然资源的滥伐滥用而不加以珍惜、保养。结果，树木被砍伐光了，被破坏了，草场被过度放牧而枯竭了，河流湖泊被污染了，耕地越来越贫瘠，甚至沙化了。这就使得原来的这些地区居住、劳动的人的收入越来越少，难以再依靠山、水、土、林为生，不得不外迁谋生。而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给当代人和后代人留下了沉重的包袱。

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把“靠”字改为“养”字。重在保养。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地吃地，靠林吃林”改为“养山吃山，养水吃水，养地吃地，养林吃林”，才能使自然资源得到保养，被人们合理地、长期地利用，才能使环境得到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这是利国利民，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同时，把“靠”字改为“养”字，又为就业量的增加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大规模治荒治沙，植树造林，种草，防止水土流失，提高土地肥力；持久不懈地恢复草场的生态平衡，制止乱开荒，制止过度放牧，有计划地整治河道，消除河流湖泊的污染源，引水治旱等等，都需要大量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这就包括了许多工作机会的出现，城乡过剩劳动力将在这些工程中获得就业岗位。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的严格执行，将消除对环境与资源的继续破坏，而政策的放宽和实施则有助于财力、物力、人力向这些领域的增加投入。比如说，为了有效地治荒、治沙、种树、种草、改良土壤，防止水土流失，要鼓励个人和企业进行投资，因此，土地承包期应当延长。理由是：只有延长土地承包期，愿意投资的个人和企业才会感到投资是合算的，才会从事治荒、治沙等活动。又如，对治理好的土地，要允许转让使用权。如果某些个人或企业，经过投资，把一片沙地改造为可利用的土地了，他们就可以把它转让给他人，以便投资早日得到回报，并有积极性继续投资来治沙。投资者在从事这些工程时，必然要雇佣一定的劳动力，有时还需要聘用技术人员，这样，就业人数将会增加。

异地开发是另一种可行的、维护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增加居民收入的方式。在一些自然环境较差的地区，居民生活困难，收入水平低下，不得不以破坏生态的方式来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结果自然环境更差，居民生活更加困难。为了解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行的办法就是动员当地居民外迁，然后封山育林，或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居民外迁到平原地区以后，谋生的机会多了，收入的增加也就有了保证。在新建的居民区，随着居民生活的安定和收入的增加，往往增添了若干新的就业岗位，就业人数也增加了。

“愚公搬家”还是“愚公移山”，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增加居民收入的角度来看，应当选择“愚公搬家”之路。如果居民依然住在山上，靠开荒砍树为生，收入增长不了，自然环境必定日益恶化。异地开发，正是有助于贫困农户的脱贫的措施。有人说，要保持与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这完全正确，艰苦奋斗创业的精神要一直保持下去。异地开发，移民们在平原地区艰苦创业，不正是这种精神的发扬么？发挥艰苦奋斗创业的精神，并不意味着居民要始终居住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整日靠开荒砍树为生。如果他们依旧像祖祖辈辈那样，长年累月地住在高山上，生活既困难，又同外界隔绝，信息不通，文化闭塞，靠破坏生态来维持最低生活，这怎么谈得上艰苦创业呢？何况，即使老一辈农民愿意留在山上，过着艰苦简陋的生活，难道他们的儿子、孙子不想读书、上学？能拴得住他们么？外地的女子不愿意嫁到山里来，难道山上的年轻男子甘心一辈子做单身汉？可见，异地开发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假定我们把全国按经济发展程度划分为一、二、三类地区，经济不发达的省和自治区无疑属于三类地区。假定我们仍按经济发展程度把每一类地区分为甲、乙、丙三个档次，“三类丙”就是最贫穷的地区。怎样对经济不发展的省和自治区进行开发？有人认为，既然“三类丙”最贫穷，那就应当首先帮助这些地区发展经济，多向那里投资。然而，根据已有的经验可以了解到，这种投资重点的安排是缺乏效率的。应当首先发展“三类甲”，即做大原有的中心城市，使它们的经济实力增强，并由此向周围地区辐射，“三类丙”

地区的城市和小城镇的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周边的农村经济也会好转。至于“三类丙”地区的边远地带的农民，以及居住在自然环境较差地区的农民，则应当向外迁移，该下山的下山，该迁出自然保护区的迁出来。异地开发，异地创业，可以大大加快三类地区，尤其是“三类丙”地区的发展速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地区城乡就业问题的缓解也就有了保证。

中国的就业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对此应从隐蔽失业向公平失业的转化谈起。

在《转型发展理论》（同心出版社 1996 年版）一书的第 75 页，我曾写道：“隐蔽失业的存在是计划体制下的一种特殊情况。比如说，企事业单位中人浮于事，尽管一些人闲着没有工作做，但只要有工资可领，只能算隐蔽失业，而不能算公开失业。广大农民则被看成是全部就业的劳动者。对他们来说，不存在失业问题，而只能称他们是隐蔽失业者。”隐蔽失业者是一个大蓄水池，随时向外输水。以农村来说，外流劳动力的人数既取决于“推力”，也取决于“拉力”，“推力”和“拉力”同时起作用。外流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同农村以外的就业状况，即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状况有关。农村以外较易于找到工作，外流人数就多一些；如果农村以外暂时难以找到工作，外流的速度就会放慢。如此年复一年，流动不止。不仅如此，单以农村来说，每年新增人口 1000 多万人，也意味着每年有 1000 多万人到达就业年龄，他们会加入到隐蔽失业者这个大蓄水池之中。因此，只有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使由农村外流的劳动力逐渐减少。

城乡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会一直存在。即使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就业问题也只能逐步缓解。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呢？从总体上说，只有经济运行转入了良性循环，经济发展状况才能被称为良好。就业问题将在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之后好转。所以，经济运行能否转入良性循环，是一个关键。

什么叫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简要地说，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是指：在不过分依赖政府投资的条件下，靠经济自身的力量使社会

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要知道，政府投资在任何时期都是存在的，政府投资刺激了社会总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率。问题在于“不过分依赖政府投资”，而要靠“经济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这里所说的“经济自身的力量”，是指非政府投资（包括来自企业的投资 and 个人的投资）以及社会的消费支出。那么，企业和个人为什么投资于经济之中呢？一定是由于产品有销路，投资有合理的回报率，这样，非政府投资才能被启动，成为发展经济的力量。社会的消费支出来自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居民从投资、劳动、储蓄等方面取得了收入，其中一部分转化为消费支出，从而使市场上的产品有销路，同时也保证了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的合理的回报率。

经济运行转入良性循环之后，政府投资将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这可以吸纳一定数量的新增劳动力。经济主要依靠企业投资和个人投资未实现持续增长，从而为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开辟了渠道。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和消费支出的上升，则又可以使一部分新增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因此，就业压力的缓解，在经济运行转入良性循环之后，是可以期待的。

经济运行怎样才能转入良性循环？前提是有有效的体制创新。经济运行的主体是企业，因此企业体制创新是促使经济运行转入良性循环的最重要环节。只有使企业真正成为政企分开的、多元投资主体组成的、富有活力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才能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投资和经营。企业的投资是对投资者负责的，盈亏是由投资者承担的，利润率多少是企业作出投资决策时首先考虑的目标。这样，经济运行过程中才能在不过分依赖政府投资的条件下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与此相应的是，市场体制应当创新，应当建立有效的资本市场体制、技术市场体制、劳动力市场体制等等。企业和个人作为投资者，能在有效的资本市场体制下进行融资活动，经济的增长将有保证。个人作为劳动者，能在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体制下进行流动并找到适合于自己发挥才能的工作岗位，效率将会提高，收入也会随效率的提高而上升，这就为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

基本平衡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实现创造了条件。而技术市场体制创新与资本市场体制创新的结合，又为产业的升级、高新科技产业的成长、市场竞争力的加强以及人才的吸引、激励等起着重要的作用。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技术力量与技术水平的竞争，而这取决于人才的竞争。只有体制创新了，经济才可以在不过分依赖政府投资的条件下，靠经济自身的力量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正是当前中国面临的形势，也是中国必然要作出的选择。

就业问题在经济持续增长过程得以缓解，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作了分析。现在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就业是依靠就业来不断增加的。一批人就业了，他们就有了收入，就需要消费支出，于是就使另一批人获得了就业机会，而后者有收入后又会花掉，这样又会促使更多的人的就业。各个就业者的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在增加就业的过程中起着作用。此外，各个就业者未用于消费支出的那部分收入，成为储蓄，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也会使就业余数增加。“以就业扩大就业”的设计，在经济体制创新和经济运行转入良性循环后，将成为事实。经济转入良性循环，意味着要依靠经济自身的力量来维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就业人数的增加、收入的增加、消费支出的增加和投资的增加，都依赖于体制的创新，依赖于国有经济的重组、结构的调整和民营经济的介入，依赖于对资本市场的充分利用和产业的升级，依赖于人力资源使用的发挥，也就是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体制创新的确是关键所在。

当前经济中存在着某些产品积压、滞销、内需不足等情况，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决不能把这些情况的出现说成是供给过剩。在人均国民收入刚刚达到 800 美元的中国就出现供给过剩是难以想像的，也是无法从经济学上得到解释的。是市场尚未真正启动，还是市场容量已经饱和？是人们对市场前景（或就业前景）的信心不足，还是市场前景已经临近极限？是人们真的不想购买，还是人们抱着“可买可不买的暂且不买”的念头？肯定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就业不易，失业可能性增大，使人们对前景缺乏信心，“可买可不买的就不买”，从而看来似乎是供给过剩了，实际上却是市场尚未启动。

通过体制创新，经济运行转入良性循环以后，就业机会的不断增多和收入的上升，将改变人们的预期，使人们逐渐从“可买可不买的不买”转到“可买可不买的，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不仅得以实现，而且将在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二者都增大的条件下实现。所以，“以就业扩大就业”将使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长期维持下去。

世纪之交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回顾与前景

晏智杰

晏智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院院长（1993年12月起）。主要学术兼职：中华国外经济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北京大学国外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等。曾任北大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86-1989）。祖籍江苏仪征，1939年12月生于古都西安，1957-196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62年本科毕业，考取本系研究生，师从我国经济学界元老陈岱孙教授攻读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1965年底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曾先后赴美、德研修。晏智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的主要研究领域，除了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以外，近些年又更多地转向中国经济改革及中外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

一、我们要继续努力，建立中国的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

我们应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并不意味着是一种狭隘、保守、民族主义的经济学，而是开放的，前进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学说。在艺术作品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经济学也一样。在中国，经济学是最热门之一，但中国经济学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还处于初期探索的阶段，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看看我们手边教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观点存着严重对峙现象，但在我们的教材里却是相安无事地并存着，老师可以各讲自己不同的理论，结果成为“两张皮”，两种制度、两种

现象，最好的结局是使学生无所适从。这是个客观的现实，对此我一点也不隐讳。这能说明我们现在有了统一的、完整的、成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吗？没有。就中国经济发展而言，还没有到能出现成熟经济学体系的时候。我们不妨参考一下西方，西方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从它产生到其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框架，至少100年，从17世纪下半期到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标志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形成，那已是经过了100年之久。再往后，经过产业革命，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又一个成熟阶段，形成了新的自由竞争的完整体系。又经过100年，1770—1890年，马歇尔经济学出现，马歇尔经济学出现到现在又是100年，这中间又发生新的变化，在西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研究，从开始产生到成为框架经过了一个世纪，从框架搭成到自由竞争阶段成熟的研究，又是一个世纪还多，然后又拿出一个世纪才达到现在这个阶段。300多年到400年的历史才形成了现在我们接触到的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人家走了这么长时间，经过这么多阶段才有今天，那我们能设想这么快就建立中国的成熟的科学的经济学体系？我以为不可能，这是一个经济制度的演变，是十几亿人的社会制度演变的进程。

如果我们再回顾一下中国经济学的情况，对我们建立中国经济学的长期性、艰巨性就更应有思想准备，更不能着急，尽管我作为一个经济学院院长，我非常希望现在就有成熟的理论拿出来，不要给同学教这种“两张皮”的东西，但事实上谁也拿不出来。因为经济学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舶来品，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建立自己独立的经济学，这是常识，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何来成熟，发达的经济学呢？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学的讲坛是被引进的西方经济学支配的，说不上有自己的经济学，解放后随着我们国家政治路线的演变，我们立即把西方经济学赶出校门，引进苏联老大哥的经济学，那是变了形的，由苏联人加以改造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支配我们的讲坛又是很长一段时间，从解放初到50年代那是全盛时期。1958年之后，随着政治路线的变化，在经济学战线上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那时是想探索自己的经济学，结果呢，

失败，因为 1958 年之后经济发展策略的失败，导致我们经济理论的失败。“文化大革命”更是对文化的毁灭，对经济学的践踏，完全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玩偶。中国经济学真正走上轨道，真正研究解决问题是从改革以后开始的，到现在 20 多年怎么可能搞出自己成熟，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呢？不可能的，这是一种客观的观察，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愿望为转移的。关键是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经济发展和改革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这条道路没有为我国中国经济学的建立提供客观可能性，因此不可能建立。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确有一些科学家、经济学家在他们当时有限的理性思考、科学思考，得出了某些在现在看来很有局限性的东西，但在当时仍遭到的厄运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呢？北大老校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的遭遇是一个典型，我们北大经济学院老院长陈岱孙又是一个典型，他 1924 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7 年成为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 年成为北大经济学系系主任，他是一个经济学理论专家、财政专家，也是一个爱国者，可是解放后 20 年（1957—1977 年），他被迫保持了沉默，学术上沉默了。我们有多少有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因为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当时都遭到了比陈岱孙更悲惨的命运。在这种环境下，还能搞什么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呢？还能有什么认真的经济学的科学思考呢？这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轨道，也使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异常的活跃，并且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这些成就是过去几十年加起来都不能够相比的，是一个新的飞越，但就是这样我们也得冷静地看到那离我们要建立的理论经济学还差得很远。我们现在不仅是在应用问题上七嘴八舌，而且在一系列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更说不上共识，因此不可能有一种主流经济学，涌现出来支配所有的理论。这种情况在西方屡见不鲜，在其几百年经济发展史上都不例外，因此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理应对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建立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这一点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性急是不行的。当然这绝不是要降低努力的力度。时不我待，形势不允许我们有任何的懈怠，我们要加紧努力，世纪的发展，中国的发展，要求我们尽快的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

我们要踏踏实实，按照事物规律，一步一步往前走，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意思。

中国需要自己的经济学，但现在中国没有，对这一点要有明确的认识。但是就是这一点，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不管理论家们是不是提出系统论证，更多的是一种看法，一种认识，一种习惯，不认为问题有这么严重。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两种倾向，一是偏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存在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任务，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拿到中国来用就可以了。最常见的提法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管这些问题多么新，多么艰巨，他们认为都能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答案，如产权制度改革，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劳动价值论和发展等等，都能找得到，关键是我们这些后来人没有读懂没有理解。我发现，在中国经济学理论界有一些同志把自己的功夫都用在书本上了，说得难听一点，是习惯了从书中讨生活，认为老祖宗都是对的，是我们这些门徒的问题。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对马克思主义抱着一种非常虔诚，近乎宗教教徒的忠诚，拒绝对它作出进一步的思考，更不用说提出质疑和批评了，谁要是这样做，他们会认为这些人太“右”了。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还很严重。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对西方经济学完全是另一种态度，认为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除了马克思肯定的古典经济学还有几分科学成分之外，其余的都是庸俗经济学。照此说法，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30年代的发展进程就终止了，因为古典经济学在那个时候就终止了，往后就是庸俗经济学，马克思之后呢，西方经济学该怎么说呢？马克思的书没有说，那我们的经济学家有办法，马克思说的是早期庸俗，死后的这一段是晚期庸俗，从20世纪30年代之后，庸俗经济学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总危机阶段，这就是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西方经济学的总看法。总而言之，这些人总认为自己的是最好的，别人的都要批判。这就是一种倾向，并不生疏，而且大量存在着。另一种倾向也不太赞成提出中国经济学。要创立符合中国的情况，解决中国的问题，为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青年学生和干部喜闻乐见，能够反映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

理论体系，他们从另一个角度不赞成这种要求。他们讲没有必要，既然我们从过去的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那就说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中用了，那是伪科学，应该扔到历史的垃圾堆去，西方经济学经过那么多年的发展，早已经成熟了，完整了，我们拿过来用就是了，还搞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如果要有有什么改造的话，就是把中国的情况加进去，搞一些例子，就可以了。持这种意见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排除，这些人对于《资本论》、马克思的一切著作根本不屑一顾。如果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还应加以珍视，他们会说这是“老保”。这些同志对西方经济学抱一种完全相信的态度，不允许别人提出批判和分析。我从自己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工作中体会到在中国经济学界的确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刚才说的两种倾向，而且这两种倾向间水火不相容，只是在有些政治气候下，这种占上风，那个暂时低调，在另一种气候下反过来。这个情形提醒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学界目前这种状态，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经济学体系的确不是一件易事，不是一个漂亮的口号就能把它统一起来的，其中交叉着认识问题，立场问题，还有利害问题。

二、如何从建立理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讨论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建立自己的理论经济学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的。我认为死抱着西方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不可取的，最根本在于国情不同，这就引起了在经济学体系中一系列的区别或是应当有的、不能不有的区别，因此，也就不能不对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做出分析，并且在分析时，我还有一个观点，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建立中国理论经济学这个角度来看，它们都是外来的，而不是本土的，我们又可以把这个问题归纳为，在建立中国理论经济学时，如何对待外来的经济学？尽管这个词会使一些同志听了感到不舒服，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会是外来的经济学？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怎么能称其为外来的经济学呢？那我的反问也很简单，“你

以为那是中国的吗？”这是常识性错误，那本来就是外国的嘛，这才有如何把外国的东西变成中国的问题，才有如何把它们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还叫什么毛泽东思想呢，如果不是这样那王明不就正确了吗？（鼓掌）我想这是事实，这种想法让人可悲，当然对西方经济学，称其为外来的，也会有人反感，但那是次要的问题，现在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偏差较大。

在面对建立中国理论经济学的问题上，我们的确有一个如何对待外来经济学的态度问题。我以为，从总体上来说，这两种经济学都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理论经济学，原因是国情不同。最根本的就是这一点。具体来讲，首先，外来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性质与我们大不相同，西方经济学（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到马歇尔到现在，他们的研究对象是自己的生产方式，其运动和发展规律，这种生产方式从性质上定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原则不同，两者有许多联系，但也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私有制还是公有制为主体，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探索。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怎么样，它研究的对象与古典经济学差不多，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以英国为典型的19世纪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对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资本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有没有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呢？有，那是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得出的某些推测和论断，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总结。马克思之后，有了列宁，列宁开始接触到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而且也动手搞社会主义，但时间太短，没有做出更多理论上的创造，尽管其中有许多科学的闪光，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再往后是斯大林，他的理论和实践早已被历史做了结论了。中国呢，我们对于研究对象是如何认识的？我们要说的是，不管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为解决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准备现成的经济学理论，中国不能指望别人去帮我们建立适合我们需要的经济学。马克思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列宁研究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还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某些问题，所有这些都不够

我们用。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的性质同我们现在追求的，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不可同日而语，无法替代。

其次，研究对象的发展水平也很不一样，他们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各个水平，包括机器大生产之前的工厂手工业，包括产业革命之后的发展，还包括垄断的发展，还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大致扫描一下就会发现，这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不断推进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范围。现在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的大国，有我们一系列的特点：人口众多，但素质又偏低，土地和各种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行，诸如此类。因此，就研究对象而言发展水平是不同的，存在的困难也不同，我们的问题并不一定是人家的问题，如人口问题，这些问题无法从别人的主流经济学那里找到现成的答案，还需要中国人自己去解决、去探索、去研究。

由于国情不同，因此在经济学方面造成很多差别包括研究的课题任务不同，方法有差异，还有基本理论有众多区别。就基本理论而言，我们不可能拿来就用，其中有些问题同我们当前研究的密切相关，比如说当代中国一些重大问题，就经济方面来讲如经济体制改革，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要问：能从西方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里得到答案吗？许多人可能忽视了这一点，但这是不能够忽视的。因为正是在这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其经济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上，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没有给我们提供科学的答案，相反，给我们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说有答案的话，那就是两种经济学都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体制不会是市场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论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最后，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会崩溃，取而代之的就是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这种体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就应该走完其全部历程，资本主义的消灭也就是市场经济这种体制寿终正寝。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意。并且说，这种结束在 19 世纪末期就要实现的。这些都是书中讲清楚了，也是马克思的实践所追求的目标。这都是我们所

熟知的。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搞吗？也不是嘛。相反，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断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二者必择其一嘛。这就是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著名的论战之间提出的重要论断，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的只能是统治经济、分配经济，即计划经济，这两种观点都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那么，请问：我们怎么能从马克思主义那儿得到搞市场经济的启发、指导，又如何从西方经济学那儿得到同样的启发和指导呢，不可能。只能得到否定的回答。说到这点，我们有些同志感到意外，意外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一些同志讲，马克思主义在某某问题上可以给我们作出指导，可以给我们很大启发，甚至马克思讲过的东西，我们没注意，现在应该把它们挖掘出来。这是我们很多同志的看法，对这些同志来讲，他们讲了这么多东西，却忘了一条：马克思否定社会主义还会搞市场经济。在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从外来的经济学那里得到答案，如果固守外来经济学的立场，那我们就不可能设想还有 20 年的经济改革，理论经济学的进展，我们就不可能正确评价邓小平先生所讲“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论断的伟大历史意义。要知道这个论断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是首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突破就意味着对某些部分的抛弃、否定，我听了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非常兴奋。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伟大的突破和革命。这话出自“邓大人”之口，这意味着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世界。

在分配方式上，鼓励资本主义参与分配，承认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都是劳动的重要形式，要承认它们在分配体系中间应有的地位，拉开差距，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跟上时代的步伐，如果现在还不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不承认信息化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以及相应的分配制度改革精神的贯彻，我们何以跟上经济飞速发展的形势，但是，问题并不简单，问题是我们赞成这样做，拥护这样一个观点，这是一回事，但是这样做时，人们总是习惯于从马克思经济理论找根据，把这些认识和做法看作是扩大

和加深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有的人认为应该去扩大、深化，应该把科学技术放入“劳动”之中，把经营管理放入其中，这算扩大。由体力劳动转向脑力劳动，算是深化，他们认为过去忽视了这些，只重视体力劳动，认为它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现在看来是太狭窄了，需要扩大，这不就统一了吗，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既可以承认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作用，又可以维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我们一些理论家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能这样做，既可以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又可以坚持劳动价值论，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如果能这样做，当然好，但是不能这样，这种做法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因为这种扩大、深化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原意。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意不是这个意思，那仅仅是指原始未开化状态下，实物交换的比例的决定，既不考虑土地、资本，也不考虑经营管理，更没有什么信息存在的决定，仅仅是最基本的体力活动，其最基本和典型的场合就是原始人有捕鱼的抓了鱼和打猎的打了兔子，他们之间的交换。这就是劳动价值论处理的唯一前提，唯一场合。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不允许把别的场合加进来，认为那研究的就不是价值论，这是马克思在理论上一直坚持的东西。因此，在现在的社会状况下，我们觉得一些理论家认为马克思所讲的内容太少了，应该把它扩大一下，这样做可能用意是好的，但就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了。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这样做还有危险。可以把经营管理和科技工作者的工作都算作劳动，然后加进去，那就是劳动价值论的扩大和深化。这讲起来还容易一些，尽管它已违反了马克思的原意，但讲的还是劳动。从这种意义上说，那还有什么理由把资本排除在创造价值的源泉之外呢？因为资本，且不说资产阶级经济学过去是如何美化资本，说其是忍欲、牺牲等等，但有一点我们得看到，在现代社会发展状况下，运用资本所要求的知识的准备，技能的具备，熟练程度的掌握，决不亚于高级劳动、熟练劳动，在一定意义下，它还有更特殊的要求。这样来讲，资本的运用能否排除在外呢，何况我们的很多经理就是资本家身兼二任，如何把他的资本职能和管理者的职能加以区分呢？因此，如果我们允许把马克思说的劳动之外的东西加

进去，资本这个因素是挡不住的，而如果我们也要承认资本是一种劳动，一种高级劳动，那么，这种劳动价值论不是离马克思更远了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要排斥资本的嘛，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因此我们的经济学家在写文章时有所区别，叫做鼓励资本参与分配，在现代生产条件下，管理和现代科学技术工作是劳动的重要形式。我们要问：为什么鼓励资本参与分配呢，它如果不创造价值或财富，不是生产的合作者和创造者之一，何以要鼓励它？这种扩大法是很难办的。

第三点，在历史上不是没有人想这样做，结果把一个本来还有一定科学价值的劳动价值论糟蹋了，导致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最先提出来的，在这之前，古典经济学提出过相当完整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对其继承和发展。可是就是这种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的直接继承者的身上发生了危机，并且导致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李嘉图讲商品的价值就是由劳动决定的，这条理论遭到许多学者的反驳，有两个矛盾无法解决：（1）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劳动和资本交换以后为什么会有利润出现？难道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不是等价交换吗？如果说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有利润存在，不是等价交换，那么，这就说明，所讲的等价交换原理在劳资之间并不存在，而劳动和资本交换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基本的交换关系，那这个劳动价值论还有多少意义呢？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同利润之间发生矛盾。（2）讲劳动创造价值，请问：其他的许多因素与劳动没有关系，那么它们怎么可以直接影响商品的价格呢？例如，生产葡萄酒，有一桶直接送到市场上卖，另一桶则被放到窖中去酵，反对者问，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发现，立即送到市场上的酒，其价格低，酵过的酒价格升高，而且酵得时间越久，价格越高，请问：在酿酒期间，有多少劳动参加进去呢？当然会有一些必要的设备，而价格的高低与其设备的价值是不成比例的，这也是应该承认的。请问这个陈葡萄酒的价值是谁创造的？这就是新旧葡萄酒的例子，难住了李嘉图。经过思考，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很难把劳动价值论同这些反驳加以解决，同社会现实加以统一。他的学生维护老师的学说，提出“劳动价值论是唯一正确的”，新陈葡

葡萄酒是因为酒放在窖里时，虽然人手的劳动结束，但大自然还在劳动。他得出的一般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是唯一正确的，劳动包括一切能够引起合乎我们愿望的后果的那一种操作，而不管这种操作是由人还是由大自然进行的，因此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是普遍规律。这就是他的学生们为维护其劳动价值论所抛出的高论，这导致了劳动价值论的破产，李嘉图学派的解体。这说明劳动价值论如果把握不好，把不该加的东西加进去，就有可能使原来还有一定意义的劳动价值论变成荒谬的东西，我大声疾呼：我们要认真研究西方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尽管它们都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完整的、现成的答案，但第一步，要如实去认识它们，不要根据我们的需要加以改变，改变到面目全非，最终使我们的改革陷于被动。我们的价值论该走什么道路呢？我以为那就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多少年来的成果，应当认可各种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创造。这是属实的，所创造的价值是生产价值，要拿到市场上去，变成市场价值，还要得到需求的认可，需要需求与供给共同作用，才能确定商品的市场价值。价值论的问题的确要深化、扩大，但不是把什么问题都装到劳动的筐子里去，而是如实的认识价值，这个问题应有的范围、领域。我以为这才是多少年来在世界范围经济思想在思考价值论问题上所得出的科学成果。（详见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

邓小平说得好，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要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包括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内。糟踏马克思主义的最好办法不是正面的攻击，而是把它变成教条，因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这种教训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我以为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教务的态度发生在改革中，支配我们的理论经济学，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理论经济学则永无建立之日。

我们该怎样建立和探索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呢，我以为有两条：

（1）坚持现在的改革方向。改革开放的方向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而且要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经济改革上走市场经济道路，这一点是确定的。（2）我们在理论经济学的建设上，目前阶

段，尤其要注意切实研究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际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给我们的启发。如果我们没有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就无法做出科学的概括。我们要踏实研究实际，胸有全局，在重大问题要心中有数。另一点，应当大力宣传研究邓小平的经济思想，要看到他为我们解决新问题指明了方法和方向，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只要我们重视实践，贴近实际，在理论和实际的关系上，尊重实践的呼声，如果理论和实践发生矛盾，我们不是去坚守有了问题的理论，用有问题的理论去限制、切割规范实践，相反，我们要根据实践发展去修改、补充理论，这样我们才能使建立理论经济学的事业向前推进。这还要有一个好的氛围，提倡自由的研究，自由的争论，允许各种意见自由发表和交换，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拥护党的领导，希望中国能国富民强。在这种氛围之下，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发展的进展，我们的理论经济学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地取得更大的成绩。因此，我对于我们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前景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在现在的形势有利于理论经济学的探索，忧在传统势力的顽固，我们的机关部门有时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摇摆，这就加重了我们建立科学、完整、成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任务，我们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抱有了建立中国科学的经济学这项伟大事业付出自己的辛苦，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总的来说，我对于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界抱谨慎的乐观态度，这就是我今天这个题目最后要说的一句。

谢谢大家！

中国人口未来发展态势、问题和对策

张 纯 元

张纯元,男,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专业特长:人口经济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一、计划生育工作已有成就的社会、经济意义

计划生育工作已取得了巨大成就,近 30 年来由于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而少生 3.38 亿人口(参见表 1),其意义是巨大的:

1. 节约了大量抚养成本。按历年当年价格计算,少生 3.38 亿人口,就为家庭和社会节约 7.4 万亿元的抚养成本,相当于 1997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2. 节约了少增加这部分人口的物资技术装备费用。少增加这部分人口成长为劳动力,社会要为每一个人提供具有社会平均水平的物资技术装备,否则,他无法生存下去。按 1998 年标准,少生 3.38 亿人口又为国家和社会节约 6.99 万亿物资技术装备费用,相当于 1996 年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3. 节约了少增加这部分人口的社会福利费用。其中包括具有原有人口平均水平的社会福利费用、社会救济费用、文教卫生费用、非生产性基本建设费用和社会后备基金。

4. 节约了大量的消费基金。中国劳动力过剩,新增人口只会扩大失业队伍,增加消费基金,而现在少生了 3.38 亿人口,就为社会节约了大量的消费基金,可提高原有人口的生活水平。

5. 有利于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我国资源总量不少,但人均资

源占有量很低，绝大部分资源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少增加 3.38 亿人口，对于提高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6. 有利于减轻社会公共设施的壓力。70 年代城乡到处都存在人满为患的现象，就业难、乘车难、住宿难、看病难、就餐难、上学难、购物难、打电话难等等随处可见，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少生 3.38 亿人口，有利于缓解这些难点，明显地提高了社会公共设施的人均占有水平。

7. 有利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增进身心健康和改善就业条件。

8. 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人口再生产的社会条件和环境条件。

总之，投入控制人口的资金效益是很大的，投入 1 元的计划生育经费，可获得 78 元的经济效益。国外研究的结论，收益更高。

二、中国人口未来发展态势及特征

中国人口生育率虽属于低生育水平行列，但距离人口零增长还有很长一段路程。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和育龄妇女总数的增加，21 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总量还将继续增长。那么，增长态势如何？人口呈现什么特征？

我们利用 199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有关数据，用三个方案进行了预测：

高方案：2000 年总和生育率 2.1，持续下去，最高峰值人口为 16.1 亿；

低方案：2000 年总和生育率 1.53，持续下去，2022 年最高峰值人口为 13.6 亿，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30%；

中方案：2000 年总和生育率 1.90，持续下去，2033 年最高峰值人口为 14.8 亿，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16%，此后，总人口将缓慢下降。

中方案比较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

情况，是首选方案，优于另外两个方案，以下的分析就是用中方案预测结果进行的。

中国人口未来发展态势呈现出五个主要特征：

总人口达到最高峰后转为缓慢下降的特征（参见表 7）；

具有低生育率和高净增量同时并存的特征（参见表 8）；

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快并达到最高峰的特征（参见表 9）；

具有老年人口不但增长速度加快而且数量很大的特征（参见表 9）；

少儿人口绝对量不断减少，在总人口中比重不断下降的特征（参见表 9）。

三、中国人口存在的问题

1. 人口基数过于庞大，2000 年大陆人口已达 12.65 亿，是世界上第一号人口超级大国。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很容易的，需要长期努力才行。

2.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长期下去，会导致未来婚姻市场失衡，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参见表 2、3、4）。

3. 人口文化科学素质偏低，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 1999 年只有 6.05 年，而美国达 14 年之多（参见表 5）。

4. 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相对较高，约在 13.1%，影响中国人口的身体素质。

5. 过剩人口较多，就业压力很大。

6. 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对经济社会发展挑战性强。

7. 人口大国，经济上的小国，人均资源水准低，人均收入水平低，贫困人口仍有一定的数量。

8. 中国人口不但总量多，而且各地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率差异很大（参见表 6）。

人口的影响作用不但大，而且是全方位的、非常久远的，领导者如对此不了解，心中无数，是十分危险的。

四、解决中国未来人口问题的主要对策

从上面分析可见，在 21 世纪前半叶，中国人口将相继出现三个最高峰（2016 年的劳动人口最高峰，2033 年的总人口最高峰，2040 年的老年人口最高峰）和一个低谷（2015 年的抚养系数为 38%），与此特征相适应，必须采取如下一些主要对策：

1. 利用抚养系数很低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 8%—9% 之间，实际经济增长率在此区间为最佳。所以，“十五”期间年均增长 7% 是完全有把握实现的。发展经济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参见表 11）。

2. 继续执行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并在本世纪的一定发展阶段上调整和完善人口生育政策（参见表 12、13、14）。

3. 实行合理的技术升级政策和正常的劳动就业政策。实行“金字塔”状的经济技术就业结构，以应对劳动年龄人口高峰的到来。

4. 建立、发展、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以应对“银发浪潮”的到来。

5. 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6. 尽快完成经营机制的革命——实行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转变，提高资金、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7. 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的所有问题（包括人口问题）都只有在西部大开发中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

五、我国未来的人口发展目标

这里所说的人口发展目标，是指我国未来的人口数量规模目标而言，它究竟稳定在多大规模上为好呢？

我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最高限为 16 亿人口，自然，只能在此限以下。

有几种提法:

稳定低生育水平;

人口零增长;

静止人口;

经济适度人口;

人口负增长。

这些提法均没有回答我国未来人口总量目标是多少的问题。

根据什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能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最优人口条件这样规模的人口数量就是我们应追求的未来人口发展目标。

据有关专家预测, 中国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人口规模是 8 亿—10 亿之间, 这是一个有上限和下限的“度”, 而不是一个时点的绝对数。

实现这个人口目标, 需要在党的领导下长期奋斗才行, 而不能急于求成。

表 1 中国 1949 年到 1998 年主要人口数据表

年份	总人口 (千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总和生育率 (个)
1949	541670	36.00	20.00	16.00	6.14
1950	551960	37.00	18.00	19.00	5.81
1951	563000	37.80	17.80	20.00	5.70
1952	574820	37.00	17.00	20.00	6.47
1953	587960	37.00	14.00	23.00	6.05
1954	602660	37.97	13.18	24.79	6.28
1955	614560	32.60	12.28	20.32	6.26
1956	628280	31.90	11.40	20.50	5.85
1957	645630	34.03	10.80	23.23	6.41
1958	659940	29.22	11.98	17.24	5.68
1959	672070	24.78	14.59	10.19	4.30
1960	662070	20.86	25.43	-4.57	4.02
1961	658590	18.02	14.24	3.78	3.29
1962	672950	37.01	10.02	26.99	6.02

年份	总人口 (千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总和生育率 (个)
1963	691720	43.37	10.04	33.33	7.50
1964	704490	39.14	11.50	27.64	6.18
1965	725380	37.88	9.50	28.38	6.08
1966	745420	35.05	8.83	26.22	6.26
1967	763680	33.96	8.43	25.53	5.31
1968	785340	35.59	8.21	27.38	6.45
1969	806710	34.11	8.03	26.08	5.72
1970	829920	33.43	7.60	25.83	5.81
1971	852290	30.65	7.32	23.33	5.44
1972	871770	29.77	7.61	22.16	4.98
1973	892110	27.93	7.04	20.89	4.54
1974	908590	24.82	7.43	17.48	4.17
1975	924200	23.01	7.32	15.69	3.57
1976	937170	19.91	7.25	12.66	3.24
1977	949740	18.93	6.87	12.06	2.84
1978	962590	18.25	6.25	12.00	2.72
1979	975420	17.82	6.21	11.61	2.75
1980	987050	18.21	6.34	11.87	2.24
1981	1000720	20.91	6.36	14.55	2.63
1982	1016540	22.28	6.60	15.68	2.87
1983	1030080	20.19	6.90	13.29	2.42
1984	1043570	19.90	6.82	13.08	2.35
1985	1058510	21.04	6.78	14.26	2.20
1986	1075070	22.43	6.86	15.57	2.42
1987	1093000	23.33	6.72	16.61	2.59
1988	1110260	22.37	6.64	15.73	2.31
1989	1127040	21.58	6.54	15.04	2.25
1990	1143330	21.06	6.67	14.39	2.17
1991	1158230	19.68	6.70	12.98	2.01
1992	1171710	18.24	6.64	11.60	2.00
1993	1185170	18.09	6.64	11.45	2.00

年份	总人口 (千人)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总和生育率 (个)
1994	1198500	17.70	6.49	11.21	1.83
1995	1211210	17.12	6.57	10.55	—
1996	1223890	16.98	6.56	10.42	—
1997	1236260	16.57	6.51	10.06	—
1998	1248100	16.03	6.50	9.53	—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8年,第36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2 若干年份0—4岁婴儿性别比表(女=100)

年 龄	1990年 ^①	1996年 ^②	1997年 ^②
0—4	110.22	119.98	120.14
0	117.75	116.16	117.04
1	111.59	120.89	126.58
2	110.11	121.32	122.51
3	109.12	120.83	116.53
4	108.47	120.94	119.29

资料来源:①《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

②《1996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1997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

表3 1998年中国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
全国总体出生性别比与分孩子出生性别比

年份	出生总数			一孩			二孩		
	男	女	性别比	男	女	性别比	男	女	性别比
1970-1979	232401	218607	106.31	60661	56755	106.84	52918	50662	104.45
1980-1988	179496	164740	108.96	86387	81890	105.49	51614	46570	110.83
年份	三孩			四孩			五孩及以上		
	男	女	性别比	男	女	性别比	男	女	性别比
1970-1979	40875	38600	105.89	29799	27773	107.29	48155	44797	107.50
1980-1988	22193	19478	113.94	9698	8497	114.13	9604	8305	115.64

资料来源:《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全国数据卷》,中国人口出版社,1990年。

表4 0-4岁分城、镇、县婴儿性别比表(女=100)

年龄 Age	1990			1996		1997		
	市	镇	县	市、镇	县	市	镇	县
0-4	108.06	111.12	110.53	116.80	121.05	112.58	119.17	122.21
0	108.88	112.15	112.09	111.68	117.70	108.81	125.90	118.35
1	108.78	112.47	112.03	115.26	122.91	118.88	132.49	128.13
2	107.98	111.08	110.42	118.51	122.29	107.57	113.00	127.62
3	107.40	110.01	109.36	115.48	122.60	112.18	104.53	119.08
4	107.28	109.89	108.57	123.37	120.22	116.20	123.29	119.59

资料来源: 同表2

表5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15岁以上人口文化构成比较表

国 家	年份	文盲及半文盲的比重	受小学文化教育的比重	受初中文化教育的比重	受高中文化教育的比重	受高等教育的比重
中 国	1990	15.88	37.06	26.34	8.04	1.42
	1997	12.11	37.56	29.62	9.59	2.53
菲律宾	1990	6.7	46.9	27.4		18.9
泰 国	1990	10.7	69.6	13.7		5.1
阿根廷	1991	5.7	56.9	25.3		12.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第94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第28页、3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

表6 中国各地区总人口及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地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总人口(万人)	
	1997	1998	1997	1998	1997	1998	1997	1998
全国	16.57	16.03	6.51	6.50	10.06	9.53	123626	124810
北京	7.91	6.00	6.02	5.30	1.89	0.70	1240	1246
天津	9.98	9.89	6.95	6.49	3.03	3.40	953	957
河北	13.11	13.01	6.82	6.18	6.29	6.83	6525	6565
山西	16.18	16.09	6.06	6.17	10.12	9.92	3141	3172
内蒙古	15.21	14.40	6.96	6.17	8.25	8.23	2326	2345
辽宁	11.78	11.39	6.38	6.81	5.40	4.58	4138	4157

地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总人口(万人)	
	1997	1998	1997	1998	1997	1998	1997	1998
吉林	12.22	11.81	5.42	5.76	6.80	6.05	2628	2644
黑龙江	12.02	11.68	5.17	5.32	6.85	6.36	3751	3773
上海	5.50	5.20	6.80	7.00	-1.30	-1.80	1457	1464
江苏	11.43	10.97	6.84	6.84	4.59	4.13	7148	7182
浙江	11.41	11.15	6.48	6.33	4.93	4.82	4435	4456
安徽	15.80	15.74	6.50	6.54	9.30	9.20	6127	6184
福建	12.41	11.53	6.09	6.20	6.32	5.33	3280	3299
江西	17.43	16.85	6.56	7.05	10.87	9.80	4150	4191
山东	11.28	11.58	6.65	6.12	4.63	5.46	8785	8838
河南	13.97	14.17	6.30	6.37	7.67	7.80	9243	9315
湖北	14.81	12.58	6.69	6.70	8.12	5.88	5973	5907
湖南	12.59	12.31	6.99	7.10	5.60	5.21	6465	6502
广东	16.90	16.51	5.40	5.61	11.50	10.90	7051	7143
广西	15.93	15.87	6.40	6.86	9.53	9.01	4633	4675
海南	19.18	18.48	5.62	5.56	13.56	12.92	743	753
重庆	13.60	13.19	7.36	7.68	6.24	5.51	3042	3060
四川	15.75	14.62	7.00	7.14	8.75	7.48	8430	8493
贵州	22.15	22.02	7.67	7.76	14.48	14.26	3606	3658
云南	20.82	20.01	7.91	7.91	12.91	12.10	4094	4144
西藏	23.90	23.70	7.90	7.80	16.00	15.90	248	252
陕西	13.91	13.56	6.29	6.43	7.62	7.13	3570	3596
甘肃	17.22	16.45	6.20	6.41	11.02	10.04	2494	2519
青海	21.80	21.26	6.95	6.78	14.85	14.48	496	503
宁夏	18.90	18.19	5.43	5.11	13.47	13.08	530	538
新疆	19.66	19.74	6.55	6.93	13.11	12.81	1718	1747

资料来源: 1. 全国数据根据抽样误差和调查误差进行了修正。

2. 全国数据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的数据, 不含台湾省、香港、澳门地区的中国同胞, 分省数据中为含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的数据。

表 7 未来中国总人口变化预测表 (单位: 千人)

年份	年底人口	年份	年底人口
1995	1211210	2007	1337820
1996	1223890	2008	1346800
1997	1237170	2009	1355880
1998	1249330	2010	1365020
1999	1260870	2015	1408370
2000	1271780	2020	1442740
2001	1282150	2025	1465370
2002	1292080	2030	1475600
2003	1301650	2035	1476200
2004	1310910	2040	1467710
2005	1319960	2045	1449280
2006	1328900	2050	1421430

资料来源: 孙兢新等“中国人口变化与发展趋势展望”, 引自《国家计生委“九五”期间第一批人口与计划生育课题研究成果汇编》, 1999 年。

表 8 未来中国人口的自然变动情况 (单位: 千人)

年份	出生人口数	死亡人口数	自然增长人口数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95	20630	7920	12710	17.12	6.57	10.55
1996	20670	7990	12680	16.98	6.56	10.42
1997	21140	8380	12760	17.18	6.81	10.37
1998	20640	8480	12160	16.60	6.82	9.78
1999	20110	8570	11540	16.02	6.83	9.19
2000	19600	8690	10910	15.48	6.86	8.62
2001	19180	8810	10370	15.02	6.90	8.12
2002	18880	8940	9940	14.67	9.95	7.72
2003	18640	9080	9560	14.37	7.00	7.37
2004	18480	9210	9270	14.15	7.05	7.10
2005	18400	9350	9050	13.99	7.11	6.88
2006	18430	9490	8940	13.92	7.17	6.75

年份	出生人口数	死亡人口数	自然增长人口数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2007	18560	9640	8920	13.92	7.23	6.69
2008	18760	9790	8970	13.98	7.29	6.68
2009	19020	9940	9080	14.07	7.36	6.72
2010	19280	10140	9140	14.17	7.45	6.72
2015	19220	11160	8060	13.69	7.95	5.74
2020	18330	12280	6050	12.73	8.53	4.20
2025	17080	13620	3460	11.67	9.31	2.36
2030	16370	15160	1210	11.10	10.28	0.82
2035	16450	17030	-580	11.14	11.53	-0.39
2040	16180	18660	-2480	11.01	12.70	-1.69
2045	15470	19960	-4490	10.66	13.75	-3.09
2050	14600	20810	-6210	10.25	14.61	-4.36

资料来源：同表 7。

表 9 未来中国劳动力人口数及比重的变化（单位：千人，%）

年份	男性 16-59 人口	女性 16-59 人口	劳动力人口总量	劳动力人口比重
1995	387550	343570	731120	60.52
1996	391460	347500	738960	60.51
1997	396050	352130	748180	60.63
1998	401270	357170	758440	60.86
1999	405780	361240	767020	60.99
2000	410100	365000	775100	61.10
2001	414920	368990	783910	61.29
2002	420890	373690	794580	61.65
2003	427520	378740	806260	62.09
2004	433720	382820	816540	62.44
2005	439410	386160	825570	62.70
2006	444670	389690	834360	62.94
2007	448780	391860	840640	62.99
2008	452010	393100	845110	62.90

年份	男性 16-59 人口	女性 16-59 人口	劳动力人口总量	劳动力人口比重
2009	454610	393930	848540	62.73
2010	456910	394930	851840	62.55
2015	461620	404360	865980	61.63
2020	464720	395090	859810	59.73
2025	453900	378400	832300	56.92
2030	439210	368310	807520	54.84
2035	427460	367100	794560	53.94
2040	422570	361620	784190	53.55
2045	412410	346460	758870	52.48
2050	394240	335470	729710	51.45

资料来源：同表 7。

表 10 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单位：千人，%）

年份	0-14 岁 人口	0-14 岁 人口比重	15-64 岁 人口数	15-64 岁 人口比重	65 岁及 以上人口	65 岁及 以上比重
1995	322480	26.70	809460	67.01	76070	6.30
1996	323140	26.46	819640	67.12	78430	6.42
1997	322450	26.13	830460	67.30	81060	6.57
1998	322790	25.90	839500	67.37	83850	6.73
1999	322730	25.66	848420	67.46	86520	6.88
2000	321050	25.31	858410	67.67	89130	7.03
2001	316840	24.77	870450	68.06	91660	7.17
2002	311030	24.13	883780	68.57	94070	7.30
2003	305530	23.53	896650	69.06	96260	7.41
2004	300540	22.98	908880	69.50	98290	7.52
2005	294970	22.40	921360	69.97	100430	7.63
2006	291000	21.95	932100	70.31	102590	7.74
2007	288450	21.61	941600	70.55	104580	7.84
2008	286020	21.29	951020	70.78	106550	7.93
2009	283870	20.99	959990	70.97	108810	8.04
2010	282480	20.74	967990	71.08	111360	8.18
2015	277460	19.75	996280	70.90	131430	9.35
2020	277850	19.30	996960	69.26	164740	11.44

年份	0-14 岁 人口	0-14 岁 人口比重	15-64 岁 人口数	15-64 岁 人口比重	65 岁及 以上人口	65 岁及 以上比重
2025	272280	18.62	1003980	68.66	185900	12.71
2030	258690	17.57	987860	67.09	225860	15.34
2035	247760	16.82	956680	64.95	268560	18.23
2040	241790	16.51	928930	63.43	293780	20.06
2045	238090	16.46	914350	63.23	293640	20.31
2050	231020	16.29	894810	63.09	292400	20.62

资料来源：同表 7。

表 11 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抚养比重表（单位：%）

年份	0-14 岁	15-64 岁	劳动力 人口	老年抚养 人口①	老年抚 养人口②	抚养 人口③	抚养 人口④
1995	26.70	67.01	60.52	6.30	13.01	32.91	39.64
2000	25.31	67.67	61.10	7.03	13.81	32.25	39.05
2005	22.40	69.97	62.70	7.63	15.09	29.96	37.45
2010	20.74	71.08	62.55	8.18	16.90	28.85	37.60
2015	19.75	70.90	61.63	9.35	18.81	29.03	38.51
2020	19.30	69.26	59.73	11.44	21.15	30.68	40.40
2030	17.57	67.09	54.84	15.34	27.76	32.84	45.28
2040	16.51	63.43	53.55	20.05	30.10	36.49	46.57

注：老年抚养人口①是指 65 岁以上的人口；老年抚养人口②是指男 60 岁，女 55 岁以上的人口；抚养人口③是指 0-14 岁及 65 岁以上人口之和；抚养人口④是指 0-14 岁人口与男 60、女 55 岁以上人口之和。

资料来源：同表 7。

表 12 第三、四次人口普查八年间人口增长比较表

项目 \ 地区	全国	山西省	临汾地区	翼城县
1982 年三普（万人）	10081.8	2529.1	302.7	25.1
1990 年四普（万人）	11336.8	2875.9	346.7	27.2
八年增长速度（%）	12.45	13.71	14.54	8.37
年平均增长速度（‰）	14.77	16.19	17.11	10.09

资料来源：《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13 1990 年 0—5 岁组性别比比较 (女性为 100)

地区 年龄	全国	山西省	翼城县
0	117.75	109.19	106.40
1	111.59	109.70	111.65
2	110.11	109.05	105.03
3	109.12	108.55	102.86
4	108.47	108.65	103.27
5	108.65	109.83	106.92

资料来源：《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二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14 1991—1998 年翼城县出生婴儿性别比表

年份	男性	女性	性别比
1991	1885	1751	107.6
1992	1810	1801	100.4
1993	1861	1842	101.4
1994	1975	1873	105.4
1995	2042	1932	105.6
1996	2100	1915	109.6
1997	2067	1935	106.8
1998	2110	1999	105.5

资料来源：翼城县计划生育年报表。

经济学家看法律、文化与历史

张维迎

张维迎，1959 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 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 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 年 9 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 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M.Phil.)，1994 年获博士学位 (D.Phil.)，1994 年 8 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Mirrlees 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 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2000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另有数十篇中英文论文发表。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经济学家看历史、法律与文化。首先需要声明的是我本人历史知识非常有限，对法律也知之甚少，更不是一位文化学者。我只是一位经济学者，选择这样一个跨学科的题目主要目的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经济学，特别是近 20 年来的经济学有关历史、法律、文化的一些观点。我的演讲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一下有关经济学的一些知识；第二部分介绍一下经济学家如何看待文化；第三部分介绍一下经济学家如何看待法律；第四部分介绍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历史。

一、经济学：理性选择的科学

经济学是一门显学。在当今的世界上，各种社会科学中从事经济学这一行当的人可能是最多的，他们分布在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商业机构等多种组织。国外的银行和大的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经济学家。对好多非经济学专业的人讲，他们的第一个感觉可能是经济学只研究经济问题，这样一个认识可能使好多其他学科本能地对经济学有点反感，特别是当经济学家把他们的经济学方法运用到其他领域时，好多其他学科都持批评态度，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学的名声也不是特别好，社会上流传许多讽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笑话。尤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实际上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是属于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因而可能会批评经济学家把什么问题都归为经济问题，是过分简单化了。但是这种认识可能是一种误解。第一个需要纠正的概念是，经济学仅仅是有关经济问题的科学的说法并不准确。经济学是一种思维方式（way of thinking），或者更准确地讲，经济学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science of rational choices）（Myerson, 1999）。这个定义实际上告诉我们经济学这种方法不限于研究某一领域，它是我们认识人们理性选择行为的一种方法。这个概念决定了我们后面为什么说经济学的许多方法、理论可运用到其他领域。当然，经济学的理性带有特定的含义，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

（一）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

第一点，经济学分析总是从个人出发，换句话说，“经济学总是个人主义的”。经济学的确是这样的，经济学对任何问题的分析包括组织行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个人行为的分析的基础上，即由个人到组织。这一点与社会学形成鲜明的对比，社会学一般是从组织到个人，即在组织规则下研究社会个人行为。第二点，经济学研究人们的行为时，假定每个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至于最大化结果是什么要根据他的偏好和约束而定。个人偏好不一定是利己主义的，也可能是利他主义的，例如你高兴我就高兴，最大化你的偏好

就是最大化我的偏好（有东西宁可让你吃而不是我自己吃。母亲都有这样的特点，即孩子的幸福就是母亲的幸福）。现在经济学家正在探讨为什么人们会理性地选择利他主义的偏好（Casadesus-Masanell, 1999; Rotemberg, 1994）。另一方面，任何偏好最大化都是要满足一定条件的。这种约束条件可能是技术决定的，例如在某种情况下，你一天的饭量总是有限的，工作时间也是有限的；也可能是制度决定的，如不能无偿地用别人的财产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后面将更多地谈到这种制度的约束。第三点，均衡分析是重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经济学分析某个人的行为时，最后要落实到某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是某个个人所无法改变的或不愿意改变的，我们称之为均衡。

上述的这些基本方法在一般的经济学教本里得到充分的体现。例如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一般是从“消费”开始。但消费理论的简单性在于只考虑面临约束条件下的一个人的偏好最大化问题，也即“单人决策问题”。现实中却不是这样，人们的许多决策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你的最优决策依赖于别人的决策，别人的最优决策依赖于你的决策。你的决策还依赖于别人认为你怎么决策，你怎么认为别人认为你将怎么决策，如此等等。例如考博士生，导师仅招2人，却有4人报考，你能否被录取，不仅依赖于你考得怎样还依赖于别人考得怎样，这被称为“互动”。研究这种互动环境下的理性选择理论叫博弈论（game theory，或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s under interactions），它代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发展，三位博弈论专家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在，博弈论已经成了一种研究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Aumann and Hart, 1992; Elster, 1982），甚至是一种超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研究生物、生物的进化也需要博弈论。牛津大学著名的动物学家 Richard Dawkins 教授写了一本畅销书——《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就是从基因开始分析人们的行为，分析基因怎样进行博弈，从而得到一些有意思的结论。基于博弈论的广泛应用，有人甚至说，如果说未来社会科学中还有纯理论的话，这种理论就是博弈论。

下面我介绍一下博弈论的概念和基本方法。（关于博弈论的详

细讨论，参阅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二）博弈论的重要概念

1. 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纳什均衡概念是纳什首先提出并证明的（纳什是一位数学家，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谓纳什均衡，指的是所有参与人最优选择的一种组合，在这种组合下，给定其他人的选择，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做出新的选择。好比大家都坐在这里，给定一个人在这边不动，你的最佳选择是坐在这里不动，如果你站了起来，你就会感到累；如果你想不坐这里，你却发现没有座位，因而改变现在的状况不是最佳选择。为了理解这个概念，我举一个简单的博弈——“两个胖子进门”（如图1）。假定一个窄的门仅能让一个人进入，现在有两个胖子，A和B，都想进门，每个人都有两个选择，先走或后走，两个人共有 $2 \times 2 = 4$ 种组合。如果两个人都抢着进去，那么两个人会撞到，每个人得到-1；如果A先进，B后进，A得2，B得1；反之A得1，B得2；如果两个人都不进的话，他们得到的都是-1。在这个博弈中你该先走还是后走依赖于别人的选择，如果他先走，那么你的最优选择是后走（你得到1，若也选择先走则得到-1），同时，给定你后走，他的最优选择是先走；如果他后走，你最优选择是先走（得到2，比选择你后走得到-1合算），同时，给定你先走，后走是他的最优选择。所以这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先，后）和（后，先），即A先B后或B先A后。如果A预期B会先进，B也预期A预期B会先进，那么B就真的会先进，A只好后进，这就是预期的自我实现：如果所有人都预期它出现，它就真的会出现。它是纳什均衡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结论对于分析一些制度来说很有用，如果一种制度不满足这种均衡，则A、B都有积极性偏离这个结果，它就不能自我实施。

		B	
		先	后
A	先	-1, -1	2, 1
	后	1, 2	-1, -1

图1 两胖子进门

纳什均衡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假设博弈中的所有参与人事先达成一项协议，规定出每个人的行为规则。那么，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没有外在的强制力约束时，当事人是否会自觉地遵守这个协议？或者说，这个协议是否可以自动实施（self-enforcing）？说当事人会自觉遵守这个协议，等于说这个协议构成一个纳什均衡：给定别人遵守协议的情况下，没有人有积极性偏离协议规定的自己的行为规则。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协议不构成纳什均衡，它就不可能自动实施，因为至少有一个参与人会违背这个协议，不满足纳什均衡要求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纳什均衡的哲学思想。

2. 承诺（Pre-commitment）

在前面的博弈中有两个纳什均衡，但不同均衡中个人的所得不同。显然，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先进，如果这时候有个人有办法先进，另一个人只好让步。这个“先下手为强”的行动就叫承诺。此时，这个博弈就变成一个动态博弈，A 决定先行或后行，B 在 A 决定后再决定，如果给定 A 先行，那么 B 最优选择是后行（如图 2）。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合理的”纳什均衡：A 先进 B 后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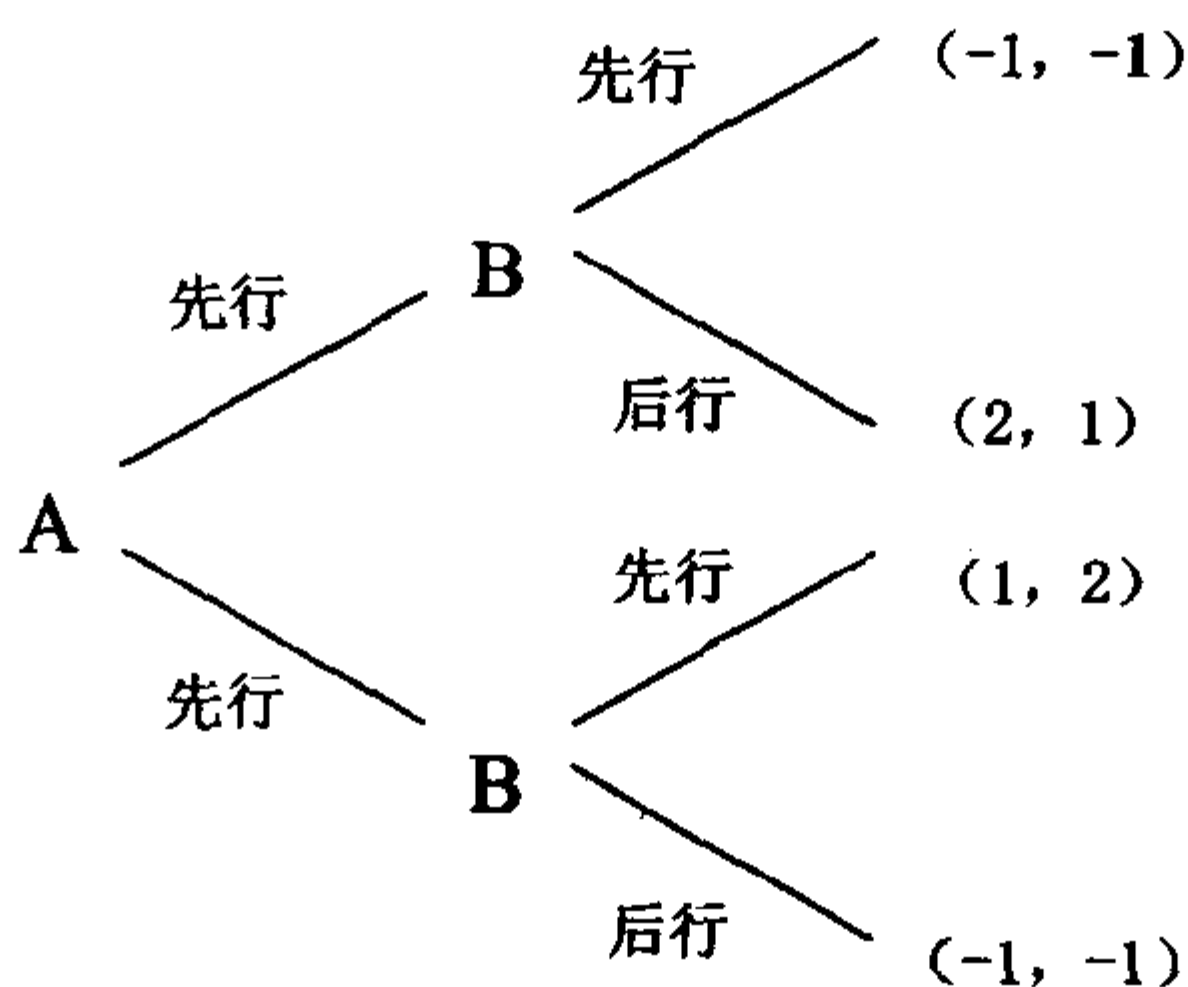


图 2 承诺博弈

承诺的基本特征是当当事人作出承诺后，原先在没有承诺情况下的一些最优选择在事后变得不再是最优。例如你走了一步后又退了回来，那就更麻烦了。这样就使当事人自己在事后的选择余地减少，剔除掉事先最优的某些选择；借此也迫使对手重新考虑你的策

略，从而使作出承诺的一方得到利益。当然，事先作出的承诺必须是可置信的，如果它是不可置信的，那么承诺将失去意义。比如说，A 喊一声“你别走，我要先走”，但并没有行动，B 是不会相信的。一个广为人知的承诺例子是“破釜沉舟”的故事，破釜沉舟就相当于一个承诺行动，它使自己和对方都明白决一死战是自己的最优策略。人们习惯讲“选择越多越好”，博弈中可能不是这样。承诺的意义是，给自己少留后路可能是一件好事。

3. 信息

信息对均衡有重要的意义。信息在参与人之间的分布或者说信息结构会直接影响均衡及其结果，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微妙的。比如考虑两个瞎子进门，因为看不见对方的行为，那博弈的结果就会不同；如果一个瞎子和一个正常的人同时进门，结果也会不一样，一般的情况下瞎子会先进，因为他不知道对方的行动，所以如果他选择“不管对方先进或后进，我进”的策略是可以置信的，而正常人选择这样策略的威胁却是不可信的。所以有时候，你看不到，你就向前走，别人就让着你。这与“难得糊涂”的道理相同。在单人决策场合，可能是信息越多越好，而在博弈的情况下，有时无知比知道的多可能更有好处。

下面就以这些概念为基础来分析文化和法律等问题。

二、文化：一组人群行为规范的稳定预期和共同信念

经济学家并不对文化和法律的界限作过细的区分，经济学家在概念划分中可能有点任意。但是这并不妨碍经济学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概念。我们知道，文化是人为的一种规则。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文化是一种人群行为的稳定预期（expectation）和共同信念（common belief）。当你预期别人干什么，别人预期你会干什么时，倘若这种预期成为一种共同信念，我们就归结为一种文化。

（一）三类行为规范

一般地，经济学家把文化或社会规范归结三种类型（Kaushik

Basu, 1998)。

1. 理性限定规范 (rationality-limiting norm)

理性限定规范是指阻止人们选择某种特定行动的规范，不论这种行动带给当事人的效用为多少。比如说，你看到别人的钱包掉在地上，那么对你而言，“理性”意味着把钱包拿走。但我们一般人都觉得这样做不好，不要拿别人的钱包，所以这可理解为限制你的理性选择的规范。这种理性限定规范的作用是改变当事人面临的可行选择集，缩小了当事人的选择空间。为什么这种规范会流行？博弈论从进化稳定均衡 (evolutionary stable equilibrium) 的角度提供了解释。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讲，如果大家都去偷人家的东西，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会长期存在下去，所以大家会赞成说，偷人家的东西是不能为的，即使没有法律的惩罚。实际上我们在好多场合可以抓到机会占别人的便宜，但人们通常不这样行为，这种“自律”可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解释。如果一个社会建立不起这种规范，那么这个社会就可能要灭亡。

2. 偏好变异规范 (Preference-changing norms)

偏好变异规范是指改变人们的偏好的规范，这种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人们偏好的一部分。比如当你刚开始信奉伊斯兰教时可能觉得理性限定规范制约你不能吃猪肉，尽管你本来是喜欢吃猪肉的。但不吃猪肉时间长了以后，你就真的可能不想吃猪肉了，你就真的形成这样一种偏好，不再喜欢猪肉了。这样，规范变成了偏好本身。

3. 均衡筛选规范 (equilibrium-selection norms)

均衡筛选规范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种规范，它是协调人们在众多的纳什均衡中选择某个特定的纳什均衡的规范，但是策略与行动的选择完全是当事人的自身利益所在，所以说这种规范不改变博弈本身，但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这种规范的作用就是使人们能够从多个纳什均衡中筛选出一个。例如在前面的进门博弈中，假如你现在碰见了你的老师跟你一块赶到门口(老师是 A, 你是 B)，那么，均衡 (A 先, B 后) 最可能出现。这就是“尊师”文化在起作用。这里，“尊师”是一种理性行为。在西方社会，人们形成了

“女士优先”的习惯，也是一种均衡筛选规范。如果一个瞎子和不瞎的人碰在一块，通常是瞎子先走，也是一种规范。这种规范和我们刚才讲的前两种规范的最大的不一样在于，前面的规范要求或者你不能选择，或者你的偏好改变，而均衡筛选规范既不改变选择空间，也不改变个人偏好，只是协调人们的选择，使得某个特定的纳什均衡出现。这意味着，对每个人来讲，给定别人的选择，自己的选择一定是最优的（理性的）。例如“尊重老师”的文化使得“老师先走，学生后走”的均衡更可能出现，尽管“学生先走，老师后走”也是一个纳什均衡。

有些习惯并不好，但仍然有助于选出均衡。如果我们把两个胖子进门博弈稍微作一点改动，假如是两辆车过交通路口，一辆是武警的车，另一辆是普通老百姓的车，假如武警是 A，普通老百姓是 B，那么，（A 先，B 后）这个均衡最可能会出现。这也是因为有一种意识的支持，在中国，人们认为武警先走是肯定的，武警也知道你应该让他先走，所以他就呼地过去了。当然这个规范可能不好，但是由于它已经形成一种规范，而且这绝对是一个纳什均衡——你见了武警的车，给定武警先行，你的最优选择是后行；给定你后行，武警的最优选择是先行——这样就有了自我实施的基础。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实验。我手里有 100 元钱，让两个人来分这 100 元钱，规则是：每个人都用一纸条写上自己要的数额，如果两个人的数字加起来刚好等于或小于 100 元的话，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但如果两人所要之和大于 100 元的话，谁也得不到什么，钱再装回我的口袋。我现在找两位同学来写一下——实验的结果是各写 50。这个博弈有多少个纳什均衡？无穷多个！给定对方写 X，另一方的最优选择是 $100-X$ ，X 从 0 到 100 都是纳什均衡。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实验中两人都选了 50？是因为这两个参与者选择的背后有“公平”这样一种平均主义文化观念。这个观念不是中国人独有，其他社会的人在面临类似情况时也都有一种 fairness 的意识。fairness 是一种文化，一种规范。它使得尽管这个博弈中有无穷多个纳什均衡，但经过一次实验就成功地选出了对半分这个特定的纳什均衡。这个结果可以运用到实际中，例如和对手谈判时可能会面临

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太贪婪，留给对方的很少，那么，生意就很难做成。这不是因为交易中没有净剩余可分，剩余可能很大，但是因为你太贪婪了，超出了对手的预期，均衡反倒不会出现。

更一般地说，参与人怎么行为，依赖于社会的规范，当你的预期变成信念时，它就是一种文化，其他人可以从这种文化预见你的行动。比如对极权制度的忠诚。如果大家都反抗一个极权制度，则可以推翻它，但实际上没人起来反抗，这说明它是一个纳什均衡。该均衡之所以能维持，是因为你认为服从权威是一个均衡：你服从该权威，不是因为个人心理或生理上害怕那个君主，许多君主长得很矮（如拿破仑），从生理上你能轻易打倒他。你害怕他完全是因为你认为别人害怕他，在给定别人服从他的情况下，你的任何反抗将导致别人对你的抵制，因此你的最好选择是服从他。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认为，并且，每个人都认为别人也这么认为，极权制度就是一个均衡。这一点对当领导也很重要。当领导的一个诀窍是使手下每个人都认为别人尊敬你，服从你，于是每个人都会尊重你，服从你，你就是领导。这种改变别人的预期的例子非常常见。例如提干的时候，有五个局长，你想从科长提到副处长，你就对张局长说，李局长、赵局长、王局长、黄局长都同意提我了。你再依次找每个局长。其实每个人都不一定同意提拔你，但如果他们相信了你的话，都认为别人同意了，自己反对也无济于事，结果你真的提成了副处长。为什么有时开正式会议前要开一个预备会，原因也是为了使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别人已同意了，因此对每个人而言最好的选择是同意。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均衡筛选规范不光人类社会中存在，动物界也如此。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关于孔雀尾巴的故事。雄性孔雀尾巴越大则雌孔雀就越喜欢。为什么？可能有好多原因，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如果每一个雌孔雀都认为其他的雌孔雀都喜欢尾巴大的雄孔雀，那么对雌孔雀而言，最好的选择是选个尾巴大的，即使尾巴大本身没用，甚至还要消耗额外的精力。一只雌孔雀如果找个尾巴短的雄孔雀，它的后代很可能也尾巴短，于是就很难找到对象，基因延续就有困难。人们找对象时对身高的选择的道理也一样。“时髦”是一种文化，原因就在于此。

这样，规范会影响人们的预期从而筛选出均衡，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会筛选出不同的均衡，但是他们都是一种纳什均衡，都有自我实施的基础。这个被筛选出来的均衡，博弈论里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做“聚点”（focal point）。例如，让两个人在1、3、5、7、9、10 六个数字中，各写下一个数字，如果双方写的数字一样，每人各得10元，否则各得零。在这个博弈中，每人的选择背后也有文化支撑，如果认为单数不吉利，则10最可能是一个“聚点”。

现在我们专门看一下信任问题，它是被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特别是文化学、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二）关于信任的经济学分析（economics of trust）

信任当然很重要，市场经济不能没有信任，离开了它，社会很难运转。问题是如何解释信任。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传统的解释，认为是纯文化因素起作用，有些国家信任程度高，有些国家则低（Fukuyama, 1995）。如北欧人之间的信任度高于意大利人之间的信任度。或者，我信赖你可能因为你有宗教信仰，怕上帝惩罚你，所以有宗教信仰的国家信任就高。如在美国，教会的人信任高，因为他们认为若不诚实，将来会进地狱。这种解释中，信任是外界强加于你的，使你不违约。而我主要想给出的是第二种解释，即经济学是如何解释信任的。

简单地说，经济学认为信任是在重复博弈中，当事人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Kreps, 1986; Gibbons, Robert, 2000）。在某种制度下，若博弈会重复发生，则人们会更倾向于相互信任。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见图3）。有A、B两个参与人，A销产品，B付货款，或A借给B钱，B是否还钱。A一开始有两种选择：信任B或不信任B；B也有两种选择：守信或不守信。如果博弈只进行一次，对B而言，一旦借到钱最佳选择是不还。A当然知道B会这样做，因而A的最佳选择是不信任。结果是，A不信任B，B不守信。这个结果很糟，若双方信任本可分别得10，现在分别得0，是低效率的均衡。若人们之间都这样地进行一次性博弈，信任就建立不起来。

现在来看怎样建立信任。先回过头来看前面的三种规范。纯粹

的文化可能改变支付向量,有助于建立相互信任。假如 B 害怕上帝,不守信带来感情上的不安(图 4),实际收入为-5,而不是 15,则 B 就会守信。基于此,A 的选择为信任 B,因此每人得 10。我们看到,宗教可能起这样的作用:它使你守信并且因为你守信,别人就信任你,双方得好处。但现在排除这种可能性。考虑刚才的博弈,假定博弈有足够的概率 δ (δ 也可以解释为耐心或贴现因子)进行下去,即能进行多次。设想 A 选择这样一种策略:我先信任你,只要你没有欺骗我,我将永远信赖你;但一旦你欺骗了我,我将不再信任你。这时 B 有两种选择,如果守信,得到的利益是长远的,根据公式总和为 $H=10/(1-\delta)$;如果不守信,得到利益只能是一次性的,总和为 $L=15+0+\dots=15$ 。因此,如果 H 大于 L ,即 δ 大于 $1/3$,守信是自己的利益所在,那么“A 信任 B, B 守信”是一个纳什均衡。这种均衡的出现是因为 B 谋求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的利益。通俗地讲,一个人有积极性考虑长远利益时,就会建立一个信誉。这样的话,博弈的结果为(10,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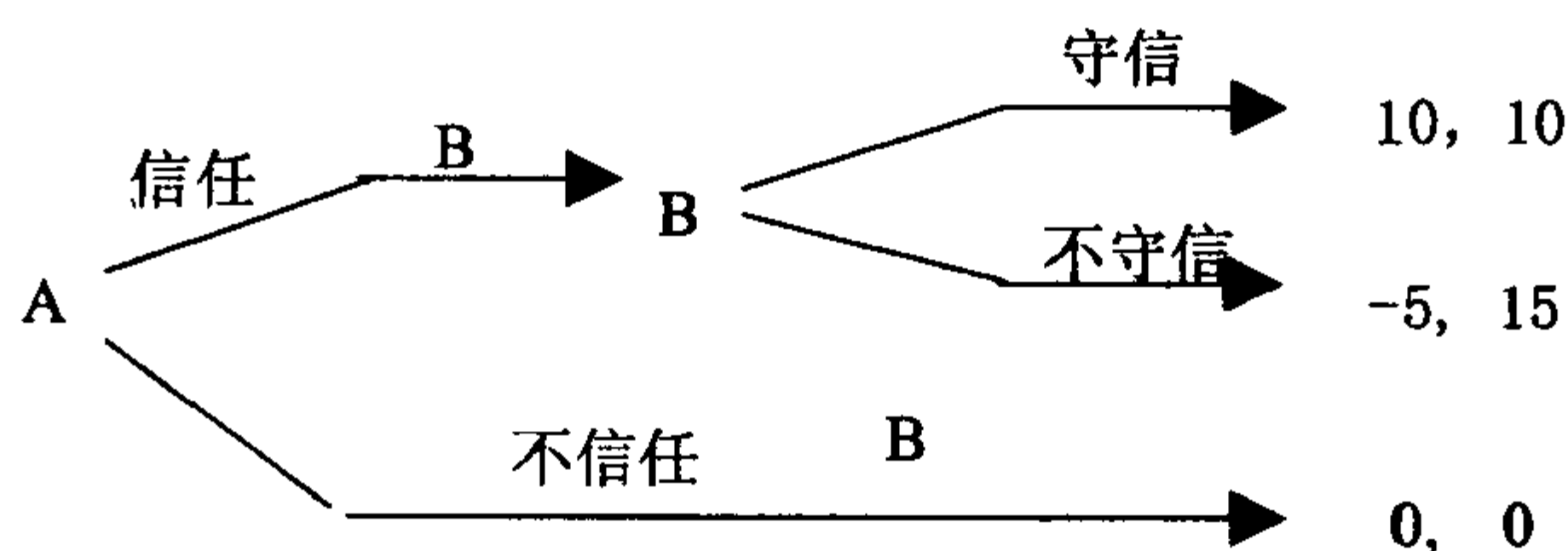


图 3 信任博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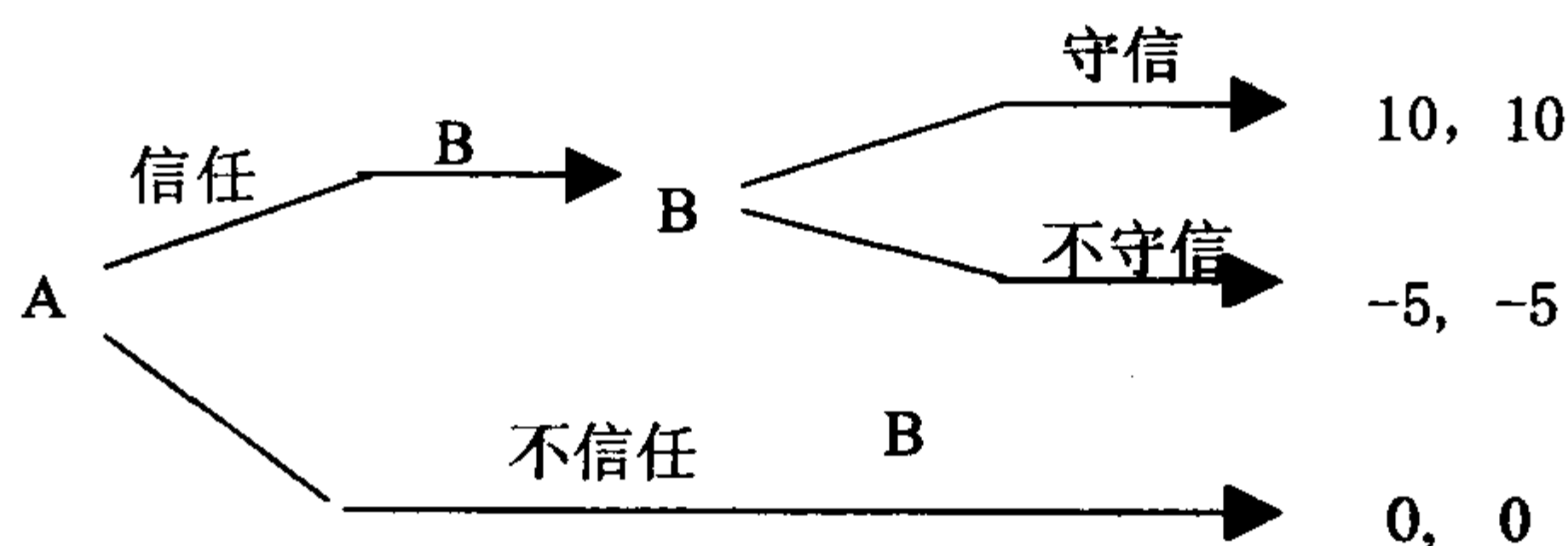


图 4 信任博弈:来自上帝的惩罚?

但是上述博弈的问题是:(1)可能存在多个均衡,例如 B 对 A 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每三次守信两次,不守信一次;但如果你

有任何一次不信任我，我将永远不守信”，那么 A 的最优选择仍然是信任；（2）人总是有生命极限的，博弈不会是有限的，如果博弈次数是有限的，根据逆向归纳法，人们会在最后一次欺骗，于是最后第二次也会欺骗……依此类推，信任仍然不会出现。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引入不同类型的 B，例如可以假定有一些人天生是守信的，尽管另外的人天生不守信，此时，即使天生不守信的人也可能守信，原因在于，如果博弈的次数足够长的话，为了获得长期利益，天生不守信的人也有积极性建立一个守信的声誉；（3）如果 A 不能观察到 B 的行为，从而 A 不能根据 B 过去的行为而选择相应的行动，信任也将难以出现。这就是信息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上述模型仍然有很大的解释力。一种情形是在一个小社会中，如果 B 经常是向多个不同的 A 借钱，而每个 A 都根据 B 过去的行为记录而选择是否信任他，并且关于 B 的信息能在 A 之间很快地传递，那 B 将有积极性建立一个守信的声誉，信任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形是即使 B 是短命的，仍然可以通过某种机制使得他有积极性建立声誉，例如可以把 B 的一生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工作，另外一个阶段退休，假定 B 建立一个“企业”，退休时可以将企业出售给另外一个人。显然，只有在这个“企业”有良好的声誉时，人们才愿意购买它。那么，B 在合伙期间也即工作阶段就有积极性守信，因为否则的话，他在退休后将难以生存。这样，信任仍然可能出现。当然，为了使 B 有积极性守信，他的工作时间要短于生命。这种观点还可以解释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功能，它使得博弈不会因为参与者的自然死亡而停止，起了一个长期参与者的作用（Kreps, 1986）。

最后要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关系。通过前面对信誉机制的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把市场与道德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和信任的关系很密切，因为交易离不开信任；同时交易又推进信任的建设，因为在商业社会里，要得到别人的信任，就要讲信誉。这已经不是新观点了，亚当·斯密早在 200 多年前就讲过：最商业化的社会，也是最讲究道德的社会。16 世纪时荷兰人就被英国人值得信赖，原因就是当时荷兰的商业比英

国发达 (Klein, 1992)。

三、法律：通过第三方 (Third party) 实施的行为规范

接下去我们来讨论法律。法律是靠第三方实施的规范，第三方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如国家）。这与前面讨论的借钱博弈不太一样，在前面的博弈中，出钱的人（第二方，second party）惩罚不还钱者，但法律不同，是法院、警官这样的“第三方”（third party）来惩罚。这种靠第三方来实施的法律究竟有何作用？在经济学家看来，法律的作用可能在于两个方面（Basu, 1998）。首先，法律可以改变博弈，包括当事人的选择空间，收益函数，从而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假如没有法律，违约可能得不到制裁；有了法律，违规者就会被处罚。例如在借钱博弈中，如果规定违约处罚，一旦违约，你就亏了 15，而不是赢利 15，那么，你的最优选择是守约，信任就会作为均衡出现。这样，法律通过改变支付矩阵就改变了博弈。法律也可以改变当事人的选择空间，使得原来在技术上可行的选择，经法律规定后就不能选择。如行车可左可右，假如法律规定你只能右行，那么左行的惩罚就很大，你就不会左行。但是，除了这种可以归结为对当事人选择空间及选择之后的支付来刻画法律的所谓“皮古观点”之外，现有一种更新的观点认为，法律不改变博弈本身，但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法律的这种作用是通过改变个人行动的预期来实现的（Basu, 1998）。这个观点很重要，下面就重点介绍这种观点。

（一）法律的作用：通过改变预期影响均衡结果

为何认为法律不会改变博弈呢？法律是由政府官员或法官实行的。在前面，我们假定执法人员是独立于博弈之外的，事实上，执法人员也是人，也有他们的选择空间和对应的效用函数。如果我们把执法人员也引入博弈，在一个更大的博弈框架里考虑法律，那什么也不改变。如在图 5，A 选择信任或不信任，B 选择守信或不守信，法官选择惩罚或不惩罚。在这个博弈中，法官也是其中一个参

与者（当然，博弈也可拓展到公众对司法部门的节制，但为了方便，我们只选这三个参与者），如果 A 预期 B 不会守信，B 认为法官不会惩罚他，法官实际上也选择不惩罚，那么 A 的最优选择就是不出钱。这样，如果每人都像原来那样行为，结果与原来一样，有没有法律都一样。问题是为什么有合同法的话，人们更可能还钱？因为法律可以改变人们的信念和预期，从而改变均衡结果：如果有了法律，A 预期 B 不守信将会受法官的惩罚，就会信任 B；B 预期不守信的话将受到法官的惩罚，守信的话将不被惩罚，就会选择守信；这样就会出现相互信任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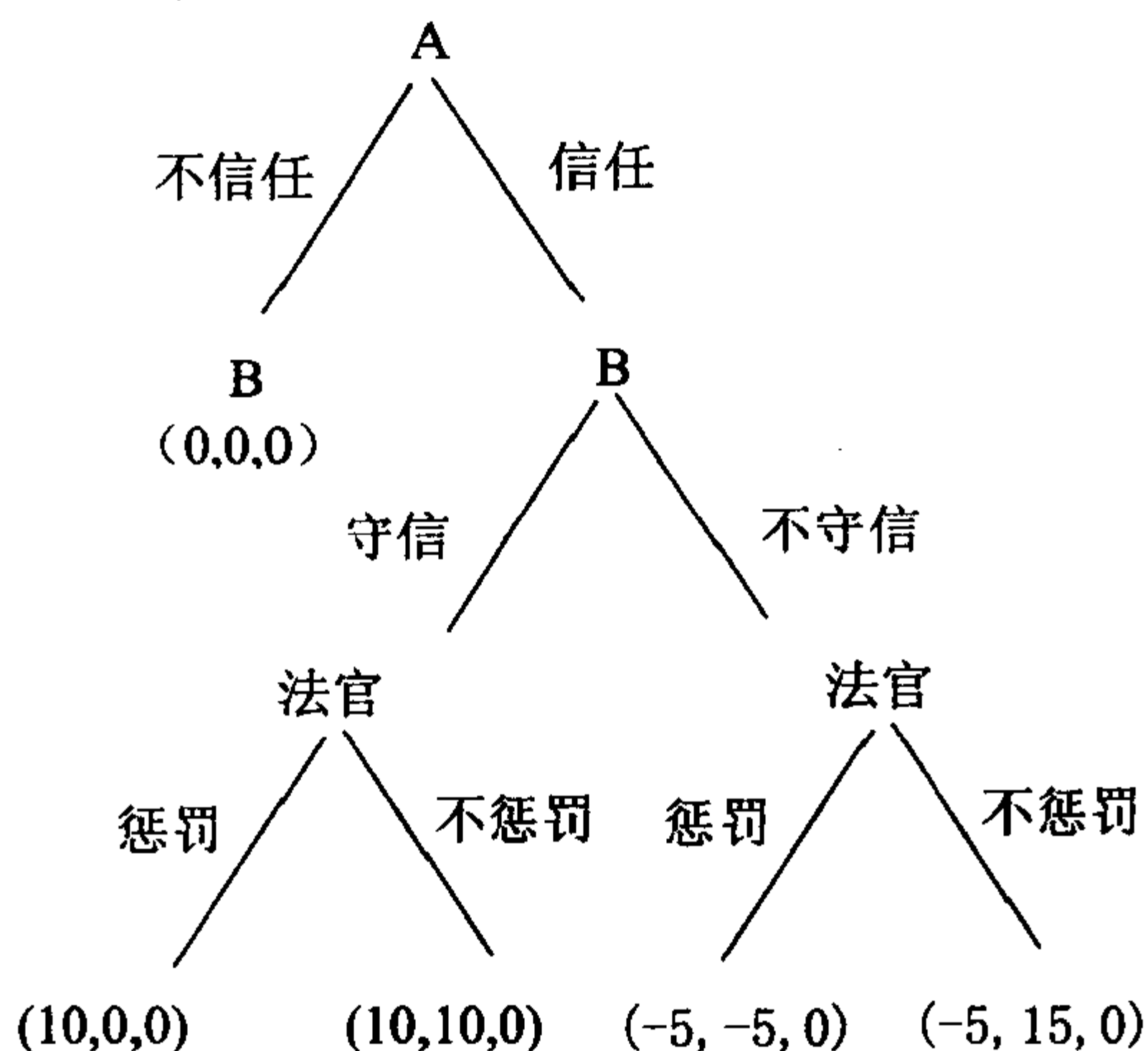


图5 法律的作用

这种理论很有洞见，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它。如刚才讲的交通规则，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开车时大家自然会形成走左还是走右的习惯，这是一种社会规范。但如果有法律，尽管博弈本身没有改变——每个人都可以左行或右行，但如果法律规定右行，每个人将预期别人都右行，并且每个人都预期别人预期自己会右行，则每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右行，所有人都将选择右行。类似地，如果法律规定左行，每个人将选择左行。同样如果法律规定男女进门时，女的要先行，那男的预期女的要先行，女的预期男的后行，所以先走了。这就是通过改变人的预期来改变博弈的均衡结果，而非改变博弈本

身。还有一个例子，如去飞机场接人，事先没说好地方，就有很多个纳什均衡。你去什么地方等人，依赖于你预期他去什么地方；而他去什么地方依赖于他预期你去什么地方。在英国希斯罗机场，每个航站都有个会客厅（meeting point），如果你找不到你的朋友，你预期你的朋友会去会客厅，你朋友也会有同样的预期与行为，你们就会在这个会客厅见面。此时，会客厅类似一个法律，它使得人们不再预期其他众多的均衡。假如机场管理当局建立 20 个会客厅，那就毫无用处了，因为它不能使人们形成一致预期。这时你可能会用另外的预期，比如你知道你朋友喜欢看书，你朋友也知道你知道他喜欢书，在书店碰面就可能是一个纳什均衡。这里法律并没有起作用。所以法律与文化都一样，可能只改变“虚”的东西（perception），不改变“实”的东西（reality），即只改变当事人的预期。但预期一变，结果就完全变了。回头来看专制者为什么令人害怕，因为每个人都预期别人害怕他，如果预期别人不害怕，那就造反了，齐奥赛斯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既然如此，就有下面一些问题：究竟法律与文化有什么关系？

（二）法律和文化的关系

Basu (1997)提供了一种理论，也即这里要介绍的“核心定理”（the core theorem）：任何能够通过法律来实施的行为和结果，都可以通过社会规范来实施。也即说只要法律能做到的，社会规范一样能做到。这定理有两个推论：（1）任何可以通过法律实施的结果，没有法律也能实施（order without law）。这不难理解，在许多情况下没有法律的确也能实施某些规则。比如几年前你去北京口腔医院看牙，看牙的人特别多，经常要排队。这些人自动达成一个规则，最早来的人会给每个人发一个号。这不是政府行为，只是自发行为，但大家都会遵守这个规则。形成这种自发秩序的原因在于，首先，最早来的人最有积极性发这个号，因为他可以给自己发个 1 号；其次，第 2 个人肯定尊重他的第 1 号，因为他可以是 2 号，否则可能第 2 号都排不上；第 3 个人也同样，如此等等。在这种规则下，只要前面的人数足够多，后面的人捣乱的可能性就很小，给定别人遵守这个游戏规则，每个人的最优选择是遵守这个游戏规则，

所以是一个纳什均衡。这就是没有法律的秩序，不是任何一个政府施加上的。这类现象在抗震救灾中也容易出现。（2）如果一个特定的结果不是纳什均衡（即不能通过社会规范实施），那么，没有法律能够得到这个结果（disorder with law）。这种例子俯拾即是，我们许多规定为什么会成为一纸空文、许多行为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它不具备自我实施的基础。

既然这样，那么法律和社会习惯有何区别？为什么还需要法律？这是因为社会规范的形成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进程，而法律通过加快信息的传递，来缩短形成一致预期、达到纳什均衡的时间；同时法律的强制性也使人们更容易造成一致，减少冲突。像交通规则，当没有汽车时，农村里走左或走右没有什么问题；汽车多了，没有法律，自然也会形成一种规范，左行或右行，但这需要一个很长时间。如果有了法律，它能够在已知两个均衡中选一个，宣布从明天开始大家靠左行或右行，这个试错过程就可以缩短很多。反过来，这也使规范改变起来比法律慢多了，法律废除了，会有新的，但社会习惯形成慢，消失也慢。

其次，法律特别是在处理不同的规范之间的冲突时往往很有威力。例如，英国人习惯靠左行，美国习惯靠右行，一个英国人到美国后，由于不同的规范，可能会发生冲突，此时有法律的话，就比较好解决。如果去美国之前，记住美国法律规定人们靠右行，有些冲突就不会出现。否则光靠规范，英国人到美国撞两次车后自会走右边，但可能他会先被撞死。与此相联系的问题还有，一个规则本身是否是纳什均衡也能预见到法律执行起来的容易程度。为何在许多交通规则中，靠右行的法律容易得到遵守，但不要抢行这个法律难以被遵守？这是因为大家都靠右行并不会带来损失（而且有好处），是一个纳什均衡，但如果抢先，你就可能得到好处。

再次，法律和文化还有一点重要的区别是，法律可以通过加快信息的传递来起作用。假如在北京，一个人向好多人借钱，他骗过你之后，你没有时间告诉别人他骗你了，但如果有法庭，你只要告上法庭，就可以了，信息很快就传递到其他人去了。中世纪商人当时有自己的法庭，当时地中海一带都是一些小的诸侯国家，法律不

统一，在其他国家做生意得不到法律保护。商人就自己成立一个法律机构（Law Merchant）（Milgrom, North, Weingast, 1990）：如果你要与某人做生意，可先到这个机构来调查这个人过去是否有骗人的记录，如果你调查了，那么你被骗之后可以向这个机构投诉，否则，不可以投诉，这样形成一个私人法院（private court）。无需每个人都告诉别人他做了什么事，你只要告诉这个 private court 对方骗过你，做生意时，它就会告诉你谁有信用。这样信任就可以建立起来了。

至于法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传统的观点认为法律是有意识设计的产物，代表政府的意志；但现在的研究表明，大部分法律是自发形成的，很多法律都是由社会规范演变过来。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普通法演变的故事。英国的普通法来自商法，而最近对商法的演变的研究表明（Benson, 1989），许多法律都不是由立法者当初就设计好的，而是吸收商人习惯法基础上长期演变的结果，是各个参与人长期博弈的一组均衡。法律在这里不过是确认了的一种社会规范，这样它具有自我实施的基础。

（三）不完全合同理论与法律

最后，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及经济学上的不完全合同理论对法律的研究有推进作用。不完全合同理论是由 Grossman 和 Hart (1986) 首创的。所谓不完全合同是指对未来可能的状态及行为没有明确规定的合同。合同不完全，不仅仅是说字面上写不清楚（或成本很高），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字面上写清楚，还有两个实施中的问题，一是事件的不可观察性（unobservability），二是第三方无法确认性（unverifiability）。但是法律执行一方面要求的是完全合同，另一方面法律的实施依赖于可确认的证据，这导致了不完全合同在法律上往往是不可执行的。更进一步说，法律本身也是不完全的，否则，就不需要律师了。合同的“空当”导致了“权威”（authority）的出现，或者说权威就是填补合同中没有规定的东西。

当合约不完全时，权威就不可缺少。但权威的获得需要信誉的保证。比如说，在雇佣关系中，雇主获得指挥雇员的权威，但雇员愿意接受雇主权威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他相信这种权威不会被滥

用。这种信任一定是以雇主的信誉为基础的，因为法律很难防止雇主对权威的滥用。

不完全合约可以用来解释企业文化。只有理解了不完全合约才能理解企业文化。企业中有许多行为没规定清楚也无法规定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人的行为的稳定预期必须要求有一种“默契”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否则企业运行的交易成本将很高甚至根本无法运作。这种“默契”和稳定预期就可以认为是企业文化(Kreps, 1986)。企业文化主要就是用来弥补正式合约缺陷，如果合同是完全的话，那么可能就不需要企业文化或者说企业文化的作用要小的多。为何中国现在企业文化炒得特别热，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制度很糟糕，所以我们才要拼命地去宣传企业文化的重要性。

这也适用于对政府行为的研究。政府的权威往往来自不完全的“合同”，因为合同不完全，到发生法律没有规定清楚的事情发生时就由政府说了算，所以政府官员喜欢把法规政策写得很模糊。法律法规规定得越模糊，政府的权威就越大，因为一方面法律越模糊解释的权威就越重要，另一方面，法律越模糊自由裁量权就越大。而且，进一步说，政府与企业不同，企业是有竞争的，这自然会使条约模糊度会达到最优点。比如有两个饭馆，一个饭馆明码标价，即条约明确，另一个没有标价，吃完再说，后面这家就没有生意了。但是政府是一个垄断者，没有别的一个“饭馆”与它竞争，这样它就有可能将法规写得很模糊。所以，政府文件下常有诸如“或由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什么什么”的条款。如中国过去的保密条例有“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写的不写”这样的规定，但没规定什么不该说，什么不该写，判别一个人是否泄露国家机密的权利都交给了管事的官员。

政府法规的最佳模糊度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法制建设。基于不完全合同理论，我自己的观点是：能够写清楚的交给法律管，写不清楚的交给文化管。运用法律的成本非常高，如果把法律都不能写清的行为交给法律管，那肯定会有问题。例如现在，见义勇为之后的纠纷很多，把你救起来之后我向你索钱。如果法律规定把人捞上来可以收钱，这没有什么不好，至

少这样可以调动大家救人的积极性；但人们认为你既然做好人好事，那为何还向别人要钱？所以在这一点上有争议，还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预期。还比如拾钱酬金问题，我国古代也有这种规矩，先是招领，如果没人认领，那么这个钱包就是他的；有人招领的话，失主就给拾金者一定比例的报酬。因此不完全合同理论对于法律的完善大有帮助。

四、历史：文化、法律和制度的演进

最后，我们来看历史。如果你不了解法律、文化，就无法理解历史，因为历史本身是文化、法律和制度的演进。我们先来看经济学家如何研究历史。

（一）经济学研究历史的三种方法及其运用

经济学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可以归结为三种（Greif, 1997）：

（1）新古典方法（The Neo-classical Approach）。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用计量经济模型来检验历史上存在的制度，包括市场以及价格和非价格制度等。例如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存在着资本市场，有经济学家研究了伦敦的资本市场和曼彻斯特的利息率的关系，发现当时的资本市场已经超出地区范围了。另外，经济学家也研究市场制度的替代物。例如过去村民们分地，总是好的一块，坏的一块，分成一条一条。为什么不整块地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当时没有保险公司，这样不同的地上，有不同的坡度和肥力，可以种不同的庄稼，土地组合起到了保险公司的作用；有了保险制度以后，就不一定需要这样了。

（2）新制度经济学方法（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代表人物诺斯（Douglas North, 1981, 1990）认为制度是一种博弈的规则（rule of the game），制度变迁就是游戏规则的变迁；组织是博弈的参与者，经济增长是制度的一个函数。其主要的工具是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它得出三个推论：第一点，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来自交易成本的节约，包括诺斯

所描述的意识形态也是节约交易成本的一种安排。第二点，制度随技术变化、人口增长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制度必须有效地变化，而且经济绩效依赖于有效的制度变化。由于专业化增加交易的成本，所以制度变化在发达国家更重要，在今天比在过去更重要，技术变化越快的地方，制度变化也就越重要。我们看到，新技术革命，即 IT 技术，对我们制度提出一大堆挑战，最简单的比如中国电信这种垄断制度，它必须很快进行改变，如果它不改变，就影响整个中国的效率，而在十年前问题可能不会这么严重。第三点，制度常常是无效率的，因为它们受到交易成本的影响，不好的制度可以长期锁定。当然，诺斯的这些观点有几个问题：他认为制度是以国家为前提的，但为何要存在国家，是上帝创造的还是我们自己建立的？他无法解释我们前面所讲的制度的自我实施问题，包括国家本身；无法解释非法律因素（包括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的影响；无法解释“路径依赖”。所以我们下面介绍最新的一种分析方法。

（3）历史制度分析（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这种分析主要用现代博弈论，从微观的、大量的历史资料来解释制度的存在和演进。这是一种非常新的理论，代表人物有 Greif（斯坦福的一个副教授，在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名气非常大）等，他用博弈论来研究经济制度史。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他研究公元 11 世纪时，地中海一带从伊拉克到北非的犹太人商人团体的信用制度问题。这些商人在地中海一带做生意，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货发出去后，你自己跟过去，卖了货把钱拿回来，这样方式效率很低；另有一种方法，货发出去后，目的地有你的代理人，帮你卖东西，卖完后把钱给你。当然，第二种选择更有效，因为你不必跟过去，是他（代理人）为你提供本地的且很专业的服务，如美国人把东西卖到中国他不必跟着来，中国有人帮他卖。但代理人制度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怎样控制代理人，他随时可以骗你。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商业制度就不能形成、不能持续。Greif（1989，1994）的研究发现，那些犹太商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成立商业联盟（coalition），互为委托代理，即你帮我卖东西，我也帮你卖东西，假如你骗我一次，那么所有联盟的人都知道，以后谁也就不帮你了。

因为你害怕这个惩罚，所以你就不敢违约。商人们联合起来，互相帮助，所以贸易就发展了。在这样情况下，每个人都希望建立一个不欺骗的信誉（reputation）。Greif 通过大量新发掘的资料的统计分析，发现信誉在这里起很大作用，否则地中海商人团体就发展不起来。引申一点，Milgrom-North-Weingast（1990）关于律商（Law Merchant）的研究也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他们发现，Law Merchant 起了充分传递信息的第三方的作用。实际上这表明，Law Merchant 制度相当于在现代社会的信用报告制度（credit reporting bureau），在二战之后美国，这种机构就很多了，每一个商店都可以加入某个组织，当有人欠你的钱，你就告诉这个组织，不再对这个人提供信用。这种制度运行非常有效，美国商业信用制度之所以非常发达，也有它的一份贡献。因为用现金买东西，当场检验即可，靠信用卡卖东西，信用就非常重要，因此关于信用的信息怎么传输也显得非常重要。通过信用报告机构，有过期账款一查就知道，这样你就不会给他赊购，不易造成欺骗。当然，如你没加入但告诉你的客户说你加入了，别人也可能就不敢骗你（Klein，1992）。

再有一个研究是 Benson（1989）关于商法的自我演进的分析。实际上国际上的所谓仲裁制度本质上与 Law Merchant 一样。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跟中国人签的合同，仲裁条款大部分是通过国际仲裁机构来办的，不使用中国的法律。原因可能是因为，第一你的本身法律与他不一样，第二是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嫌疑。但国际仲裁机构没有警察，不能强制你，它的裁决为什么对当事人有约束力？因为如果你不执行他的判决，那么就沒有人会跟你再做生意，这是很简单的道理。Benson 的研究同时分析了各国法律制度本身。在西方也一样，外国人来你这儿做生意，一开始肯定保护本地人，但后来，各个商人却会联合起来，形成专门保护外国人利益的法律，使外国人有积极性来做生意。这对我国可能很有启发意义。在我国各省之间做生意，打官司一般要在当地法院，但当地法院一般偏向于本地人。所以，有人提议中国的司法审判制度应该集中化，建立像美国那样的巡回法庭，地区之间的纠纷都由上一级的法院来执行。这个建议可以接受，因为上一级法院比本级中性。但是从 Benson 这项

研究中得到的结论看，重新思考一下，觉得也不一定如此。如果地方竞争充分的话，每个地方为了吸引外地商人来投资，它也要建立一个保护外地人的法律。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例子了，一些省份签订了横向地区之间互相保护投资人权益的协议。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政府官员仍然十分短视，为了保护本地产品，规定本地的产品摆在容易看见的地方，外地的产品靠边站。我们知道这对商业的发展很不利，如果长期竞争的话，这些地方就会落后。所以应修改法律的制定原则和过程，即把商业实践本身变成法律。如果一个法律想改变一个商人本身的行为规则，一个合理的办法是要把商业协议本身变成法律。

另外，在关于路径依赖的分析上，历史制度分析法也提供了许多有意思的案例。Avner Greif (1994, 1997) 研究的 Maghrib 商人形成的秩序其实是集体主义的，因为他们是互相为代理人，惩罚对方是靠第三者完成的。就是说你骗了我了，可能不是我惩罚你，而是另外的人惩罚你。在这种情况下，骗过人会被别人所骗，欺骗骗过的人，并不算骗人。而他研究的意大利的热那亚商团，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秩序，因此惩罚就需要通过国家政策的手段来完成。由这两种不同的传统便会衍变为现在两种不同的主义。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里个人之间、人群之间的信任度可能较低；而在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较高。假如由于某种原因两个社会合在一起，那么两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会很容易互相信赖，而两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却会只信任自己，各自只跟自己的群体交易。

（二）谁来研究中国经济史？

最后我想提的问题是，谁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我虽然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但无能为力。这里我向大家介绍的是一些新的方法。这些方法，可能就目前国内而言，据我所知，很少人运用，也很少人知道。因为如果要运用这些东西，你必须要有比较好的经济学功底，这也许是一个困难。但运用这些理论，可以对我刚才所说的文化、法律和历史进行分析，如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商帮，它们怎样实施合同，怎样使用惩罚机制，使得每个人建立信誉，怎样控制个人行为，这都非常有意思、有价值，值得研究。我们中国最早形成现代的文

官制度，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建立起来，特别是到唐代的时候有很完善的三省六部制，这样一种政府制度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比我们现在制度都优越、有效。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用前面介绍的理论去研究。还比如关于王朝更替、官员腐败问题等，可以用委托—代理理论去研究。实际上，每一个皇帝都希望自己的天下长治久安，因为皇帝是一种重复博弈，他希望天下祖祖辈辈都是他家的，这跟一般官员不同，后者只有几年的任期，是短期行为。但为什么一个朝代一般都是二三百年甚至更短就灭亡呢？值得好好地研究。我猜很大的一个可能就是控制代理人的问题，代理人的问题没解决好。皇帝和太监的关系跟股东和经理的关系没什么差别，跟一个主人和保姆的关系没什么差别。他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即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需要我们去研究。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与代理人、信息有关。运用这些国际前沿的经济学方法，将会得到很多有价值的结论，有待于诸位有志者去努力。

参考文献

- Aumann, S. And S. Hart**, 1992, *Handbook of Game Theory*.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Elster, J.**, 1983, "Maxism, functionalis, and game thoery", *Theory and Society*, 11:453-82.
- Basu, Benson, Bruce**, 1989, "The Spontaneous Evolution of Commercial Law",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5: 644-61.
- Casadesus-Masanell, Ramon**, 1999, "Trust in Agency", a working paper, Kellogg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Fukuyama, Francis**, 1995, *Trust*. New York: Free Press.
- Greif, Avner**, 1989, "Reputation and coalitions in medieval trade: evidence on the maghrib trader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4): 857-82.
- Greif, Avner**, 1994,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 (5): 912-50.

- Greif, Avner**, 1997, "Microtheory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rough economic history", in Kreps and Wallis (eds) *Advance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Volume II, 79-113.
- Greif, Avner**, 1997, "On the Interrelations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and Normative Factors: Reflections from Two late Medieval Society", in Drobak and Nye (eds) *The Frontier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cademic Press.
- Grossman, Sanford and Oliver Hart**, 1986,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697-719.
- Gibbons, Robert**, "Trust in Social Structure: Hobbes and Coase Meet Repeated Games", in K. Cook (ed.), *Trust in Socie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Klein, Daniel**, 1992, "Promise Keeping in the Great Society: A Model of Credit Information Sharing", *Economics and Politics*, 4: 117-36.
- Kreps, David**, 1986, "Corporate Culture and Economic Theory",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Strategy* edited by M Tsuchiya, Nihon Keizai Shimbun, Inc.
- Milgrom, Paul, Douglas North and Barry Weingast**, 1990,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the Revival of Trade: The Law Merchant, Private Judges, and the Champagne Fair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 1-23.
- Myerson, Roger B.**, 1999, "Nash Equilibrium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XXXVII (3): 1067-1082.
- North, Douglas**,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 North, Douglas**,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tember, Julio J.**, 1994, "Human Relations in the Workpla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2 (No.4): 684-717.
- 张维迎, 1996,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

权力回归社会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根本方向

宁 骚

宁骚,男,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43年6月生于河南省西平县,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并留校任教。1990年2月开始执教于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1991年8月晋升为教授,1993年8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同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现任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民族政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非洲学会副会长、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全国自学高考委员会政治学类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非洲问题研究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第一副主任。主要的专业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学(以理论、方法和发展中国家为重点)、民族政治学和非洲研究。

政府有两种基本职能: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只要存在,就须设置一定数目的机构,否则就无从履行其职能,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政府机构设置的目标追求,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来说,从抗日战争中期以来就是很明确的,即实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实际上,精简、统一、效能,这也是世界各国现代政府在进行机构设置时遵循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

虽然目标追求是正确的和明确的,但是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府机构设置经历了许多次的变动和变革,离目标的实现都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在50—70年代,我国一直用“精简”一词来指称国家机构设置的变动;1981年12月五届人大四次

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机构改革”这个概念。建国以来中国进行七次政府机构改革，其中50—70年代三次，80—90年代四次。对于这些改革，很多人用一句话来评价，就是“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怪圈”就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循环”。具体地讲，有五次循环：第一次：从1949年设政务院到1954年改设国务院再到1956年，中央行政部门的机构设置从30个增加到64个再增到80个（其中经济管理部门51个）。1959年第一次精简机构，经过调整合并，机构数减少为59个；到1965年新设12个部委，以及直属机构恢复到23个，机构总数再次达到80个，从而形成第一次循环。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国务院的机构设置，1970年，由国务院领导的机构只有20个，其中政务类3个（外交部、公安部、国务院办公厅）、文教类4个（文化组、科教组、卫生部、中国科学院）、经济类13个（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农业部、冶金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水利电力部、轻工业部、交通部、财政部、商业部）。1975年一些机构开始恢复设立和工作，机构达到50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更多的国务院机构得到恢复和设立，机构不断增加，到1981年膨胀至高峰，达到100个，从而形成第二次循环。

第三次：1982年机构改革时中央行政部门的机构设置调整为61个，以后有小幅度的增加——1984年膨胀为64个，1987年达到71个，从而形成第二次循环。

第四次：1988年机构改革将机构数调整为66个，但是到1992年增加到86个，从而形成第四次循环。

第五次：1993年机构改革将机构数调整为66个，其中包括41个部委（含国务院办公厅）、5个办事机构、13个直属机构和8个直属事业单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8年。新一轮改革将国务院机构精简为30个部委（含国务院办公厅）、6个办事机构、17个直属机构和9个直属事业单位和新设的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总共63个机构。

比较确切地讲，只应当说有 4.5 次循环，因为在 1993—1998 年期间，政府机构的数量并没有膨胀。膨胀的只是人员编制和行政费用开支。

很多人对上面我们谈到的“怪圈”，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失败的表现”。我认为这种认识是表面性的、片面的。

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出现“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这种循环，至少有这样几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任何行政组织都具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倾向。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机构的膨胀是行政组织的共性的一种表现。

对于行政权力自我扩张的趋势，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中曾作过系统的历史考察。他指出，在法国，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大革命使行动权力“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了它的“辖制范围和职能”，扩大了它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增加了“它的机构、它的独立性和控制现实社会的超自然威势”。到了复辟时期，行政权力更“得到了充分发展”，它的内部有了“更大程度的分工”，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无孔不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更高的普遍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到法国的铁路、国有财产和国内大学止”。到第二帝国时期，行政权力看起来战胜了立法权力，“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它已经“臻于完备”，“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它是极其强大有力的——“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可怕的寄生机体”“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它“像蟒蛇一样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成为市民社会身上的“寄生赘瘤”。

以前我们在学习马克思的著作时，认为马克思揭示的法国行政权力的自我扩张，只是体现了资产阶级国家行政权力的共性，现在看来所有的行政权力都具有这种特性：行政权力总是试图扩大自己

的权力范围、组织规模、人员与编制和地位级别，总是尽可能多地储存人力资源和权力资源。当行政权力扩充机构和人员时，它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因此争机构、争编制、争经费就成为行政权力的不可遏止的冲动。这种冲动就是政府机构膨胀的动力。

第二，中国行政权力缺乏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

在西方国家，政府各部每年提出预算报告，财政部门对预算报告尤其是人员编制等进行审查后报议会讨论批准，任何人无权更改。对各部来说，必须在批准的预算限度内安排人员编制。在严格的预算控制下，当然就难以出现机构和人员增长失控而自行膨胀。

在中国，情况几乎完全不一样。长期以来的管理办法是，随着人员的不断增加，行政经费开支，尤其是人头费部分，也不断增加。换句话说，不是编制服从预算，而是预算服从编制。增加机构和福利，行政经费相应增加。于是，政府机构和人员的增长，失去了硬约束机制。在中国，由于行政预算管理 with 编制管理的脱节，以及行政预算的软约束，使得编制部门在审核政府各部编制时，缺乏明确的依据和有力的手段。有的行政部门甚至在国家下拨的行政经费之外，将各项业务费拿来作人头费开支或购买办公设备，以至于出现了只要手中有经费就可以增设机构、增加人员的局面。

要改变这种状况，治本的办法就是强化预算约束，用硬约束强制政府各部门的内设机构和人员配置只在预算的范围内进行。

第三，中国行政管理的人治特征，造成政府机构设置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长期以来，政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规则，往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联合或单独下发通知的方式做出，一直没有一部专门的基本法律作依据。另外，在有关的组织法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机构在其地位、任务、职责权限等方面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造成部门、机构之间职责不清、互相扯皮和推诿等弊端严重存在。同时，关于机构设置的法律规定用语过于笼统、条文过于粗略和简单，法律涵义弹性过大，使得实际执行过程中歧见重重、莫衷一是。仅有的几部组织法规和有关的政策性文件，缺乏承担法律后果、法律责任的具体条款，缺乏严格的违法处罚制裁内容，使

得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模糊不清，这样就造成执法不严的现象更加难以扭转。

在改革开放以前，行政机构的设置尤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通常的做法是，当需要加强某方面的工作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设立机构，而且在设置机构的具体程序上又有很大的随意性。

第四，人事管理上的某些压力，对政府机构的人员膨胀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某些压力：（1）人事安排压力。军队转业干部要安置，高校毕业生要就业，加上编制工作无法可依，这样就使得政府机构中的人员编制，变成了日益膨胀的气球。（2）职务终身制的压力，政府官员由于卸任以后在待遇上会发生很大变化，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继续担任一定的职位或者晋升到更高的职位，而这种要求又常常得到迁就，也往往能被安置一个与原职相当的职务甚至再升一级半级，于是各种“巡视员”、“调研员”便应运而生。

以上我们分析了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形成“怪圈”的若干重要原因，但是还没有谈到根本原因。那么根本原因在哪里？回答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

机构的设置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履行政府的职能，在政府的基本职能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单纯的政府机构调整、增减，虽然能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解决机构臃肿、人员庞杂的问题，却毕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政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确定，取决于两个因素：（1）政府要管理多少社会事务？（2）社会能够向政府支付多少管理费用？

当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时，最早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Jefferson, 1801—1809）提出，“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也就是说，政府管理的社会事务少，政府要履行的职能只是最低限度的，所以政府的机构就少、人员编制就小，当然政府向社会收取的管理费用就不多。这样一种“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对马克思和十月革命前的列宁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在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做设计时，遵循的就是杰弗逊的思路，坚持的是社会中心主义。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明确指出：未来的无产阶级国

家“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所谓“社会共和国”，就是以“社会解放”为宗旨的共和国。而社会解放，一是要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二是由人民自己实现“人民管理制”，“将‘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马克思认为，“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

按照马克思指示的方向，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里为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设计了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就是所谓“半国家”的模式。这个模式有以下几点：

1. 无产阶级国家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
2. 无产阶级国家“只要有很简单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组织”；
3. 无产阶级国家不要行政机构这种“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彻底破坏官僚制”，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要“全民化”，也就是“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
4. 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全体公民……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也就是说，在实行了“剥夺剥夺者”这一根本措施的条件下，公民权利上的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5. 无产阶级国家“把民主大规模地扩大，使民主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享受……的民主”。

虽然马克思、列宁设计的无产阶级国家模式在有些方面如“废除常备军”、“彻底破坏官僚制”等等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他们指示的根本方向，即权力回归社会，对于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是有重要意义的。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联 70 多年的国家发展史表明，马克思、列宁主张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在实践中蜕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国家中心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马克思、列宁的社会中心主义模式中包含着一种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安排：废除私有制，建立公

有制。公有制经济的直接所有者和经营者只能是政府，于是这一模式蜕化为国家中心主义就成了必然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仿照苏联国家机构的模式，到 50 年代中期就形成了执政党与政府、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政府与企业、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在这种领导体制中，行政体制与体制密切相关。当时逐步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典型的命令经济体制。它在计划体制上反映为国家把国民经济的绝大多数成分都不同程度地纳入计划轨道，对国营工业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管理，以中央主管部门“条条为主”，企业生产所需的物资和奖金，由其主管部委根据计划统一分配和调拨。它在财政体制上表现为实行中央、省、县三级管理，统收统支，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负责。它在投资体制上表现为由中央政府各主管部门按不同的“条条”管理投资，统一计划。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行政体制的模式，决定了中央政府的功能、结构和行为方式。中央政府所属的各管理部门，按其管理对象可以划分为非经济管理部门（如外交、国防、文化、卫生等）和经济管理部门（如机械、冶金、化工、电子等）。经济体制模式直接决定了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功能和结构。首先，在功能上，政府各经济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是决定各自所属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投资数额、资金来源、原料供应、销售渠道等都由其主管部委直接决定，其所运用的手段是行政性手段。地方各级政府对其所属企业的管理情况大致相同。其次，在结构上，政府各经济管理部门内部机构的设置是由其承担的功能决定的，通常是把管人财物、产供销的功能划分为若干部分，然后设立相应的机构承担各自的职责和任务。由于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功能包罗万象，决定了政府各经济管理部门必须按照产品专业详细划分，细密设置，否则便“管不了或管不好”。这就导致了中央政府内经济管理部门在比例上占了主导地位。据统计，1956 年中央政府内设机构 81 个，其中经济管理部门占 50 个，1981 年 100 个中占 66 个，1988 年 66 个中占 37 个，1992 年 86 个中占 50 个。大体上都占到约 60%。地方政府在功能、结构和行为方式上，基本上与中央政府相同。再加上经济的公有制性质，企业对职工的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都要包下来，这样就全面地形成了单位制。结果，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就遍及各个角落。社会在各方面都指靠、依赖政府。政府管理社会的功能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机构膨胀就成了不可阻挡的趋势。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重新考察中国在最近半个世纪里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改革不是全都失败的。如果朝着权力回归社会的方向进行改革，改革的成果就能逐渐地得到巩固，这样的改革就是有成就的。如果只是在政府机构之间进行职能调整，机构精简之后很快就会膨胀或者变相膨胀。这样，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就可以划分成如下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50—70年代政府机构精简，有两个不变的主题，一是在管理体制上，局限于中央权力大一些，还是地方权力大一些，是以“条条”管理为主，还是以“块块”管理为主；改革的思路是做行政性分权，权力的转移是在同一层次的不同政府机构或者不同层次的政府之间进行的，经济管理权虽然有收有放，但是企业作为各级政府机关的附属物的地位，始终没有发生变化。二是中央政府的组成结构不断有所变化，机构有合有分，有设有废，但其直接管理企事业单位的功能始终没有变。在功能未变的前提下，机构精简之后必然重新回升。这个类型的改革，以1982年改革为巅峰。

第二种类型，是从1988年从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开入手进行机构改革，1993年“从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为目标进行的机构改革，权力的转移除了行政性分权之外，主要的是在政府与企业、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的，不仅政府机构的设置有变化，更重要的是政府直接管理企事业单位的功能有了根本的改变，企业自主性、社会自主性开始形成。1998年改革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显著。在这次机构改革工作中，国务院交给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的职能有200多项，这一点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在地方行政改革中，只有坚持权力回归社会这一方向，才能有所成就。当然，企业自主性、社会自主性的形成，也需要有政府的指导。

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民法

刘 凯 湘

刘凯湘，男，1964 年 12 月 2 日出生于湖南攸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会员，北京民商法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员，北京市高等学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校兼职教授。1984 年 7 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87 年 7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商学院法律系任教，1992 年晋升为副教授，1998 年晋升为教授。1999 年 5 月调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学术研究领域为民商法，主讲课程包括民法总论、物权债权法、西方国家民商法等。

晚上好，同学们！今晚我的讲座题目是“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民法”。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一）民法的本质；（二）民法的理念；（三）民法的国际性与民族性；（四）21 世纪的中国民法展望。

一、关于民法的本质

这个问题涉及到民法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和性质。我们知道，从横向分析，人类文明有政治的文明、文学的文明、法律的文明等组成部分，都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范畴；而从纵向看，文明又有三个层次，从器物层文明，到制度层文明，最后上升到观念层、文化层的文明。对于法律文明在人类文明中所起的作用，从法学本身的角度看待法律文明，我们更多地是从法律本身如何完善，如何从不成文法、习惯法走向成文法，如何从一般的制定法走向法典法，如何从简单的刑法、民法走向现在各种各样的法律部门如诉讼法、

行政法、经济法、商法，等等，但是从法社会学、法哲学的角度分析，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与文明的其他组成部分，如伦理、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经济制度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所以现在很多法学研究者可能更多地从法哲学、法经济学、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法”这种社会现象和其他文明现象的相互关系，想从此揭示一个国家的文明化、现代化进程，不是单一的社会现象的过程，而是综合的、各种社会现象和制度共进的关系。这当中，我觉得从民法的角度来分析“法”与其他社会现象这种共生、共进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什么是民法？它的本质是什么？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各个典型阶段，与这种典型阶段发展相适应，都屹立着一座丰碑——这座丰碑就是民法典。恩格斯认为，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最完善的法制是罗马法，而罗马法 90% 以上是民法的内容，如关于财产的权利、关于人身方面的权利等内容。到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自由经济时期，有法国民法典；国家资本主义时期有德国民法典；二战以后，有美国的商法典，等等，英美法系传统上没有“民法”的概念，但其有与大陆法系的民商法相对应的私法概念，也就是所谓的 *private law*。也就是说，在人类的任何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法制上记载这种历史变迁的一座座丰碑就是民法典。这种现象从非法学的角度是很难想像的。拿破仑在起草法国民法典时说，他希望他的法国国民今后依靠两样东西就能幸福美满地生活，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他的《民法典》。一个民法典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一国的国民能依靠它而享受幸福、安宁的生活？这要说到民法的本质了。

民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简单地说，民法就是关于人的法。民者，人也，民众也。“民法”这个词在汉语里是很巧的，这个“民”并不完全是“民间”的意思，它是从罗马法所谓的“市民法”演变而来的，指公民、国民、人民。所谓“市民法”，里面有个基本定性——市民社会的问题。市民社会本身不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那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人们头脑中、观念里的一种抽象概念。人总是生活在两个社会中的，

一是市民社会，所谓市民社会，就是人之为本质的那些社会关系，人生存的基本需要。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他需要占有财产，有良好的生活条件；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他有名分的追求，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这都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人之本的东西。而民法则通过规则和文化来认可这些人之本的东西。与市民社会相对应的概念是政治社会，政治社会是国家、政府发展以后人们不可离开的一种社会关系。人一出生便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具有这个国家的国籍，有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自由等宪法上的权利。但作为一个人，他的生存之本是在市民社会之中，而不是在政治社会中。政治社会中的需求对于正常人的正常生活而言是可多可少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而市民社会中的需求则是人们须臾不可离开的，是人的生存之本。而民法正是关于肯定和保护人之基本生存状态所需要的权利的法，这就是市民法。国家是由这两个社会组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如果政治社会被不恰当地放置在市民社会之上，政治权力过于扩张，由于利益本身是个常量，市民社会就必然被压抑、排挤，人们的基本需求就得不到承认和保障，政治社会就会发生异化。反过来，当市民社会很发达，人们的财产权利、精神的权利、人格权利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时，人本的东西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实现。而一切文明的东西，都是为了人基本权利的实现而存在的。同样，我们何以需要政治社会，需要政府、国家？为了证明国家、政府的存在甚至强大？不是。政治社会的存在是为了国民能安宁、幸福地生活。政治社会不是为它的存在而存在，市民社会才是目的。政治社会只是一种手段，人们需要这样一个社会利益的中心来代表全民进行社会秩序的管理，行使公共权力，但其目的是市民社会中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而这正是始于罗马法的一种理念。这种关于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进入文明的范畴并成为人类的一种共识是历经磨难、弥足珍贵的。欧洲也是这样的。从公元 5 世纪罗马法结束以后，欧洲进入了漫长的教会法时期，否认了罗马法所植根的古典的民主政治和市民文化。14 世纪，欧洲出现了所谓的三大运动：一是文艺复兴，一是宗教改革，另一个就是罗马法复兴。学者认为三大运动的前奏和核心都是罗马

法复兴。因为人们发觉，在现代社会中，如果希望得到安宁、幸福的生活，能够理性地理解和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政府的关系，只需要恢复罗马法里的东西并加以改造就可以，因为罗马法已经找到了迄今为止最完美的答案，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所谓罗马法其实主要就是指罗马私法，即民法。

我们再简单地看看罗马法是如何培育和发展这种理念，以至现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受到罗马法的影响。说到底，罗马法揭示了两个最基本的人之为人的东西：第一，它承认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承认这种追求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只有这些利益、权利、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和保障，社会才可能得到进步，才可能创造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来满足人们的生活。这与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如人之初、性本善是很相似的。但第二步，质的变化就出现了：这种对利益追求的认可不光是观念上的，而且是规则上的、制度上的，一国之内，从皇帝到臣民，都必须遵守这个规则，它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们权益的实现、追求的满足，所以可以说十七八世纪的西方启蒙思想运动不过是恢复了罗马法学家、政治学家已经创立的这种思想，再在自由经济时期将它丰富、充实而已。说到底，罗马法已经将这种性善的追求法律化、制度化。

中国古代也有对性善追求的制度性保障，但这种制度更多的是伦理道德制度，如三纲五常之类来维系。但这些三纲五常之类的东西经过不断发展、完善之后，反过来泯灭了人性。到了宋明理学，强化道德制度，强调以等级划分为特征的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自一出生便被划为三六九等，一种强大的伦理道德制度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身份等级意识。人与人之间是身份的关系，是天生的领导与服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规则自始至终地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而人们也自始至终地接受它。中国文化承认性善，却又依靠、利用性善反过来戮杀了性善，它用强大的伦理道德，使人们忘记了自身的生存价值。而罗马人以及后来继承罗马法的西方资产阶级则创立了一种透明、公平的规则，公开承认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主张人生而平等，并把它法律化。从具体制度来看，比如承认对所有权的追求，

所有的东西，只有人们可以控制，小到日用品，大到土地、自然资源，只要你善意地占有、勤恳地利用，能够创造财富，法律就认可你的权利，由此发展了物权制度。鼓励人们进行交易并从中获取利益，由此发展了合同法制度、债权制度。同时为防止人们对他人权利的侵犯，发展了侵权行为制度。当然还有人格权和亲属家庭制度。由此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民法体系。其主线是权利。所以民法被称为权利法，一部民法典就是一部权利宣言。这就是为了什么到了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西方国家的启蒙思想运动中，都无一例外地意识到必须制定法典，特别是民法典。说到底，民法本质是体现了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民法本质的揭示，给我们什么启示呢？现在的人们仍旧生活在市民社会、政治社会两种社会状态中，但对长期的计划经济与建立在这种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使人们特别是领导阶层产生了这样的政治概念：政治社会被目的化，而市民社会被手段化。这与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传的，而与民治思想是相悖的，或其标榜为民治，实则为“治民”。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本末关系认识上的偏差是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在我们国家，政府之所以成为政府，是基于政府本身的价值存在，人之出生便为了和国家、政府奠定关系，人自出生便需要政府的制约、规范、保护。这种理念不断强化政府的职权，担心政府职权不膨胀不扩张，不达到非常强大的程度，就无法保护自己的臣民。由此形成了畸形发展、空前强大的政治权力，人民不被视为市民社会的主体而被当作政治社会的分子。这就是我所说的本末倒置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事实上，当人民富裕起来，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和满足时，政府的职能也就得到了实现。反之，当政府职能极度扩张时，只能使公民权利受到损害。经验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在治国理念上，一定要把市民社会和政府社会分开来，理清它们的本末关系。我们的人民首先是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人民，政府和官员，一切都应为了使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人民更美满更幸福更安宁地生活。政府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人们选择的结果。政府是因为人民才具有存在价值，这是第一个启示。

第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对人性“本”的东西有过很多伦理的、道德的探讨，尤其是儒学。但是两千多年来，包括民国时期，包括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基本理念中完全没有民法的传统。民法不是中国的固有法，中国古代汉语中没有“民法”这个词。它完全是舶来品，我们缺乏这样一种治国理念。新一代人都谈论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人权，并把对民主和人权的追求放在很高的位置，可是如何在现在的环境下建立中国的民法文化、民法理念，让人们知道他们的生存之本是市民社会，国家政府和官员不过是为了人民而生存的，不过是人们选择的结果？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认为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民法文化、民法精神、民法伦理如何得到社会的认可。这种认可，首先从中国这种政治结构、经济结构，这种历史的因袭、传统文化的影响上来看不可能是来自官方的，所以我们希望在市民社会中培育市民社会观念，使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的主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认识到市民社会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目的，由此来培养市民社会的文化、观念，慢慢进行渗透，我们才可能最终把民法规定的权利作为任何法律制度，包括政治社会存在的目的。

二、关于民法的理念

理念是抽象的，而法律很讲抽象，尽管法律条文可能非常具体。抽象的东西与具体的实物的规程、细则完全不是一回事。一个社会若缺乏基本的理念，如经济理念、政治理念、文化理念、法律理念，是很可怕的。当然，也有消极意义上的理念，即使是专制政体也会有它的理念，如政治权力高于一切，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身份等级，都是它的理念。但我们讲的理念是积极意义上的理念，这种理念是人类文明的高度总结、概括，高度抽象化。所以这种理念也必须建立在“性善”的基础上，符合人的本性。

民法的理念，我认为有两点，一是权利本位，一是私法自治。下面我简单地把我的观点加以阐述。

首先是关于权利本位。权利本位也可以理解为权利至上或私权

至上。现在我们讲权利至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本位”是一种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民法以权利为其本位。它的一切制度都是为了人们能更好地、充分地获享权利，使人们更安宁、美满地生活。权利本位的理念包含以下几层意义：其一，民法以充分创设和保障私权为己任；其二，任何私权均受法律之平等保护；其三，人格权神圣和所有权神圣是私权的核心内容。现代社会中有一种倾向叫私法公法化，私权受到限制。例如在所有权领域有所有权社会化之谓，即以社会公共利益和效率为由对个人所有权予以限制。如何来解释这种现象呢？随着国家、社会不断地膨胀，人口不断增加，地球上的可利用资源渐渐减少，利益冲突显著增加，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限制规则。但它的症结是什么？在我看来，社会发展到现在，无论是国家干预经济，还是这种私法公法化的现象，并没有影响到民法的本质，民法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权利仍是民法的本位。权利并非弱小了，甚至被其他东西如义务所取代。如果真到了这一步，只能说明社会的倒退。反过来说，如果以国家的干预现象说明法律的本位不再是权利，而是服从政府的一种义务，这恰恰可能是为专治、暴政寻找的政治借口。所以任何时候民法都应该旗帜鲜明地以权利作为它的本位，没有了权利，也就没有了民法。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出现的所谓私法的公法化是有其社会背景的，例如所有权的公法化，它是在西方久行所有权绝对原则的前提下出现的妥帖修正。西方的法律要求人们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私有财产，而中国根本没有经历过私权绝对保护的历史阶段，恰恰相反，我们的私权制度与私权观念刚刚萌芽、刚刚培育，如果这个时候就要讲对私权的限制，那是十分荒谬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其次是关于私法自治。私法自治的核心概念是，法律要更多地给予人们创设自由、创设权利的依据，每个人得依其自我意愿处分有关私法上的事务。私法自治是对政府的一种制约，政府不能对市民社会的生活指手画脚。私法自治说到底就是对政治权利扩张的一种扼制。现代社会中，必须通过对私法自治的强调来尽量淡化政府在市民社会中的色彩，淡化它在市民社会中的角色，政府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当个人权利极度滥用以致损害他人权利的情况下进

行干预，而干预的目的正好是为了权利的更好实现，而不是为了显示政府的存在。比如说物权法，其中有很多基本原则，如“一物一权”。现代社会讲物的利用，资源的最佳配置，关键不在于物归属于谁，而在于谁拿到它能为本人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而“一物一权”很多时候会妨碍这种效益的发挥。又比如说“物权法定”，是指物权类型的强制化和物权内容的固定化，其目的是保护交易安全，但由于立法总有它的局限，如果老百姓自己发明并运用一种与物权近似的東西，但由于法律上没有规定，就是不能得到保护。这些原则有其价值，但需要重要评判与规范。它们与私法自治理念有轩輊之处。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做法律不禁止做的任何事情，私法自治表现在私法事务的各个领域，如所有权领域，表现为所有人有权依法任意处分其财产，或买或卖，或租或赁，或抵或质，或自用或交易，悉听尊便，无任何限制；如债权领域，表现为契约内容、契约形式、契约对象等方面的充分选择自由；如婚姻家庭继承领域，则表现为结婚自由、离婚自由、遗嘱自由等等。

三、关于民法的民族性与国际性

我们首先谈一谈民法的国际性问题。记得我上大学时，老师跟我们讲过一个政治笑话：其时是80年代初期，里根刚当选了美国总统，一个美国人对一个苏联人说：“我们美国很自由，我们可以到白宫前去喊‘打倒里根’。这是很了不起的民主呀。”苏联人想了想，说：“我们苏联其实也很民主的，我们也可以到克里姆林宫前去喊‘打倒里根’。”（笑）这个笑话说明，我们必须承认东西方在文明、观念、制度方面的差距，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文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个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国民素质、传统文化都会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明。但是，如果以此认为在人的权利保护的制度和观念上每个国家也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有可能成为专制甚至暴政寻找的借口。虽然我们承认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文化、语言，或者目前的经济制度、政治意识形态都会有差别，但任何民族，任何人种，其人本的东西

是共性的，而民法关注的正是人本的东西。不能认为不同国别的人民享有的权利在制度上应当有差别。所以借本土资源的不同来决定法律文明的差别，这是阻碍中国法律文明进步的最可怕的东西。比如说当年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确实是对我们主权的一种侵犯，尤其是它的司法裁判所，可它毕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法律文明，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先进的法律制度，比如当时西方的死刑是文明地结束犯人的生命，不像我们搞凌迟，搞五马分尸。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一个被判处死刑要结束生命的人还有他的人格，还要受法律保护。

法律中一般有两个大的领域：一是公法，一是私法。公法是关于公权行使的规则，而私法则是关于私权行使与保护的规则。公法由于涉及国家利益，确实有一些本土特色。比如刑法中，我们过去有“反革命罪”。现在新刑法才改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再比方说我们没有罢工自由，宪法把它取消了。这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东西。就是说，在公法领域，各国之间法律的这种融合、趋同的难度相对更大，各国统治者借以拒绝外来文明的理由要充足得多。在私法领域则不是这样。私法涉及个人权利的问题，而这种权利是市民社会的权利，市民社会的保护规则应该是一样的。私法中的国际趋同性比公法中的来得简单、容易得多，因为人性的东西并不因政治制度的不同而不同，这就是我所说的民法的国际性，就是想说明这一点。人民的政治权利可能有较大的差别，但人民的私权不应当有这种差别。人类的共同文明成果应当被每个民族共享，这也能使相对落后的国家能少走许多弯路，能借鉴、移植迄今为止已被证明为比较合理、比较科学的法律制度。那么在民法的规则上、立法上，以及文化、观念上，我们就应当采取拿来主义，大胆移植。这绝不是崇洋。每一个民族和国家，从它们的祖先开始，就一直在追求一种使自己的人民能更好地生活的制度，而迄今为止，我们不能不承认，就经济、社会和基本人权保障而言，西方发达社会是经历了很多教训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是我们能够认可的。所以如果在公法上我们可以走得慢些，甚至停一停，而在私法领域，我们走得越慢，就会丧失越多使我们经济发达起来、市场更加完善、人民更

加富有的机会，从而为我们政治上的民主化，为我们在公法上也向一种更科学的制度看齐，设置了更多的障碍。没有民权的保障与实现，政治民主的实现只能是海市蜃楼。所以如果漠视民法的国际性，直观损失是我们无法进行私法领域的国际交流，如加入 WTO，而进一步的损失，是延缓我们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因为没有民权的实现，不可能让人民提出正常的主张，让他们获得政治社会为市民社会服务的理念。

这是我讲的第三点——民法的国际性。这一点在我们今后制定各种民事方面的法律上，如物权法、婚姻家庭法以至民法典，都是非常重要的。合同法已经颁布实施了，尽管也还存在不少缺陷，但仍不失为一部好的立法，成功的关键之一就在借鉴了许多合同领域的国际惯例与国际条约的规则。但我绝不是否认民族自己的东西。我们也曾花过很多时间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的市场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到底起着什么作用。其中一些有益的东西确实也值得我们借鉴。我和几位同事曾经写过一本《契约观念与秩序创新——市场经济的法律文化思考》的书，其中有专门一章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更多的是借着“人性”来反人性。这样的东西被历来的统治者所尊崇，正因为它们有利于政治权力的扩张与维持。

四、21 世纪中国民法的展望

事实上，展望民法有两个角度，一是从法本身来看法，二是从法外的角度来看法。同学们研习法律有三个层次，最初是从法条本身的角度，理解法条的含意；第二层次是考究为什么作这种规定，根据理由何在；第三层次，从其他角度，如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法律规定得是否合理、科学，能否实现法律的价值，诸如公平、效率、正义等。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民法会怎样发展？能否如我前面所讲，把市民社会放到一个核心的地位，把权利本位、私法自治突出来，深入人心，这关系到中国法治化的整个进程，也关系到经济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首先,我想从法本身的角度来展望中国民法。改革开放十几年的成果,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以至伦理确实有巨大的贡献。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任何其他人所不能取代的,因为他绝不仅局限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或仅是“文革”暴政的结束,而是更多地开启了一种民智,提出了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即不要贫困落后的社会主义,而要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并进一步让人们能够有自由的思想,有人的尊严,虽然这种自由状态现在还受到许多约束,但与改革以前相比已是极大的进步。这种民智的开启,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存在的风气,是他开创出来的。我们民法的成果也是在这十几年中取得的,这之前我们是没有民法的,一直沿袭着前苏联的东西,这就是经济上的高度集中,政治上绝对的个人专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抛弃了苏联那一套。从民法的制度到理念,我们更多地是从大陆法,包括从欧洲、日本的民法典以及中华民国的民法中借鉴我们认为对我们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改革有益的东西,结合我们自身的情况,由此形成如今中国民法的基本状况。

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民法。“刑民不分,诸法合体,以刑代民”,基本上就是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法制状况。“民法”这个词是清末才引进的,至此,中国才有了初步的民法文明。1930年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典》,这部法典在大陆法系中是很优秀的法典之一。在这些基础上,我们终于有了今天的民法状况,有了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公司法、票据法等诸多民商事立法,民法的立法体系大体上健全了。但是,我们还缺一个物权法和一部民法典。

为什么还得有民法典?这就涉及到法典化对于民主国家的意义。人治的基本规则是“临事制刑”,“刑”即法,“临事制刑”即事情出现了才制定法律。我先不说你能不能这样做,而等你做完了,是惩罚还是保护,我再说了算。而法治必须把规则预先公开出来。规则一旦制定,就不光约束着老百姓,也约束着立法者、执法者,国家里没有任何东西比“法”更大。而法典就有这样一个功能:它把所有的规则事先制定出来,公之于众,以此引导人们的行为,

保护人们的权益。成文法有两种表现形态：大陆法是一种法典法，而英美法则是判例法，判例法绝非习惯法，它是成文的。大陆法强调一种两千年来习惯的沿袭，看重一种非常完美的，结构严谨的，表白清楚的，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法典。而英美法是通过司法者创造性的劳动，总结大量的判例，但判例也是必须公之于众的。我们是属于大陆法系的，但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对英美法的研究相对而言较有成果，而对我们自己所属的法系包括德国法、日本法、法国法、瑞士法、意大利法等，从二战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后的变革我们知之甚少。法典的意义并不在于有文字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人们知道有这么一种制度，它就是圣经，人人都可以拿出来讲：我有哪些权利，你是不是侵犯了我的权利，我可以去寻找什么样的权利救济途径。法典化的东西制定出来，它的意义基本上也到此为止。但它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成为一种文化的、习以为常的东西。西方的法律基本上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和自由，而不是像我们必须每天都要讲依法办事、依法治国。他们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就像我们的商店，当我们到处写上“顾客是上帝”的时候，顾客就肯定不是上帝了。当规则成为常态时是不需要这样说的，凡是不把顾客当上帝，其结果只能是关门、破产。规则已渗入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自觉的东西。法典化的功能必须达到这一步。首先是文字化的东西，通过文字化的推行，渗入人们的观念——不仅是老百姓的观念，也包括执法者、立法者的观念。所以中国必须有民法典，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真正的人权宣言。

那么，中国的民法典应当如何制定？让我们看看德国民法的立法体系。德国民法采用“五篇制”，称为“潘德克吞”体系，包括总则，用以阐明法律的基本原则，规定民事主体的资格，规定取得权利的方式，等等，然后是债权、物权、亲属和继承篇。整个民法制度就是以权利为体系贯穿下来的。我们现在的民法典是否还这样搞？有学者提出，既然是大陆法系的民法，要搞民法典，就应当以德、日为范本，尤其是德国法。德国民法被称为整个德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所以值得参照；而德国法采用五篇制，那么我们也应该搞五篇制，即总则、债篇、物权篇、亲属篇、继承篇。对于这种观点，

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应当在规则、理念上借鉴西方先进的东西，但不一定在形式上也照搬。我们是可而且应当至少在立法技术方面超越它们的。法国民法制定于 19 世纪初期，德国民法制定于 20 世纪初期，一个过了近两百年，一个过了一百年。当初德国民法的制定比法国民法晚了一百年，就有很多新的创造。法国民法的成果影响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国家，德国民法有创新，人们并不因此否认法国民法的地位，可也并不认为德国法大逆不道。与德国民法相制定相比我们又晚了一个世纪，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所创新而只是沿袭德国法呢？所以我认为我们也可以有创新，至少可以突破“五篇制”。除了保留原有的部分，我们还可以有所增加。比如知识产权，这也是重要的民事权利，而且对于科技的进步、文学创作的繁荣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而在 20 世纪初期，知识产权还没有上升到这种地位。为什么不能把它写进法典呢？这是其一。其二，人格权。无论德国法、日本法，还是中华民国法，都没有人格权篇。民法涉及两大社会关系，一是财产关系，如社会财产的归属和交易，二是人身关系，如人们的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亲权等。但德国法、日本法里就看不到人身权的一篇。为什么物权债权可以独立成篇，人身权就不能独立成篇呢？这也是值得考虑的。人身权特别是人格权是自然人最珍贵的权利，没有人身权的权利体系立法是不协调的。这些创新一点也不违背自罗马法开始到法国法、德国法所贯穿的民法的基本理念与精神。如果中国的民法典出来以后能够让他人刮目相看，它不仅承继了大陆法包括法国法、德国法、瑞士法的优秀传统，而且能反映和记载 20 世纪的社会变革成果，有自己的创新，这何尝不是好事呢？这何尝不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法制史中所能写下的意义深厚的篇章呢？其三，对几个具体篇目的设想。

第一是关于债法篇。债法篇是以合同法为基础的。前面说到过，合同法应该说是中国民法体系中优秀的立法之一，因为它既承认我们的民族性、国情性，又更多地借鉴了国际惯例、国际条约和他国一些先进的法律制度。它不仅可行，而且体系上也有自己的风格。将来民法典的债法篇基本上以合同法为主，再把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单方允诺等债的发生原因归并进来，基本上就可成为一篇了。

但最大的问题是，侵权行为制度怎么办？还放不放在债篇里？德国民法中，侵权行为的问题主要在债篇规定，但它在总则中也有权利受到侵害时的保护和救济措施的规定，并不完全在债篇。

现在有不少学者主张把侵权行为独立出来，单独成篇。我主张民法典具体规则的创新，但反对破坏体系的和谐，大陆法非常讲究体系的功能，崇尚一种疏而不漏、高度抽象、逻辑严谨的体系。如果把侵权行为法独立出来，它会破坏民法体系的和谐，它不再以权利来贯穿民法。所以我不赞成把侵权法独立出来单独成篇。但是有些已经达成共识的东西，比如说损害赔偿的范围问题，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要扩大，我是竭力赞成的，但应放在总则中规定。当然，从实用角度出发，将侵权行为独立成篇有它的好处，但它是牺牲民法典的体系和谐为代价，不值得，而且侵权行为的相关制度除了主要在债篇规定外，还可以分别规定在物权篇、人身权篇、知识产权篇来解决，如物权中的物权请求权制度。

第二是关于物权法篇。大家知道，现在正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九届人大希望在这一任期内把物权法搞出来。如果能把物权法搞出来，我们的民法典的框架可以说就基本上成形了。物权法和债法有很大的不同，物权法涉及所有制，有些问题目前是带有敏感性甚至是禁区性的东西，比如说土地制度，土地到底有没有私有化的问题？国有土地是不是只归中央政府所有？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到底归谁？是农民集体，还是村委会，乡政府？它没有一个明确的主体，也有一个所有权主体缺位的问题，既不利于农民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农业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最终的结果是在农村像土地这样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始终不是靠规则而是靠权力。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权力来分配土地。所以，没有土地的私有化，尤其在农村中，就不可能很好地利用土地。土地制度立法的宗旨其实很简单，一是土地的保护，一是土地的有效利用和开发。北欧许多国家如瑞典，在二战之后，土地大部分都是国有的，土地的破坏、污染很严重，没有人管，人们只顾利用土地，没有人注意保护。土地保护的有效办法是搞私有化。后来瑞典政府对土地实行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后的北欧土地资源得到了极好的保护。当然这

只是一个方面，就是说所有权的问题，如土地的物权问题，涉及的目的是什么？是考虑政治社会的问题如政权稳定，或者政治权力实现的资金来源？土地这样的重要资源私有化后，国家会担心政治的稳定。还是陷在这样的思路里。事实上，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确实是一种所有权缺位。大量的土地被侵蚀、荒化，没有更好的对策。现在看来，物权法是解决不了土地的所有制问题，但至少应当在土地的用益物权方面多下些功夫，规定得尽可能周全和完善一些，多给农民以保护。

同样，我们的国有企业的财产权性质如何规定？要不要规定企业经营权？把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来规定？我们国有企业的所有财产，包括国企本身是国家的，现在虽搞了一些改革，但真正解决了问题吗？国有企业的体制因此发生变化了吗？它的效益提高了吗？客观上说都没有，或者至少说绝大部分没有。真正效益好的企业都是通过非国有化如股份制或合资实现的。如果搞一个国有企业的物权——国有企业经营权出来，这倒是有什么性质的权利？一个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法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它有自己的财产，即享有物权；能签署合同，即享有债权；有技术有发明，即享有知识产权；有自己的名称、名誉，即享有人格权。从法律上说，这些已经解决了国企的所有私权问题，包括物权，何必还要有一个“国有企业经营权”？如此说来，规定国有企业经营权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规定了在物权体系上也是不和谐的，但如果不规定，国有企业似乎对自己的权利心中没有底，怕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是个两难选择。说到底还是国有企业没有对资产，尤其是不动产的所有权。一方面我们希望把企业搞活，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希望影响所有制，背离社会主义大方向，才搞出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企业始终还是搞不好。但这些问题很难突破，所以物权法的制定远比债权法、合同法困难，因为它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直接挂钩。但是，如果在物权法方面没有突破，很难说我们的民法是“21 世纪的民法”。泱泱大国，只有中国有机会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制定民法，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个机会了（笑声）。可如果我们仍然没有突破——这“突破”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促进法治发展、市民社会的完善——这是

不行的。

第三是关于人格权法的问题。前面我已说过，人格权法必须单独成篇，不能放在总则中，作为主体来写。主体指法律关系的参与者，而我们讲的是法律主体享有的权利，是权利本身。人格权必须独立成篇，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是关于亲属篇，也即婚姻家庭篇。婚姻家庭中的一些制度，如果不放在民法典中，也会成问题。婚姻家庭关系，其真谛仍是人本问题。一方面，人必须依赖婚姻、家庭才能生存，你自己可以持独身主义，一辈子不结婚，但你仍然离不开婚姻家庭制度对你的保护与约束。如果把婚姻法放到民法之外，就会走偏。而在中国，一旦走偏，只有一个方向：把婚姻制度意识形态化。这就抛除了婚姻家庭领域的私法自治。立法者仅仅是立法者，只能解决法律规则，仅仅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一个裁判官，而与感情、道德无关，如果参与到这当中来，就丢弃了法律功能的本质，混淆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比如，规定惩治婚外恋和第三者，规定有责离婚，规定夫妻间的忠贞义务，把这些道德问题写进法律，你的目的是稳固家庭，但反过来，人们会对家庭产生新的恐惧感，结了婚会怎样？这也会被反对，那也会被禁止，真正是进了“围城”。当人们对家庭有了普遍的恐惧感，社会就难以安定了。关键是“本”的问题。婚姻、家庭关系的本质是人本的。理顺了这一关系，那些强加于婚姻的伦理、道德的东西就不会进入法律中来了。当然，我并不是说婚姻、家庭法不要顾及伦理道德。一个好的法总是与伦理、道德更相接近的，但伦理道德本身也有个发展的问题，法律必须把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引向良性化，打破落后的、封建的、束缚人性的伦理道德，倡导更合理、更理性化的道德。摆不正这条主线，我们制定的婚姻家庭法就只能是过时的。

最后，从法外来看法，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民法典。

我觉得，中国的民法，如果能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结合已有的政治、经济改革成果，人们已有的观念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参照法、德、瑞、日和英美的先进立法，完全有理由相信，用5至8年

的时间,或稍为更长一点的时间,中国能搞出一部比较好的民法典。但如果急就章式地搞出来了,而没有前面所述的基本立法理念与内容,我们宁愿暂时没有民法典,我们宁愿等待。良好的立法时机必须等待。民法典不是单行法,也不是一般的法,是中国改革二十余年来法文化的结晶。在这上面,我们需要充分的酝酿,完满的准备。但从法外看法,立法者是否把民法典的制定,看成中国整个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的大动作?法学家有义务把它渲染到这个地步。法国民法典制定时,拿破仑亲自呼吁,把国家最有名的律师、最好的法官都召集到他的麾下,大大小小的会议他自己就参加了 100 多次。德国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典等著名法典的制定也是这样。唯有这样声势浩大的民法典制定运动,才能对人们贯彻这种市民思想,这种权利至上、私法自治的理念,法律才有很好的社会基础,使当局者能够自觉退出他们不应涉足的领域,使民众更好地生活。技术性的规范留给法学家解决,不会有什么困难,关键在于立法指导思想。我们是否承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我们是否承认民法是权利至上私法自治的法?我们是否承认民法是商品经济的基本法?我们是否接受一个好的民法典出台后政府必须把很多相关的领域和私权利还之于民?如果我们的法学家不从这些方面去酝酿,进行宣传,让民众、立法者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即使民法典草草出台了,也不会是一个好的民法典,它达不到培育我们的市民社会,完善我们的市民社会,为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宁的生活提供保障的目的。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同学们! (掌声)

参考文献

- 鲁道夫·冯·耶林, 2000:《为权利而斗争》, 胡宝海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迪特尔·梅迪库斯, 2000:《德国民法总论》, 邵建东译, 法律出版社。
 卢梭, 1980:《社会契约论》, 何光武译, 商务印务馆。
 杨振山、斯奇巴民主编, 1995:《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梅仲协, 1998:《民法要义》,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法学漫谈

贺卫方

贺卫方,男,1960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西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1982),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85)。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任教至今。1992年聘副教授,1999年聘教授,并担任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法理学会理事。

今天能受到团委和法学社的邀请,来作这次迎新讲座,我觉得非常荣幸。每年能够迎接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与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四年,可以说是大学教师生活最有乐趣的方面之一。

我曾经在一本书里说自己很幸运,生在中国的一个有大学的年代。我们的大学是一百多年前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是没有大学的,只有私塾和书院。书院并不是一种大学,它不分科系;而大学是分科系的,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创造。有大学的时代使得有一些既不擅长当官又不愿意种地的人可以一辈子以一种闲散的风格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我小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从事这样一种职业,这种职业是一辈子读书,又有人发工资。我最后在大学里找到了,既能读书又有人发工资,而且发得还不低。按照江青的说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家伙们居然可以享受如此待遇。但在中国古代,像我这样既不适合做官,又做不了生意,还不喜欢种地的人,真的没有地方可去。所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参加科举考试,成功了去做官,无论适合不适合。其实有许多人根本不适合做官。例如蒲松龄老先生,他天生就应当到中文系学习,或者到新闻系,毕业之后在中文系教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业余时间写点小

说。可是没有大学，他只好不断参加科举考试，想去做官。这个老贡生是个范进似的人物，一次一次都失败了，最后，算了，老子不干了，写小说去。所以，中国古代没有真正职业的小说家，都是科举考试不成功，没办法了，做一点小说家流。这样一个社会真是不好。而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就不同了，有大学是我们时代最让人欢喜的一个特点。

大家都是新生。现在法律专业学生中男女生比例似乎有些失调。我听说 2000 级本科生里的女生占了将近三分之二，特别吃惊。我 22 年前上大学——西南政法学院——时，法律专业中的女生只占七分之一，所以女生格外受青睐，地位特别高，本来嘛，资源稀缺，物以稀为贵。经济学上的规律叫供求关系，供应量太少，而需求量太大，追求的人一定会很多，价格就必然上涨。现在女生多了，对女生未必是一件好事，不过，对男生却是一件好事。（笑）当然，对未来法律的发展可能也是件好事。因为两千多年来，法律一直反映了男人的声音，男人的声音是法律发展——制定法律、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主旋律，就像科举考试一样，女人是不允许参加的，只有男人才能去做官，能够在大堂上一拍板子，高喊“大胆”的没有一次是女声。西方法律发展史也是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你们知道，过去一直由九个老男人执掌着；现在增加了两个老女人，七个老男人加两个老女人主宰了这个国家的法制（笑）。但是男人仍然占多数。美国的法学院里女生通常占三分之一左右。我们这儿可不得了。近代以来，我们在妇女解放方面向来不落人后。当然，几千年来妇女一直受到欺压。有这样一个故事，古代的一对夫妻吵架，男人气冲冲地说：“按照周礼，你这样的人我早就休了。”太太说：“请问我的老公，周礼是何人制定？”丈夫不无自豪地说：“当然是周公所制。”太太说：“要是周婆制定的话，是我休了你！”（笑）也许法律的发展，女性能够有更多机会在法律里表达自己的声音，我觉得，从事法律职业的女同学越来越多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现在的比例已足够了，再多的话，以后的法律发展史就是一部男人受欺压的历史了。（笑）

以上是一些题外话。今天的时间比较从容，我想和大家作点交

流，谈一谈作为一个新入学的学生，作为北大法学院的学生，应当怎样去学习法律，怎样能够在毕业之后不觉得自己这四年没有白过。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什么经验，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是一个单科大学的毕业生，不像你们。你们太幸运了，高中毕业后考入这样一个伟大的学校，我当年就没这么幸运了。当时只有几个学校招法律系的学生：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西南政法学院——后来改名西南政法大学。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报考法律，我当时并没有报法律，报的是山东师范学院的中文系，我梦寐以求的就是当个作家。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学院当年第一届招生，宣传力度不够，结果在我们那里报考者上线的人数还没有招的人多，很幸运，我的考分超过了重点线，就被作为重点院校的西南政法学院抓过去了。人生的命运真是很难捉摸。如果当时真到了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以后很可能到一个中学里当老师，我相信我会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语文老师，经常在本地的报纸上发表一些小资情调的散文，（笑）大约不可能有今天。当然你们也许能驾驭自己的命运，因为你们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所以毫不犹豫就报考了北大而且是法学院，最终又金榜题名，这是你们最大的幸福。

不同的不仅是学校；我读书时所学的东西也跟今天大不相同了。我们当时上法理课，老师推荐一本教材，是工农兵大学生编的，教材里经常提到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不断灌输的是这些东西，真正的知识学不到。我从大三开始才省悟到不能陷在教科书里，应该多读些有价值的书。于是，在一个好心的图书管理员的关照下，大三时读了许多好书，也引发了对西方法律、西方历史的兴趣。后来考的是外国法制史专业的研究生。大家知道，佳能公司的商标是 canon，这实际上是西方历史上的一种法律，叫 canon law，是天主教会制定出的法律，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那个。最近几年才转为对中国现实制度的研究。

大学的第一年需要不断观察、不断了解，不必过分地去记忆，什么东西都要搞清楚。几年前，我面对着与你们一样刚从高中毕业、有人戏称为高四的 97 级同学时，觉得给他们讲法理是一个非常大的

挑战。法律这门学科涉及到许多问题，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社会科学。中学教育已给大家灌输了许多真理性的东西，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一个大学生来说，一切都要去重新理解，而不是去背诵。当然，法律专业所学的许多东西对于刚刚从高中毕业的人们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比如说，婚姻法里规定离婚的条件时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请问同学们，什么叫“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我跟你们一样，读大学时不理解婚姻法，实习时偏偏派我去处理婚姻纠纷。可以想像，那真是一场灾难——对我是一场灾难，对当事人更是一场灾难。我耐心地听夫妻俩讲他们的生活，讲哪些方面出了问题。我不懂，只朦朦胧胧意识到一点，但是不深刻。只有人在相当成熟、有了婚姻经验并且对婚姻有相当的观察之后，才能理解什么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所以，你们会发现，在美国，就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法律系学生，因为高中毕业后不能直接读法律，必须有一张大学文凭才能上法学院。可以想像，有许多人大学毕业后就结了婚，再读法律时，对人生的幸福、社会制度的设计等的理解力就会强得多。对我们这样的大一学生来说，有许多问题的确比较难以理解。有同学曾经对我说，老师你推荐给我们读的书每个字我都认识，每句话我也读得下来，但整句话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显示了呢？这是一个知识背景的问题。要读懂一本书，必须理解书背后的一种知识的积累。这种知识的积累甚至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有许多著作，回答的都是两千年前古希腊的那个老哲学家柏拉图先生提出来的问题。两千年人们的论证，两千年的学术积累，最后结出一朵朵小小的花儿开在你们的法理学教科书里，要你们一下子去理解，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不理解也不要着急，慢慢的，随着逐渐的累积，你会理解这些东西。

我觉得人在大学里的心态最重要的就是从容，尤其是一二年级的时候。也不要太在意成绩。我的同学中在学术界干得最好的几个，都是在大学里成绩刚刚及格的人。我还有个同学，四年下来成绩全优，但是后来并没有走学术研究的道路。当然，他在实务部门干得也很好。观察学术界，你会发现，有创见的人很少有那种过分循规蹈矩、过分重视大学时的课程成绩的。当然有些时候成绩与某些利

益相关，比如申请奖学金，比如将来推荐报送研究生，这是让人很无奈的。但是大体来讲，现在的教育制度在调整，老师在改变，不会只根据你背诵的功夫，还要根据你自己是否有自己的理解，有独到的见解来判分。

我也许应该强调一下，作为北大的学生，进入这个学校后，你首先应该去阅读和了解这个学校的历史。这个学校出现过哪些伟大学者，它如何变为今天这样一所了不起的学校，它的教育哲学是什么，等等。胡适先生在校园里没有塑像，因为他当了国民党政府的驻美大使，后来又死在台湾；但是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北京大学，他虽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毕业生，但在北大任教，在北大当校长，在北大名满天下，所以对北大充满了感情，无论走到哪儿，一说起北大，他一定要说“我们北大”。本校的一位老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采访时说：“我这一辈子很满足。全中国最好的地方是北京，北京最好的地方是海淀，海淀最好的地方是未名湖畔，我能在未名湖畔生活一辈子，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未名湖畔的美，并不完全在于它的景观，还在于那些伟大的学问家、思想家，是他们铸造了这所学校的伟大风范和伟大品格。前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大家都在争夺对北大精神的解释权。北大的精神是什么？有人解释说，是爱国主义，这是第一位的，然后是民主、进步；也有不同的见解，我就不同意从这个角度来阐释。我认为北大最主要的精神在于对学术自由和人的思想自由的倡导，这是这个学校最伟大的传统。我们法学楼门前立着一座雕像：马寅初先生，他就是这种精神的示范者之一。50年代初，在毛主席倡导的“人多力量大”的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马老校长公然明确地提出与官方不一致主张，提出所谓的“马氏人口说”，认为“人多力量大”是错误的，人多消费多才是正确的。在被打倒之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开头就说，真理是需要辩论的，是需要对方说话的；但是现在我已经明确地知道，你们要封住我的口，不许我说话。但是，我该说的话，只要一有机会，我还是要表达出来。——就是这样一种人格魅力，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一种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是我们的学校得以立世的最重要的资本。

大学独立、大学自治是一种西方的传统，传到中国后，它的发育并不容易。中国有悠久的读书做官的传统，而且是政教合一的，这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也可以两边躲藏——得罪了世俗政府，可以躲到教堂里；得罪了教会，可以请求国王的庇护。所以他可以有一个自由的空间。天主教会、罗马教廷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抗衡世俗权力的一个精神组织，这种精神组织对于西方的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制度因素。不像我们这儿，自古以来，“一经圣人口，议论安敢道？”刚才我说的李贽，李贽有一个罪名叫“非圣”，对我的老乡孔子的有关学说提出质疑，不赞成孔子的学说，这就是非圣。但是，赞成或不赞成孔子的学说由谁来判断？这是个问题。在传统社会，照例是由世俗权力最高的人来解释的。今天，在我们国家，这个问题仍然重要。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谁有权谁说了算，两千年来一直是皇帝说了算，皇帝说你非圣你就非圣，没有辩护的余地。在这样一种传统下，说实话，大学要获得一种生存的真正空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西方最古老的大学都是教会办的学校，当政教分离时，教会管一个人的精神，世俗的政府只管一个人的行为，也就意味着在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中，国王的权力不能进入。有一种说法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大学就是这样。大学的神圣的殿堂，绝对不容许任何世俗势力指手画脚，不允许它干涉一个学者的思想自由。一个学者的思想自由是他得于立世的最根本点，如果没有这个自由，学者便成为行尸走肉。说老实话，学者不怕吃不好，不怕住小房子，不怕坐大汽车，怕没有自由。可能你们听说过哈佛大学的校长不买美国总统账的故事，那个故事典型地体现了大学的尊荣和面对世俗政府的高贵。

我虽然不是北大毕业生，但很早就对胡适校长、对蔡元培校长感兴趣，不断阅读了许多北大学者的著作，知道不少老辈学者的事迹，我觉得这样的精神最让我感动，所以，当后来有一个机会调过来的时候，自己真是觉得找到了灵魂的归宿——不仅仅是有了一个饭碗，而是一个灵魂的归宿。自己感觉到，一辈子能在北大生活，我心已足！有一本书叫《最好的辩护》，是哈佛法学院的一个教授

叫德肖维茨写的，他在书里写道，在美国，最好的职位是什么？是哈佛法学院教授。我们的法制没有美国那么发达，收入没有美国法学院教授那么高，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北大法学院教授这个位置，是一个中国人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位置（笑，掌声）——不用再加上“之一”。我想，我们每一个进入北大的人，对我们来说首先要上的一课是这样一课，使我们成为这个精神家园中的一个成员。从入学开始，你们就注定有了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就是北大毕业生，北大的校友。按照美国的惯例，你们的名字后面会加上“04”，表示你们是2004年毕业的这届学生。这是一个标志，可以说一入这个门，就跟这所大学有了不解之缘，你们今后的路还很长，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一辈子生活在这个校园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体现出这个校园中生生不息，延续百年的一种精神，这是我们第一课里应当学到的。

下面谈谈过去学习法律的一些体会。我现在仍处于学习过程中，活到老学到老，自己也常感到一种危机感，感到做教师的压力。我原来以为一辈子读书、拿工资就行了，搞了半天还要发表文章，每年还要发表几篇学术论文，论文还要有一定规范性，下边有一些外文注释才算好文章，压力也很大。现在有些方面的压力已经没有了，比如评职称，因为已经到顶了，我打电话给我妈妈说：“我评上教授了。”我妈说：“还能往上吗？”我说：“不行了，已经到顶了。”老太太说：“人还不到四十就到顶了，就没得可追求了。”这是她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这样一种职业，还有一种压力，要求你不断创新，要有一种追求，比如给你们作过报告的朱苏力教授，他真正是一个学术上有追求的人，有一种创新精神，写文章也特别漂亮，我有时感觉：“怎么跟这样的一个同事在一起！”（笑）

那天的开学典礼上让我作为教师代表讲话，我强调了两点：一是要意识到法律学术是一个伟大的学术传统，你要了解两千年来的法律学术是怎么回事，要用有限的四年时间，真正地把握其内在精神，要成为一个法律人。我们法学院教育的目的是，让在座的每个人都学会 *thinking like a lawyer*，如何像法律家那样去思考问题？法律家是怎样思考的？我这段时间给研究生讲课，讲的就是法治、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究竟是依什么治国？就是依在座的各位，你们将

来就是治国之才，你们将来就是这个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意味着你们在法学院里所学到的这套思考问题的方式，学习到的这套概念、理论，它对社会有一种调整作用，你们用的是这种东西去调整社会，而这种东西的历史绝不是几十年或几百年。古罗马人创造了伟大灿烂的法律文明；中世纪人类最早的大学只有三个系：哲学系、医学系和法学系；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学意大利的波洛尼亚大学，就是一所法律学校。许多人学了几何、逻辑、修辞等学问以后到波洛尼亚大学来学习法律。法律是调解社会生活的，法律是用一套经过数千年构筑起来的人为的知识来改造社会、调整社会。但是，请注意，法律首先是一个饭碗，我们学法律，也许并不完全是为了满腔热情地报国报民，或许首先不是这个，而是律师收入比较高。做一个律师，打官司、诉讼、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下来后腰包滚圆，凭什么人家给你这么多钱？凭什么一场诉讼人们就给你 20 万、30 万，有人打一场官司就能买一幢房子？凭的我们所学的这套知识无法普及到整个社会，无法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律师，只有我们才能担任律师工作。我们掌握的是什么？是特殊的知识，是一个很难普及的学科。请看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将来你们会学到一大堆一大堆怪头怪脑的词汇，人家叫“老公老婆”，你偏要叫“配偶”，还有配偶权；人家说 bar 是喝酒的地方，我们说 bar 就是律师界；我们平常有一些怪怪的词汇，比如说无罪推定，老百姓不理解，有人写文章，称：“林彪、四人帮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大搞无罪推定！”他理解错了。还有善意买受，一年级的同学问我什么叫善意买受人、恶意买受人。一个人在自行车市场上花 30 块钱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们说这是恶意买受，为什么呢？因为依据常识，30 块钱是不可能买到一辆新车的，你居然买到了，这是你有意识地买赃物，这肯定是在帮助销赃嘛。你这种财产权也是不受保护的，这里的善意、恶意跟道德家讲的很不一样。还有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禁治产人，老百姓都不知道，有人连“上诉”都不知道，东北某法院的审判长说：“如若不服本判决，可以上诉至本院的上级人民法院。”当事人问：“审判长，你让我上哪棵树啊？”（笑）

这些概念太多了，即使是在美国这样的法制发达国家，法律家

所使用的概念体系跟日常语言之间也有很大差距。正是因为对这样一套语言、对这样一套知识及其背后的制度和理念的把握，使得我们成为一个法律人。法律人因此可以交流，而且交流的成本降低了，交流的准确性高了。大家一见面，“我看你的要约有问题，你那里边有点诈欺的意思，所以可能很难得到法律上的救济”。我们说得很清楚，都没有什么误解，可要是有个外行人在旁边听了，就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说的什么东西啊？我又不是灾民，要什么救济呀？他不知道法律救济是法律上采取的相关措施。这一套语言是我们的饭碗，也是我们的学问得以精确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无论是法官、律师、检察官，都要到法庭上去辩论或作出决策。如果法官、律师、检察官没有受过共同背景的训练，那法庭就乱了，就会相互之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要是法官听不懂什么是善意买受人，那就很可怕了。所以，这是我们法律人必须领悟把握的一套伟大的知识传统。

总的来说，我们要理解法律知识的传统，这是经过四年的教育后首先或最基本的要求，以后分析问题时，要 *thinking like a lawyer*，你就是一个 *lawyer*。我最近写了篇文章分析一个事件，就是在追求 *thinking like a lawyer* 这个境界。这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事件。重庆有个 28 岁的年轻人，叫唐卫江，他到朋友家玩时看到朋友新买的佳能打印机，这台打印机附送了一个宣传品，上面是“百变赵薇”，就是那个演小燕子的演员，佳能公司选她做形象大使。唐卫江觉得这个挺好的，就借回去看。他回家后仔细一看，不对，有问题，上面写道：赵薇出访过的国家：中国、台湾、香港。问题严重了，唐卫江怒不可遏，这不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污辱吗？这不是公然分裂中国吗？搞“一中一台”，还有“一港”！唐卫江先生拍拍屁股就到了重庆晚报社。编辑可能也觉得抓到了一个大题材，他们第二天就刊登了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并且配发了题为“国家尊严无小事”的社论，愤怒谴责佳能（香港）公司这种对中国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报纸出版后，这起事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纷纷表达对唐卫江行为的赞赏。不久重庆律师界有几位著名律师站出来，声援唐卫江，要免费为他打这场官司，起诉佳能公司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同

时声称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果然，唐卫江开始筹划着提起诉讼，他向记者称要代表中国人民打这场官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有四项，第一，立即向全体中国人民赔礼道歉；第二，立即停止发送光盘；第三，立即销毁已有光盘；第四，赔偿1亿元人民币，作为对中国人民损害的补偿，同时他表示要把这1亿元人民币捐献出来建500所希望小学。《北京青年报》等报纸都登了，我那天上网一查，简直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各地媒体都加入了报道的行列。各地的人都觉得这件事太令人气愤了。然而，我仔细想了一下，*think like a lawyer*地想了一下，就觉得这个事件有点问题，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叫“一桩热门事件，三点理性建言”，发表在“北大法律信息网”上，后来又刊登在《检察日报》上。我说看了这个事件后，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有种激动，我对唐卫江这种行为表示理解。但是，既然唐卫江先生说要用严格的法律程序跟佳能公司讨个说法，那么，我作为一个研究法律的人，从法律的角度去想一想，结果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发现法律问题还不少，姑且写出来，以便有关人士及决策者更周全地更妥帖地处理此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唐卫江有权利起诉吗？他有没有当原告资格，或者说，他是不是“适格”的原告？从小的层面上说，你是在朋友那儿拿的光盘，是你朋友买的打印机，所以，是你朋友与佳能公司有消费者与生产商之间的关系，你没有。你从人家那儿拿个盘过来就起诉啊？那我也去拿一拿好不好？大家都找一张这种盘，然后都去起诉，都索赔1亿元，那就乱套了。法律上讲究，一个人要起诉，必须是利益的直接相关者，也就是说，诉讼中你的利益一定在里边，你一定与被告人利害攸关，否则法院不受理你的起诉。因为在诉讼中你可以使一些权利如变更诉讼请求，与被告和解等。所以首先你没有这个资格。

从大的层面上说，你说你代表受伤害的中国人民，谁让你代表的？法律上的代表不是中央领导那样说“我代表中国人民”就能代表了。诉讼中的代表需要有一个推选程序，受伤害的中国人民一起来推选才行，而且在民诉法中说，一方当事人人数不确定时，叫“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诉讼”，这时法院要求把人数确定下来，其方

法是在报纸上登公告，一定期限内利益相关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有关单位登记，登记之后才是诉讼当事人，否则不是。而这个事件发生后，既没有经过推举程序，也没有经过公告登记程序，唐卫江先生如何可以代表中国人民呢？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案件究竟是什么性质？唐卫江非常愤怒，律师们也跟着愤怒，律师们说：“这不仅仅是法律事件，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这是对中国人民尊严的侵犯，对中国人民情感的污辱。”这里的调子倒是抬得挺高，容易引起人们的激愤，但是最大的坏处是，若是政治问题，则法官无法处理。政治问题与法律问题有很大差别，它是一种大是大非、你死我活、不可妥协、绝不让步、寸土必争的问题；但是法律上处理任何案件，都有一个可能的妥协让步，尤其是民事案件，有什么大是大非呀？你让让步，要80万太多了，40万怎么样？那边说，40万少了，那我损失太多了，60万吧，好，就60万，双方达成妥协。这就是民事诉讼方面经常所说的优势证据、调解原则等，有什么是非呀？说这件事是政治问题，势必将法官推到一个尴尬的境地，唐卫江先生说：“这个案件，如果法官判决我胜诉，以后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时就会注意中国人民的感情；如果法院判决我败诉，外国人今后到中国来就会更加猖狂！就会更多在思想文化领域给我们制造混乱，使我们重新回到清朝受外国人欺侮的状态！”法官遇到这种案件该怎么判？两条路，一条上写着“爱国主义”，一条上写着“卖国主义”，法官还有选择余地么？这不是法官判案，是唐卫江先生已经把案给判了，法官只能就范；这是何方道理？所以把这当作一个政治问题反而搞乱套了，搞得法官没法判了。

第三个方面，这1亿元的诉讼请求是怎么出来的？“我也没经过什么精确计算，反正算它一台机器3000、5000块钱吧，有些还上万呢，要是彻底一点，应该所有财产都没收了，他们侮辱中国人民的感情，这就是代价。”说得咬牙切齿地。然后，我觉得诉讼请求还是该经过一个合理计算，狮子大开口也是个问题；另外，1亿元，看起来很大，法院可能从未判过这么大的数目，但是，他说这1亿元作为中国人民受到感情伤害的补偿，我一算，坏了，中国人——

大陆外加上港澳台，少说也有 14 亿人口，1 亿除以 14 亿，每个人才区区 7 分钱！这才真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侮辱，是在伤口上又洒了一把盐。我本来就受到了伤害，你说：“给你 7 分钱补偿一下”，（笑）这不明摆着欺人太甚么？另外，唐卫江又说要用这 1 亿块钱建 500 所希望小学，我说你没这个权利，你仅仅是诉讼代表人，而诉讼获得的收益是在全体当事人中间分配的，你说捐给希望小学你就捐啦？这是你的钱啊？你作为代表人打了官司这钱就都成你的啦？简直是不像话。当然我不是说唐卫江不像话，而是说那些律师不像话。唐维江没学过法律，脑袋一热来干这种事，你律师怎么不想想这场诉讼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大家听我说这些的时候感到心里有点憋，似乎我把解决问题的路都给堵死了。其实我们说它是政治问题时，并不是说它不能解决，中国政府完全可以跟日本政府方面提出交涉，中国外交部可以提出照会，可以表示遗憾，可以表示抗议，可以表示强烈抗议，可以降低甚至断绝外交关系，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可以诉诸武力。政治上的事情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法律没办法解决这类问题。毫无理性地乱来一气，那就不是搞法律。

上面我们谈的是作为一个法律专业学生在专业方面的训练。法律之外，一个人进入大学后，还应该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博雅之士”。四年之中，你会受到一种精神的熏染，最后，当你走出校园时，你会变成很不一样的人，从外观气质、内在修养，各个方面都变得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学教育的功绩。当然，不看一本书，偶尔听听课，在未名湖畔谈谈恋爱，四年之后也会改变，也会变得俨然有斯文之气，（笑）但是我们不该这样过这四年，还是该经常地、认真地读一些书，开学典礼上我也说过，不仅仅要听法学院的课，还要听点外系的课，比如西方艺术史、电影艺术鉴赏这样的课。百年纪念讲堂时常有交响音乐会，听听交响乐，领略一下最高层次的交响乐团演绎的贝多芬，在听《田园》时想着田园风光，听《命运》时想着贝多芬这个命运多舛的艺术家怎样与命运抗争，怎么写出那么美好的音乐。《第九交响乐》，那是圣灵的感召，人类要走上大同，要有更多的和平而不是战争，人类都是兄弟姐妹，我们要有一种大同的理想，不要在人间制造仇恨，我们要追

求人类的和平，相互的理解。我们不能想像贝多芬在写《第九》时耳朵全聋了，而且已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亲自担任指挥演奏完《第九交响乐》之后，下面欢声雷动，大家都在鼓掌，贝多芬却一点都听不到，旁边的人提醒他说：“你应该向大家致意，大家都在鼓掌。”贝多芬转过身来，现场的人们看到音乐家满脸淌着的泪水。这种伟大的作品，让你感到人的伟大。胡适老校长写过一篇文章叫《不朽》，人怎么才能不朽？不见得我们都去创造贝多芬那样的伟业，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让自己不朽的方式，那就是为社会做出某种贡献，这就足够了。你会在这个世界中领略许多美好的东西。蔡元培校长说：“要以美育代宗教”。我们有许多伟大的艺术，容易让我们感受到宗教式的伟大，我们应该看看画展，看看其他的艺术作品。我一直主张，北大应该利用自己的资源，给我们的师生提供更好的精神修养环境。一百多年来，北大历史上有多少伟大的人物，有伟大的艺术家和学问家，他们的书法墨宝，他们的著作手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搞个很大的陈列馆把它们陈列出来，让大家每个人来以后都可以看到：“哎呀，你看胡适校长写的一封信。”看着先贤的手迹，会睹物思人，会感到一种精神风范。孟子讲“养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是怎么养出来的？在家养鸟种花行吗？不行，靠的是读书、听音乐、看展览和其他一些富于意义的活动。没有这些东西，一个人的人格就不会获得真正的提升。

对于学习法律的人来说，追求博雅境界还有职业意义上的效果。一个只懂法律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法律人。他需要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他要读许多东西，例如莎士比亚。通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可以领悟到许多人生的道理、人生本身的悲剧。像哈姆雷特这样的角色，他体现的不仅仅是戏剧里的一个表浅的人物，他揭示的是人生的深刻的悲剧和内在的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提示的对法律正义性的追问，那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卡夫卡的《审判》，可以揭示出法律的某种荒诞；狄更斯说法律诉讼是人类的一种灾难。我们搞法律的人也许应该跳出来一点，读一读这些文学家的东西，文学家往往是社会里感受力、领悟力最高的一个群体，“春江水暖鸭先知”，文学家的脚总是在水底下游动，他对这个社会体悟得最

快。所以，读文学作品实际上是理解一个社会、理解一种人性，最终对于我们的专业工作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觉得我们应该分出一定的精力去读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还应当去读一些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一些原著，不要过多地读一些二手资料；二手资料可以读一些传记，我觉得伟大人物的传记总是让人感到人生的振奋，感到一种激越之气。还要读经济学的著作，说实话，这是我自己知识上的一个缺陷。我一看经济学的书就烦，看不下去，不喜欢经济学，特别不喜欢。我一直到上大学后才知道，为什么在银行里存钱不但不收保管费，反而要给我利息。到别的地方存东西人家都要收保管费，到银行去保管钱，它倒过来给我钱，我真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到上大学后才理解了，原来我的钱被它用了。但现在我觉得一些经济学著作还是比较容易读。我劝大家不要重蹈我的覆辙，现在法与经济，Law and economics 已经变成了一门非常有影响的学科，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法律问题。不懂一点经济学，怎么分析法律呀？什么成本、效益，还有博弈论，这是个 game, a theory of game, 对法律思考也产生了不少影响。另外，我们还应该多读一些历史名著，希罗多德的呀，塔西佗的呀，爱德华·吉朋的呀，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已经翻译成中文了，还有其他的等等。总而言之，经典著作是我们应该阅读的，包括中国古典的经典，如孔子、孟子。我跟一些本科生接触，发现他们对孔孟还都挺熟，有时候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比我强多了。我只在小时候“批林批孔”时学了一点孔子，后来就没有很好的读过，读研究生时才开始在中国古典上面下点功夫。最后，一个法律专业的学生还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且把字写得好一些。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的汉字写得不漂亮，那真是不大好。这些知识都直接或潜在地对法学有影响，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多开拓自己的知识，所谓“艺多不压人”，读书多了，对分析法律问题是一种潜在的资源，会让你在分析法律问题时不会陷入工匠式的牛角尖里，拔不出来。你会获得一种有智慧的平衡，一种理性的平衡，永远会做好自己的判断，这是一个法律人成长中必须要做的。所以这四年要做的事还很多。

希望我以上所讲的对你们有所帮助。谢谢大家！（掌声）

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 西著东译与本土化研究

毛寿龙

毛寿龙，浙江奉化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教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兼职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团体研究中心研究员。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公共政策的制度基础”，致力于“有效公共政策的制度平台”研究。

我今天主要想讲一下关于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PCIA)的问题，首先会对一些西方流派和著作以及汉译状况进行介绍，然后会以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的研究为例阐述关于PCIA的本土化研究问题。其中有些是我的个人观点。

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就是把适用于市场选择的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非市场选择；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则着眼于人类选择的制度基础，包括市场选择和非市场选择。这两个传统有一定的区别，但其价值、方法和所探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个传统。研究公共选择的学者往往很关心制度问题，而进行制度分析的学者也往往以公共选择的研究为基础。在一些学者看来，公共选择只是比较早期的称谓，制度分析是比较晚近的称谓。因此人们往往把这两个传统放在一起，并且往往给他们贴一个标签，这就是新政治经济学。与老政治经济学相比，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新政治经济学的一大特色。

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PCIA)传统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到70年代时，这一传统的学者已经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数学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成果，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这一传

统的许多重要学者都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PCIA 研究的成果获得了各方面的承认，虽然还不能说在各个学科成为主流，但至少已经是一种重要的传统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国外的研究成果逐步翻译、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基于这一传统开始了本土化的研究。

公共选择在美国主要有三个学派：第一是弗吉尼亚的公共选择学派，已有了相关的译著；第二是社会选择学派，主要是罗切斯特的政治学研究，这几乎没有中文译著；第三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多中心学派，也是最近才有译著。除此之外，与公共选择有关的还有三个相关学派，分别为：芝加哥的政治经济学派，拥有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主要是用纯粹经济的方法分析问题；奥地利学派，也有很多译著；新制度经济学派，是译著最多的。

根据现有的翻译出版情况，我们可以说，PCIA 领域的西著东译工作有如下特色：

所选择的著作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布坎南、阿罗、斯蒂格勒、贝克尔、弗里德曼、科斯、诺斯等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就很可能忽略一些未得奖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

这些著作虽然译成了中文，但是其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地位、与西方学术传统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明确的梳理，不同著作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也很少被系统地得以理解。人们还是把它们当作一本一本的书，而不是当作某个学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去理解的。

除了个别的例外，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翻译并得以出版的。这说明，这些著作虽然在中国已经得到了传播，但是如果要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PCIA 研究的翻译和介绍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其政治学部分得到的关注也比较少。如布坎南有许多财政学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但其宪政理论、寻租理论的著作几乎很少受到关注，《同意的计算》到了 2000 年才有中文版。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家庭的经济分析受到了关注，但其利益集团竞争理论却没有受到重视。

在公共选择领域，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两大学派，多中心学派直到 2000 年才有重要译著译成中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社会选择学派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人问津，也很少有人介绍，威廉·赖克的学术贡献在中国几乎不为人所知。其结果就是，即使在政治学领域，人们做相关研究时，其引用的文献、运用的概念和理论，都是经济学领域的。但政治学 and 经济学有不同的学术传统、理论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有本质的差异，西方政治学者引入经济分析，也并非只是简单地移植，在这些方面西方的许多学者作出了长期的努力，并且很有成果。了解政治学领域的 PCIA 传统，翻译和介绍其重要成果，成了政治学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PCIA 的本土化研究状况。从 90 年代起，其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与其在该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并且，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批杰出的学者，并已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

这些研究有如下特色：

许多学者都有在国外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国外取得的。但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尤其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已经非常重视本土化的理论资源，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制度变迁问题。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与公共选择虽然也有一些关系，但与公共选择的关系还是比较远。公共选择就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研究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和官僚制度等(Mueller, 英文版, 1989; 缪勒, 1999)。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学者本土化的公共选择研究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初步的。

本土化研究的状况与翻译的状况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的学者和作品比较多，与此相适应，新制度经济学翻译出版的著作也比较多。

目前的研究之所以呈现这一状态，可能有很多原因，这里试举一二。

西方公共选择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基本的制度探讨，但是无论

是规范的和实证的研究，往往与西方国家特定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其核心主题往往是西方政治制度下的公共选择问题，比如公共选择研究中，直接民主下的公共选择、代议制民主下的公共选择，多党和两党竞争模型、寻租理论、集体行动理论、政治竞争、利益集团理论和选民投票理论等，其话题基本上是西方性质的（有关公共选择的基本选题，参见缪勒，1999）。与此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则是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假设制度不是给定的，它探讨制度对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的影响，并且其理论框架比较一般，可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其学术传统是跨多学科性质的，不像公共选择研究那样，把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问题研究，具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而是与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组织学、管理学和道德哲学本身的学术传统和问题都有很大的关系。

本土化研究的状况与研究的空间和正在发生的变革的空间也有很大的关系。在目前，经济改革的空间最大，发生的变化也最多，但政治改革的空间较小，发生的变化较小；相应地，经济研究的空间也较大，研究成果易于引起实际的反响，反过来刺激此类研究；而政治研究的空间较小，研究成果不易引起实际的积极反响，反过来影响此类研究。

与学科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经济学在中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为经济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机构空间；向国外输出了大量的留学生，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留学生回国研究，这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比较缓慢，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发展缓慢，向国外输出留学生较少，许多留学生到了国外就改行学计算机，回国研究也比较少，而属于 PCIA 传统的就更少。这也妨碍了政治学领域 PCIA 传统的传播、教学和相关研究的发展。

但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发展，需要我们政治学者开展系统的研究。IAPP 研究，就是一群有政治学背景的人所作出的努力之一。

IAPP 的研究着眼于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促进以个人自

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宪政法治与民主制度等制度平台为基础的公共政策。对于国防、公共安全，通常认为是国家的天职，但事实上国家和市场处理都很失败，这就需公共经济来处理。此外，大部分法律的实现均应是自觉自愿实现的，而不是完全靠强制。因此，公共经济便是以自由治理为基础，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价值，以 PCIA 为逻辑，在中国发展的背景下，着眼于治道变革，探索具体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政策问题。其特色便是价值、方法（逻辑）与问题偏好并重。以上是关于 IAPP 研究的基本定位。

IAPP 关心的是多层次的问题，认真对待所有的公共问题，关心每一个人都可能关心的问题，关心适合于解决每一个人所关心的各种各样问题的制度平台。其强调多样化的价值、多样化的制度安排以及多样化的问题解决方案。此外，还针对治道变革的事实多层次的探索治道变革的问题。中国的治道正在发生变化，从人治向法治，从信息封闭到政府公开，这不仅是制度方面的，也表现在人们生活方式上的变化。

IAPP 目前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表现在一些翻译著作的引进（如 IAPP 译丛等），并就 IAPP 所关心的问题，着眼于 IAPP 的价值，运用 IAPP 所中意的逻辑与方法，撰写专著、教科书及研究报告、学术论文。此外，还就目前发生的有些具体问题，用 IAPP 的眼光、用 IAPP 的分析框架，给出 IAPP 的分析，得出 IAPP 的分析结论，以及政策建议。最后，还就目前所有的学术著作、论文，从 IAPP 的角度，评论学术进展，并分析其与 IAPP 学者努力之间的关系。比如对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即可进行 IAPP 的解读。学术研究是一个集体行为，学术成果如何与他人沟通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IAPP 的研究应是具有开放性和可讨论性的。任何人都有意追求真理，但都会而且易犯错。并且我们的研究都是有限的，研究成果也是有局限的，是在当前情况下、当前资金条件下、当前学术水平下、当前问题背景情况下等严格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和作出的，在空间上不是无限的，在时间上不是永恒的，在观点上也不是完全正确

的，其政策建议未必一定是有效的，其认定的问题也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问题，其所依据的事实也可能是不确定的。因而，我们的研究就应该是开放的，其完善过程是无止境的，要欢迎建设性的评论与探讨。除此以外，还应不与任何努力作对，并不追求标新立异，而要努力寻找接口。

下面我们来看看 IAPP 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核心理论有人的属性和社群属性的理论、物品和服务属性的理论、多层次制度安排和制度涉及的理论。以这些理论为基础，进行规范的和实证的研究，着眼于个人（包括公民和官员）的选择和行动（政策），即以对个人研究为基础，分析制度对个人选择和行动的影响，以及个人选择和行动对制度的影响。

从 IAPP 研究的传统与努力的方向而言，应该着重于运用复杂的知识分析复杂的公共问题，强调问题解决的制度能力，强调培养和开发自主治理的能力，为充分发挥自主治理能力和克服其局限性提供适当的制度框架。中国缺乏自主治理的传统，那么如何设计制度便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一种建设的理论，任何研究都需要有规范的理论方法来建设；此外，还要进行实证的研究，去发现在什么样的地理、社会条件下，自主治理被充分利用并且未被滥用。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可能。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很多复杂的制度框架和政治理论。同时，还要有强烈的理论与强烈的现实问题关怀的结合。回到 IAPP 的研究方向，其所涉及的政策包括政府的、公民的和社会组织的，政府并不垄断政策，公民和社会也并不只能有对策。最后，关于 IAPP 的研究，还要将中外传统进行适当处理。

具体而言，IAPP 应如何实施呢？这是以个人努力为基础，多中心协作的集体行动。一些具有类似兴趣的个人（学者、学生和官员）聚在一起，形成一种自发自愿的氛围，组成具有开放性的研究社群，进行有组织有目的但自愿的集体行动。这里不存在命令与控制，而是一种共和无支配的研究秩序。还有一些礼仪性质的学术活动，如 IAPP 学术报告系列、IAPP 学术研讨会系列，以便进行制度化的沟通。

IAPP 的研究目前还存在很多困难,构成对我们研究的压力。包括理论传统梳理与实证研究实施的挑战,跨学科的挑战等,最大的挑战却是集体行动的挑战,许多人在一起难免会产生冲突,如何解决冲突进行合作这在一个研究的群体中十分重要。因为任何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而一项研究本身往往有需要多个领域的知识,因此,鼓励合作,解决冲突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另外,还有西方理论资源于本土理论资源的挑战,在这里我们要问,本土化需要有意为之吗?许多本土化研究都停留于口号,IAPP 的研究是否也会陷入这种困境?

当然,所面临的困难还不止这些。但有一点是肯定的,IAPP 研究绝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实现其所预想的研究成就的。从实际情况来看,IAPP 研究可以说仅仅只是开始。这表现在,相关研究人员还比较少;研究活动的组织只有若干年的经历,缺乏历史积累;研究成果比较有限,所设想的许多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无论是价值的论证(古典自由主义)、分析方法的阐述(PCIA)和问题导向的研究(治道变革,一般的和具体的),都是如此。好在来日方长,只要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并且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作为基础,那么其努力就将会是很有前途的,其理论意义或者实际意义也将是富有成果的。

相关文献

阿罗,肯尼思(1987):《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陈志武、崔之元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阿罗,肯尼思(2000):《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埃格特森(1996):《新制度经济学》,吴经邦译,商务印书馆。

奥尔森,曼库尔(1993):《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吕应中等译校,商务印书馆。

奥尔逊(1995):《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奥斯特洛姆,埃莉诺(200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迅达、陈旭东译,上

海三联书店。

奥斯特洛姆, 埃莉诺、拉里·施罗德和苏珊·温(2000):《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 陈幽泓、谢明、任睿译, 上海三联书店。

奥斯特洛姆, 文森特(1999.1):《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 毛寿龙译, 上海三联书店。

奥斯特洛姆, 文森特(1999.2):《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 毛寿龙译, 上海三联书店。

奥斯特洛姆, 文森特等(1992):《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 王诚等译, 商务印书馆。

奥斯特洛姆、帕克斯和惠特克(2000):《公共服务的制度结构》, 宋全喜、任睿译, 上海三联书店。

巴泽尔(1997):《产权的经济分析》, 费方域、段毅才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贝克尔, 加里(1993):《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王业宇、陈琪译, 上海三联书店。

贝克尔, 加里(1998):《家庭论》, 王献生、王宇译, 商务印书馆。

波斯纳, 理查德(1997):《法律的经济分析》, 蒋兆康译, 林毅夫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布坎南(1988):《自由、市场和国家》, 吴良健等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布坎南(1993):《民主财政论: 财政制度和个人选择》, 穆怀朋译, 朱泱校, 商务印书馆。

布坎南、塔洛克(2000):《同意的计算: 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 陈光金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布坎南、瓦格纳(1988):《赤字中的民主》, 刘延安、罗光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布罗姆利(1996):《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 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 陈郁、郭宇峰、汪春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郁编(1998):《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 代理经济学文选》,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德尔、韦尔瑟芬(1999):《民主与福利经济学》, 陈刚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德姆塞茨(1999):《所有权、控制与企业: 论经济活动的组织》, 段毅才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德姆塞茨, 哈罗德(1992):《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 陈郁译, 上海三联书店。

迪屈奇(1999):《交易成本经济学: 关于公司的新的经济意义》, 王铁生、葛立成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范东海(1999):《证券市场管理的制度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菲吕博顿等编(1998):《新制度经济学》, 孙经炜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弗里德曼, 米尔顿(1999):《资本主义与自由》, 张瑞玉译, 商务印书馆。

弗里德曼夫妇(1998):《自由选择》, 胡骑等译, 朱泱校, 商务印书馆。

哈耶克(1989):《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哈耶克(1997.1):《通往奴役之路》,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哈耶克(1997.2):《自由秩序原理》, 北京: 三联书店。

哈耶克(2000.1):《法律、立法与自由》, 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哈耶克(2000.2):《致命的自负》, 冯克利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霍奇逊(1993):《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 向以斌等译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柯武刚、史漫飞(2000):《制度经济学: 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 韩朝华译, 商务印书馆。

科斯(1994):《论生产的制度结构》, 盛洪、陈郁译校,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科斯、阿尔钦、诺斯等(1994):《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科斯等(1999):《契约经济学》, 李风圣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李立中(2001):《中国文化管理体制与文化服务市场化的经济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林毅夫(1994):《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林毅夫(2000):《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麦金尼斯主编(2000):《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 毛寿龙、李梅译, 上海三联书店。

麦金尼斯主编(2000):《多中心治道与发展》, 王文章、毛寿龙译校, 上海三联书店。

毛寿龙(1996):《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毛寿龙(2001):《政治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毛寿龙、李梅(2000):《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
- 毛寿龙、李梅和陈幽泓(1998):《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毛寿龙主编(1999-2000):《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上海三联书店。
- 缪勒,丹尼斯(1992):《公共选择》,王诚译,商务印书馆。
- 缪勒,丹尼斯(1999):《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诺斯,道格拉斯(1992):《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
- 诺斯,道格拉斯(199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
- 诺斯,道格拉斯,罗伯斯·托马斯(1999):《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 平乔维奇(1999):《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蒋琳琦译,张军校,经济科学出版社。
- 任睿(2000):《建立复合多样的环境保护制度安排》,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 盛洪(1992):《分工与交易》,上海三联书店。
- 史卓顿,奥查德(2000):《公共物品、公共企业和公共选择:对政府功能的批评与反批评的理论纷争》,费昭辉等译,高鸿业校,经济科学出版社。
- 斯蒂格勒,乔治:(1992):《价格理论》,李青原等译,戴伦彰、刘诚校,商务印书馆。
- 斯蒂格勒,乔治·(1989):《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潘振民译,上海三联书店。
- 斯密,亚当(1974):《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斯密德,爱伦(1999):《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对法和经济学的进一步思考》,黄祖辉等译校,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 宋全喜(2001):《公共服务的制度分析:以公共安全服务为例》,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 托克维尔(1988):《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威廉姆森(1999):《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张群群、黄涛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 杨小凯,黄有光(1999):《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张玉纲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 姚学祥(1999):《气象服务商业化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 张曙光(1996):《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曙光(1999):《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张维迎(1995):《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张五常(2000):《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易宪容等译,朱泱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 Alt, James E., Margaret Levi, and Elinor Ostrom (1999):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Conversations with Nobelists about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Arrow, Kenneth, Samuel Karlin, and Herbert Scarf (1958): *Studies in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Inventory and Produc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Arrow, Kenneth (1971):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Rearing*, Chicago: Markham.
- Arrow, Kenneth (1974):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 New York: Norton.
- Becker, Gary S. (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8: 371-400.
- Becker, Gary S. (1976):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cker, Gary S. (1993):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cker, Gary S. (1996): *Accounting for Tas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er, Gary (1985): "Public Policies, Pressure Groups, and Dead Weight Cost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8(3): 329-47.
- Black, Duncan (1958): *The Theory of Committees and Ele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nnan, Geoffrey, and James Buchanan (1985): *The Reason of Rul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chanan, James M. (1960): *Fiscal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Buchanan, James M., and Geoffrey Brennan (1980): *The Power to Tax*,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chanan, James M., and Roger D. Congleton (1998): *Politics by Principle, Not Interest: Toward Nondiscriminatory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chanan, James (1968):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Public Goods*, Chicago: Rand

McNally.

Buchanan, James (1969): *Cost and Choice: An Inquiry in Economic Theory*, Chicago: Markham.

Buchanan, James (1975): *The Limits of Liberty: Between Anarchy and Leviath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uchanan, James (1978): *Freedom in Constitutional Contract*,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Buchanan, James (1979): *What Should Economists Do?*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Buchanan, James (1992): *Better Than Plowing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Green, Donald, and Ian Shapiro (1994):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James and Herbert A. Simon (1958):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iley.

March, James and Johan P. Olsen (1989):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March, James and Johan P. Olsen (1995): *Democratic Govern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March, James G., and Johan P. Olsen (1976):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Organizations*, Bergen: Universitetsforlaget.

Miller, Gary (1992): *Managerial Dilemm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erarc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iker, William H. (1982): *Liberalism Against Populism: A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Choice*,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Riker, William H. (1996): *The Strategy of Rhetoric: Campaigning for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iker, William H., and Peter C. Ordeshook (1973): *An Introduction to Positive Political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Riker, William R. (1962):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chwartz, Thomas (1986):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ullock, Gordon (1965): *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Tullock, Gordon (1970): *Private Wants, Public Mean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Desirable Scope of Govern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Williamson, Oliver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Williamson, Oliver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似与不似之间

——金庸和大仲马小说的比较研究

严家炎

严家炎，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笔名严霁、稼兮。1933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58年北京大學副博士研究生肄业，留校工作至今。1984—1989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1984—1997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语言文学学科第二届、第三届评议员，1986—1997年任全国丁玲研究会会长，1988年至今任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1989年至今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1997年至今任全国丁玲研究会名誉会长。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津贴证书。

大仲马出生在1802年的法国，金庸出生在1924年的中国，两位作家不但地域上相隔万里，而且文学活动的时间上也相隔了一个多世纪（大仲马去世半个多世纪后金庸才出生）。把这样两位作家拉扯在一起，人们是否觉得有点意外或奇怪呢？

然而，更引起我们兴趣乃至惊异的，是两位作家在创作经历上的一些相似之点：他们都在小说中创造了许多仗义执言、替天行道的侠士与好汉的形象；他们的小说常取材于历史，以历史为创作的支架；他们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前，又都有一段编剧的经历，从而使他们的小说在结构上颇多戏剧的成分（晚了一个世纪的金庸小说还有电影的成分）；他们又都办过报纸（大仲马办过《火枪手》等多种报纸，金庸先在《大公报》工作，后来又办了《明报》），他们的小说也都曾在多种报纸上连载，并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有时报数因此一下子上升了几千份、上万份。所有这些，全都只是出于巧合？可能，却又似乎未必尽然。

三年前，金庸和池田大作对谈时的一段话，多少解开了读者心

中的谜。金庸是这样说的：

《侠隐记》（即伍光建所译大仲马的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引者）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法国政府授我骑士团荣誉勋章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 Gilles Chouraqui 先生在赞词中称誉我是“中国的大仲马”。我感到十分欣喜，虽然是殊不敢当，但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而且是从十二、三岁时开始喜欢，直到如今，从不变心。^[1]

金庸这段自述，启发我们思考很多问题。下面，我试图从几个侧面对金庸与大仲马小说的相似性和各自的独特性作些探讨。

—

首先可以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小说与历史的关系。

大仲马的文学作品，包括他的戏剧与小说，大多与欧洲历史有某种因缘。他的处女剧《克里斯汀》，受胎于一幅历史题材的浮雕，表现的是 17 世纪瑞典王官秘史。《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奈斯尔塔》等戏剧，更是作者读了从 16 世纪上溯到 14 世纪法国的许多回忆录、编年史而生发出来的精彩故事。至于小说，像《三个火枪手》（中译本亦名《三剑客》或《侠隐记》）及其续集《二十年后》、《勃拉日隆子爵》，《基度山伯爵》（中译本一名《基度山恩仇记》），《玛格烈王后》，《蒙梭罗夫人》或直接取材于历史，或以史做背景装饰，使故事的展开获得了宽广而仿佛真实可信的舞台。如果以为大仲马从历史取材就是忠实于历史，写历史演义，那就错了。他只是借用历史，从历史中寻找一点因由来驰骋自己的想像，写出一个个活脱脱的人物而已。大仲马有句名言：“历史是什么？是一个钉子，一个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2]换句话说，历史只是大仲马为自己小说进行时间、空间定位的一个框子。在大仲马，小说与历史的融合，就是演化为有声有色的故事，借典型来复活历史的某种精神。大仲马并没有耐心去钻研学问，他只相信自己的想像的艺术。他心里明白：人们绝对不会认真地把他当做历史学家。

以《三个火枪手》为例，小说取材于伽田·德·库尔底兹伪托的《国王火枪手第一连中尉达德尼昂先生回忆录》一书。原书已非历史实录，只能算作笔记体故事；而《三个火枪手》除了采用原书中达德尼昂、阿托斯、波尔多斯、阿拉密斯四人的名字及部分事迹外，在主体内容、基本倾向、情调风尚等方面均与伪托的所谓“回忆录”有极大的不同。据权威的法国学者的研究，“在库尔底兹笔下，火枪手们都是些不讨人喜欢的冒险者；仲马把他们改写成传奇式的人物，像现在书中这个样子。书中那些打斗的场面，精彩纷呈，又真实可信，许多地方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妙，使人想到他父亲（仲马将军）当年在布里克森桥头只身退敌的壮举。”^[3]“原作者才力不高，小说最精彩的情节（博纳修夫人的故事，米莱迪·德·温特的故事等），都是由仲马与（助手）马凯全部改编或大部分虚构而成的。”^[4]“仲马还有一手不为人知的绝活：杜撰出一些次要人物，引进故事情节之中；通过这些无名之辈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来表明作者对这些事件的看法。……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出自想像的角色，在真实事件的关键时刻，总要出现他们的身影。阿托斯及时赶到司徒亚特王朝查理一世的断头台下，记下了国王最后的遗言。那一声著名的‘记住’就是对他讲的。靠了阿托斯同达德尼昂他们两人的力量，查理二世被扶上了英格兰国王的宝座。”^[5]至于在充实种种曲折的情节，添加许多生动的细节，虚构人物间的精彩对话，以及追求结构布局的巧妙匀整方面，大仲马更是施展才力和想像，做得异常出色。完全可以说，《三个火枪手》虽有所本，却是大仲马艺术天才的真正创造物。书中出现了首相黎塞留、国王、王后等真实历史人物，但他们只为小说构成了一点淡淡的历史背景；《三个火枪手》的主要故事纯属虚构，因而它完全不能叫做历史小说。

在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上，金庸虽被人们视为“有历史癖”，但基本态度与大仲马相似。他自己曾说：“《三剑客》教了我怎样活用历史故事。”^[6]也就是说，他从《三个火枪手》学到了艺术创作的极大自由度。金庸像大仲马一样，只是把历史当做“用来挂自己小说”的钉子。历史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定下了时间、空间之位，布

置下某种环境气氛，增进了故事的真实感，却丝毫不会妨碍金庸在这一框架内施展自己的艺术想像。金庸小说除小部分历史背景不明者外，多数故事涉及两宋、元代、明初、清代。这种背景不但没有构成他创作的限制，反而给了作者以更大、更充分的驰骋想像的自由，使他便于布置或威武雄壮、或哀感动人的舞台。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借家乡一带流传的乾隆乃陈阁老之子出生后就被雍正调包的民间传闻，虚构出以陈家洛为主人公的一连串极热闹的反清复明故事，其中既出现了乾隆帝这样的历史人物，在重大关节上却又无背于历史真实。第二部《碧血剑》在“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的氛围中开场，作者设想出袁崇焕的儿子袁承志因习武有成，为父报仇而卷入闯军、明廷与关外清方之间的斗争，仍是凭借艺术想像而自由展开的富有传奇性的武侠故事。种种事实证明，金庸甚至比大仲马走得更远，敢于虚构某些重要关节，让自己的武侠故事更深地嵌入历史。《天龙八部》中的段正淳，不但实有其人，按有些史料记载，还曾在位十余载，金庸则采用了另一种说法，将他塑造为一个到处留情、并未登基的角色（其实，既与历史人物很不一样，何必再用真名）。《鹿鼎记》一方面让重要历史人物康熙皇帝出场，写了这个有为的“明君”，另一方面又大胆塑造了韦小宝这个特殊的虚构角色，让他参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以致台湾的中学生竟然信以为真，在作文中写道：“自从韦小宝和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中国因此如何如何。金庸和大仲马都依靠自己神奇的想像力和英雄主义激情来复活历史的某种精神，但显然，金庸的某些想像，远比大仲马更为大胆，虽然这类做法有时也会引来远非一致的评价，甚至招致史学界的某种非议，但却大大增进了小说创作的生动性与丰富性。倪匡评论金庸小说时曾说：“历史在金庸笔下，要圆就圆，要方就方，随心所欲，无不如意。可以一本正经叙述史实，也可以随便开历史玩笑。可以史实俱在，不容置辩，也可以子虚乌有，纯属游戏。”^[7]这里面既体现了金庸作品想像力极其丰富的突出优点，也包含着作者艺术处理上某些不周或失算之处。

禁的教会长老，这个长老临终时把自己的遗产赠送给他，还告诉他一处放着大量钻石、钱币的秘密宝库。皮科取到财宝以后，就化装成巴尔迪尼神父等身份回到巴黎，到处向人打听七年以前那个鞋匠哪里去了。终于从安东尼·阿吕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于是，皮科先用行刺和毒药杀了参与陷害的两个同乡，又放火烧了卢比昂的房子，让卢比昂前妻生下的一子一女出丑并且成为罪犯。正当皮科最后刺杀卢比昂的时候，他自己也被安东尼·阿吕所识破并杀死。阿吕后来逃到英国，直到1828年他临终前，才向神父讲述了自己知道的详情，坦白了这些可怕的往事，并且让神父又把所做的记录交给法国司法当局。

这桩真事本身就像一部离奇曲折的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大仲马利用这个素材写成小说《基度山伯爵》时所进行的多方面的艺术改造和虚构。他写主人公爱德蒙·邓蒂斯遭受邓格拉司、弗南尤其维尔福法官三人的陷害，入狱十四载，受尽折磨，越狱后找到宝藏，成为基度山伯爵。在邓蒂斯誓报恩仇的过程中，作者匠心独运地突出了事件和人物的正义、道德、人格的力量。一方面，邓蒂斯的对立面——三个陷害者都是些极卑鄙无耻的角色，他们都以无辜者的自由幸福为代价，营造了自身的飞黄腾达：邓格拉司成了银行家；弗南不但娶了邓蒂斯的新娘，而且当上将军，成为马瑟夫伯爵和贵族院的议员；法官维尔福更是官运亨通，不断晋升。这些人物不仅对邓蒂斯个人犯了罪，而且也是法兰西民族的败类。像弗南，“身为法国公民，他竟会投到英国人那一边。祖籍是西班牙人，他竟会参加攻打西班牙的战争。受禄于阿里，他竟会出卖、谋害了阿里。”^[8]这种状况使基度山伯爵的复仇具有“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性质。另一方面，基度山伯爵的复仇又体现了宽容、仁厚、大度的胸怀。尽管邓蒂斯与皮科的人生悲剧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基度山伯爵完全没有像皮科那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用残忍手段——杀死仇敌来寻求单纯复仇的快感。相反，当美茜蒂丝为儿子求情，恳请留下阿尔培一条性命时，基度山伯爵甚至准备在决斗中以自己的死来换取仇人儿子的生。他还颇费周折地将另一个仇人维尔福的女儿从死亡的边缘抢救了回来。最后，还给仇人邓格拉司本人留了一

条生路。基度山伯爵的复仇，大体上以只给予仇敌应得的报应或惩罚为度：他让富有的银行家回归到一无所有；让议员因叛国罪败露当众出丑并遭妻儿离弃而自杀；让法官因家庭成员接二连三死于非命却找不到可供审判的“罪犯”而发疯。这样的复仇既能大快人心又保持了君子风度。银行家、议员和法官正是构成当时法国统治阶级的三大支柱；大仲马为小说主人公设计了这样三个仇敌，不仅大大高出于原来的素材，也是作家“将自己的小说挂在历史的钉子上”的又一个成功的范例。

金庸对大仲马《基度山伯爵》中有关复仇的描述是赞赏的。他说：“一个人要报仇，把仇人千刀万剐，只是取决于一时；但如果千方百计的图谋报复而终于大仇得报之时，能合情合理地宽恕了仇人，那更加令人感动。”^[9]他认为，基度山伯爵“重情义、轻性命的高尚情操，令人留下永不能忘的深刻印象”^[10]。金庸在自己的小说中，一脉相承地体现了《基度山伯爵》这类思想，否定了中国传统武侠作品那种“快意恩仇”、血腥杀戮的观念。不但《雪山飞狐》里纯粹因误会造成的“百余年来胡苗范田四家子孙冤冤相报”的荒唐事情，通过苗人凤父女的义行而得到制止；就连《射雕英雄传》里怀着家国双重仇怨的郭靖，在实现了正当的复仇之后，也作了自我反省：“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连城诀》与《基度山伯爵》思想主旨颇不相同，但主人公狄云与邓蒂斯的经历颇为相似：他们都无端受了仇家的陷害，长期历尽铁窗生活的折磨；又都在狱中因祸得福，一个从长老那里获得大量珍宝，一个从难友那里学到高强功夫；他们的未婚妻都被仇敌所夺；他们又都因旧时心上人的求情而拯救过怨敌的生命；他们都实现了复仇，却又都表现了宽容与大度；他们对怨敌的惩罚，又都体现为“替天行道”式的报应（狄云的仇敌因自身无尽的贪欲而导致在抢宝时相互残杀致死）；他们的复仇行动，虽然也出于个人恩怨，却都映射出为民除害、伸张正义的理想之光。这说明金庸小说与大仲马确有不少共同之处。但金庸小说中，又渗透着民族文化传统的更深烙印：《天龙八部》里那个害得许多人惨死的慕容博以及为报仇杀过许多人的萧远山，作者

没有安排他们被仇敌杀死，而是送他们出家，给了一个皈依佛门的前途。即使拿上述两部最为相近的作品来比较：《基度山伯爵》的结尾，是主人公携带财富与高尚、善良、美丽的东方女奴海蒂扬帆而去，《连城诀》里的狄云，则宁可回到深山雪谷与水笙相聚；前者多少体现了大仲马的人生理想，后者则深烙着金庸所受传统文化（包括佛学）的印记。

复仇可能是侠义小说的永恒主题之一。金庸和大仲马一样，对复仇没有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赋予了复仇以良知、道德和正义的内涵。复仇本身是中性的，唯有从仇恨的具体内涵和报复的动机、对象、目的、手段的不同，才能分辨出是非曲直、善恶清浊。金庸和大仲马所塑造的以复仇为情节的各种小说人物，都有从家仇到国恨的升华；都有对血腥复仇手段的摒弃；都有行侠仗义的气度；都有对无辜者，包括对认罪之人的宽容。小说人物的价值取向代表了作家的价值取向，作家的价值取向则体现着作品的思想水准和质量。这正是大仲马和金庸的小说经得起读者和时间考验的秘密所在。

三

金盾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谈录中这样说过：“您拿我和大仲马相比（我）是不敢当的，他的精彩之处我远远不及。不过我们二人的小说的风格很相近。”^[1]金庸一方面很谦虚，另一方面也承认自己与大仲马的小说“风格很相近”。这里所说的“风格很相近”，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理解为艺术上相互关联的几个共同点，即：神奇的想像力，丰富生动的情节，多姿多彩的人物形象。这些正可以说是大仲马与金庸小说最吸引读者的地方。

《三个火枪手》中，一些最精彩的情节像达德尼昂的情妇博纳修夫人的故事，红衣大主教黎塞留的女间谍米莱迪的故事，几乎全出自大仲马的放胆虚构。这些故事都在双方争夺得最紧张的关头发生，而且一波三折，风潮迭起，令人读时屏息凝神，目不暇接，结果却又峰回路转，出人意料，真有意想不到之妙。特别是米莱迪在英国被囚禁后的五天里所发生的事（连最忠于职守的监管者，竟也

逐步成为她的精神俘虏，终于帮助她出逃），简直曲折变化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把这个毒蛇似的女间谍的阴险奸诈、善于伪装、精明强悍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让人不能不对作者超凡的想像力和杰出的编故事才能佩服万分。当然，大仲马为数众多的小说中也有许多劣质产品（主要是他人代作而用他名字发表的）。因此，对大仲马极其了解的雨果，在他去世后曾说过这样的话：大仲马“是个天才，他的天才甚至超过才能。他的想像力孕育出了那么多的事情，然而又把它们一股脑地扔进熔炉中。至于出来的是钢还是金，他可从来不过问。他那带天性的热情，在他神奇的作品中，得到了尽情的抒发……”^[12]这也许是相当确切的评价。

金庸小说能够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甚至令人废寝忘食，靠的是什么呢？我认为，靠的也是艺术想像的大胆、丰富而又合理，情节组织的紧凑、曲折而又严密。有关这一方面，我曾在《论金庸小说的情节艺术》一文中作过较详细的探讨，此处不赘。金庸小说情节的最大好处，是让神奇的想像和尽可能完满的情理结合起来。他的情节既是出人意料的，仔细一想，却又在人意中。《天龙八部》里，那个最没有王霸之心的段誉最后却做了皇帝，最没有男女之欲的虚竹和尚却做了快乐之极的西夏驸马，最怀着民族之恨的萧峰却为平息辽宋干戈而“杀身成仁”，最想当皇帝的慕容复最后却发了疯只能对着几个孩子南面称孤。这些情节与结局我们事先料想得到吗？可以说一点都没有想到。然而仔细一想，它们都非常合乎情理。加上在叙事艺术方面，金庸将大仲马式西方小说开门见山地切入情节以及倒叙、插叙、闪回、推理的手法，戏剧中“三一律”式的严整结构，电影中镜头推移、组接的方法（蒙太奇），与中国传统小说讲究伏笔、悬念、转折、一张一弛的节奏起伏等技巧融合在一起，中西合璧而又浑然一体，兼有多方面的妙处，这就使他的情节艺术具有极大的魅力。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终身教授王靖宇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详细描述他三十年前经常通宵达旦地阅读金庸小说，享受无穷乐趣的情形。他的这种阅读经验，恐怕也是千千万万金庸小说的读者所共有的。

就大仲马和金庸的小说代表作而言，人物刻画都非常出色和成

功。但是，两位作家笔下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大仲马传记的著者、法国学者兼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认为：大仲马“习惯于笼统地把人分成忠奸两大类，不是英雄豪杰就是背信弃义的叛徒。”^[13]又说：“仲马按照自己的先入之见塑造不同历史人物的形象，爱憎分明，决不模棱两可。马扎然在他笔下和在烈茨红衣主教笔下一样，是个面目可憎的人物。仲马立场鲜明地站在富凯一边，反对科尔贝。历史要求有分寸地表现出色调浓淡的细微差别；而连载小说的读者则喜欢黑白分明，人物好坏一看便知。”^[14]就在《基度山伯爵》这样优秀的作品中，读者也看到了作家将人物的善恶忠奸过于简化，以致多少有点脸谱式的痕迹。晚了一个多世纪的金庸则不然。可能由于生命科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使他对人性的认识要深刻得多。金庸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谈录中说：“我相信在人间社会中，善与恶是复杂交错在一起的，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谁是百分之百的善人，也没有一无是处的坏人。恶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坏的方面，不过占的比例较少而已。作者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真实地写出来。我在写作《倚天屠龙记》时表示了人生的一种看法，那就是，普遍而言，正邪、好恶难以立判，有时更是不能明显区分。”^[15]金庸小说的突出成就之一，即在于不但塑造了乔峰、郭靖、黄蓉、杨过、令狐冲这些性格各不相同而又出类拔萃的英雄形象，而且还成功塑造了许多极复杂的人物形象，像《笑傲江湖》中的任我行、岳不群、林平之，《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天龙八部》中的游坦之、段正淳、康敏，乃至《书剑恩仇录》中的张召重等。这些人物都是多棱面、比较经得住分析的。因此，金庸小说给人的感觉不仅是一幅幅速写和写意画，而且是有立体感的油画。

四

最后，我愿意就大仲马和金庸小说所体现的各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涵量说些想法。

不管作家自觉还是不自觉，成功的小说作品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涵融着各自民族的文化特质和民族精神。大仲马的小说不但体现了

大仲马作为共和派作家那种反专制、反黑暗的政治倾向，同样还突出地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热情奔放、酷爱自由、爱国尚武的民族性格。一位大仲马的研究家就把《三个火枪手》里四位主人公当作法兰西民族的代表来称颂，他说：

对法兰西怀有炽烈的情感，这就是隐藏在达德尼昂、阿托斯、波多斯和阿拉密斯这四位英雄内心深处的魅力所在。顽强的意志、贵族式的忧伤、并不总是锐不可当的力量、微妙而有情的风度，把他们造就成可爱的法兰西的缩影。这是一个勇敢而年轻化的国度，现在仍引得我们满心喜欢地品味它，驰骋想像去体验它。当然，在这个混杂着爱情隐私与政治阴谋的纷扰动荡的世界之外，还有许多笛卡儿与帕斯卡尔式的人物；不过，就是这些人，在生活中对军旅的习俗与上流社会的交往也并非一概无知。年轻人通过斗剑比武走到了一起，后来又一起进入火枪手的行列。在他们身上有多少风雅，多少俊秀，多少刚毅，多少魄力，多少机敏！就连博纳修夫人也宁愿把勇敢大胆置于操守修养之上。……如果说丹东和拿破仑是法兰西力量的倡导者，那么大仲马在《三个火枪手》中，就是表现这一力量的民族小说家。^[16]

实际上，大仲马小说的文化内涵当然远不止此。他的作品渗透着早自古希腊、罗马以来欧洲文化传统的内容，包括宗教习俗、神话故事、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等。《三仲马传》的作者安德烈·莫洛亚就曾指出：“大仲马为了怀念他当过将军的父亲，曾把赫拉克勒斯的神话体现在波尔多斯这一人物身上，取得很大成功。”^[17]在《三个火枪手》的续集《二十年后》中，大仲马还引用希腊神话故事，写了阿托斯少年时代和石雕美人之间的恋情，这很可能启发了百多年后的金庸去构思《天龙八部》中逍遥子与李秋水间爱情转折的线索。

金庸小说虽然受到大仲马作品的影响，但二者文化内涵之不同，亦如地域距离那么遥远。金庸小说中的英雄，无论是乔峰、郭靖，还是令狐冲、杨过、狄云，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既热爱和平、仁厚谦逊，同时又见义勇为、不畏强暴的根本精神。其中乔峰形象的塑造尤其值得称道，可说达到了很高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具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英雄们个人的结局虽不甚相同：有的杀身

成仁，舍身为国，有的飘然而去，遁世而居，却无不昭示着救民于水火的侠魂，渗透着儒、道、佛文化思想的多元影响。武侠小说这种文类固然烙刻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深深印记，而英雄主人公们义薄云天的壮烈行为，感人肺腑的道德情操，无疑更集中地显示了我们民族的美好性格和理想。大仲马的小说作品中，有一部分也可以称之为侠义小说，在文类上与金庸的作品相当接近，但两者确实蕴含着属于不同民族的不同的文化观念与不同的文化韵味。仅以爱情为例，大仲马的侠士们必有情妇，大仲马本人的情妇就多到难以精确计数；金庸小说的主人公除小流氓出身的韦小宝之外，爱情上都是专一的，^[18]尽管他们每个人几乎都被许多个美丽的女性包围着。这就见出民族文化精神和风俗习性的显著差异。

更加值得重视的，是金庸小说所包容的厚重的文化涵量。这完全是金庸的自觉追求。他的小说具有迷人的文化气息、扎实的文化底蕴和文人的艺术情趣。作者不但依据人物刻画和情节发展的需要，将诗、词、歌、曲、琴、棋、书、画化为小说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寓文化于技击，连武功与武技较量也成为阐发中华文化内在精神的绝妙空间。以至有些学者认为，金庸小说可以当做道家 and 佛学的入门书来读。金庸小说涉及的宗教、哲学、文史、科技知识的广博丰富，也令人惊讶。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同时可以视作文化小说。与金庸作品体现中华文化内涵之深厚比较，大仲马作品在体现法兰西民族文化方面似乎就相形见绌。大仲马少年时代并不爱学习，后来他虽然不断充实文化知识，却并不连贯。《三仲马传》的作者安德烈·莫洛亚说：大仲马“这位自学成才的青年，在许多事情上无知得令人吃惊”。^[19]他以出色的想像力和倚马可待的快速才能见长。这或许就是金庸作品在文化内涵上相对而言较大仲马为优的根本原因。

上面，我们从四个窗口对大仲马和金庸的小说作了近于浮光掠影式的观察和比较。

大仲马的小说多达四百卷以上，可惜质量上下落差很大。原因是许多作品乃大仲马雇人写成（已知者有七名），来不及由他本人认真修改就在报纸上连载了。金庸则属于另一种类型，他受中国传

统观念影响，视文学为超乎年寿、荣乐之上的“不朽盛事”，因而发表以后还要严肃地精心修改，有的作品甚至改到三四遍。请朋友倪匡代笔的部分，也由他本人亲自重写过。在小说创作的态度上，两位作家也恰好成为一种鲜明对照。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注 释

- [1]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 298 页，香港明河社 1998 年版。
- [2] 安德烈·莫洛亚著，郭安定译：《三仲马传》中译本第 212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3] 同上书，第 221 页。
- [4] 同上书，第 218 页。
- [5] 同上书，第 223 页。
- [6]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 302 页。
- [7] 《我看金庸小说》第 79 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97 年版。
- [8] 《基度山伯爵》第 1254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 [9]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 289 页。
- [10] 同上书，第 293 页。
- [11] 同上书，第 284 页。
- [12] 《三仲马传》中译本第 392 页。
- [13] 同上书，第 153 页。
- [14] 同上书，第 223 页。
- [15] 《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第 287—288 页。
- [16] 伊波里特·巴里戈：《亚历山大·大仲马》。
- [17] 《三仲马传》中译本第 283 页。
- [18] 到处留情的段正淳，因并非《天龙八部》主人公，故此处未提及。
- [19] 《三仲马传》中译本第 80 页。

说古典诗词创作的“奇思” 及其艺术表现

葛 晓 音

葛晓音，女，1946年8月23日生于上海，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在新疆昌吉州中学任教、在河北省兴隆县文化馆工作。1978—1982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读硕士研究生。1982年至今，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澳门大学文学院、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即研究生院）人文社会学系（兼东京大学文学部）进行教学工作。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91年1月被国家教委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6年7月被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市第一届学位委员会委员。

中国古典诗词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自宋代以来，文人们就开始不断地总结中国诗歌的艺术特色，逐渐建立起一套自成系统的鉴赏理论。其中许多名词术语至今仍为人们引用。像比兴、意境、风骨、格调、炼字、声韵等都是大家所习用的，而且渐渐形成了欣赏古典诗词的思维定势。其实如果跳出古人的理论范畴，研究古典诗词的艺术还有不少领域可以开掘。比如钱钟书先生从西方心理学和欧洲文学中领会了“通感”的道理，拈出中国诗文中的一种表现手法，确实是古代批评家和修辞学家都没有发现的。当然发现一种手法，而且要为它确定一个准确的名称并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可以用今人的眼光发掘一些前人注意不多的表现艺术。比如古代批评家经常称赞某些作品“思奇极矣”，说某些作家“好奇”。但究竟怎样奇法？没有明确的解释。奇思即奇特的艺术构思。包括全篇新奇的构思和视角，或某些诗句描写事物的奇特手法。这种奇思与想像力有关。以前我们说诗人的想像奇特，一般都举屈原、李白、李贺等诗人，所关注的也主要是他们融会神话传

说、运用夸张等艺术手法。但是同为想像奇特，却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屈原、李白是大家所熟悉的。他们的想像力极其丰富，但不追求刻意的表现。我今天不讲这两位大家熟悉的诗人。我要讲的四方面的内容，除了第一类人们不太注意的“奇思”以外，其余三类都是刻意追求惊人表现的。我想通过这些讲解，把林庚先生、陈贻焮先生和我个人研究某些诗词艺术的体会作一个综合，来解释明清诗话里未能说明的一种创作现象：

一、化抽象的理念为虚拟的情境

就是将自己和社会人事中的感受，以及人生信条等比较抽象的理念，通过一种虚拟的具体场景或境界表现出来。这种构思方式从比兴发展而来，但与比兴有所不同。如阮籍《咏怀》“独坐空堂上”：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阮籍生活在魏末晋初的乱世，在司马氏的高压政治下，当时不合作的名士很少能保全自己的性命。阮籍的82首咏怀诗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抒写自己在这个时代找不到人生出路的苦闷。这是其中的一首。这首诗虚拟了一个除自己以外别无一人的空廓世界。诗意共分三层：第一层写自己独坐在一个空堂上，没有可亲近的人。第二层写他走到门外的大路上，也看不见车马来往。这里用“永路”一词，永就是长。这意味着在他的人生长途中，始终没有一个人可以交往。第三层写他登上高处，眺望整个九州，还是只见一片旷野。在这片旷野上，只有朝着西北飞的失群的鸟和朝着东南方向跑的离群的野兽。这个境界是很奇特的。试想什么样的高处能让他望见九州呢？所以这个不受视野局限的空无一人的世界，只是他内心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体认。无人可亲，鸟兽又不能为群。这就更突出地表现了世无知音的孤独和寂寞。在阮籍之前，虽然曹植的《野田黄

雀行》也是用少年拔剑解救被网住的黄雀这个故事来抒写他无力救助朋友的悲哀，但整个故事还是一个比兴。阮籍的这种奇思也来自比兴，但他所构造的境界已是一个具象的理念。这一点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可以看得更清楚：“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近年来有学者指出这几句话在南北朝时就有人说过，不是陈子昂创作的诗。但陈子昂的好朋友卢藏用在《陈子昂传》里提到陈子昂登上幽州台时吟了这几句，说明还是把它当作诗歌来看的。这首诗实际上把阮籍诗进一步抽象化了。陈子昂在幽州时内心很苦闷。但这首歌没有局限在政治失意的牢骚中，而是把他在政治社会中的孤独寂寞之感，纵观古今历史的慷慨悲凉之情，化为一个天高地广、苍茫空旷的境界。在一无所有的背景上突出了诗人独立于悠远的时空中的高大形象。概括了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在困厄境遇中的愤激不平。

又如陶渊明《拟古》其八“少时壮且厉”：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这首诗写陶渊明少年时的人生抱负。诗里所写的都是北方地名。他并没有去过。行游到张掖和幽州，说明他曾有过立功边塞的雄心壮志。首阳山的薇菜是避世的伯夷叔齐吃的，易水是荆轲刺秦前诀别燕太子的地方。伯牙和钟子期是一对懂琴的知音。庄周思想是超脱世俗的哲学。一座座坟丘象征自己钦慕的先贤和知音在现实中都已经找不到了。全诗把这些古人的遗迹集中在一起，化成他虚拟的壮游途中所见的景物。表现了少年时志在四方的豪气，对避世的节操和除暴的义气的向往，以及自己在人生长途中坚持以古人的节义作为精神食粮的意志。这首诗的构思原理虽然和阮籍有相同之处，但更加抽象，令人联想到现代派绘画中把许多表示抽象观念的图形组合在一起的表现手法。

魏晋诗中对于人生哲学的探寻是一个普遍性的主题。这时的诗一般不追求奇巧的构思，而是对思想、感受和情绪进行高度概括和抽象化的需要导致诗人产生了以上奇思。这种奇思不可能多得。我们在阮籍诗和陶诗中能挑出的也不多。因为在比兴盛行的时代，它很容易与比兴混淆，作者自己也未必具有与比兴明确区分开来的自觉意识。更何况高度概括和抽象化的佳作也不可多得。但这毕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创作现象，这种带有象征意味的表现方式具有一种历久不衰的新奇感。

二、印象的表现

林庚先生在《中国文学简史》里指出：唐诗“到了韩愈就发展为追求那奇特的、生疏的、惊人语句上的表现”。他举韩愈的《昼月》为例：“玉碗不磨着泥土，青天孔出白石补。兔入臼藏蛙缩肚，桂树枯枝女闭户。……”说“从这生疏的主题，奇特的表现，都可以说明这一个诗派的开始，就着重在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昼月》写白天出现的月亮，用了很多奇特的比喻。说它像一个着了泥土的没磨过的玉碗，又像是青天捅了窟窿补上去的一块白石。月亮里兔子不在外面了，捣药的杵臼被藏起来了，蟾蜍也缩起了肚子。月中桂树的枝叶枯萎了，嫦娥也关闭了门户。这些比喻用的都是常见的关于月亮的传说和比喻，补天的故事也是人们熟知的。但韩愈把它们丑化以后凑在一起，既写出了昼月上面的阴影不如夜月清楚的视觉感受，又突出了月亮在白昼变得暗淡呆滞的印象，所表现的“阴为阳羞固自古”的主题却是生疏的。林先生还指出“在这一个追求上表现得更尖锐的则是孟郊。”“《秋怀》诗可以代表这一个典型。其中最突出的诗句像‘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梦是脆弱到一滴就破，肋骨是瘦得如同梳子一般，可以任风吹疏过去。”陈贻焮先生进一步阐发孟郊这种奇思的原理：“梦比纸薄，冷露一滴即破。要理解寒风梳骨，得先想到像梳子似的肋骨梳风才行。”构思之奇在于梦与露水的关系，以及风和肋骨的关系，梦是无形的，冰冷的露水又怎能梦滴破？风也是

无形的，梳子又怎能梳它？诗人的意思无非是说自己冷得梦都做不成，瘦得皮包骨的人顶不住料峭的寒风。但诗人用奇异的想像强调了被冷露滴醒的梦是何等冰冷脆弱，把寒风彻骨的感觉写得像是一把把梳过肋骨似的那么难受，这就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如果说孟郊以上两句诗主要是把无形的感觉变成有形，加以夸张，那么杜甫《秋兴》其七、其八则是梦忆印象的表现：“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这两句向来以倒装而成名句。之所以要倒装，就是为了凸现回忆中的印象。杜甫此时身在夔州，已经到了晚年，这时他写了很多总结自己一生的诗歌。早年他在长安所见到的一切，都已经是梦中的回忆，而我们知道梦中的回忆往往是片断的，不一定有逻辑联系的。浮现在脑海中的总是印象最深的一些事物。杜甫就用倒装句把他的这种回忆加以突出：先是香稻的印象，然后是联想：那是鹦鹉啄剩的稻粒；又突出碧绿的梧桐；接着是合乎逻辑的说明：那是凤凰栖息的枝头，这就把极盛时期的长安留给诗人的最美好的印象突现出来。如果改成顺序描写：“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这两句就显得很平淡。又如：“波飘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写昆明池的萧条凄清，以大片的云水的黑色，零落的几点粉红的莲花瓣来形成色彩的对照，这更是梦忆中才有的印象。李白也是善于写梦的，最典型的是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但这首诗写梦是合乎梦的逻辑的，梦中意象缤纷，然而按着他游天姥的顺序展开，先是一个在梦中飞行的诗人在月光下来到极其静穆的镜湖边，接着是在梦境的快速转换下游过重重山岭，最后看到一个訇然中开的洞天福地，那里有无数仙人飘摇而下……。这是诗人借天姥山的自然景色展开神游的幻想世界。杜甫的梦是一种现实的回忆，是被时光删除了许多过程和细节之后剩下的强烈而又朦胧的印象片断。常人会有类似的体验，只是杜甫能把它刻意地表现出来罢了。

从杜甫诗里可以看出诗歌表现印象与色彩和构图有关，这也正是它与绘画相通的地方。同样是几何图形的抽象，表现效果大不相同。比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它的好处在直和圆这两个勾勒几何图形的字。因为它把大漠和孤烟以及长河与落日的

垂直关系作了最简洁鲜明的勾勒，使诗歌要展现的辽阔空旷的空间拓展到极限。杜甫的“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送张十二参军赴蜀州》）却像一幅抽象派的绘画，因为它将秦地平坦和蜀中多山的特点作了一幅几何图形的对比。把不是一眼可以望尽的视野，也不是一笔可以勾勒的景象浓缩在高度抽象化的描绘之中了，与其说它是蜀道和秦树的形象概括，还不如说是感觉的简化，所描绘的事物也因为这感觉的强调而变形。而王维的直和圆只是客观地勾勒了可以一笔画尽的轮廓，这种勾勒不但没有使景物变得抽象，反而比着色更加鲜明。所以同样的字，有时可以收到完全不同的效果。用构图突出印象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岑参。岑参是盛唐诗人中最好奇的一位，杜甫就说：“岑参兄弟皆好奇。”他写山水的不少诗构思都比较奇特，角度也不同。这里举他的《上嘉州青衣山中峰》诗里的两句：“江云入袈裟，山月吐绳床。”如果将“入”改成“拂”；“吐”改成“照”，同样是描绘和尚在山顶寺里修行的情景，但没有新意，意境平常。但这里用“入”和“吐”字，写江云飘入袈裟，绳床被山月吐出。给人的印象便是：在绳床上坐禅的和尚像一个巨大的剪影，塞满了画面。江云成为缭绕在袈裟上的点缀，山月的光轮成为绳床背后的衬景。和尚似乎坐在一个巨大的虚空中，他和大自然之间已经没有寺庙这些建筑的阻隔。诗人想要造成的正是这种效果。我们再看孟郊的《游终南山》：“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陈贻焮先生说：“惊人奇想”。它的奇首先在于日月从石上生出，但为什么会发此奇想呢？是因为前面说南山把天地都塞满了，那么日月石上生就是来自一个自然的逻辑，也是来自一幅可以想像得出的图画。其实我们把这两句和岑参的前两句诗作个比较，不难看出，孟郊诗只是把岑诗的构图无限放大了，就成为一幅印象派的佳作。两者都是改变客观描绘画面的传统写法，夸大内心的主观印象。前者强调山僧月夜修行的神秘感以及与大自然冥合无间的意思。后者极度夸张南山之高给人的堵塞天地的感觉。当然孟郊的表现更强烈。如果没有孟诗，岑诗的表现可能被忽略。

岑诗和孟诗说明这种印象的表现其实是一步步发展而来的。杜甫和岑参在构思造句方面给后人许多启示。有些诗句的效果或许不

一定是有意造成的。比如“当为斲青冥”（《路逢襄阳杨少府人城》），本来是写到高入青冥的山上去锄药，读来却给人以凿天的错觉。那么青天就像是可凿的固体了。李商隐有“凿无不到牵牛处”（《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的名句。自然令人联想到它与杜诗的关系。杜甫的“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剪水的构思很奇，不过这里还是指画。而李贺说：“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罗浮山人与葛篇》）就真的是剪天了。不过，这句的奇特，还要联系全篇来看：“依依宜织江雨空，雨中六月兰台风。博罗老仙时出洞，千岁石床啼鬼工。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御沙立。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这首诗主要是形容葛的制作精细，罗浮山人送葛的及时，以及葛布给人带来的凉意。葛是夏天穿的。前两句写葛的织工如空濛的江雨，让人在六月的雨天好像感受到一阵从兰台吹来的风。宋玉《风赋》写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而至，大王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博罗老仙就是罗浮山人，博罗是罗浮的异名。石床是洞府里常有的东西。这两句写罗浮山人把葛拿出洞府，鬼工知道要给人，非常可惜，所以啼哭。鬼工形容做工极其精巧，似乎不是人力能做到的。这里给人的印象是鬼工就在洞府里，那么这罗浮山人真成了千年老仙。第五六句写天气的湿热。蛇因湿闷而毒气不散；江里的鱼也因水热而伏在沙上，所以罗浮山人要剪葛制衣。前人注解说明湘中一尺天是指湘水，水里含有天光，因为杜甫有剪水之说。其实何必定要依杜诗注解呢？这首诗头两句已经把葛比作烟雨空濛的江天，最后说剪天是极顺理成章的。以天之清莹洁白喻葛，如果没有全诗奇特的境界和气氛渲染，就显不出它的妙处。诗里所写的是在南方漏雨天气的闷热中见到葛的清凉感。罗浮山人是给葛的人，而他的居处被诗人夸张成潮湿的洞府石床，又为这种湿热感更增添了几分神秘，因此作者之意不在以比喻取胜，而在“无意中创造出了一个虚荒诞幻，却又十分有趣的童话世界”，使读者在这个世界中直接感受他所描写的湿热和凉意。剪天的妙喻，正是依附着这种感觉的表现的。

三、化虚幻的想像为生活实感

这一个观点是陈贻焯先生提出来的。我认为在唐诗艺术特色的研究方面，这是一个很精彩也很重要的观点，而它的提出是在五六十年代，这就更加难能可贵。奇怪的是至今仍有很多研究者没有重视这一观点，这是很遗憾的。陈先生对李贺李商隐的诗歌艺术研究是建立在他对诗歌的妙悟的基础上的。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说透了李贺创作的奇思中包含的道理。杜牧说，李贺诗“鲸吸鳌掷、牛龟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陈先生指出，“讲李贺的诗歌风格和艺术特点的，没有比这更形象、更得要领的了。可惜的是，这只是一印象，一种诗人用诗的语言所做的评价。须作进一步的剖析。”他通过对李贺构思的科学分析，讲清了所谓“探寻前事”，就是“对某一史实或生活中某一事物偶有所感，从一点生发开去，精骛八极，神游千载，既要从现实中解脱出来，力求想像的虚荒诞幻，又要紧紧地依据生活经验，力求感受的真切和形象的生动。”

《金铜仙人辞汉歌》等歌行，“抓住传说中的一点，并进一步运用想像，将莫须有的情事按生活形式活生生地表现出来，这就使得诗境既新奇又真切”，“这就是‘长吉体’歌行构思和表现艺术的主要诀窍”。陈先生的这一解释不但说透了李贺构思的重要道理及其对李商隐的影响，而且可以用来解释中晚唐相当一部分作品构思的共同原理。比如杜牧有一部分诗如《过华清宫》等，也是把传说或历史还原成现实生活，其构思原理相同，只是不追求虚荒诞幻的效果而已。像这样的发现能够总结出诗歌表现中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就很有价值。以下举李贺的《梦天》和李商隐的《谒山》为例，说明陈先生因为说透了李贺的构思诀窍，他对李贺一些诗就有不同寻常的精彩解释，而且能对一些历来不得确解的李商隐诗提出合理的新解。

梦 天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
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
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陈先生对这首诗的分析极其精彩：“不同于一般虚无飘渺的游仙诗，它不但怦然如真地描绘了月宫情景，同时还明晰地描绘了自月上回望、所见九州的渺小和尘世变化之速，出奇地给予了广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以形象的表现。”奇妙的是：它既清晰地描绘了月宫中的老兔、寒蟾，云楼、白壁，和仙人们在桂树下相逢的情景，又让人看到这幅真实的月宫图，是一个在天上碾压着露水的闪着湿润的光芒的团团玉轮之中展现的，正因如此，诗才能采用从高空下瞰的视角，使时空的变化也成为可纳入视野的景象。

谒 山

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
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

明清诗论家都说此诗想像“极奇”，但“未解其旨”，不知它说什么。陈先生指出：第一句是用西晋傅休奕的《九曲歌》“岁暮景迈群光绝，安得长绳系白日”的意思，说白日西驰，无法阻止。第二句是用孔子叹息逝者如斯夫的意思，说流水东逝，恨随着云生。第三句用麻姑三见东海变桑田的故事，假定东海是属于麻姑的，可以购买的。第四句从李贺《梦天》的“一泓海水杯中泻”点化而来：海水既然像一杯水，如果把一泓海水买下来，那不就像一杯春露吗？也就是说，如果使海水变成一杯冰冷的春露贮藏在杯中，使太阳无处藏身，江水也没有归宿，那么时光就不会流逝，人也不必为此悲伤了吗？陈先生批评李商隐把李贺的这种构思用得过分，造成诗歌晦涩难懂的毛病。不过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这种奇特思路的走向。较早从麻姑眼里看人间变化的是顾况。他的《古离别》写道：“西江上，风动麻姑嫁时浪。西山为水水为尘，不是人间离别人。”在世人看来，西江之浪从麻姑出嫁的时候起就一直没有变化，所以说风吹的还是麻姑出嫁那时候的浪水，可见江山是何等长久；但是西

山变为水水又变为尘的变化,就不是人间的离别之人所能见到的了。可见人生的短促。顾况是从人间沧海桑田的变化着眼,以普通的生活经验揣度神仙眼里看到的人世变化。李贺的《梦天》正是将顾况的这种思路演绎得更加明确。李商隐则把这种想像更加坐实,干脆把神仙的永恒说成是他们可以掌握沧桑的变化,也从人间买卖和用杯子贮水这样的生活经验出发,把海水想像成可以藏在杯子里的一杯春露,藉此挽留时光的流逝。时空的永恒和人生的短促这对矛盾,是从汉代以来就不断歌咏的诗歌主题。到中唐以后,在一些不得志的诗人手里,随着对这种矛盾的感受进一步强化,前人的奇思被后人不断发展,表现艺术也越来越丰富多样。类似以上例证的诗还有很多。

四、运用错觉和幻觉

早在齐梁时代,就有人注意利用错觉和幻觉来加强形象描写的逼真感。比如梁简文帝萧纲的“水纹城上动,城楼水中出”(《开霁》),为了表现雨晴后水的清澈、倒影的清晰,把错觉写得很真实:城楼从水里冒出来,水纹就像在城上晃动。又有用幻觉来强调感情的,如王僧儒的“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夜愁示诸宾》)从心理紊乱造成视觉错乱来写他的愁思之深,在当时非常新奇,“看朱成碧”几乎成了常被后人引用的成语。当然齐梁诗比较平直,构思虽然奇特,却是一看就明白。

用幻觉有很复杂的,以南宋词家吴文英为例。吴文英词的构思受李贺和李商隐的影响很深。我们来看他的两首名作。一是他的《八声甘州》的前半首:“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时鞞双鸳鸯,廊叶秋声。”这首词写他与幕府诸公游苏州灵岩的观感。灵岩在苏州市西,上有春秋时吴国的遗迹。第一句写登上灵岩,只见长空浩渺,四望无边。接着问哪一年天上掉下一颗大星,化作苍翠的山林,美女的公馆,以及没有完成霸业的吴王的宫城。这里用金屋藏娇的故事形容灵岩山上吴王夫差为西施建的馆娃宫。箭径指采

香径，据说吴王在香山种香，让美人在溪水里划船采香。从灵岩望去，一条溪水笔直如箭，所以俗称箭径。“腻水”指宫女们把洗剩的胭脂丢入水里，使水变得腻腻的。“染花腥”指花也染上了水里的脂粉气味。鞞本来是没有后跟的拖鞋。这里用作动词，写宫女们趿拉着鞋。鸳鸯指妇女的鞋子。灵岩山有响屧廊，传说因吴王让西施们穿上木板拖鞋走路，在空廊里发出响声而得名。“廊叶秋声”说现在响屧廊里响着的是秋风吹落叶的声音。这前半片因灵岩之高而产生奇想，将苍山云树、吴宫遗迹都看成是天上长星坠地后幻化而成的。“箭径酸风射眼”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的句子，李贺写汉武帝的铜人被曹魏宫廷派来的人拆走，离开东关时，酸涩的风吹着眼珠，实际是写离开长安汉宫的悲伤，眼睛发酸。李贺写这个传说原是感叹汉武帝的昔盛今衰。吴文英把这个典故和现成的句子化入他自己观看采香径而产生的盛衰之感，便在写景中自然融入了吊古伤今的酸涩之情。“腻水染花腥”也是从李贺的“溪女洗花染白云”变化出来，身临其境地想像当初吴宫中的脂膏腻粉，使花至今都染有腥味。而最后把沙沙的落叶声当作屧响空廊，不但扣住了响屧廊得名的缘故，而且连听觉也进入了幻境。作者就通过视觉、嗅觉、听觉造成的美景与幻觉相融合的境界，借助现实生活经验将历史古迹还原，又由一个“幻”字，总领，形象地表达了吴宫遗迹在游客心头所引起的历史虚幻感。这种构思方式来自李贺和李商隐，用在词里，又觉得新鲜。又如他的名作《风入松》：“西园日日扫林事，依旧赏新晴。黄蜂颠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写物是人非之感。看到黄蜂扑向他思念的女子以前玩过的秋千绳，竟疑以为是被女子纤手的香气所吸引。手上的香气当然不会长久凝结在绳子上不散，像这样通过幻觉把眼前景致和往事融成一片，只是把作者的痴情写得更深切而新奇而已。

以上几方面都是因强化心理感觉而采用的表现手法。奇特的构思产生新颖的表现，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因为中国诗词的题材和主题有一种持久的承传性。同样的内容主题要写出新意，必须借助构思和技巧的创新。而从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随着表现的愈趋深细和追求新变，也必然会愈益深入内心感觉。各种现代艺术流

派的产生，也起因于此。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以上所举诗例的“奇思”已颇有现代艺术中抽象派和印象派表现的意味。清代诗论家叶燮已经觉察到这种现象，但不能用确切的术语把它表述出来，只是把它称之为“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原诗》）。这些奇特的表现确实很难用风格、意境等常用的概念去分析。而要说清这些艺术表现中的道理，又要对诗歌有真正的领悟。仅仅知道一点现成的理论，是不可能深入理解作品的。理论应当来自丰富的创作实践和较高的悟性。古典诗歌艺术的研究要有一定深度很不容易，光写艺术研究容易被视为软学问。其实真能自己从诗歌创作中总结出前人没说过的道理，这学问比考证更难。我们看上一世纪的诗歌艺术研究中，有几个人能超出明清诗论的现成术语，发明一些前人没说过的道理？实在数不出多少，这就可以见出有水平的诗歌艺术研究之难。林、陈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启发我们从创作实践中去发现和总结理论问题，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向上的正路。

女性诗歌：“误解小词典”

周 璜

周璜，著名女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内第一家女性诗歌刊物《翼》的创办者。勤奋而自觉的诗艺训练使得她能够把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明确的个人立场转化为推动写作的内在动力，而以这种力量为核心，一个知识者内心生活的清晰秩序和容纳进诗歌的炫目的现实背景形成了饶有趣味的对峙。

对我而言，“女性诗歌”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它不仅是女性的集合，是诗歌的集合，而且也是一种描述话语的集合。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和许多概念、许多词语迎面相撞，我们必须考察这些概念的来历、背景，以及它们运用的范围。需要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体认我们对它们的信赖程度。要不然，由此展开的交流就会出现混乱——这里所说的交流不仅指规范而严肃的学术研究，也包括与此有关的街头闲话或者未名湖边轻松的漫步讨论。前不久，我有过这样的经验。一个新认识的朋友问我：“周璜，听说你是研究女性诗歌的。”

我答：“是的，我确实对它感兴趣”。

他问：“那么你一定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啊？”

我反问：“是又如何？”

他又问：“你是什么样的女性主义者？”

我反问：“那你认为的女性主义者是什么样的呢？”

他答：“我认为的女性主义者就是女孩子欺负男孩子”。

我回答：“那我不是这样的女性主义者”。

当然，这差不多是个玩笑，但它也能说明人们对女性主义的了解程度。因此，为了避免一种自言自语或是一种交流上的困难，我想学一学米兰·昆德拉，首先为我们的讨论议题——“女性诗歌”

编一个“误解小词典”。

词条一：翟永明

在“女性诗歌”的批评话语中，“翟永明”已经成为一个关键词，一个象征，一个传统。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说，“翟永明”这个名字与“女性诗歌”概念直接相关，正是这个名字使我们今天的话题成为可能。因为没有她诗歌中的“女性意识”的集中体现，我们今天谈论“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就可能无所依凭，或者也许只能依凭译介的一些国外女性主义文学观念来完成。早在十五年以前，当人们读到翟永明的组诗《女人》的时候，也许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一点。男性批评家唐晓渡属于这有限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评论组诗《女人》的时候，敏锐地发现并指出“女性诗歌”的存在可能以及翟永明诗歌的精神意义。他称组诗《女人》“启示了一种新的诗歌意识”。确实，组诗《女人》的诞生对于翟永明而言，显示出诗人创造力的惊人爆发的一个阶段，它的整体性和成熟感，奠定了诗人翟永明在汉语诗歌中的坚实位置。

从个人经验角度出发，我自己承认，无论何时何地何种语境下，我读翟永明的诗歌，不管是她80年代的作品，《女人》、《静安庄》、《死亡的图案》、《称之为一切》，还是90年代的《咖啡馆之歌》、《莉莉和琼》、《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小酒馆的现场主题》等等，长诗《黑夜里的素歌》，以及最近两年来写作的大量短诗，我都能感受到诗意的愉快。我在80年代读到组诗《女人》的时候，大约是大学三年级，就无保留地喜欢这组诗。与当时活跃于诗坛的其他诗人相比，翟永明对我更具吸引力。那时候，我总是在杂志上寻找她的诗以及有关的文章来读。可以说，我几乎及时地读遍了翟永明发表的作品。我也追踪阅读另一些诗人的创作，但不少人的写作到后来总会让我失望。翟永明从没有使我失望过。翟永明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她不重复自己，她的诗始终有一种激发力和考验力，她总会给读者带来新喜悦。

阅读过组诗《女人》以及翟永明写于同一时期的短文《黑夜的

意识》的读者都可领会到，这二者堪称“女性诗歌”这个概念在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场域中诞生的重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看，唐晓渡所撰写的分析组诗《女人》的短文《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只能算是对前者的一种补充阐释。但此后，“女性诗歌”这个词的涵义却被简约化、固定化了，尤其当翟永明的诗歌带动了一批女诗人的写作意识之后。80年代后期，“女性诗歌”写作一度繁荣，涌现了像唐亚平、伊蕾、张烨、林雪、海男等诗歌中性别意识鲜明的女诗人，同时，也有像王小妮、陆忆敏、张真、虹影等性别意识可能相对含蓄，风格各异的女诗人。事实上，这些女诗人的写作有着不尽相同的动力与出发点，我们所看到的有关性别意识的表述更多的是在对写作的批评总结中获得的。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不成熟的批评话语往往容易蜕变成衡量写作的标准。简单地讲，事情变成了这样，好像女诗人似乎必须写出像女诗人写的诗。

在15年后的今天，有关批评文章，在谈及翟永明的写作时存在着两种十分有趣的分歧，简单地说，一种观点认为：90年代以后她的诗歌进步了，而另一种则认为90年代以后她的诗歌退步了。因为她的诗总是与“女性诗歌”的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女性诗歌”的写作面貌，比如“黑色”这个意象对于一个时期的“女性诗歌”写作具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后来的一些评说者舍本逐末，割裂诗歌文本与诗人创作历程的关联，用分类学的简捷划归行动代替对诗人精神历程的细微考察。因为说实话，分类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方法，其实也是很困难的方法。迄今为止，有一种简便的分类法在研究翟永明的诗歌写作时起作用，即把她的写作划到由她的诗歌写作衍生而出的“女性诗歌”阵营中；因而，她的诗歌既成了旗手，也成了束缚、陷阱与牺牲品。褒扬者称她90年代的诗歌超越了性别；贬抑者则认为，她90年代的诗歌失去了80年代的感召力，进而认为她的写作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依附性的写作。

最近，我在网上读到两篇关于90年代中国“女性诗歌”的文章。梦亦非认为进入90年代以来，翟永明一改自己的诗歌观念和风格，并切合了90年代诗歌的叙事风格，过去她那种自然的写作方式被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叙事所代替。但他更愿意把这种转变看成在同

时代诗人内部的影响所致，90年代初已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叙事作品，叙事性写作在知识分子写作那里是个公开的秘密，而翟永明一向被视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名，所以，从写作的惯性来说，梦亦非认为翟永明由前期的普拉斯风格一下转为自发的、自省的叙事风格，这种转变是受到了其他的男性诗人影响的缘故。按此思路，梦亦非认为转变之后的翟永明较出色，90年代她的诗更加接近诗歌的“个人写作”的意义。虽然梦亦非是肯定了翟永明90年代后的写作，但这种肯定的思路和逻辑显然很成问题。另一位女诗人鲁西西在去年的“中国南岳90年代汉语诗歌研究论坛”上发言，列举了几位在她个人的写作历程中影响过她的几位当代女诗人，提到了翟永明。她说80年代她经朋友介绍阅读翟永明的诗，但她发现翟永明的诗好像是在男性话语比较纷呈的时候，起了一个服装上的变化作用，好像只是换了一个穿着女性服装的角色，她试图依靠自己的单薄的身影跟男性对抗，对她对抗得怎么样，姑且不论。鲁西西觉得翟永明除了把黑白变得带有女性色彩之外没有任何背景，只有一些男性注目的眼光。翟永明为了和他们对抗才写了些诗，至于那时人们说它像普拉斯，鲁西西却也没有感觉出来；至于最近有诗评家说，翟永明90年代的诗歌是把“普拉斯还给了普拉斯”，因为没有看到她像普拉斯，也没有看到她是怎样还给普拉斯的。翟永明的写作到了90年代以后就越来越显得苍白了。

我当然是不同意这两种非常简单的评价，这种判断与陈述的背后显然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其中之一，对我来讲，可能首先是阅读问题。我不好怀疑这两位诗人的阅读量，也许他们读了翟永明所有的作品，也许他们也读了同时期所有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但他们只停留在一种感性的了解层面上，而没有经过十分系统而深入的阅读，并且他们的好诗标准也不明确。阅读诗歌对诗人来说，不单是一种知识上的积累，更多的是一种认识能力的获得。阅读诗歌对于诗歌写作者来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诗人的个人感性——不同于小说家，也不同于政治家的个人感性，所以，我们能够在海子的诗中读到亘古的大地的辽远，天空的明净，以及精神力量的聚合。而如果说我们在西川的诗中读到白日梦似的精神，神游的喜悦，智慧

的来临；我们能在欧阳江河的诗中读到繁复眩目的词语的欢乐；能在臧棣的诗中品味到汉语的柔韧性，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其间的奥妙联系和一首诗的整体性，匀称，绵密，复杂，清晰；……那么，我们同样能从翟永明的诗歌中读到自由的创造激情，对经验的反复拷问，内省，对美的形式的执著追求。所以，阅读诗歌实际上是一个发现不同趣味的过程，像翟永明这样的诗人，她曾经在一些文章里谈过，也私下里跟我谈过，她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叶芝。像叶芝一样，翟永明也是一个不断能够自我更新，不断能够在写作的不同阶段寻求到自我变化的诗人。而刚才提及的两位诗评家，在谈到翟永明的诗，特别是在考察诗人的创作阶段性历程时，没有能够更加细致地考察诗人精神历程的复杂转变方面，更没有敏锐地抓住诗人作品中的感性因素。

从性别批评视点看，对翟永明诗歌的误读与曲解非常有代表性。因为，一方面女性诗人写作中的性别问题是难以回避的，同时，把“女性诗歌”牢牢框定在一个被简化和粗鄙化了的性别阐释模式中，就极其危险。

词条二：自白话语

第二个条目也是涉及“女性诗歌”的一个关键词，自白话语。“自白话语”这个词可能和80年代中后期对翟永明诗歌语言风格的批评相关。一些评论家谈及普拉斯对翟永明诗歌的影响，唐晓渡在文章中还举了一段诗来比较这两位诗人在精神上的某些切合。大家知道，普拉斯是美国当代诗歌中自白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中最有才华的一位。自白派是在美国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一个诗歌流派，它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几位：罗伯特·洛威尔、西尔维亚·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和约翰·贝尔曼。自白派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诗人中有三位在非常年轻时就自杀身亡。“自白”常常是非常风格化的描述，表明诗歌切近个人的生活并具有非常直接的表达风格。但实际上，“自白话语”这个词语在中国批评界关于“女性诗歌”的批评运用里面渐渐成了一种缺陷性的描述。因为，自白作为一种

看来，自白话语所基于的自白风格本身也可能从内部拓展出一种写作的方向。

词条三：性别意识

在十多年来的女诗人的写作中，性别意识的强化是不争的事实。此间不仅有翟永明等女诗人的影响，而且也包括了新诗人对个人经验的开掘。但即使是翟永明的短文《黑夜的意识》和组诗《女人》，也不仅仅显示了单纯的性别意识的自觉。换句话说，性别意识是与其他方面的感性认知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我们分析“女性诗歌”中自觉的性别意识时，我们不能回避由文化史所构造的各种权力关系，性别立场中包含着种族的和阶级的冲突。

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去年我参加的一个“20 世纪中国妇女现代性和机遇”（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研讨会，当时我提交的一篇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当代“女性诗歌”的。当时的发言是有评议人的，我们小组的评议人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女学者。她对我的发言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她说我谈论的全都是诗歌，为什么我没谈及阶级、种族的问题。她认为，我的论文的不成功之处就在于我没有谈论这些问题。我当时非常沮丧，虽然心里也是不服的。我当时想到，在中国，女性遭到了很多的压力和蔑视，能从事写作的阶层毕竟是一个知识阶层，但“女性诗歌”遭受的仍然是受冷落的命运，女性在诗歌方面的创造力不被重视或肯定。阶级问题和种族问题似乎离这很远。后来，我意识到，其实她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谈的只是“女性诗歌”，而我们应该呼吁更多的批评家、学者来关注女性写作。我的论文中谈到了一些我认为是重要的当代女诗人，但她们被忽视了，从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中期，我们看到当代诗人里面几乎没有出色的女诗人，能够和郭小川、贺敬之等男性诗人一样，坚持写作，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位女诗人——林子，她在 50 年代后期写作了一组情诗，但到 1980 年才得以发表。她属于一个被埋没的女诗人。另外还有一个女诗人，灰娃。这位女诗人也是很富有传奇色彩，她不是文学专业出身，她写作完全是为了摆脱她自己的精神焦

虑。因为在“文革”期间她得了精神病，得病的原因是她的穿着、行为异于别人，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压力。在病中，她找到了诗歌，她全部的诗集出版于90年代。以上两位女诗人终于被我们从历史的尘土中挖掘了出来。我忽然意识到那位台湾的女教授对我论文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我们挖掘不同历史时期的女诗人的时候，在我们呼吁大家关注“女性诗歌”的时候，我们也无法逃避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必须把诗人的创作置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之中。根据我自己在学校里学习（因为我也刚刚从北大毕业）和阅读的经验，我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一直都在困扰着我的老问题，这就是“文化性”和“本体性”的冲突。我发现，我曾读到的一些文章写得很“漂亮”的批评家，他们在批评中列举的一些作品都是我认为没有多大文学性的。这样的批评有意义吗？我认为介绍和列举某些作品必须参照这些作品的文学性或艺术性。在谈论女性作家的作品时，涉及女性主义视角，我们就会发现，性别差异是我们讨论“女性诗歌”时难以回避的问题。我非常幸运曾有过一次机会与戴锦华老师交流这方面的问题，戴锦华老师的观点对我来说很有启发性。她认为：“我们谈论女性时更多谈到的是差异，所以变得很温和，其实不然。整个文明、文化的建构其实都是一个不包容差异，而是把差异绝对化、等级化的过程，并非仅仅说我们是平等的人，只是性别不同。相反，说到不同时，就意味着我优你劣，或你优我劣。所有文明都如此，我们在谈女性差异时，也时刻要警惕不要把性别差异绝对化，因为性别差异本身又包含了很多差异，都是我们要思考的，如阶级差异、种族差异。这些其实还是非常大的差异，而那些具体而细微的差异，如男性的差异和女性的差异，女性诗歌在多大程度上来包容女性问题，或女性诗歌要不要包容和负载女性问题，这是否是它的首要命题等等。”我引用了戴锦华老师的话，是因为她说出了我想说出的话，而且，分析得更加清晰、透彻。所以，回头再看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梦亦非的文章。作者在谈到并肯定翟永明90年代的诗歌创作的时候，他有一句判断说，她90年代的诗歌已经超越了性别。“超越”实际上是一种男性话语，试问，为什么一个女诗人或女作家要超越性别呢？男作家为什么没有一个需

要超越他们性别的问题呢？换个角度看，性别意识在“女性诗歌”写作中就是一个对女性原来的性别派定具有超越性的认同。

再回到诗人臧棣对一些“女性诗歌”写作倾向的批评，比如：“当代女性写作经常把对白话语的意识同对诗歌的意识混同起来”。我不禁想问：“什么样的意识是诗歌的意识呢？”是的，在一些女性诗人那里，因为迷恋于一种自白式的自我表达，她们往往可能忽视了诗歌技艺的多样性，忽视对诗歌技艺的锤炼，自白意识演变成为一种词语狂欢，一种以想像力操纵抽象语词的内在磨合，这样的写作很容易乏力、枯竭。但也许，也还有另外的可能，性别意识并不必然演变为性意识，因为性别意识、立场与女性经验中的各种压迫关系紧密相关。事实证明，90年代以来不少女性诗人拥有这种警惕性，她们注重日常经验，注重为个人感性找到恰切的诗的形式。因此，我们能够在一些新诗人的优秀诗作中读到不仅是被狭窄化地理解的“女性意识”，而更多的是与我们的当下经验的关联。

一开始我谈到“女性诗歌”是一个集合，是诗人的集合，组织，很难说它是一种阵营，或者说它只是一种空间的阵营。它是优秀女诗人的集中但不是诗歌写作集中营，它是需要不同的女作者甚至男性作者参与其中的阵地，它应该是开放的。我在这里想考察一下80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批评的话语是怎样构造“女性诗歌”这个概念，并使之不断地狭隘化、主观化的。

我们知道，事实上，翟永明的诗歌写作对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的影响较大；而且她在写作中遇到过的很多问题，也是许多女诗人都遭遇过的共同问题。批评话语在构造“女性诗歌”的时候对许多女性诗人产生了一种压力。比如说唐晓渡的另一篇文章叫《谁是翟永明？》，实际上他也就是指出了对女性诗人的这样一种认同的压力。他谈到他在80年代认识翟永明的时候，介绍他来读翟诗的人这样说：“来读一下这位诗人的诗歌吧，这是我们四川的小舒婷。”可是后来，又有批评话语把她构造成了“中国当代女诗人的代言人”、“普拉斯的中国版”。我记得在认识了翟永明之后的一次交谈中，翟永明说她一度很害怕在诗歌中用“我”字，因为用了这个“我”字好像就变成自白诗了；如果要写到“我”字就变成了一种自白性

的写作。翟永明也曾在有关文章中不只一次地提到：“我首先是位诗人，然后才是位女诗人。”这种表达是非常有意思的，实际上它显示了周围的环境对诗人的压力，这就是一种性别的压力。

我想引用戴锦华教授所谈到的一些关于“女性诗歌”的观点，当时我们谈话的时候还有几位朋友在场，包括一位男诗人，他很有质疑精神，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女性在写作时如何确立自己的角色呢？”“是要按照我是一个人的角色来写还是其他？”戴教授回答：“首先我就质疑‘人’的存在，因为这个世界上只存在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不存在本质意义的‘人’。我们反对‘人’作为一个集合，但同时我们建立了另一个很大的集合，那就是女人的集合。女人相对少，我们并不是将男人作为一个相对的集体，而是作为一个相对的权力集团，作为一个权力集团的既得利益者，而女性则是在这样一个视野中被压迫的群体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是女人反抗男人，但是我们其实是女性反抗男权。而且，我相信当女性反抗男权的时候，她会揭露很多男权自身的漏洞、裂隙和压抑以及男权自身对男性群体的压抑。但这样的现实仍然不能改变男性作为压迫群体分享权力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不排除女人对男性群体的批判以及女人对男人的反抗。但我们最终是要颠覆一个暴力的、不平等的结构，而我们相信我们的理想——这个权力结构被颠覆，是使人获得解放。”她的这种观点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们之所以在研究时一直用“女性诗歌”这个名称，动因就在于对于历史和现实状况的体认和反抗，有一种性别意识作为前提，这种性别意识首先当然也是最强烈地由女性诗人感知。

从80年代以来，关于“女性诗歌”的批评话语本身，就存在着许多误导和曲解，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对“女性诗歌”的理解。因为翟永明的影响，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女性诗歌”的写作潮流。1988年出版了一本《中国当代女青年诗人诗选》，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收录了活跃在当时中国诗坛上的女诗人一共64位，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诗人阵地，显然这本诗选并没有突出女性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性别自觉，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女诗人的创作在当时还处于一种传统的性别秩序之内。戴锦华教授在她的另

外一篇分析 80 年代的女性文学的文章中谈到：女性的边缘身份与当时 80 年代知识分子的边缘身份是契合的，使得其潜在的女性话语被男性精英知识分子所接纳，在 80 年代的一系列中心冲突中，女性话语进而被阐释和接纳为主流叙事。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80 年代“女性诗歌”虽然一度繁荣，却仍然是受批评的冷遇的。在 1988 年出版的由男性诗人主持的记录中国 80 年代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中，我们看不到一个女诗人的群体集合，也许现实中有，但没有被男性编选者看中。这本书收录诗人 210 多人，但女诗人大概占 1/20。或许我们应该强调指出：“女性诗歌”在 80 年代的辉煌时段正是在 1986—1988 年之间，除了上面提及的翟永明的部分诗歌外，还有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伊蕾写于 1986 年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等长诗和组诗。

回顾 80 年代初中期整个女性文学研究，甚至都处在更为滞后的状态之中。这些评论往往纠缠在女性文学概念的界定和所谓女性自我的问题讨论中。十分有意思的是，我们会看到，参与讨论“什么样的自我是女性自我”的都是男性评论家，真正有着性别立场的，更有效的女性主义参照并没有被引入到女性文学研究中来。而 80 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话语对“女性诗歌”的误导也非常明显，它被误导为一种女性性别本体性回归，从而忽视了女性的现实经验与女性意识的批判性。比如说“自白话语”，无疑是一种混合着批评与轻视的温和复杂的男性立场的批评话语。从“女性诗歌”这个概念所获得的含义来看，或许我们可以把这几位诗人的写作看作 90 年代以陈染、林白等人为代表的“个人写作”的先声。

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当代女诗人写作中的性别自觉以及一定意义上的独立的个人依然被放逐在阐释的空间之外，“女性诗歌”依然只是狭窄的场地，依然不能供女性诗人驰骋其想像力，更不能激发女性诗人的创造力面向历史和现实文化进行自我开掘。实际上自 80 年代以来有关“女性诗歌”的评论一直包含着男性主观的俯视姿态，其中夹杂着男性对女性自身写作能力的蔑视，诗歌评价标准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以及通过批评实践对女性意识巧取豪夺式的改写。首先，我注意到，在批评中，存在着对“女性诗歌”和“女性

意识”的简单化的理解。仿佛一种套路，这是一种非常男性化的自以为是的方式。

80年代脱颖而出的一批女诗人的写作确实具有一种共同性，但是其中对性别身份的本体性回归，对于女性经验的开掘，甚至也可能包括对女性意识的开掘，以及对女性书写风格的尝试，在男性批评话语中却变成了十分简单的几条特征，而且被几条包含着鄙视性的词语加以概括，比如“性而上”、“自我性感的工具”、“死亡冲动”等等这些词。这些评论家所关注和发现的根本不是女性诗人在创作中真正具有的实践性和创造性。我可以举个例子，1995年5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当代女性诗歌透视与展望”的研讨会。与会的诗人在对“女性诗歌”、“女性主义诗歌”之类概念的理解上争论不休，他们的争论固然也有助于理解有关概念的内涵，但同时也透出了对“女性诗歌”理解和研究的不足。在讨论中，关于“女性诗歌”的性别意识、自白话语，又出现了大量的批评，因为此类的批评太多了，引起了参加会议的荷兰汉学家贺麦晓的感慨。他说，长期以来男性话语占统治地位，“女性诗歌”是从长期被压抑和忽视的另一角度另一情感世界用新的话语方式进行的写作，无疑丰富了诗歌样式，应该尽量地让她们写下去，而不要用一种男性立场来横加指责。我们听到了太多的中国批评家对当代中国“女性诗歌”的批评，所以，他发出的感慨不得不让人感到一丝苦涩。

《大话西游》、后现代文化 和“新新人类”

夏学璠

夏学璠,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理事,北京市心理卫生学会理事,北京市社会学会理论组负责人,《中华工商时报》专栏主持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组织管理、社会心理学、群体动力学、社会政策分析、项目评估可行性研究、企业发展设计、科学决策、战略规划等。学术经历:197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88年12月至1990年9月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学者;1992年2月至3月英国诺丁汉大学与香港理工学院学术考察;1993年2月至3月英国诺丁汉大学考察。

一、给一个话说“新新人类”的理由先

说“新新人类”需要一个理由吗?不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需要吗?不需要吗?大家不过是研究一下嘛,干吗那么认真呢?需要吗?(掌声,笑声)

这种说话方式是“新新人类”所特别喜欢的,包括本小节的标题“给一个话说‘新新人类’的理由先”也体现出“新新人类”的语言特征。其实,这种说话方式我们的古人类也很擅长,如辛弃疾在他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曾有这样的词句:“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对那些没有接触过“新新”文化的读者来说,看到这些文字或听到这种说法也许会感觉不太习惯。但是不要紧,只要您愿意入门,慢慢就会习惯的,这叫做“入乡随俗”、“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嘛!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新新人类”像一只幽灵一样在东方大地

上飘荡。说她像一只幽灵，因为她居无定所，飘无定向，来无影，去无踪，聚则成形，散则成气。但是，相当多的人还是看到了她世俗“法象”的显现，且在神州造成了不大不小的影响。

“新新人类”的传统“法象”，男性有香港“四大天王”，女性有王菲、张惠妹等所代表的精神画像。最近，“小燕子”和“至尊宝”相继成为“新新”族狂热崇拜的次新、最新偶像。像“小燕子”那样自由飞翔，同时又像“至尊宝”那样自尊坚固，这就是“新新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家园，也是“新新人类”所代表的“新新”文化的灵魂和精髓。

今年2月，当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就“新新人类”问题采访我时，我还不太情愿承认有“新新人类”一族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新新人类作为一个社会范畴存在的集群意识和文化自觉尚不明显；另一方面，我还担心由于主观标定的不当而引起的“旧”与“新”、“老”与“少”之间的隔阂与对立。但总的基调是明显的，即对新生代应该采取关怀、教育和保护的态度。记得在采访结束时，我引用了新人文主义者阿尔文·巴特的话说：“与整代人作战绝对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1]

时间过了半年又两个月，随着我接触到的关于“新新人类”材料的增多，原来关于“新新人类”没有形成“文化自觉”的观点，现在根据其发展需要改变了。“新新一族”已不再仅局限于外现的行为特征，例如，把头发染成棕色，穿奇装异服，像冰美人那样扮酷，等等，而且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群体自觉和亚群体文化，这就是说，她作为全新的文化已经从整体上浮出水面。从作者所掌握的最新材料看，“新新人类”在文化上比人们想像得要“自觉”、“自为”得多，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习惯语言，生活理念和行为方式等一整套哲学、文化，而且还发展出自己的形象大使、群体自我界定和文化代表网站。

“新新人类”文化的代表网站 Xday 负责人说，“新新人类”就是指在毛主席逝世后诞生的一族。但是，作者认为，即使这一代人从年龄上符合“新新人类”的定义，但是从文化上说，他们也并不全是“新新人类”。在这一代人中至少还有普遍为新新人类所不

齿的“上海宝贝”这类人，在新新人类看来，她们连“另类”也不如。

请听新新人类的形象大使“小燕子”在《还珠格格》II部中的一段唱：

有一个姑娘，她有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
 没事吵吵小架，反正醒着也是醒着；
 没事说说小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有一个姑娘，她有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
 喔！喔！喔！是哪个姑娘呀？HA 我就是这个姑娘（嘿）！
 整天嘻嘻哈哈，看见风儿就起浪；
 也曾迷迷糊糊，大祸小祸一起闯；
 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喔！喔！
 更曾轰轰烈烈，拼死拼活爱一场！
 我就是这个姑娘！（掌声，笑声）

当你听到这首歌时，你还能说“新新人类”离我们很遥远吗？与其说这是一部电视艺术插曲，不如说它是一篇“新新人类”宣言！“新新人类”不仅是一种艺术形象，而且我直觉地感到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和周围。当“小燕子”飞遍长城内外，《有一个姑娘》传遍大江南北的时候，作者真的不知道，是“小燕子”唤醒了“新新人类”的类群体意识呢？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新新人类”造就了“小燕子”？可能是二者的交互作用才使得“小燕子”这样火爆，也才使“新新人类”突现于地平线之上！尽管有些新生代嘴里说不喜欢“小燕子”，但她们的心却是与“小燕子”相通的。

另外，在各种网站上，我们也可以到处发现“新新人类”刚来访问过的足迹，什么“我特故我在”啦，什么“我存在，我行动；我存在，我主张”，什么什么“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啦，什么“马马虎虎，快乐人生”啦，等等，这些口号不仅反映了“新新人类”存在哲学和行动理念，而且是“新新人类”茂盛存在的证明。

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

都是合理的。作为一位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作者要作以下补充：凡是存在的，都是可知的；凡是可知的，都是实证的。认识 and 发现人类社会存在，倾听他们在“门后”发出的哪怕是十分微弱的声音，这是社会学家的学术使命和社会承诺。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新人类”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凸现于地平线之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社会学工作者怎能对她的存在无动于衷、莫然置之呢？

二、《大话西游》、后现代文化和“新新人类”

后现代文化，主要是它的电影、舞蹈、文学、美术和模特表演不断为“新新一族”推出新的时尚形象大使，这种时尚形象热潮真是一浪高过一浪，《还珠格格》的热潮还没有完全退尽，《大话西游》的热浪又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新新人类”的类意识同时因《大话西游》而得到加强，“至尊宝”成为他们的又一个至爱神话。在《大话西游》里，观音还是那个观音，悟空却已不是那个悟空，连唐僧也变了，变得入世、随和和后现代了。他们三个人一上场的对话，典型地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文化价值取向：

观 音：孙悟空，你这个畜生，你本来答应如来佛祖护送你师傅唐三藏去取西经，你居然跟牛魔王串通起来吃你师傅，你知道不知道你犯了弥天大罪？

孙悟空：少啰嗦！你追了我三天三夜，因为你是女人我才不杀你，不要以为我怕了你了！

唐 僧：悟空，你怎么可以这样跟观音姐姐讲话呢？

这段对话一开始就为三个人物各自定了文化基调。如果说观音代表传统文化，悟空代表现代文化，那么唐僧在这里则是后现代的代表了。虽然“新新人类”喜欢孙悟空反权威、反说教的叛逆精神，敢爱敢恨、敢骂敢打的率直作为和一万年承诺的真爱情，但是，对它的化身“至尊宝”强烈的控制欲、仇恨欲、恶欲癖和形而上学的信口开河，恐怕他们也是不敢苟同的。按照“至尊宝”所代表的现

代理性逻辑，爱一个人怎么能不需要对他（她）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呢？

真正震撼“新新人类”心灵的不是“至尊宝”的爱恨分明、爱有等差的分别之心，而是以菩提和唐僧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爱无等差”之心。在盘丝洞，菩提和“至尊宝”有这样一段对话：

菩 提：紫霞在你心中是不是一个惊叹号，还是一个句号，你脑袋里是不是充满了问号……

至尊宝：紫霞只不过是一个我认识的人！我以前说过一个谎话骗他，现在只不过心里面有点内疚而已。我越来越讨厌她了！我明天就要结婚了，你想怎么样嘛？

菩 提：有一天当你发觉你爱上一个你讨厌的人，这段感情才是最要命的！

至尊宝：可是我怎么会爱上一个我讨厌的人呢？请你给我一个理由好不好？拜托！

菩 提：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至尊宝：不需要吗？

菩 提：需要吗？

至尊宝：不需要吗？

菩 提：需要吗？

至尊宝：不需要吗？

菩 提：哎，我是跟你研究嘛，干吗那么认真呢？需要吗？（转身走了）

这段话以及这种思维方式是许多“新新人类”所特别喜欢的，殊不知把它们连在一起混用而忘记了它们所代表的不同文化形态，对上士来说可能代表一种文化境界，对下士来说则可能是一种文化糊涂。这段话典型地代表了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也可看作是现代性的自我分裂：“至尊宝”坚持现代文化的“理性”原则，追求“爱”的理由，而菩提则坚持后现代文化的“直觉”原则，提出“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这样振聋发聩的诘问，代表着后现代文化对“理性”的质疑和挑战！这种现代性的自我分裂首先反映在《大话西游》中的人物关系上，即许多人都有两个“自我”，

例如紫霞和青霞，春三十娘和白晶晶，铁扇公主和香香，孙悟空和至尊宝，……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菩提是唐僧的另一个“自我”。这样看来，与其说《大话西游》是在用后现代文化解读爱情，不如说它在用爱情诠释后现代文化！这正是《大话西游》的微言大义！

你看，唐僧在整个《大话西游》里所说的话虽然不多，总共也不过十来句，且字字平淡无奇，但句句暗藏“玄机”，已成为“新新人类”的经典语录，例如：

唐 僧：你想要啊？悟空，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是想要吗？

后现代文化从本质上是反对“宏大话语”的，编者之所以把这部后现代主义的搞笑剧叫做“大话西游”，也许正是想要受众通过像唐僧这种被“至尊宝”称为“啰嗦”的“小话语”来发现其“微言大义”。

又如：

唐 僧：喂喂喂！大家不要生气，生气会犯了嗔戒的！悟空你也太调皮了，我跟你说过叫你不要乱扔东西，你怎么又……你看我还没完你又把棍子给扔掉了！月光宝盒是宝物，你把他扔掉了会污染环境，要是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那些花草草也是不对的！

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匀质、平等、和谐、圆通，这与佛家“物我两忘”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让唐僧扮演后现代文化的代表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你看他在这里，“啰嗦”一点，但是啰嗦得纯真可爱，句句在理！

再如：

唐 僧：悟空他要吃我，只不过是一个构思，还没有成为事实，你又没有证据，他何罪之有呢？不如等他吃了我之后，你有凭有据，再定他的罪也不迟啊！

不仅现代文化的代表“至尊宝”嫌唐僧“啰嗦”，这次连传统文化的代表观音也嫌她啰嗦了。唐僧“啰嗦”了吗？不！他表面上

看似啰嗦，实际上，他不过是打破了传统和现代文化习以为常的背景假设，公然向传统——现代文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话语挑战，促使现代性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失去时效而已。而这，正是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

最后再看：

唐 僧：唉，那个金刚圈尺寸太差，前重后轻左宽右窄，他戴上之后很不舒服，整晚失眠，会连累我嘛！他虽然是个猴子，可是你也不能这样对他，官府知道了会说我虐待动物的！说起那个金刚圈，去年我在陈家村认识了一位铁匠，他手工精美，价钱又公道，童叟无欺，干脆我介绍你再定做一个吧！（笑声）

这次轮到观音和悟空同时对唐僧说“闭嘴”了，并且他们同时用双手去掐唐僧的脖子，欲置唐僧于死地而后快。这里形象地体现了后现代文化所处的险恶环境 and 不幸遭遇。后现代文化时常被误作是现代文化的简单否定，因而受到现代文化的攻击；作为现代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或一个发展阶段，它又受到传统文化的反，尽管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向传统文化的一种复归。在这段话里，作为后现代文化的代表唐僧。他对传统文化的代表观音菩萨犯有大不敬之罪，又不被现代文化的代表“至尊宝”所理解，尽管在《大话西游》里，他始终是站在现代文化的代表孙悟空一边说话的。所以唐僧同时受到二人的夹击就不难理解了。不过观音毕竟定力高强，赶快把手缩回，忙说“罪过！罪过！”

这段话里有三个惊叹号，每一个惊叹号前表示一层意思，按“常理”说，唐僧说完了前两层意思就该停止了。虽然也冒犯了观音，但仍属于抗辩的性质，情有可原。但他还要继续说下去，唠唠叨叨些好像是不着边际的“废话”。作者原以为这是编剧为了搞笑而故意增加的噱头。后经仔细研究，发现其中另有文章。按照编剧对唐僧的后现代文化定位，后一段话是非说不可的，因为它不仅表达了唐僧对观音权威和法力的亵渎，而且也表达了后现代文化对现代文化的认同和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也许是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特征状态，“新新人类”在许多方

面也像《大话西游》一样把什么都解构了，但唯独没有解构爱情，信仰也没有解构。爱情在“新新人类”那里依然是崇高神圣的，菩提的一句“爱一个需要理由吗？”已成为新新人类的爱情宗教。他们对爱情的定义或诠释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爱是永恒的，不需要理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话西游》，特别是它的下部《大圣娶亲》简直就是“新新人类”的爱情宣言！《大话西游》许多关于爱情描写的话语，已经成为“新新”一族的口头禅。首先请看“至尊宝”的爱情表白：

至尊宝：不错。自从看到晶晶姑娘之后，我决定改过自新不再做贼，
为了表示对姑娘的诚意，我不要再看见以前的我……

“至尊宝”的初恋对象是一个叫“白晶晶”的姑娘，也就是白骨精。（笑声）只因五百年前与孙悟空惹下一段情缘，因此她怀着爱恨交织的心情来到五岳山，寻找孙悟空的托世“至尊宝”。想不到“至尊宝”对“白晶晶”也是一见钟情，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为了讨好白姑娘，“至尊宝”决心洗心革面，向她承诺从此不再做山贼了，可见爱情的力量是何其强大！

再看“白晶晶”的爱情宣言：

至尊宝：你中的毒越来越深，再不解会死的。

白晶晶：解了又怎么样，不开心长生不死也没用，开心就算只活几天也足够了。

这段话已经成为“新新”一族爱情生活的座右铭。

“至尊宝”的第二次爱情是与一个叫紫霞的少女之间发生的，也就是给他脚上三颗痣的人。如果说“至尊宝”与白骨精的初恋是一场喜剧的话，那么他与紫霞的再恋则纯粹是一场悲剧。当紫霞姑娘把从未离开己身的紫青宝剑交给孙悟空，孙悟空“嚓”的一声把宝剑拔出来看了看，又插入鞘中的时候，紫霞姑娘的心跳得很厉害，她暗自寻思，想不到自己的心上人居然是他！经过一番动人心弦的示爱和调情后，紫霞终于让“至尊宝”知道她的心上人就是他了，然后：

紫霞：“那我们大家立刻开始这段感情吧！”

至尊宝：好，就立刻开始！

紫霞：你先亲我一下！

然而，就在紫霞姑娘主动投怀送抱的时候，不知是“至尊宝”哪根筋不对，还是天意使然，“至尊宝”却百般拒绝与紫霞亲热的要求，最后竟然粗暴地一把把紫霞姑娘推开，这大大伤了紫霞的心。她心灰意冷，在被牛魔王强行掳去后被迫答应了牛魔王的求婚要求，但她一直对她与“至尊宝”的爱情抱有美好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念，因为她相信缘分和命运。

当“至尊宝”从蛤蟆精那里得知，紫霞曾经发过一个誓，如果谁能把紫青宝剑拔出鞘的话，就是她的如意郎君时，不觉惊讶和浑身一震，紫青宝剑从他怀里掉了出来。牛魔王说：“让我来！”紫霞一边抢先拾起宝剑，一连否认“没有这种事”，“这把剑谁拔得出谁拔不出根本没关系”。说完就往后院走去，“至尊宝”赶来找紫霞，紫霞突然拔出宝剑抵在“至尊宝”的咽喉上。这时“至尊宝”的画外音响起：

画外音：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 0.01 公分，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人将会彻底地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过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紫霞：你再往前半步我就把你杀了！

至尊宝：你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再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这时的“至尊宝”已经知道自己是孙悟空，担负着保护唐僧去取西经的历史重任，他明明知道自己与紫霞的这段感情不会有结果，但是他仍然坚持要再说“一个谎”。这样至真至诚的爱情表白怎么可能是谎言呢？如果说，那也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动听的谎言。对于紫霞来说，当她把“至尊宝”又变回孙悟空的时候，她不知道她与他的这段感情注定就是一场悲剧。后来，紫霞为保护孙悟空而被

牛魔王的钢叉刺中，临终前她依然无怨无悔地说：

我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的云彩来娶我，我猜中了前头，可是我猜不着这结局……

这就是说感情没有欺骗她，天意如此，她死而无憾！孙悟空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因为他一动人间真情，头上的金箍就越收越紧，苦不堪言。在这里，与其说是造化弄人，不如说是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在现代性那里，感情和理智、人欲和天理是不可能最终统一起来的，其结果只能是“存天理，灭人欲”，牺牲感情而成全理智。在这一点上，它和传统文化是一致的。

悲剧归悲剧，但它却给人以纯洁、完美、崇高、神圣的艺术享受。当孙悟空在七彩天空中抱着紫霞，倾听她最后的爱情遗言，然后痛苦地看着紫霞悄然飘逝的时候，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悲壮美场面！试问，在众多的言情作品中，甚至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如此至真至诚、至纯至洁、至神至圣的爱情颂歌吗？说句实在话，在这里受到感动的，不仅仅是“新新人类”而已！

三、后现代文化和“新新文化”分析

“新新”文化是以“新新人类”为主体的，体现出个性自由和多元化价值取向的亚文化形态。它是一种客观社会现实，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它都在那里实实在在地存在，并且演绎着人生的喜怒哀乐，品尝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由于“新新人类”有不同的生活模式和价值取向，例如，有“小燕子”和“至尊宝”为代表的“新新人类”，也有“小龙女”和“猪八戒”为代表的“新新人类”，还有“唐僧”为代表的“新新人类”，所以，以“新新人类”为代表的“新新文化”也呈现出多样的形式和斑斓的色彩。

从本质上“新新文化”属现代文化，从形式上它又好像是后现代文化，准确地说，它是从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的一种过渡形态。

不过，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说到底它依然是一种现代文化，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太强大的缘故，它主要发挥的仍是现代

文化的功能；而在全球文化环境中，不管它自觉与否，它已属于后现代文化的范畴。这种区别正像“南橘北枳”的区别一样。

后现代文化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或一种新形式，它不以反对现代文化为己任，而宁愿以挑战它的基本假设的形式来发展它，从而使它成为一种更加符合实际、更加人性化、更加富有人文色彩的思维方式。

按照杨伯翰大学的 G.M.沃勒教授，现代主义，构成大多数学术科学坐在其上的这把“交椅”被描述为有四条腿（或信仰）：（a）单词、观念和事物是截然不同的实体，（b）真实的世界是客观的——一是与我们讨论它或表现它的方式相分离的一个固定的物体，（c）自然超越社会的优先，和（d）个人高于社会的优先。^[2]（9-11）对现代社会依赖于其上的这把交椅的舒适性和稳定性进行挑战的正是后现代主义。

现代性理性原则的过度发展似乎背叛了它最初的效率目的，同时带来了更大的社会问题：社会不平等以及由此引起的贪欲的无限膨胀，从而导致了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人类几千万人的死亡。说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后现代主义者埃莫森的一段话，他说，有两条法则分立并行而不可调和，这就是人的法则和物的法则。后者建立城镇和舰队，但是它的野蛮疯跑，并且对人极不友好。现在人类更是生活在自己的狭隘理性所制造的核弹药库上，这些热武器可以把整个地球，迄今为止所有人类的唯一生命家园毁灭好几次。因此，现在所有人类不得不开始对理性重新反思，开始考虑对理性的疯狂和疯狂的理性进行一下限制。后现代主义所扮演的就是这样一种要对理性加以限制的，不讨人喜欢的角色。

后现代主义是在 50 年代初滥觞于西方文学、戏剧、舞蹈、绘画、雕塑和建筑中，而在 80 年代盛行于西方学术领域和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社会学术思潮。对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它几乎都发出了疑问和挑战。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福柯、拉康、奥利塔等人。它可区分为“建设性的”和“怀疑的”两个流派，其中包括后结构主义，后批判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在西方，它同时受到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抵制和批判。

后现代文化对弥漫于各个领域的理性组织提出挑战，因此后现代艺术强调美学高于功能。在建筑学中，这意味着要放弃现代主义所主张的有效的、重视实用的空间布局设计，而为“提供给人们看起来像他们感觉的那个样子的建筑”所代替，即是说，需要反映异化、焦虑和混乱的建筑，外观和形象获得了比技术、实用和效能更大的优先权。

在文学中对理性的挑战导致后现代小说家不再考虑情节的线性原则：任何有组织的故事成分或设计必须由每一个读者自己提供或发明。

在心理学中，它向意识的、逻辑的和连贯的主题挑战。

在健康社会学领域，后现代主义否认健康的现代主义的消极形式——控制和拥有它的主题，而进入到一种积极慷慨形式，使其主体丢弃它的那种主观性而变成其他的事物。

在行政管理和公共规划领域，对理性组织的怀疑鼓励从中心计划的退却，从对专家信任的退却。

在政治科学领域，它对等级制的权威、科层组织的决策结构提出质疑。

在人类学领域，它唤起了对地方的原始文化的保护意识，并反对“有良好的意向的”第一世界计划的干预，因为这种干预追求修改（重组）这些文化。

在哲学领域，它意味着主观性的重新唤起，同时意味着对理性和客观性的怀疑。

后现代主义在所有学科领域里都拒绝讲演的惯例的、学术的风格，它们宁愿选择大胆的和引起兴趣的演讲形式。

后现代话语的声调更加富有文学的特征，而现代话语的目标在于标准、精细、实用，并且在风格上更加严谨。但是后现代强调风格和表现，也并不意味着它完全不考虑内容。

从以上后现代文化在各个领域里有区别性的特征来看，“新新”文化的确是后现代文化在中国的变异，它包含有以下八个方面的文化特质：

世俗。“新新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这是因为无论是从国际

还是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现时代都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而不再是一个神圣的时代。世俗文化是相对于神圣文化而言的，对无论是天上的还是人间的神，它都持一种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因此“新新文化”是一种藐视权威和权力逐角、追求个性张扬或物质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文化，这是实行市场交易法则的必然结果。

媚情。“新新文化”又是一种媚情文化。当人类的信仰和理性这些高级需要趋向于衰微的时候，人类的感性和情绪这些低级需要就逐渐上升到主导地位。这对“新新人类”来说特别真实，因为他们生长在信仰和理性相对缺乏的时代。人类的原始兴趣和追求在“闲着没事”的时候就容易被唤起。正像在《大话西游》中所表现的那样，媚文化是对爱情的一种张扬，用后现代文化对爱情进行重新诠释，不是说它对爱情一点也没有解构，爱情本身作为一种终极价值在这里依然很崇高。但是，其表达方式则变得十分直接和随便了。如“至尊宝”提出“来吧！”“白晶晶”则立即用“来就来”作出反应，在他们两人之间，看不出任何人有半点羞涩和踌躇。当白晶晶已把“至尊宝”的性冲动唤起，她突然又说：“白天我不习惯，晚上再说。”“至尊宝”则一点也不生气：“晚上也好，白天也好，以后你随时需要随时吩咐，从今天开始，我会一直陪着你。”像这类事情在“新新人类”这个年龄，能这样拿得起，放得下，媚而不淫，进退有度，是不是比那些没有爱情的、不道德的婚姻更高尚啊！

独立。“新新”文化追求独立这种宝贵的文化价值观念。尽管他们大部分是1970年代后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但他们的独立意识特别强烈。他们并没有被他们的双亲宠坏，在学习、工作、生活和交际方面很有自己的主见，对各种人生问题拿得起，放得下。他们既不依赖组织（对他们大部分人而言已无组织可以依赖），又不依赖家庭（他们的双亲不少是下岗工人），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即使有的家长有能力在社会上为他们谋取较好的职业和前途，这些“新新”一族也不愿意到这些靠人际关系跑来的工作岗位任职。这种独立不倚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反应了新生代的自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不与世俗环境同流合污的“另类”情感。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特行。“新新文化”的独立价值特质同时决定了它的特行品质。特行就是“新新人类”表现个性魅力和风采的独特行为，除了一些表示她们共同特征的一般行为外，在许多方面（包括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他们不愿意赶时髦，随大流，反映出多样性的审美情趣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与其说特行是新生代的个性表现，不如说是他们的存在哲学。英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说：“我思故我在。”“新新人类”则反其道而行之，追求个性，按照自我的独特方式存在、生活，信奉“我特故我在”。在“新新人类”看来，最终决定一个人存在价值的不是思考和思想，而是那种独特的思考和独特的思想。这是因为人人都会思考，人人都有思想，只有思考独特，才能思想独特，而只有思想独特，才能存在独特，才能不再是别人的影子或附属物。特行还有行动哲学的涵义，“我存在，我行动；我存在，我主张”。这十二字把行动哲学的意义说得一清二楚。只有行动和主张才能表明人的存在，没有行动和主张，人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稚嫩。“新新”文化的第五个特质是稚嫩。稚嫩即幼稚化倾向，例如，据媒体报导，上海的大学生叼奶嘴、用奶瓶，穿着打扮越来越幼稚化。它反映了“新新人类”不愿长大、拒绝成熟的一面。这种情况的造成，有“新新人类”主观上的原因，也有家庭和社会上的客观原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不能责怪他们这一代的。从家庭环境看，这一代独生子女由于没有弟妹的出现会产生两种效应：第一，对他们的双亲来说，他们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第二，对独生子女本身来说，他们的独霸地位永远不会被罢黜，只有与其竞争的另外孩子的出现，才会促进他们的成熟和责任心的发展。但是，他们知道这种状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在其实际担任社会分配给他们的角色以前，这种成熟和责任心一直处于若无若有的潜伏状态。从社会环境来看，由于工作应聘条件的高学历化，许多高考落榜生甚至一些大专、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很难找到工作，他们基本上处于社会的边缘甚至边际位置。社会把发财致富作为合法的文化目标来宣传，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安排上却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发家致富的合法手段，也没有赋予他们多少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自

觉或不自觉地，他们被当作“垮掉的一代”而被忽略和否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愿把自己当作长不大的孩子。这里包含着十分复杂的涵义：也许是为了迎合社会对他们的角色期待，也许是为逃避肮脏的世俗环境，包含着几分自嘲，几许清高，几多无奈。

直觉。直觉是“新新”文化的第六个特质。“新新”文化与后现代文化一样，靠直觉而不是靠理性判断事物，他们只知道他们喜欢就够了，并不追究喜欢背后的原因。他们只知道跟踪自己的感觉和心情，并不愿意思考迅速变化的世界，从“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到“我只知道跟踪自己的心情，别的一概与我无关！”或者是他们不愿动脑筋思考，或者是他们见惯了理性的虚伪和虚伪的理性挫折了他们思考的积极性。不管是什么，反映了现代文化向原始文化的回归或返祖，“新新人类”愿意过那种简单素朴的生活。

同理。同理是“新新人类”的第七个特质。“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个口号反映了“新新人类”具有强烈的同理利他心，能够把自己放在他人的地位上，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抛开人间一切世俗的考虑，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信任、友谊和关爱推广到极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新人类”是最具有人情味的人类，“新新文化”是最带有人文关怀的色彩的文化。

自残。自残是“新新”文化的第八个特质。自残是为了为自己的劣势地位或事先估计到的失败寻找借口，或者为了生存或报复而进行的自我伤害的行为。轻度的自残包括自渎、自嘲和自贬行为。例如，某网站的一个小姑娘为自己起了一个“酒桶肉丸子”的网名，还有人起名为“二狗子”，这些都是社会心理学所说的自残倾向。严重的自残包括用牺牲自己人格尊严的方式把贪官污吏的种种吓人脸皮揭下来，让他们威严扫地，丑态百出。有一本书，叫《伊甸园的罪恶》专门描写那些知识女性严重的自残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上海宝贝》所描写的也是这样一种具有严重自残行为的女性。当然，这些人是不可与“新新人类”同日而语的。但是“新新人类”必要认清自己的文化局限，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样才有可能担当 21 世纪建设美好国家的历史重

任。不管怎么说，自残在这里是被当作一种生存手段和斗争武器来使用的。自残是一种预设的借口，即使你表现不好也不会有人说什
么，因为事先你已经把表现不好的理由公之于众，它具有调适心理
失调和心理防御功能。

注 释

[1] 转引自小奥维拉《新人文主义：对现代美国的批评》（英文版）一书序言。

[2] Gary M. Wolle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stmodernism, Published i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st, 411), 9-11, Sep. 1997.

中西文化比较略论

辜正坤

辜正坤,男, 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文化文学与翻译研究学会会长, 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带头人。曾发表著、译、编、校著作 35 种, 论文 100 余篇, 获各类奖项 16 种。主要学术方向为中西文化比较、莎士比亚研究、翻译学、诗学。

今天这个讲座, 我想应该是普及性的, 因此我就把关于中西文化比较最关键的地方, 做一个粗线条的介绍, 让大家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有一个大致的看法。

要讲中西文化, 首先就得讲讲关于文化的定义。那什么是文化呢? 关于文化的概念, 有人统计过, 至少不下于 180 多种。今天不可能去一一探讨它们。根据我的理解, 我所使用的文化概念跟别人使用的有所不同。我认为, 文化可以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 我今天要用的这个文化在定义上主要是广义的文化, 我给它下定义是: 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 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这样一来, 文化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

请大家顺着我的思路来理解文化的概念, 那么就很容易明白我是如何来作中西文化的宏观比较的。

第二点, 讲到文化我还要谈谈文化是受哪些因素驱动的, 有没有一些因素, 导致文化的总的方向受到制约呢? 当然有的。有各式各样的因素, 这些因素构成一个因素系统。从纯理论上讲, 这些因素可能是无穷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无穷的因素中压缩提取出一些主要的因素。我把它们概括成九大因素。这九大因素分为物理的、生

理的、心理的、哲理的四组因素，也就是：（1）生态、环境、横向决定律；（2）语言、文字纵向诱导暗示律；（3）科技、工具、媒介横向催变律；（4）物欲原动力律；（5）情欲原动力律；（6）权欲原动力律；（7）审美递增、递减律；（8）阴阳两极对立转化律；（9）万物五相（行）选择律。一共有这么九大因素。它们会导致文化在不同的层面上发展。我今天不可能把每一个方面每一个因素都进行阐述，我只能侧重其中的一点，或者两点，以之作为一个汇通点，把其他的层面连贯起来讲。比方说我可以从地理环境入手来展开这个话题，然后再把它横向拉开，引入其他话题。

其次，我还要提出一个万物自协调理论观点。万物都是具有自协调、自组织特性的。万事万物只要被赋予一个简单的力以后，不管把它放在哪个地方，它都会和周围的东西产生一种关系。这就如一杯水，如果你把它泼到地上，它就会依据一种力的作用向四面八方渗透，或者是遇到一种阻碍暂时停顿下来，或者是突破阻碍继续渗透。总之，在最后你就会发现它是一种不规则的形状，这个形状就是和周围的事物相关、互动而构成的一种形状。这个形状就很类似于文化的形状。人类的文化是可以自我协调、自我组织、自我规范、自我节律、自我适应的。它在诸多互动、互构的因素网络中一定要找到一种最好的存在方式。这个观念和生态学的观念是相通的。任何一个东西，它的任何一个因素被改变后，就往往发生一系列的相应改变。任何一个东西被放到一个环境里去以后，就会和周围的环境产生一种协调的关系。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没有一种文化不是合理的，这也说明了没有一个文化不是好的。依据它适应周围的条件而言，它肯定是最好的。换一种角度来说，如果文化换一个环境，它的渗透方式也就会发生改变，发生改变以后，它也是最好的，至少相对于它所依存的环境，它是好的。这也是文化相对主义的一种变相说法。

那么，中国文化是怎样自己加以协调的呢？西方文化又是怎样自我协调的呢？就是说它找到了怎样的一种形状或者模式使它们处于一种最好的状态呢？这正好是要讲中西文化比较之前要说清楚的。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怎样自己协调的。要讲清楚这一点，就必然会讲到中国文化所产生的那个地理环境。而地理环境中最关键的因素则又是它的气候条件和资源条件。尤其是气候条件，它可以说明一切生命都依赖于它。在特定的时期和条件下，不仅生命的发展程度依赖于它，和生命相关的一切行为和现象，例如文化现象，也往往依赖于它。当地球的气候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相应的文化也就会相应发生一种比较大的变化。举例来说，根据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大约距今一万年前，地球的第四冰期到达了尾声，地球表面温度开始慢慢地上升。到了距今五千年前后，地表的温度普遍转暖。这么一种气候产生了什么样的文化效应呢？各种各样的研究表明，世界各个地方的文化，都基本上适应这种条件而作出了相应的变化和反应。这个变化、反应的结果，就是在温带，在亚热带，例如北纬35度到40度这个地带，首先发展出了人类早期最辉煌的文化，例如地中海文化，包括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等等。也就是说，到五千年前后，人类到此为止最辉煌的文化差不多都在那个时候相继产生。这不能以偶然性来解释它。实际情况是，只要我们所在的地球给出了生命、生活、文化所必需的基本的相关条件，各种相关因素一旦不同程度地汇集到一起，就会产生互动、互构活动，产生种种协调、适应、组织现象，促成种种演化，于是文化、文明就在这样一个条件下繁衍生发开来了。大体上说来，五千年前后的文化，在这个纬度上发展得最辉煌。这首先是和它所处的气候条件相关的。

说到中国，情形就更是这样。我们经常讲华夏五千年文化，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古代文化也确实是在那个时候忽然间发展得最好、最快。那时候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发展得最好呢？竺可桢先生曾经把中国五千年的气候波动画了一个曲线图，学者们认为这个图是相当客观的测定。依据相应的气候的变化，人们就可以找到相对的文化的缩影。种种研究表明，一旦一个地方突然变得很冷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也往往容易发生改朝换代的情形，也往往同时伴随着大饥荒，频繁的干旱、水灾等等。而当文化比较辉煌的时候，往往都是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经常是

这样的。例如当商朝要灭亡的时候，气温就突然降低了。唐朝兴旺发达的时候，气温就总是比较高，并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根据气温会发现，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都会同时发生和气温相应的波动现象，这是非常有趣的。有人会觉得非常奇怪，事实上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因为一种物质条件的变动有可能导致相关的物质现象的变动。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什么时候容易出乱子呢？显然首先是人们没有粮食吃的时候。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一般都是气温比较低的时候，因为气温一低，农作物就长不好，会相伴有很多的灾害，战争也往往会随之发生。同时，北方的少数民族迫于相类的恶劣的气候条件而不得不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这时也就会容易趁着当时中国内部苦于天灾人祸的时机攻打中原，并且常常得手，对中国社会产生颠覆性影响。因此，古代中国文化在若干方面的起伏状态都是必然的，并且往往呈一种循环态势。这就颇类似白昼和黑夜、日和月的循环现象。当然，人类文化和自然现象毕竟是不同的，因为人类文化有一个自我累积并抵制淘汰的内在特性。但是总的说来，地球——甚而至于整个宇宙——它本身的发展就是循环的，因此人类的文化从宏观的走势来看，当人类自身对环境条件的干预能力较弱的时候，其早期发展也就必然具有循环性。如果只是以几十年为周期来看，这种循环现象可能不容易发现，但是像中国这么长的未曾中断过的以千年计的历史过程，就很容易让人们发现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所以中国的文化就是依据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相关的种种历史因素相应地不断发展、演化，一直到现代。这样来解释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原理，就比较简单明了。当然，还可以用其他的许多观点来作出不同程度的解释，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讨论它们了。

更进一步地具体来说，为什么基本相同的气候条件下，中国的文化又会发展得和西方的不一样呢？是什么东西使它们发展得不一样了昵？

首先我们还是从气候差别来看这个问题。中国的最北方是很冷的，所以不太适合于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南方按理气温高，应该适合文化的发展了。但也不尽然。因为古代南方的气候不是现在

这样的。最关键的是，当时南方的土地是非常贫瘠的，排灌系统落后，其土壤跟现在不一样，根本不适合农作物生长。根据专家的研究，从远古的时代起，中国北方的西伯利亚的寒流不断地向南方移动，在经过蒙古大沙漠的时候，风力把细沙卷了起来，夹裹着飞扬，但是当到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一带时，由于风力不支，慢慢地沙尘又降了下来，经过长期的一个过程就在中原一带形成了约莫150多米厚的土壤层，这层土壤是非常肥沃的。此外，如果以喜马拉雅山为界，它以西和以东的气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以东的中国的气候比较湿润，雨量充沛，因此在这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就更加适合于农耕。这样一种环境气候条件就产生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农耕生产方式，它是自然产生的。它的这种生产方式和西方很多国家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农耕使得中国人可以长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这叫安居乐业。而游牧民族就不行，当一个地方的草被吃完了以后，就必须再换一个地方。这种生存条件导致一种流动的生活形态，因此西方古代社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往往趋向于流动的生活方式。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西方的地理气候条件不是很适合农耕，比如地中海一带，就非常贫瘠，地中海本身也很贫瘠，连鱼都不产。但是为什么它这种条件同样能产生非常辉煌的文化呢？这是因为它的地理气候条件提供了另一种潜力。比如说，地中海的航路、航海业就非常的发达。航路的发达使得商业就逐渐的兴盛起来。有了船，就可以四通八达。因此地中海周围的文化也是非常发达的，比如古希腊、罗马、古埃及等等都在这一带。反观中国，既然可以安居在一个地方，就少受迁徙流离之苦，而这种长时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条件便使得中国的家族发展得很快，所以中国的家族往往都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中原一带。百姓，百姓，一个姓就是一大家族，其实岂止一百个姓？一旦安居乐业以后，居安而不思流动，就容易促使静态的文化模式发展起来。所以中国的文化就其整体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更趋向于是一种静态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更趋向于是一种动态的文化。这样一来中国文化中与静态特点相关的一切就更容易得到鼓励而蓬勃发展起来。

有人常说中国的宗法制、家长制为什么这么严重呢？严重二字

具有一种贬义。其实它不是严不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就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是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而产生的结果，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最佳的文化果实。如果相反，它就绝难有后来积累而成的辉煌文化成果，很可能整个国家跟欧洲一样，至今四分五裂。这就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文化是如何具有自协调性的。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的流动性的文化，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促使他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发展得非常的充分。这种自由主义得力于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这也就是西方商业之所以很发达的一个原因之一。这正是西方文化自协调的重要表现。所以中西方文化都是依据具体的先天的自然条件及后天的人性因素而互动互构发展起来的。不同的客观条件模塑了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也是东西方文化不同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然，顺便提一句，我们这里谈环境谈得较多，但绝不是说环境就决定了一切，因为环境毕竟是横向性决定因素多一些，纵向性因素相对少一些。实际上决定文化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我们在前边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因为以环境因素作为主要讲话契机，自然就要谈得多一些。

从地理环境我们可以追踪到一些文化发展的线索，当然不完全对应得那么紧密。现在我们进而谈谈中国在这种环境制约条件下会有些什么独特的文化现象。首先，如果这种条件下的民族安居乐业，老是相对久远地住在同一个地方，它的家族就容易繁衍起来，一代又一代连锁式地滋生，因为它所栖息的土地可以不断再生所需要的生存资料。结果这个家族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人口数量越来越庞大，其相应的家族纽带也越来越繁复体系化，人际关系网越来越大，在这种条件下，谁来处理人际关系呢？或者说，谁来当首领比较合适呢？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的部落、家族强行挤入的话，既然大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论起来实际上就都是一家子，只不过慢慢地由于年代久远了，相互之间的亲戚关系、血缘关系不是那么亲密，但归根结底还是一家人。既然是一家人，在一家人当中的矛盾该怎么处理？你不可能借外来人处理，帮有帮规，族有族规，

自家的事情只能自家处理。那么听谁的，听来听去肯定只好听父母的、听年长者的话。这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尊老及相应而来的祭祖现象必然要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也就是说，所谓的家族观念，所谓的宗法制这些东西，它一定就要这么自然而然地形成。这种形成方式孳生了中国式国家的形成方式。这若干的家族不断地繁衍，繁衍成越来越大的家，家大到最后就变成了国了，所以叫家国。国和家，家和国都是在一个规模上的变化，这样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家国主义，它有这么明显，这么根深蒂固。我不是在暗示家国主义就一定是坏的，恰恰相反，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主义就其所处时代的自律形式而言，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机制。它非常符合它自身的生存条件。它和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模式是完全呼应的。进而言之，中国社会中的与此相应的伦理、政治、经济、艺术、哲学，种种制度、思想也跟随着以相似的模式发展起来。比方从伦理方面来说，既然大家都是一家子，就不应该争斗。不是说中国人不会去争斗，因为人的天性中存在着一种争强好胜的权欲，但是争斗的程度是有差别的，至少为适应这种具体的人际关系，就会产生出一种理论来，压抑这种争斗的思想，例如“和为贵”的思想。什么叫“和为贵”？因为既然都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打打杀杀呢？显然和睦、和谐、相互间的体谅这类品德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历史地看，和为贵、爱好和平这种思想，必然在华夏文明，尤其在中原一带这种文化当中产生出来。它不是从外国注入的。诚然，人生来就有权欲，就有征服欲，但也不是毫无解决办法。通过一定的环境、条件，人的先天的权欲会慢慢地激发出另外一种和它相生相克的关系，慢慢地把人性中某些过强的权欲、征服欲加以削减，使之被约束到一个比较能够被接受的程度。一种中庸形态的德行准则逐渐成形。但是单单这一点就很容易把中华民族和大多数的西方民族区别开来了。

如果说中国人生活在这个地方容易把天下太平作为一种理想追求的话，那么在西方世界情况就不一定了。西方世界的社会生活动态感强。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的农耕特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游牧业确实比中国要发达得多。游牧业的特点就是老动来动去的。

放牧的时候，一个地方的草吃完了，不可能马上长出来，你就得不断地迁移。加上地中海一代的商业特别发达，假如你去经商，漂洋过海，显然不可能把一家老小都跟着迁走。这样的条件，促成对个人行为的自决能力的强化。很多人的冒险的精神容易被激发出来，被熏陶出来。海上的贸易，面对大海，可以启示人思考自然力的狂暴，引起人征服自然力的雄心壮志。当然，这种自立、自决行为方式和冒险精神也会从另一个方面激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们乐于争夺各种生存资源如土地等，乐于争夺一些要害地点，如港湾、航路等等。英雄精神、骑士精神容易得到鼓励，于是发生战争的时间就特别多。所以西方民族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很突出。很多人问：individualism、好战性为什么会在西方特别明显呢？中国人当然也有这种东西，可是是受到压抑的，而西方民族那个东西非常鲜明。为什么？生存状态使然。有人说西方人好战成性，可能夸张了一点，但是他那个好战的心理确实比中国人要强。就是号称爱好和平的伊丽莎白女王对于自己的臣民到海上去抢别人的船只，她都要表扬嘉奖的。她的将军在海上打劫了别国的商船凯旋归来，她是要分赃的。这类海盗行为她并不认为不好。在中国，你要那样去做的话，大家都要谴责你。那是不对的，是去抢劫别人。但是，他们觉得那是一种英雄行为。所以两个民族由于各自的生存空间条件陶冶出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当然，近几百年来，西方人也不断地试图压抑这种情绪，可是时起时伏，还只是压抑到了一定的限度。民族深层心理结构被客观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千年来的陶冶，把它模式化了，定型了，塑造了一种民族性格，是不可能一下就改正过来的。

我们还可以进而提出一个问题：儒家的思想为什么会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产生？因为儒家那一套思想，比方说扎根于周礼的那一套思想，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整套东西之所以会在中国文化中起那么大的作用，也是在相当的程度上由于上面提到的诸多地理环境原因所致。整个家族生活在一起，都是一家子，自然条件导致的生理、心理模式自然会对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产生水到渠成的定势作用。在一个家庭中父母最该受尊重，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从大一点的角度而言，其实那个皇帝在政治功能上有的时候就

像家庭里的长辈。现在很多人把这叫作什么呢？家长主义。言外之意是家长主义一定是不好的。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家长主义在古代中国中一定要产生，才可能产生最佳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国就是一个大家，那个长，父辈祖辈的，就是应该称为长。在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中，相对而言，在处理各种争端的时候，父母能产生公心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说到底，其他成员都是自己的孩子。偏袒行为有时可能会有，但总体来说，还是会比较公正的。而父母之外的其他成员由于自己就处于利害得失之中，难以不偏不倚。当然后来的皇帝不必一定是家庭中的长辈，但是这种家庭传统要求皇帝总是像长辈那样把下面的百姓看成是自己的子民，要求皇帝要以相应的德行去处理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换句话说，家庭中对父母的孝敬心必然推而广之地应用于邦国范围内对帝王的忠心。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心，也必然推而广之地被要求应用于邦国范围内成为天子对臣下及庶民百姓的关爱与宽恕。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何以儒家的整个一套政治理念会以孝为中心概念，主张以孝治天下。因为一个人只有首先在家庭里面学会尊重自己的父母，才有可能在社会上推己及人地去尊重别的一些长辈、别的一些领导人物。比如说皇上，对他要忠心耿耿。当然对他的忠也不是说一定要愚忠。反过来说，皇帝就像一家之主，如果自己的行为不足以以身作则，就难以被看作一个称职的皇帝。对于臣下，他要学会宽宏大量，要学会宽恕臣下。忠和恕两者总是相辅相成的。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有一种基于仁、义、礼、智、信的理解与默契。这一套东西在现代人眼中看来不一定是对的，但是在那个时代必然产生这样一套政治思想，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最佳地符合它的条件，解决它所面对的种种社会问题。所以儒家思想必然要在中国产生。

西方的地理环境及种种社会关系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关系功能的相对松弛。既然要以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当然就不可能以家庭中的某一成员，例如父母，为中心，也就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孝敬观念。而孝敬观念恰好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中心概念之一。这样一来，儒家思想体系就难以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

我们再来说一下历史形态，什么叫历史形态？西方学者，比如说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这么五种形态，或者说至少有这么五种形态。那么是不是每一个社会必然是依次地按照上面提到的顺序经过这些形态呢？我认为不一定。

当然马克思最初也没有系统地论证说五种形态必须一一经过，绝对不能跳越。可是后来在俄国人那里就把这个思想搞得僵化了，认为好像非要每一步都走到。实际上后来的发展证明是可以跳越的，有些形态可以不经过。在顺序上可以打乱。当然在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这五种形态，这是对的。但是我要提的问题是：什么是奴隶社会？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在五四的时代学者们就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学者们认为，中国这个情况拿来跟西欧的一比，好像中国没有奴隶社会。什么叫奴隶社会？这首先要看什么叫奴隶。如果一个人失掉了人身权，完全依附于另一个人，而且他生产出的东西都全部归于他的主人，那就是奴隶。但是历史学家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时候，发现中国的情况好像并不是那样。封建社会倒勉强可以找一个周朝来贴上标签，像奴隶社会这样的社会就不容易找到了。不是说一个社会中只要有了奴隶就是奴隶社会，而要看奴隶的数量在整个社会成员中的比例及具体受奴役的程度。我们看看西方奴隶社会，例如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社会。那种奴隶社会是比较典型的奴隶社会。因为那种社会中奴隶的数量很多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奴隶与自由民的比例相差很大。所谓自由民，就是有选举权的公民，和奴隶的比例大概是1比5，有时还可能是1比10以上。所以在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城邦中，自由民只有几万人，而奴隶有几十万人，连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者，据说都有三到十几个奴隶，所以说那种奴隶社会、奴隶制才是真正的奴隶社会、奴隶制。而中国的古代社会，你仔细查查，发现虽然不同程度地有过奴隶现象，但是其数量还远远不足以构成一个真正奴隶社会。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问，那为什么呢？为什么西方的社会，尤其是古希腊罗马的社会容易产生奴隶制，而中国的社会就不容易呢？或者说它的程度比较低呢？这很值得探讨。当然下面的话只是我个

人的看法。其实根据我刚才上面讲过的话，你们自己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奴隶虽然来源于多种渠道，比如说来源于借了人家的钱没法还而卖身奴隶，但这一类奴隶数量相对要少得多，大多数的奴隶主要都来源于战俘。一次战争后，大量的士兵被俘虏过来了。俘虏过来你怎么办？如果是关在监狱里面你还要喂他的饭呢，同时也没有那么多监狱呀。那怎么办呢？几十万几十万的人，应当怎么样处理呢？让他劳动，强制他劳动，并且剥夺他的劳动成果，于是这些战俘就成了奴隶。古希腊、罗马的贵族们在发战争横财时，分得的战俘，也算一笔财富。打仗有功的士兵也可以捞到点这类财产，这是一种会说话的财产，比现代机器人还好使。由此就可以推论，如果一个社会的奴隶制特别发达，就意味着它那个地方战争特别频繁；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地方在古代社会中异族战争频繁的话，也就最容易产生奴隶制。因此，古希腊、罗马所处的地中海一带，一定是经常发生战争的。事实上也如此。这种频繁的战争产生大量的战俘，这些战俘怎样处理？就变成了奴隶。所以古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可以说必然要产生，就它当时的那种地理条件、民族因素及相关的历史原因，必然要产生这么一种奴隶社会。而在中国你就发现这种条件不但不是那么充分，反倒有一种内在的抗奴隶机制。尤其在中原一带，既然民族主体都是华夏民族，都在这个地方劳作，都是一家子。你如果编不出名正言顺的借口，仗就打不起来。师出无名，必有败军之虞。师出有名了，也得是所谓仁义之师才行。打了胜仗的一方，也不好意思叫战俘永远作为奴隶，因为说到底还是自己人，有血缘关系在里面，在对阵时，父子朋友各为其主的现象很多。所以在大多数的场合，多半是呼吁败方弃暗投明，或者将这些农民遣散回乡，种地去了。当然，例外情况也有，比如据说白起坑降卒40万，就被历代史家所谴责，人神共愤，可见残暴的行为总是受到中国传统伦理规范的抵制。所以在中国推行像西方奴隶制那类非人道的制度不容易获得认同，故而像西方社会那么完整的奴隶社会也就不容易产生。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也是上述地理环境、民族因素及相关的历史条件促成的。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个大家经常讨论过的，从五四以来就不断在讨论的问题，即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有人说中国没有科学但是有技术。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实际上要从方方面面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得专门开一个讲座才行。我只能用不多的话阐明它。首先，你如果说中国有没有科学，你就得说什么叫科学，然后才能说它有没有。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先为科学正名。有的人容易把科学等同于真理，科学实际上不等同于真理。科学主要是一种方法和一种组织严密的概念系统。它的方法是实证的方法，是条分缕析的方法，是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框架。它把一套概念有机地组织架构成一个系统，然后再按部就班地一步一步推导出必然结论。因此客观上它有助于我们去发现真理，去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理，但它本身还不能说是完全就等同于真理。按照这种理解，那么，不仅中国古代有科学，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科学，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它不知道用实证的东西去发现什么东西，没有一个民族不知道说话或写作一定要有逻辑，要有条理。区别只在于各民族的科学形式和发达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简单地说成是没有科学，那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再换一种说法，说在中国古代，西式科学，或西式理论科学不那么发达，这就比较合乎情理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许多人容易把科学和技术等同起来，这也是不对的。科学趋向于理论性，技术趋向于实践性。科学不等于技术。与西方社会相比，技术在古代中国是非常的发达。至少在 16 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是领先于世界的。16 世纪以后西方的技术才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按照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统计，西方的科学技术成就差不多 85% 以上来源于中国。这使人感到很奇怪。中国的科学理论好像不是特别发达，可是技术却那么发达，这似乎产生了一种悖论，就是科学和技术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脱节，产生一种技术发达而科学相对落后的状态。西方传统的主流观点总认为是科学理论指导技术实践，科学理论先于或高于技术。而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恰恰是对这种观点的挑战。我认为，科学理论和技术的关系是互根、互构、互补、互彰阴阳循环互进的。在一些的情况下，理论超前；在另一些情况下，技术超前。科学并不永远指导技术，技

术也不可能总是超前于理论。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中国古代社会的技术尽管从大体来说较之现代技术要原始、简单一些，但它的基本原理在那个地方。它提供了最初的思想、最初的设计，提供了后来进行加工的基础，因此它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手枪、手榴弹、地雷、火焰喷射器、机关枪、大炮、火箭，这些东西在中国早就有了，而现代武器跟当时中国发展出来的相比，其基本原理区别不大，只不过现代西方科学家们做得更精巧一些。

由此引出新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技术搞到那个程度却不进一步发展它？为什么中国人技术上那么发展，理论却没有跟上去？西方人即使阐述一个最简单的技术原理，也往往用整本整本的书来论证，而中国人往往几句话就完了，这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若干个角度来解释它，但我不妨只就文化发展九因素中的一个因素，比方说第二个因素，语言文字诱导、暗示因素来做解释。中国的汉语言文字是综合性的，图像感很强，它虽然已经不完全是象形字而主要是形声字了，可是早期它是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至今残存着相当多的象形特点，因此它就容易在我们的大脑当中熏陶出一种象形定势思维，理解事物时就容易侧重从形象方面去了解它，从宏观整体去方面去把握一个事物。而西方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则是非常精细的一种语文。学过英语的就知道英语有性、数、格，有主语、宾语，状语、定语这一连串的东西。你学拉丁语，光是一大堆语法规则就念得你焦头烂额。它的语法非常的发达。所以西方人的教育很注重语法教育。西方的16世纪前后建立的注重拉丁语教学的小学、中学就叫 grammar school，直译就是语法学校或文法学校的意思。西方的儿童从小就学习这类语言，注重学习语法，培养一种条分缕析的思维能力。孩子一出生，父母就老教给他这个是单数，那个是复数，这是名词，那是动词。此外还有数、形、量、代，一大套分类。须知科学理论就往往是一种分类的条分缕析的理论体系，一种概念体系。西方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形态上实际上就很类似臻于精密的语法系统。或者换一种说法，它的语法体系里面内涵着科学推量的基本成分，它的形式逻辑实际上就是语言成分里已经包含的那种东西，所以西方人只要强化语法训练，由于日积月累的熏

陶，就有助于为科学推理的能力的建立打下基础。所以，西方式的理论科学形式就很容易被诱导、暗示，得到进一步的繁衍。而中国的语言文字，则语法形态比较隐晦。在马建中的《马氏文通》出现之前，中国数千年来可以说没一本语法书。马建中的语法是拿了拉丁语法来套汉语语法的，把汉语强行地拉入印欧语系的语法体系里。中国人不注重语法教育，所以条分缕析的概念应用不像西方人那么系统。

可是人们立刻会问：中国人没有语法是怎么交流思想的呢？这个问题本身就预设了一个前提，似乎人类要思考，就非得有西方式的语法才行似的。实际上，事物发展往往有自我协调、自我完善的趋势。当出现某种缺陷的时候，就往往会产生另一种优势来加以弥补。汉语言文字自身当然有语法规律，可是由于它的语文要素中的直接表意功能非常强大，远远超过印欧语系语言文字，它就无须强调语法功能。单从它的文字来看，其图像特点强，写一个门就像一道门，写一个山，就像一座山，使你不借助语法系统直接就可以一下明白它要表达的含意，岂不十分省时、省事？西方印欧语系语文却缺乏这个直接表意功能。它的文字都是符号化的，弯弯曲曲的，你必须把它们一个个死记住，记住它跟所表达的那个实物已经割断了联系的符号形式及其含义，用语言学术语来说，就是它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看起来缺乏有机联系。所以它在表意上非走弯路不可。印欧语系语文的直接表意功能有了缺陷，这一缺陷恰恰要由它的发达的语法系统来弥补。所以西方人的表意系统需要一个庞大的语法系统来加以界定，使每个字词的含意被抽象性的符号定位，被繁琐的语法规则所制约住。你看一个英语单词通常是绝不可能一目了然的，必须把它的含意死死记住。因此你学英语时，你得积累1万单词左右，才能真正无大障碍地阅读英文原版书报。但是中国字你不需要记住1万字，记住三四千汉字就可以读书看报了。所以汉语言文字之所以不强调语法系统，是因为它有这方面的优势。所以五四时期某些学者抱怨汉语言文字文法不精密，试图通过硬译的笨办法输入新的表达方式来改造汉语的想法，今天看起来是站不住脚的。

回到关于科学技术的讨论上来，我们就会发现，既然汉语言文

字的直接表意功能强大，那么，不言而喻，对于具体的东西，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就会相对强些，因此在特别需要形象思维的领域，例如写诗、填词方面，势必非常发达。而技术性的东西往往实践性强，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也是很需要想像力的，因此中国人在这些方面容易超前做出来。所以西方人，例如李约瑟，就感到很奇怪：中国古代的科学理论好像没有上去，而技术上却做出来了。实际情形是，技术需要非常生动的想像力，某个东西该怎么，技术发明人往往趋向于把那个东西在大脑中构想出来，因此才容易付诸实践。而古代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强，所以擅长于技术制作。技术的超前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汉字直接表意上的超前。汉字的直接表意功能可以经常潜移默化地暗示我们不断地跟客观现实相结合，发展发明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而对抽象的纯粹符号类的理论思考，因为与现实生活有距离，容易受到忽略，由此导致中国人在这方面技术超前，理论滞后。这就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西式理论科学比较薄弱这个难题。

当然上述情形后来还发生了变化，由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中国人渐渐地也开始学语法这一整套东西了，因此实际上现在中国人是兼而有之，兼有了两种磨炼思维能力的语言功能，语法思维和语象思维。因为现代汉语的整个语法体系现在学生也懂了，虽然不需要这套语法，中国人照样可以理解、表达的。李白、杜甫、屈原……他们根本就不懂语法的，但是你不能说他写的东西不合语法，他们还是语言大师。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值得一提，这就是：中西方的语言和文字相互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西方的语言可以规范文字，中国的文字可以规范语言。西方印欧语系语言注重语音变化，但声音语言不是那么容易把握，容易发生流变。一旦流变，它的拼写就必须要跟上去，它的文字要服从语言本身的变迁，因此变化的机会比较多。这就使得文字跟着语言走，结果就是语言在规范文字。而中国呢，它就倒过来了，文字在规范语言。从先秦统一文字以来，中国有许多民族，说着各式各样的语言，它们的发音是各式各样的，但是文字始终是统一的，因此它乱不了，因为语言必须以书面文字

为准。你到南方去，很多地方话你听不懂，例如广东话、上海话，你听不懂它，但是写出来大家都明白，因为它服从于文字。用文字整肃语言，结果使文字成为中国社会强有力的统一因子。它使得中国文化几千来得以长治久安地存在下来，没有被中断。而在西方，差不多每一个国家的文化都被彻底地毁灭过。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都经历过这样的命运。而中国呢，五千年文化一根线下来，它就不中断，非常的稳定，所以许多学者们都感到疑惑，老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西方文化它那么容易就被中断了，而中国文化却具有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呢？这个超稳定的结构它也同样得益于中国的文字的这种超稳定结构。你现在看四书五经那些书，会发现很多字你到现在都可以认识。这是很奇怪的，几千年了，你都可以认识它。可是西方的像印欧语系的文字，不说几千年，三四百年前的你看着就相当吃力了。例如莎士比亚的著作，今天不将它的拼写现代化，很多人要看懂是非常吃力的。四五百年，七八百年前的，像古英语、中古英语这些，你基本上就看不懂。不是说你看不懂，就是英国人自己都看不懂，因为它拼写的变化太大了。它的文字是跟着语言走的，语言不断地变，文字拼写就跟着变，结果变出了很多种语言。因此，如果欧洲有一个统一的文字的话，它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像中国一样大的国家。反过来说，如果中国没有统一的文字，例如没有汉字的话，它今天肯定也是四分五裂的，分成了各式各样的小国家。这种现象之所以没有出现，就因为文字起到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凝聚作用。

另外，从思维模式方面来看，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跟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之所以不一样，也是跟语言文字分不开的。中国人的思维是立体型的，而西方人的思维是流线型的。流线型思维跟流线型文字一样，弯弯曲曲的，一环扣一环。那中国思维为什么是立体性的呢？你一看到汉字就知道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了。一个汉字，它的笔画是四通八达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伸展，横的、竖的。因此这就可以诱导思维不要单向发展，而要四面都发展。这样一来，就容易全面。所以中国人想事情总是事先把各种东西都预见到，给自己留下很多的退路，说话也总是留有余地，不会把什么事都说死。

但是西方式的思维不是这样，它是二元对立型的，不是 A 就是非 A。这就是所谓真理只有一个，二者必居其一，这些话语结构，现在中国人也喜欢用，这都是向西方人学的。实际上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不是这样。《易经·系辞》就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它有同归处，也有百虑，有各式各样的差异。但是西方人往往趋向于把事物对立起来考虑。中国人则不光考虑对立性，也考虑合的一面，考虑合二而一的一面，谓之阴阳互补的思维模式。阴阳太极图就是所谓阴阳鱼，一黑一白，你感到奇怪吗？实际上不奇怪。它是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图示化。我们的思考起来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两个阴阳鱼互相交织在一块，它们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要知道其中之妙，你得把它们旋转起来。在旋转起来的每一瞬间，你会发现它们既是阴又是阳，既是阳，又是阴，不断地变化。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是以流变的观点来看。顺便说说，这个阴阳鱼其实并非像许多学者相信的那样是什么陈抟老祖画的。陈抟老祖固然也可以画，但是不需他画，这个阴阳鱼太极图是可以自己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你如果把八卦阴爻、阳爻符号——一个长横、两个短横那种符号——按照 64 卦的顺序排列起来，构成一个圆的形式，然后想法固定在什么支架上让这个圆图旋转起来，当旋转的速度达到每秒 24 转时，就会产生一非常完整的阴阳鱼。因此这个阴阳鱼不是乱画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事物运动形式的反映。也可以认为这种太极模式是宇宙一切运动形式的缩影，是爱因斯坦一生呕心沥血极力要找到的统一场模式。这种太极图跟涡流形状很相似。有人发现大脑的脑电波的运行也跟这个太极图很相似。如果你到远方观察地球上大气涡流的旋转形式，或遥远的星云的旋转形式，例如银河系的旋转形式，或者说宇宙最初处于混沌状态时候的星云旋转形式，它们很可能跟太极图的构成模式是相呼应的。因此远古中国人的智慧是和事物、和宇宙那种生发模型有种暗合因素的。带着这样一种眼光，你就可以用比较开阔的眼光来观照中国文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只有当你解清楚了中国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你才能真正了解西方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你如果不把一种文化彻底了解，你就无法彻底了解另外一种文化。因为只有有比较才

有鉴别。当你有了一个参照系统，或者说参照框的时候，别的东西才能看清楚。你首先要么精通西方文化，要么精通中国文化，然后把其作为一个参考坐标，借以了解对立面，这样来了解对立面，往往可以获得两种文化的真髓。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不单单是阴阳互补型，它还同时是内向型。而西方人的思维则外向型的东西多一些。中国人看问题的时候往往是由远到近，而西方人则往往是由近到远。我们容易从宏观入手进入微观，比方我这个讲座中西文化比较，就是很大一个框框，先说大框框，叫作提纲挈领，然后慢慢地一步步深入，进入比较具体的分析、比较。西方人就不一定，他可能由一个很小的点出发，然后由此扩张出来，以点成面。比如海德格尔从一个大家都认为不怎么起眼的 Being（一译“存在”）入手，一步一步，剥茧抽丝式地挖掘这个概念的各个层面的哲学含意，最后延伸到探索哲学上本体论的一些最重大的命题。所以中国人容易从整体的观点来看个别的東西，整体的先把握住，再来看个别的；西方人容易从个别的東西出发，推而广之，到认识整体。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往往有直观成分，一眼就把握住了某种事物的本质性特点，一语中的。有些真理性的东西，他那个直观一下就告诉他该怎么认识，他几句就把它说了出来。而西方人不是，他是理智的成分强，他要慢慢推论。如果没有实证的东西，没有一整套的推理过程，他是不承认、不认可某种结论的。

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模式综合性强，而西方人更倾向于分析性。我们再把这种思维模式推论到其他领域，比如用来解释哲学，又怎么样呢？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哲学体系中有天人合一思想，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和人是一个整体，自然界可以和人是一个整体，这个天有很多解释，有的说是上帝，有的人认为是上天，有的是无所不在的一种最高原则，宇宙运行的最高原理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解释。这样来解释天，也不仅仅是中国人，别的国家的学者也能有这样的解释。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容易产生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其实，只要了解了中国文化衍生的具体环境，就知道这类思想必然要由中国人来发扬光大。我们无须印证其他论

据，光是从汉字的构成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汉字本身有它的图画性质。汉字实际上就是外部世界的一种缩影，因此它还保留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就像婴儿生下来时那个脐带还没给割断似的。你看到这种字的时候，它老是把人拖向客观世界，使你感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感到人本身与它及它所表征的自然界是同体的。所以单单是文字本身的特殊的直接表意功能就会诱导、暗示中国人生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当然，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别的因素，不赘。

反过来，西方人就容易产生天人二分的思想。天人二分含天人对立、相争的思想。这仍然可以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条件来加以解释。他的生存条件那么恶劣，就必须与这种恶劣条件斗争，进而去征服，征服大海，征服自然。因此他一定要产生哥伦布式的冒险人物，向远方开拓。那种斗天斗地的思想，一定要产生，这都是和他整个生存条件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自然和他的关系是对立的，不是战胜自然，就是成为自然的奴隶。所以天人二分的哲学思想一定要占上风。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哲学观念。比方说“心物一体”论，这是中国哲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心理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是一个整体，又叫“一体两用”，也可以说一体两面。强调心和物不能完全截然分开，有时候一个心灵的东西也可以是物质的东西。比如意识，究竟它是物质的，还是完全非物质的、完全彻底的空的、无的？古代中国人不把它说死，不把它说成是彻底的无、彻底的空、彻底的非物质。中国人觉得心和物是一个整体，只不过它存在的状态有差别。而西方人就往往要二者分开，一定要分出要么是心，要么是物，二者必居其一。西方人一定要想说清在心物关系中哪一个是第一性，哪一个是第二性，这个问题没解决他就不往下说。他认为这是哲学的最高命题。这些命题至少在这几百年来争论得非常厉害。但是在中国比较清醒的学者眼中，这类争论有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心和物本来就是阴阳互转、互为主次的。由此可见，有些思想非在西方人的头脑中产生不可，而有些思想则又非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产生不可。

西方的哲学也不是简单的光是理论，它和什么是同源的呢？它

和科学、技术这些东西是同源的。它讲究物性，就是物理特性，跟物理科学是同源的。由于强调对客观世界的研究与征服，它要试图找到一种改造自然界的答案，因此它的哲学也是围绕这些问题来进行研究，所以哲学和科学技术这些东西是同步的。而中国人不是这样，他的哲学主要不是和科学同源，而是和另外一种东西——德性，即人伦道德同源，或者说是和性理科学同源。我所谓的性理科学，就是研究人性和人体功能本身的科学。为什么中国人把人性这个东西看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中国人既然认定自己所在的地方已经是一个大一统天下，叫中国，叫中央之国，全世界最理想、最好的地方。百姓之族长期聚集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要安、要乐，首先是要不要出乱子，如果天下不太平了，就绝对无法安乐。天下要保持长治久安，就要求中国人的个人素质要好，减少争斗心。说来说去，就落实到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问题。既然大家都是一家子，就要强调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倡忍让精神。这样一来，一整套的道德规范研究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环，没有这个，人口如此众多的这一大家子如何能生活得安宁？所以中国人的哲学往往和性理，或称德性，或伦理观念这些东西紧密相关。孔子的一整套学说实际上主要是伦理学。当然里边有哲学思想，但他的哲学往往跟伦理学融为一体，成为一种德性本身的研究。

此外，道家也有自己的一套科学。他那套科学跟西式科学不大一样，他是把人体作为一个实验工具。西方人的科学是拿人体外部的仪器去观察自然，拿一个物体研究另外一个物体，而中国人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仪器，来研究自然。所以我们知道汉语中有体察、体会、体验、体证、体认这些词汇，它们都和身体相关。因为道家认定人的身体就是个实验仪器，它里面可以安鼎设炉，炼丹、炼药。他要静坐，要不断体会人的身体怎么跟外部世界打通。因此像《黄帝内经》、《周易参同契》这一整套东西，是另一种高深的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的学问。这门学问中的经络学说非常典型、非常发达，它是靠体证证出来的，所以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实证的东西，也是一种科学的东西，是一种阴性的科学、中国特色的科学。这种科学是西方人到现在为止还闹不清楚的，因为西方人觉得只能够拿外

部的一个仪器去实证、去观察，没想到人体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实验仪器。这些道理，不但西方人闹不明白，许多中国人自己也闹不明白，常常糊里糊涂地把它们当作与西式科学完全对立的东西加以抛弃。世界是复杂的，事物是多元发展的，认识是有多种途径的，我们对传统遗产的继承也应该在新的时代格局中有新的理解与开拓，株守西式理念所带来的恶果到今天已经人所共知了。

下面再谈谈经济问题。中西经济思想、经济制度也有若干关键性的区别值得讨论。例如社会主义的思想是谁创造出来的？当然有人不假思索就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其实社会主义是很古老的思想，但古今社会主义有区别。根据西方学者的专门研究，说世界上至少有80多种社会主义，不少学者认为，其中最好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80多种社会主义不管怎样不同，在若干层面上是相通的。不论你采用什么具体的经济体制，是不是社会主义，先要看产生的实际的效果。也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不管是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样就须界定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它要取得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按我的理解，就是全体社会成员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成员之间贫富悬殊不大，社会成员实际得到的权利比较均等。如果一种体制造成一部分社会成员特别富有，一部分社会成员特别贫穷，那么从本质上说，就有违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了。这种思想，不妨称之为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广义社会主义有一个较大的缺陷，就是，如果没有一种相应的刺激社会成员生产积极性的竞争机制，它的社会生产效率就会递减，最终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被贫穷状态所抵消。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课题，这里不做进一步探讨。那么，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在西方盛行呢，还是在中国盛行呢？如果你已经明白了前面我讲的一整套东西的话，你就会明白，实际上社会主义思想，不借助于西方人，在中国它也一定要产生，而且遥遥领先于西方思想界而产生。它不但产生了，作为一种体制，它还不同程度地被实践过。例如周朝的井田制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就与社会主义试图达到的理想在一定的层面上相通。所谓井田，它的田地排列形式像一口井，中间那一块地是公田，周围还有分量相当的八块私田，八块私田都是分给八户人家来种，

基本上是平分土地的形式。各家各户有自己的自留地，但是也有公家的公有地。这种土地分配形式与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制颇相近，至少在实际的经济效果上是相近的。这不是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主义吗？孔子非常崇拜井田制。春秋以后，礼崩乐坏，井田制逐渐被废除，孔子为之痛心疾首，认为一定要恢复这种制度。所以，孔子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主张社会主义的。孔子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见《论语·季氏第十六》）孔子主要强调均贫富，宁可日子过得穷一点（寡），也不能有太大的贫富悬殊（不均）。憧憬一种使少有所养、老有所终、互相关怀爱护的集体富裕社会。后来到了西汉的王莽，还搞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他搞的社会主义是与现在的社会主义有区别的。王莽还想重新搞孔子特别推崇的井田制。王莽虽是皇亲国戚，但小时候受排斥打击，有过种种困顿的遭遇，对民间疾苦颇有了解。他发现当时的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已经成风，造成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状态，发誓要把这种贫富不均的现象消除掉。所以后来他当政之后，便主张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拿来平分。平分之后就搞成井田制那种形式。所以他搞的，实际上也是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当然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可能成功。想单枪匹马地从上自下地依靠皇权而和整个大地主阶级为敌，岂能成功？他缺的就是马克思这一套阶级斗争学说，所以折腾了十几年，最终失败了。所以，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体制中和中国古代思想家（例如儒家）中，早就有了某种程度的表现，不是说一定要在西方才能产生。这一来，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五四前后，那么多西方思想哗啦啦全部过来了，而中国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人为什么容易认同这种理念？如果没有历史上这个根子在这个地方，就很难真正地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它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因为马克思提出的那些理想，很多暗合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东西。当然它们不等同，但很多是相通的，容易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共鸣。再加上在五四那个时代，西方社会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搞得一塌糊涂，它所奉行的社会体制也就显得捉襟见肘。只有这

一套社会主义理想，还没有经过大量实践，如果它有弊端，那么弊端也还没有暴露出来，所以它作为一种理想的东西，就很容易被接受。加上它跟传统的某些东西是相呼应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容易认同它。

同样的道理，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会那么发达，社会主义不够发达？资本主义发达，因为他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商业的繁荣，它那四通八达的航路和战天斗地的征服精神与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容易使它往商业那边、往资本主义那边发展。当然，中国也不是说就没有资本主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不就是商朝的遗民在经商方面很有特色吗？中国的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得也还是不错的。但是中国的环境条件与社会现实规定了它不可能完全让商业没有任何限度地发展。它主张重农抑商。它抑制商业，抑制资本主义。抑制，不是说不让资本主义存在，而是不让它成为主流体制。所以资本主义这种形态，或者说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实际上在中国早也古已有之，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我们再看看经济方面贫富悬殊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平等的程度要高于西方社会。西方社会要么是特别的穷，要么是特别的富。这跟西方民族的思维模式也暗合，即他们往往倾向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要么是A，要么是非A。轮廓非常鲜明，对照非常鲜明。而中国人奉行的思维模式是阴阳互转互补的模式。你现在富有，但是可能以后就不富有了，这种贫富转换是存在的，甚至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转化？为什么一个社会成员现在非常富有，以后过一代两代就不是那么富有了？这里面有诸多的因素。首先是中国人均等思想，尤其是对均田思想，对均贫富思想的那种青睐。既然华夏各族都是一家人，自然在理论上希望所有的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集体主义一定会上升而个人主义就不会像西方那样受到推崇了。但是，还不光是这个可以解释，还有一些法律上的或者一些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可以解释这一点。比方有一种法律规定叫做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制在西方颇盛行，它的存在加剧并确保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越来越没钱这种状态。因为如果实行长子继承制，比如你八口之家，你有很多家财。

一家之主临终时把家产都给谁了？都给最大的了，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都没有。然后老大的长子又再继承下去，所以他那个财产可以不断积累。于是造成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穷。而在中国，一般只有皇权的继承才运用这个制度。皇权不用这个制度不行，如果皇子皇孙自由竞争，岂不名正言顺地你争我夺，国无宁日？所以皇权继承取长子继承法，是一种弥合争端的好办法。但是传统中国人他有能力不把一种制度一竿子插到底，他在老百姓中就不提倡沿袭这长子继承制。既然都是一家子，按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价值观，老百姓家中的财产一般都是均分，老大、老二、老三，基本上比较公平地各得一份家产，实行的是家庭社会主义。所以一个家族再有钱，百万富翁，如果你生出20个儿子来，那20等分，每份就没多少了，连续分上个几代人，完了，最有钱的到最后都变成没有钱了。所以在中国，你总会发现，有钱的家庭要世世代代都有钱，根本办不到，它延续不了几个时代。今天繁荣，过一段它又变成穷的了。所以在中国社会中，自古穷通贱贵，有一种循环。这种现象，通过文学作品的描写渲染，几成共识。因此上述这些东西造成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与西方的差异很大，这是我们通过比较才鉴别出来的。

政治方面我也再讲几句。政治方面，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宗法式的，家长式的，因为它认定它要统治的并非蛮夷之族，而是家里人，是自己人，因此它要强调什么是很清楚的。它肯定不主张、也不敢主张拿武力来统治人民，而是试图用德的方法来统治，强调德治。但是有了德治，它讲不讲法？有法，它叫王法。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以德治为主，以王法（法治）为辅。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德治又从何开始？从皇帝开始。皇帝首先得是一个好皇帝，有一整套的东西，从小就有博学的师傅教他。四书五经，他必须读得烂熟。德治强调，只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才可能是一个好的统治者。同理，下面的官员，也都得通跑去念国家认为可以陶冶出好的人格的那种书，比如四书五经。这一套书涉及到仁、义、礼、智、信各个方面，但核心是如何修齐治平，如何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只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成了一个合

格的好人，才能够参与管理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是先强调这一套东西，然后才有相辅助的各种具体法令。而西方不是这样，古代的西方虽然也有宗法制，但更多宗教内容，再加上较为完密的法律。稍后的西方社会则主要是“力治”（注：不同于“吏治”）加上法治。所谓力治无非是警察呀、法庭呀这一整套非常严密的东西来强制执行。但是在近代的西方，则又主要是以法治为主，然后再辅以力制。不服从的话，有监狱在那个地方，有警察，有法院，整个这一套东西。因此它是以法治为主，以力治为辅；而中国古代是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政治方面最敏感的题目是民主问题。这两大形态的社会，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今天大家都在谈论民主。谈论的结果是，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以前没有民主，好像全是专制，好像只有西方社会才存在民主。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实际情况是，中国的民主是另外一种民主。这就牵涉到要说清民主到底是什么，得从概念上探讨一下什么是民主？照我看来，民主的真髓，归根结底，还是权力分配的问题。就是说，每个人有多大的机遇从社会现存的权利总和中获得自己想获得的一份权利。或者说，应该用什么机制来使大家分享权力（包括发言权）的方式比较公正？古代中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摸索了两三千年，终于找到一个方法，什么办法？考！用严格的方式来进行考查、考核！因为学者们研究过来、研究过去，发现无论多么有德行的英明的天子，要永远都能准确无误地遴选出贤才，是不可能的。权力更不能靠皇帝想当然地给谁就给谁，怎么办？只有连皇帝都无法干预的考试才是相对说来比较公正的形式！于是发展出一个科举制，用科举制来考，考的人合乎条件，就可以当官，白屋可以出公卿。你就是一个讨饭的，你考上了就可以做状元，就可以当宰相。所以从唐宪宗到唐懿宗的133个宰相中，有104个宰相是进士，进士的文化水平有多高？相当于博士，实际上比博士水平还要高一点。104个博士来管理国家事务，你说唐朝的文化为什么会那么发达，会走在全世界的前面？这道理非常明显，这么高文化水平的人在领导这个国家，怎么会不发达呢？这些进士辅助皇帝，和皇帝分享权力。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从社会的不同层面代

表了不同的声音进入国家执政集团，与皇帝一起共同讨论如何治理国家。皇帝个人的看法，也常常被他们以委婉的方式否决，相应的监察制度、监察官员，各类谏官、拾遗之类，整合起来，构成一种以皇帝为首以知识分子精英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各类方针政策，常常要经过朝廷大臣的公开辩论，才能最终定夺。这种讨论有时不限于朝廷官员，普通人有妙计妙策也可以上书。地方官员或学者有时还可以进京与宰相（总理）为首的朝廷官员就某一国策进行面对面的平起平坐的辩论。比如至今犹存的厚厚的一本《盐铁论》就生动地记载了地方学者（贤良、文学）等与朝廷的财政大臣在皇帝面前就盐铁应该官营（国有）还是私营（私有）进行了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的大辩论。这不是民主，是什么？人们习惯于说皇帝专制。皇帝有时在某些方面确实专制。但是在国家大事上，皇帝一个人专什么制？没有一个权力集团帮他出主意、想办法、鉴定可行不可行，他什么都做不了。所以关键是由知识分子精英构成的权力集团。这些人都是主要靠考试才当上官的。当然有人会说，科举考试有作弊的现象。试问天下有哪一种考核制度没有作弊的现象？考试会作弊，一点不考，任人唯亲，倒反倒不是作弊了？笑话。实际上古代科举考试是很严格的，比今天的考试制度要严格得多。所有的考生如果品行不端，只要有人检举，立刻取消考试资格。清朝若干朝代的科举考试还禁止八旗子弟参加考试，以防作弊。凡作弊者，有牵涉的官员往往有杀头之虞，其余考生，亦往往连坐，充军、流放、抄家，不一而足。考卷实行弥封制，今天叫密封制。考生做的卷子要专门雇人全部用朱笔重抄一遍，姓名也全部弥封，以防考官认识考生或考生笔迹。这种防范措施，往往连皇帝都难以开后门。如果仍有不良现象，那是不可避免的例外，不能说这种考试形式本身是坏的。这种文官考试制度被介绍到了西方，使西方人大开眼界。传到伏尔泰那里，伏尔泰佩服得简直五体投地：原来中国人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产生了这样先进的文官制，居然是靠上帝的恩惠而是靠人自己的理性来管理的人的社会。他发现西方人都是靠打打杀杀，你拉一帮，我拉一派，今天把他推上去，明天把他拉下来，靠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公正地遴选考核行政官员的机制。所以后来现代西方

不断地在学古代中国的这种文官考试制度，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学到手。对科举制要辩证地看，例如它考试的内容，就有偏废，对科学技术方面的考试比较薄弱。但是具体内容可以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进行改进，把它本身全盘否定，是否妥当，很值得反思。在五四的时候，出于某种政治原因，暂时废除，情有可原，但后来人应该把它合理的成分吸收出来，加以改革利用。比如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在某种程度上与科举考试就有相似的地方。当然，我觉得还做得不够。拿科举跟西方的选举相比，哪种形式的实际民主含量高，值得探讨。

西方民主主要是靠所谓的选举来实现。但选举哪赶得上科举公正？科举是严格的考试，选举就是拉帮派，就是这一派那一派，各派把自己觉得好的人推上政治舞台，没有客观准则。其实你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就会发现，但凡你推举一个人，往往是推举和你利益相关的人，你说哪一个人最厉害、最称职，你没有一个非常客观的考核你怎么知道？你只能凭印象。入大学靠推荐选拔之所以行不通，最终走上今天的比较严格的考试制度，就是同样的道理。西式选举制的作用的实质是各个利益集团在利害权衡上的摩擦交锋，最后达到一种权益制约作用，普通老百姓实际上根本无缘挤入权力集团。当然这种制度客观上也能产生一种民主的效果，但是它跟中国的这种科举式民主比起来，显然是落后于中国的这种民主形式的。所以这种民主形式，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精英民主制。而西方的民主制是通过选举而来的党派式竞选民主制。

中西文化的方方面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进行有趣的比较，比如艺术的比较，文学的比较，建筑的比较，风土人情的比较，音乐、体育等等的比较，时间有限就这样结尾吧。

中西文化比较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姑且概括为中西文化是互根、互构、互补、互彰、互抗、互证阴阳循环互进论。我以此题目写过一篇文章，已经发表了，有兴趣还可以参看。

谢谢大家。

诗、音乐和国民性： 路德改教的日耳曼传统

朱孝远

朱孝远，男，1954年2月2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史学工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进入上海师范大学，分别在历史系、英语系、艺术系学习史学、外语和音乐。1982年毕业，任上海师范大学教员。1986年获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欧洲中古史硕士学位，1990年获美国俄勒冈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2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负责招收和指导世界史欧洲中古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世界古代史、世界中古史、西方史学史、史学理论四个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社会兼职有武汉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南京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英国史学会理事。1998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德国宗教改革”。这是一个老题目，已经被别人研究得很透了，所以不太好讲。我把这个大题目分成四个小题目：第一，什么是德国人；第二，日耳曼传统；第三，日耳曼传统反映的德国宗教改革；第四，德国走的只能是德意志道路。我们要说明的无非是三个观点：第一，日耳曼的历史是独一无二的；第二，马丁·路德搞的宗教改革是日耳曼传统的复活；第三，德意志道路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一条近代化道路。把马丁·路德放到日耳曼传统里作解释，我们平时很少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马丁·路德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尔文传统的复活者。

我们来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德国人。在西方文明里面，有各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风格。当我们讲到文明史，强调什么是文明的时候，总是讲三件事：一个是思维方式，一个是文化传统，还有一个是国民性。假如我们把德国人同西方的其他民族作一比较，我

们就会感到德国人的一些习性是独一无二，而且令人钦佩的，在西方文化里它独树一帜，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我到德国去，首先感到德国人的性别不太分明，女性很男性化，很高大，男性很温柔文雅，性别方面的特征不是太明显。我的第二个感觉，就是感到德国人有一种反思。德国人的反思和俄罗斯人的反思是不太一样的。俄罗斯人是宗教的反思，是文学的反思，是艺术的反思。德国人是另一种反思，是哲学的反思，或者说是优秀的反思。他必须变得优秀，所以要读很多书。德国人很喜欢学问，喜欢音乐。音乐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把人的一些兴奋点、强度充分地揭示出来了。德国出了那么多哲学家，那么多思想家，为什么？他们追求生活的精度、深度、广度，以及它的强度。德国人对于那些抽象的概念是很喜欢的。德国是个诗的民族，为什么？他们喜欢抽象的东西，为什么会喜欢诗、喜欢哲学？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统一的东西，所以希望统一，而诗和哲学恰恰是要强调普遍性的。

德国人办事非常认真，做事情一步一步来。他搞60年代的水平就一定是60年代的水平，没什么说的；如果他搞70年代的水平，就一定是70年代的水平。德国人不浅薄，他喜欢生活中的一种厚度。比如说，德国人对婚姻是极其重视的。假如一个女孩儿突然之间说：“我不再和你谈朋友了。”那个青年保证说：“算了，我不再来找你了。”不像美国人，非常浮躁，跑到哪里都是“I love you”，弄得美国的姑娘一开始就要学两句话，一句是“I don't know”，一句是“Yes or no”。德国人从来不拖泥带水，他一开始就是干干净净。德国人做事情有一种完美主义的心情。比如钉个桌子就要钉得很好，永远也坏不了，所以没办法去换新的。德国人在研究上也是这样，做一件事就要追求完美。德国不见得很前沿，但它像集团军一样，整体的一步一步的走。德国的文献是最可靠的。美国人非常海派，永远就是追求前沿，但是搞不清楚的时候总是去找德国文献，一查总是对的。

德国人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民族。他保留着自己的一整套的传统。这一整套传统使他很坚持自己的那一套。他只相信自己的祖先，老在反思自己的民族传统，深不可测，永远都在追求康德怎么说，

黑格尔怎么说，以前的人怎么说。你看文艺复兴对德国影响不是很大，启蒙运动对德国影响也很小。德国就是不喜欢外来的那些东西。你说文艺复兴、但丁算什么，我们有马丁·路德；启蒙运动算什么，我们德国德国的有一套。所以德国的文化就是光荣孤立的。德国通过自己的反省把自己变得很优秀，产生出极伟大的思想家，然后拿来教育世界各国的人民。他是精神的导师、文化的导师。德国很乐意把文化输出，很乐意在思想上、哲学上、文化上以自己的优秀性教育其他的民众，但是他就是不怎么喜欢别人的东西。

德国人有一种很奇怪的精神叫“服从”。服从什么？服从优秀。德国人服从的是一种优秀，他不是服从世袭的等级，他要追求一种获得性的身份，而不是一种天生的身份。你优秀，他就心服口服。

德国人是比较道理的，不像英国人是靠经验过日子，是经验主义；德国人是强调底蕴的，不像美国人喜欢搞高新尖，不注重底蕴；德国人是喜欢服从一种终极关怀的，一想就想到了人到底怎么活着，死了又到哪里去。追根溯源，就到一种终极关怀里面去了，不像西方其他民族是追求一种表面的效果；德国人喜欢做减法，不喜欢做加法，看到有什么东西不顺眼就把它去掉，这个很危险，我们学历史的总是追求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我们做加法，不做减法，但德国人为了真善美，放眼一看，不入眼的全去掉，这就很危险。德国人还崇拜一个纯净。我们中国人就不是，我们说“水至清而无鱼”嘛，德国人就不喜欢混杂。像我们上海菜是很清楚的，青菜炒萝卜就是青菜炒萝卜，不像北方的鱼香肉丝之类的，很混杂。所以德国朋友到北京来你们千万不要请他们吃鱼香肉丝，给他一个清清楚楚的东西，南方菜就很好。

德国有一种深度，深度是和表面现象相对立的。你把现象学那套东西弄到德国去，什么东西就事论事，他不干，他要追求一种深度。德国人很注重一种集体主义，一种次序。德国人终身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样人才能变优秀。

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种精神就使得我们要对他进行研究。那么我正好是搞历史的，一追究就追究到古代去了。于是就发现日耳曼这个民族比较奇怪。日耳曼这个民族是西方民族中很奇怪的一个

民族。它有自己的那一套。我感到的日耳曼最奇怪的一个现象是它是一个比较落后的蛮族，但是它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叫做“蛇吞象”。它一口吞了两个东西，一个罗马帝国，一个是基督教。于是就消化不良，于是它就以日耳曼的传统来对“大象”进行消化。

它把帝国拆散，搞了两个东西，一个是多元化，就是后来的封建主义；一个是地方化，地方主义一来它就可以分散消化。还有一个大的东西，基督教。基督教它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消化，一个是消化了教会，一个是消化了国王。结果造成了教会和国家的不统一，教会和国王的对立，形成了中世纪的那一套。说到蛇吞象，我们马上想到马丁·路德也是蛇吞象。马丁·路德后来的宗教改革做的就是这件事，无非就是再一次的蛇吞象。他把教会分下去了，变成了多元化的教会，还把国家分下去了，再一次用日耳曼的传统对教会进行了改革。

日耳曼传统里的奇特现象使我们深深感到它的可爱，它的可爱之处首先是和他的“蛇吞象”现象有关。同时我们发现它是一种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我们知道任何政治的发展总是有四种类型：一种是放射型的。像法国本来是法兰西岛，英国本来是南部的英国，中国大概是黄河流域一带，从中心向四周辐射，发展为大的国家；第二类是同化型，就是共同的人比较多，形成了一个民族，后来慢慢发展成了现在的民族；第三类是分裂型的，就是从某一块上分割一块，像美国从英国分过去；还有一种叫向心型的，向心型是没有边界的，就像把什么东西撒在各处，然后向当中靠拢。德国是向心型的，不是从中心向边缘扩散，而是边缘向中心走来，这是日耳曼传统的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日耳曼传统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它一直保持了自己的部落性，它只是一个个的部落，一个个自己的种族，不是一个民族，它没有一个“国家”这样的概念。

从文化的传统来看，它的关照范围很广，它的关照范围是一个世界，一个帝国，在这样一个大的范围内进行关照。我们还看到它的历史上还有一些特点：一是它有一个选举制度，其他的国家搞的都是世袭制，但德国不是，德国搞选举制，一直搞选举制，主要就是凭实力，凭实力就是说承认获得性的地位，不是承认你的血缘。

获得性地位怎么来，优秀来。

另一个情况也很奇怪。德国这个国家是四分五裂的。在英国和法国走向民主国家的时候，德国强化的是诸侯领地。所以当封建制在其他国家衰落的时候，德国的封建制不衰弱，而且还发展。结果德国只能搞联邦道路，而不能搞中央集权的道路。俾斯麦曾作过一个短暂的统一，但实际上那还不是真正的统一。从日耳曼传统来看德国这个情况，它总是很关心外部的影响，外界对德国是一个动力，外界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只要外界有什么风吹草动，德国内部就会随外界环境进行调整。德国可以根据外界的压力来调整自己，却不能从自己的内部来调整自己。

我们还想到一种情况，就是日耳曼人实际上是有一个过渡。日耳曼人是非常喜欢自由的，非常渴望自由，不能忍受任何的压抑。自由一般可以有三种：一种叫自然人的自由，一种叫文化人的自由，一种叫自由人的自由。日耳曼人有三种不同的自由观。自然人的自由就是说人处在一种淳朴的自然状况下，他是自由的，任何一个自然人总是自由的。但是自然人比较善良也比较淳朴，老爱受气。所以自然人往往引起“受气”的结果。这种结果产生了一个德国神话，就是“米歇尔”现象。就是一个精灵米歇尔，这个米歇尔是个受气包，老是不断地受侮辱。这就是自然人的自由观，结果它造成了日耳曼人的一种为了自由可以遭受人家屈辱的一些东西；第二种文化人的自由。日耳曼把基督教世界给吞并了，把罗马帝国给消灭了。它建立了高于它自己的文化。这样一种交换对于自然人来说是一种痛苦的交换。所以德国的文化里就出现了另一个形象，就是浮士德形象。浮士德不是一个受气包的形象，是一个为了征服世界与魔鬼交换灵魂的形象，这就是文化人的自由。如果说自然人自由、米歇尔形象是正体，那么文化人的自由、浮士德形象就是反体。马丁·路德实际上就是把正体和反体合并起来，就是合体。

从这里面来看，日耳曼传统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看到了日耳曼人有一种充分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日耳曼在中世纪是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但是皇帝的头衔怎么会落到德国人那里去了呢？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有一个边境，罗马帝国的边境却不把日耳曼人包括

在内。罗马人对日耳曼人产生了影响，却没有把他们包括在内。后来日耳曼人从奴隶到将军，把罗马帝国消灭了。

还有一点，罗马教会受罗马的影响要胜于受希腊的影响。希腊人的精神很少能激起罗马基督徒的激情。希腊精神里有很多东西，像强调生命力，强调极度的诱惑和极度的克制，强调动态的平衡，强调文化的修养。罗马强调军国主义，强调秩序，强调服从，强调外在的东西。这样比较一下，希腊的东西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影响很小。罗马对日耳曼的影响也不如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来得大。这种情况，使日耳曼有机会保留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的保留使日耳曼在它的发展道路上独树一帜。

这样我们就开始讲马丁·路德。我们讲马丁·路德实际上就是讲他搞了一场日耳曼传统的复兴运动。我们不如开宗明义地说，路德的改教被称之为“路德复兴”，其实并不是同人文主义者有什么瓜葛，而是指他通过复兴希腊传统、日耳曼传统和《圣经》中的原教旨基督教教义，完成了对罗马——天主教会传统的反动。日耳曼人的三种自由观即自然人的自由观（米歇尔形象）、文化人的自由观（浮士德形象）和路德的自由人的自由观（基督教的自由），完成了信仰的自由性，亦即驯服到了极点，反抗到了极点之间的统一。在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把凯撒的还给凯撒的两分法中，精神和肉体各归其所，这样，诗性、内心涌出、精神化、音乐化的希腊—日耳曼精神就解构了罗马—天主教会中所倡导的仪式、等级、强力、外在、控制，从而完成了原教旨的基督教教义。强调内心、舍弃、平等、虚心、自由、怜恤和饥渴慕义的信仰观成为本真动力，从而完成了日耳曼传统的又一次蛇吞象——通过消解外在形式，基督教回归到了它的本真信仰。

那我们总结一下，看看为什么说路德继承了日耳曼传统。根据我们刚才第二个问题的说法，我们总结一下日耳曼有什么传统：

日耳曼是部落，不是国家，是一种部落传统，不是国家传统。

它是从奴隶到将军，从米歇尔变成了浮士德。

它有一个“蛇吞象”的现象。

日耳曼民族是众多生活在农村的民族，对城市天性不满。所以

当日耳曼人征服了罗马帝国以后，他们不想进城，觉得城市讨厌，是一切腐败的根源。

日耳曼传统很强调平等和团结，人人应该平等，应该团结。

日耳曼人强调忠诚，对优秀的服从，反对世袭制度，要求一种获得性的地位，并对此进行服从。反过来也可以这么来理解，社会上获得比较优秀的地位的人，都是比较优秀的人，你就该对他进行服从。

日耳曼传统里很重视血亲和家庭。我们说罗马人是放大的国家，希腊人是放大的个人，只有日耳曼人是很重视家庭生活，很重视血亲原则的，罗马帝国那么强大，日耳曼人怎么能战胜罗马人呢？总之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罗马帝国自己的衰落；二是因为日耳曼人的家庭关系、血亲关系对罗马人很有吸引力，对希腊人也有吸引力。希腊的法律里特别强调丈夫一个月要回到家里和妻子过三天，可见希腊人很喜欢在街上过夜，跟着苏格拉底这样的丐帮领袖在街上不想回家，是放大的个人。罗马人是放大的国家，所以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里大谈一通：罗马人是反伦理的，把妻子当成财产，搞得不伦不类。所以日耳曼人对当时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有吸引力。你看他们过的是多么好的家庭生活，多么相亲相爱，多么有血亲原则，从道义上来说他是占优势的。

日耳曼传统有语言传述、形象思维的习惯。因为他们喜欢用形象思维，用普通语言来说话，很反对用高深的语言来说话。

强调刻苦勤劳，勇于前进。

日耳曼人相信精灵生活，所有的精灵并没有什么黑白之分，什么白天与黑夜的斗争，什么神和魔的斗争。他们相信精灵，相信善良的童话世界。日耳曼传统很重实际，很重生活本身，相信命运就是过程，命运对人人都是平等的。

然而，这样一种传统到了中世纪就扭曲了。为什么呢？中世纪的地方制度，不完全符合日耳曼的传统，尤其是外来的干涉，所以德国后来叫自己“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它受不了这样的一个称号，它既不是神圣，又非帝国，后来的查理曼帝国，现在的神圣罗马帝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16世纪出现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对所有这些不满的爆发。我们看到有人跳了出来，这个人叫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是中世纪四大阶级的混合物。他既是农民，又是工匠，既是僧侣，又是学者。我们注意到，马丁·路德的复杂的出身非常重要，因为他是代表了那个世界四大阶级的混合物。马丁·路德是从底层发动的，这也是个日耳曼传统。因为日耳曼总是以小见大，总是从底层发起，然后把周围的强敌给消灭了。所以从底层发起那样一种宗教改革运动正是一种日耳曼传统的继承发扬。我们只要把日耳曼人的传统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提出的原则进行一下比较，就会看到马丁·路德的所有思想都是日耳曼传统的发扬，而不是其他的思路。

首先，马丁·路德提出要取消圣礼，取消僧侣的特权，把僧侣当普通人。这样一种想法是日耳曼传统里“人人平等”的这样一个思想的发展。因为宗教仪式就是造成了人的不平等，把僧侣当成了一种带有神性的人，实际上僧侣未必就是神圣，那些宗教仪式未必就是神圣。马丁·路德提出，人人都是自己的牧师，这里把普通人变成了圣人，这就抹杀了所有的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的区别。当古代的日耳曼民族占领了罗马帝国以后，它们也是以同样的平等性来建立新的秩序的，它们要把古罗马的贵族变成平常人。所以马丁·路德提出的取消僧侣特权的做法正是发扬了日耳曼传统的这个精神。马丁·路德还不肯放过教皇，他提出了要推倒三座墙：一座是世俗和教会之间的墙，教会凌驾于世俗社会之上，马丁·路德认为世俗社会为什么不能凌驾于教会之上；第二座墙是只有教皇才可以解释圣经，马丁·路德说每个人都可以解释圣经；第三座墙是只有教皇才可以召开宗教会议。从这些情况来看，马丁·路德突出了日耳曼的一个传统，即人人平等。

马丁·路德提倡废除形式，实现内容，凡是与日耳曼传统不符的东西他都想取消。他要取消修道院，因为它和日耳曼的平民传统不符合。他喜欢农民的主席，他提倡贫贱者最高贵。他要用大众的语言、德国的语言。马丁·路德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反对知识分子，他要取消知识分子的三大骄傲。知识分子有三大骄傲：因为自己有

了一定的学问，就对权力产生了骄傲，对人民产生了骄傲，对经济产生了骄傲。马丁·路德要取消这三大骄傲。马丁·路德具有很典型的农民性质，于是他反对商人。他觉得城市不好，商人腐败，他反对商业，反对奢侈的生活。马丁·路德喜欢搞勤劳刻苦的锻炼，他是用做实验的方法来进行体验的。所以他有时候去做僧侣，有时候去做学生，家庭背景使他学过一些法律，他还教过亚里士多德。马丁·路德是最不喜欢亚里士多德的，他把他当敌人，觉得大学应该把亚里士多德赶走。从这些情况来看，马丁·路德反对抽象的语言，他要用实践出真知这样一种方法来解释《圣经》。

马丁·路德提倡一种忠诚性。一是要忠诚于《圣经》，二是你认为这个东西是对的你就要信它。马丁·路德非常强调生活性，生活高于一切，生活产生动力。于是僧侣可以结婚，可以以过平常人的生活。这种生活产生动力的动力观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其他的民族三个动力观：一是信仰产生动力，二是功利产生动力，三是理想产生动力。日耳曼人的动力观不是理想，像希腊人是理想产生动力；也不是功利。日耳曼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他要优秀，但不是为了功利去取得优秀，他即使有了很大的劳动，你表扬他一句就可以了，他不会因为有了这样的功劳就要坐一个什么位置。马丁·路德在这里发扬了日耳曼人的生存产生动力、忠诚产生动力的动力观。

马丁·路德让人感到模糊的一些概念，是他三个界、三个秩序的理论。他认为一个人生活在三界之中：下面是魔鬼，上面是天堂，人居于中道。当中就有三个秩序：一个人要成为家庭的一员，教会的一员，国家的一员。假如一个人成为家庭的一员，家里就是一种伦理关系，就要受伦理的束缚；教会里你就要受道德的束缚；国家里就要受法律的束缚。就是他的三界和三个秩序。

从马丁·路德的改教来说，他有一种中庸之道。马丁·路德的中庸之道和中国的中庸之道不太相同。中国的中庸是消灭两个极端，建立一个中道；马丁·路德是把两极拉得很开，留下来的自然就在中道了。这样的想法从某个角度来说应该是他日耳曼传统的发挥。他还造成了一种很有趣的结果，就是教会的分裂，他产生了“蛇吞象”的现象，把教会吞下去，消化不良，就把它变成不同的教派。

从这些情况来看，马丁·路德的改革是日耳曼传统的发展。他的革命是农民的革命，他就是要恢复日耳曼传统的那一套，他的革命性质有点像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帝国，征服宗教。他觉得日耳曼人血液里的一些传统经过若干年后已经变得不纯洁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用日耳曼传统对一切被外界扭曲的制度进行反抗。这是马丁·路德改革的性质。我觉得，德国不能按别的国家的设想，走一条别的国家的近代化道路。因为德国有自己的这么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加上它的优秀性，它也能发展起来，而且发展得很不错。如果你要用别的国家的经验套在德国上，没有一样是套得上去的。德国后来走的是联邦道路，大家平等，互相独立，不是像英国和法国式的那样一种中央集权。

最后，我要总结几句：德国人有一种日耳曼传统，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日耳曼传统的发扬，德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日耳曼精神和现代压力下产生的德国化的现代化道路。我的所有的以上这些看法不见得正确、准确，只不过想说一下在研究德国历史时要多多注意“德国特色”这个词，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德国，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德国历史时开辟出许多新的知识点和新的研究领域来。

谢谢大家！

帕斯与《太阳石》

赵振江

赵振江，北京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目前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长。翻译和著作曾先后两次获得北京大学科研成果奖，五次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智利中国文化协会曾于1995年授予他“鲁文·达里奥”最高骑士勋章；1998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又授予他伊莎贝尔女王勋章；1999年阿根廷共和国授予他五月骑士勋章，以表彰他对中外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1992—1996年任北大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92—1997年任国家教委高等院校专业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曾于1997和2001年先后两次聘他为鲁迅文学翻译彩虹奖评委。1987—1989年应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之邀，从事修订和校注西文版《红楼梦》的工作，该书的前八十回已在格拉纳达大学出版社分两卷出版。著作有《拉丁美洲文学史》（合著）及学术论文多篇，译著有《拉丁美洲诗选》、《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西班牙语反法西斯诗选》等。

帕斯（Octavio Paz，1914.3.31—1998.4.22）是墨西哥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出生在墨西哥城的米克斯科阿克小镇。祖父是记者并发表过以印第安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祖母是印第安人。父亲是记者和律师，曾任墨西哥革命中著名将领萨巴塔驻纽约的代表，母亲是西班牙去达露西亚的移民，虔诚的天主教徒。帕斯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土著文化与欧洲文化互相渗透、自由气氛与宗教气氛彼此融合的环境中度过的。1931年，帕斯17岁，便与人合作创办了《栏杆》杂志（1931—1932）。两年后又创办了《墨西哥谷地手册》（1933—1934），介绍英、法、德等

国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刊登西班牙语国家著名诗人的作品。193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野生的月亮》。1937年,帕斯曾去尤卡坦半岛为劳动者办学。他在梅里达发现了荒漠、贫穷和伟大的玛雅文化,这便是《石与花之间》创作灵感的来源。同年,他应邀去西班牙参加了第二次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结识了当时西班牙语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巴略霍、维多夫罗、安东尼奥·马查多、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塞尔努达、阿尔托拉吉雷等。这一年,阿尔托拉吉雷为他出版了《在你清晰的影子下及其他关于西班牙的诗》;回到墨西哥后,他又出版了1936年创作的《休想通过》和《人之根》等作品,前者是为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民阵线募捐而作的。会议结束后,帕斯曾去巴黎作了一次短暂的逗留,古巴作家卡彭铁尔带他去访问代斯诺斯,这是他与超现实主义作家们最早的接触,并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班牙内战以后,大批共和国战士流亡到墨西哥,帕斯积极热情地投入了救援工作。在此期间,他出版了《在世界之岸》与《复活之夜》(1939),并创办了《车间》(1938—1941)、《浪子》(1943)等文学刊物,成为“车间”派诗人中重要的一员。1944年他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赴美国考察并对拉丁美洲诗歌进行研究。一方面,“可怕的美国文明”令他吃惊;另一方面,他有幸结识了艾略特、庞德、威廉斯、斯蒂文斯等诗人。在考察期间,他创作了著名杂文集《孤独的迷宫》(1950),对墨西哥的历史及墨西哥人的性格进行精辟透彻的分析。1945年,他以《明天》杂志记者的身份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一段经历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日后能站在人类和世界的高度来确立自己的创作态度和价值取向。

从1945年起,由于诗人戈罗蒂萨的帮助,帕斯开始从事外交工作。他首先去了法国,在那里达六年之久。在巴黎,他积极参加了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作家们的活动,结识了萨特、加缪等著名人物,经常与他们一起切磋诗歌艺术、探讨人类命运、交流对文学与政治、诗人与社会的看法。在结束了在法国的外交生涯之后,帕斯曾于1952年在日本、新德里和日内瓦作短暂的逗留。1953年他回到了祖国,1956年出版了诗论专著《弓与琴》,并获得了比利亚乌

鲁蒂亚文学奖，这是授予墨西哥文学专著的最高奖赏。1957年他又出版了文学随笔集《榆树上的梨》和长诗《太阳石》，后者无疑是帕斯诗歌中的珍品。1958年他出版了《狂暴的季节》，这些诗作体现了诗人青年时代的结束。

1959年帕斯再度出使外国。前三年在法国，后来在印度，直至1968年为抗议本国政府在三文化广场镇压学生运动而愤然辞职。这期间发表的作品主要有诗集《蝶螈》（1962）、文集《四岔路口》（1965）、《旋转符号》（1965）、《田野之门》（1966）。《交流》（1967）等。

帕斯回到墨西哥以后，除了进行文学创作之外，主要是去美、英等国的大学讲学。如果说1953年回国后的创作是为了表现墨西哥，这一次则主要是为了剖析与改变墨西哥。在此期间，他创办了《多数》（1971—1976）与《回归》（1976）杂志，主要作品有《可视唱片》（1968）、《东山坡》（1969）、《回归》（1976）、《向下生长的树》（1987）。1989年他还亲自编选了《每日之火：帕斯最佳作品集》。散文和文论作品有《结合与分解》（1969）、《拾遗》（1970）、《淤泥之子》（1974）、《仁慈的妖魔》（1979）、《修女胡安娜或信仰的陷阱》（1982）、《乌云密布的时代》（1983）、《朝圣者在祖国》（1987）、《视觉的特权》（1987）、《另一个声音》、《诗歌与世纪末》（1990）等。

在帕斯的诗歌中，《假释的自由》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他在1949年出版了这部诗集之后，以后又一再扩充并修改，但仍沿用同一个名字，可见它在诗人心目中的地位。其中的《太阳石》是帕斯最具特色的诗歌作品之一。在这首长诗中，帕斯利用电影蒙太奇的技巧，将一系列“非时间”的形象剪接起来。全诗584行，正好与阿兹特克人历法中一年的大数相同，首尾相接，形成环形结构。它既是情诗，也是史诗，同时又包含着帕斯以及他那一代人的亲身经历。在这首诗中，帕斯完全打乱了时空界限，将神话、现实、回忆、憧憬、梦幻融为一体，充分展示了诗人激越的情感和丰富的想像力。

在杂文集中，《拾遗》与《仁慈的妖魔》则是《孤独的迷宫》的补充，它们都是对墨西哥的现时与过去、历史与文化、专制与自

由的思考和批判。在诗论集中,《弓与琴》无疑是帕斯的一部力作。书名的含义,正好体现了诗人帕斯对待自我的态度:既要像琴那样表现自我,又要像弓那样超越自我。帕斯始终认为,诗歌和艺术都具有与传统决裂的反潮流的品格,它们不能简单地接受传统,而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变革与创新。《淤泥之子》、《另一个声音》和《诗歌与世纪末》和《弓与琴》同样有着内在的联系。《淤泥之子》是帕斯在哈佛大学的讲稿经过整理而成的。它主要论述了文学与诗歌的目的和传统,分析了宗教与革命对诗人的双重诱惑。《诗歌与世纪末》主要论述了现代性、神话、革命与诗歌的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长篇巨著《修女胡安娜或信仰的陷阱》,它既有学术性又有现实性,是了解墨西哥文学难得的参考读物。

除了创作之外,帕斯还有不少翻译作品,其中包括我国王维、李白、苏武等人的诗词。虽然是从法文或英文转译的,其中却也不乏达意传神的生花妙笔。

作为西班牙语的作家和诗人,帕斯几乎得到了一切可能得到的荣誉和褒奖。其中较重要的有国际诗歌大奖(布鲁塞尔,1963)、西班牙文学批评奖(1977)、墨西哥国家文学奖(1977)、墨西哥金鹰奖(1979)、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1981)、阿尔丰索·雷耶斯文学奖(1986)、智者阿尔丰索十世勋章(1988)、诺贝尔文学奖(1990)等。此外,他还是美国文学艺术学院名誉院士,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的名誉博士。

下面,我对帕斯的长诗《太阳石》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太阳石》是墨西哥著名诗人和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代表作之一。这首长诗一问世,便如石破天惊,引起世界文坛的瞩目。墨西哥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认为:“只要西班牙语存在,它就是用这种语言创作的最伟大的诗篇之一。”西班牙诗人、科学家和文艺评论家拉蒙·希劳则说:“我有三本《太阳石》,一本为了阅读,一本为了重读,一本将是我的随葬品。”

《太阳石》发表于1957年。在此之前,墨西哥文学界的一些评论家看到帕斯创作题材和风格的转变,曾发出“一位才华横溢的青

年诗人受到没落的欧洲文化侵蚀”的慨叹。然而在这首长诗发表之后，一本曾经宣称“要扭断超现实主义的脖子”的杂志一变而成为捍卫帕斯声誉的堡垒。这至少说明帕斯并没有陷入欧洲超现实主义的“泥坑”，而是在“改造社会、改造人生”的艺术探索之中坚定不移地走出了自己的路。

《太阳石》1957年9月在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的《火山岩》选刊上发表。该刊当时只发行300册。在这为收藏家所珍惜的首版《太阳石》上，帕斯为自己的创作加了一个注释（以后的版本上，诗人又将它删去了）：

本书的封面上有用玛雅数字写的584，同时，诗的首尾分别有墨西哥人用来表示第四动日（el Día 4 Olín-Movimiento）和第四风日（el Día 4 Ehécat-Viento）的形象，指出这首诗由584句十一音节诗组成或许并非多余（结尾的六行不算在内，因为与开头的六行完全相同；实际上，全诗并未在那里结束，而是重新开始）。这个数目与金星[9]围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完全吻合：584天。古代墨西哥人从第四动日开始计算金星公转的同期，584天以后，即第四风日，金星与太阳又重新会合，这是一个周期的结束，另一个周期的开始。

在诗前引用的奈瓦尔的诗句中，“第十三个”可能指扑克牌中的最后一张：纸牌如同年历一样，周而复始，以至无穷。正是出于这样的构想，诗人采用了这样首尾相接的环形结构，反复吟咏，一气呵成，虽有几十个段落，却没有一个句号。如此奇特的构思绝不是想入非非或故作惊人之举，而是诗人当时的心理状态与精神境界的体现。

1937年，血气方刚的青年诗人帕斯满怀激情奔赴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前线，然而战争却以共和国的失败告终。回到墨西哥以后，帕斯又积极投入了对西班牙流亡者的救援工作。后来托洛茨基的被暗杀以及斯大林的文艺政策使他迷惑不解，陷入孤独、苦闷和彷徨之中。1945年以后的外交生涯使他有接触西欧、北美乃至东方的各种各样的哲学和文艺思潮。尤其是在巴黎，他受到存在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感染和熏陶，并积极参与了那里的文学运动。然而帕斯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没有成为任何一种流派的俘虏，而是在博

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在创作《太阳石》的时候，帕斯精神上并没有摆脱孤独、苦闷和迷惘的阴影，他仍在坚持不懈地求索着。他在神话传说中寻觅，在人类历史中漫游，在个人记忆中打捞，以求找到“改造社会与人生”的正确途径，使“爱情、诗歌、革命”这三个燃烧着的词汇得到统一，使人类被“现代社会”扭曲和分裂的本性得到恢复。但诗人并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并没有看到真正光明的前途，他的寻求也就如同太阳历一样，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

全诗站在太阳石的高度，以无人称开始。然后出现了“你”，太阳石才有了交流的对象。这是一个女性的形体，世界由于她的晶莹透明才变得清晰可见。接着“我”便出现了，并“从光的拱门进入晴朗秋天的长廊”。在诗人的想像中，女性的“你”与世界融为一体，“我”沿着她的身躯行进，直至跌成碎片仍在锲而不舍地继续搜寻，然后便进入了“记忆那没有尽头的通道”。这时，诗中的“我”脱离了自己，他在寻找一个“瞬间”和一张“面孔”。这个“瞬间”应当是充分展示人的本性的瞬间，这张面孔应当是具有“理想、爱情与自由”品格的人的本来的面孔。在这寻求的过程中，诗人打乱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将神话、现实、回忆、憧憬、梦幻融为一体，充分表现了自己汹涌的激情、深邃的思考和丰富的想像力，同时也给全诗披上了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

在诗人的寻觅中，首先出现的具体时间是“下午五点钟”，一群姑娘走出用火山岩做围墙的学校。在墨西哥城，这样的围墙随处可见。然而诗人的笔锋转瞬间便从现实移向了想像的世界。她们中的一位“身披霞光”走来。她的身上凝聚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品质，即是老虎又是麋鹿，既是猛兽又是猎物，二者相反相成，像“阴”和“阳”一样维系着世间万物的平衡。她既是所有的女性又不是任何一位女性。她究竟是谁？“我”忘记了她的姓名。她可能是梅露西娜、劳拉、伊莎贝尔、珀耳塞福涅或玛丽亚中的一个。这些名字可能是神话人物，可能是历史人物，也可能就是生活中的普通人，因为在西班牙语国家，尤其是在墨西哥，像伊莎贝尔和劳拉这样的名字是极为常见的。在她们中间，诗人首先着眼于梅露西娜。她是

中世纪传说中的一位仙女，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后来被丈夫发现并将她撵走，从此便常常对不幸的婚姻发出哀鸣。女性的悲剧使诗人联想到利剑的锋刃和屠夫的血杯，并像常青藤一样纠缠着诗人无法平静的心灵。这女性是“火的字迹”，“海的字迹”，“风的字迹”和“太阳的遗言”，她甚至用无法破译的火红的字迹为诗人文身。她不是任何一个女性，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牺牲者的形象。正是她将诗人引进一座座幻想的迷宫。然而，诗人并没有完全脱离神话传说，最终还是让“我”看见了她身上粗大的鳞片。

“空虚”、“受伤”的“我”继续寻觅。诗中又出现了具体的地点：伯克利市的克里斯托夫大街，墨西哥城的改革大街，韦拉克鲁斯的佩罗特大街等等。比这一切都更加具体的是1937年在马德里的安赫尔广场上发生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一对情侣在轰炸时做爱。这是诗人永难忘怀的时刻。这可能是他亲眼所见，也可能是他听到的传闻。从这时起，“性爱”就成了诗中充分揭示的“瞬间”。在诗人看来，只有在这时，人才能抛弃压抑自身的伪装和做作，毫无顾忌地暴露出自己的本性。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世间充斥着被“老鼠偷吃的法律”、“监狱的栅栏”、“戴着教士帽的蝎子”、“戴着大礼帽的老虎”、“冒充救世主……的鳄鱼”、“身穿制服的蠢猪”等摧残人性的丑类。诗人认为，只要是“爱”的享受就比在吃人的社会里苟且偷生更有价值。只有通过对“爱”的追求，人才能发现已经失去的团结和一致，才能重新获得自由，而这本是人类生存的最原始的条件。寻找这“爱”的“瞬间”正是全诗的出发点。诗人认为这样的“瞬间”不是哪一个人的，而属于所有的人，因而他交替地使用“他们”和“我们”，使主观与客观相互映衬，将作者与读者合而为一，大家都成了目睹人世沧桑的太阳石的化身。

在人类历史和神话传说的人物中，诗人忆起了一系列的典型形象：亚伯、阿伽门农、卡珊德拉、布鲁图、莫克特苏马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帕斯所列举的政治家中，许多人如林肯、马德罗、罗伯斯庇尔等都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而被政敌处决或谋杀的。这表现了帕斯对世界的悲观而又无可奈何的看法：善与恶、美与丑、烈士与凶手、革命与悲剧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样不可分开。面对

这不公的社会和严酷的人生，诗人缺乏勇气去正视和改造，也看不到出路和前途，因而采取了玄学的态度：将生和死、“自我”与“非我”等互相对立的概念融合起来，使它们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通过对《太阳石》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帕斯的转变，从世界观来说，是从阶级论向人性论的转变；而从艺术技巧来说，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一元到多元、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正是这后一种转变，使帕斯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诗人。

正如一位墨西哥评论家所说：“在文学家和知识分子当中，帕斯属于热衷于政治的一代，满怀激情而又屡遭挫折的一代，但又是‘生的乐趣’没有被愤怒完全摧毁的一代。”读《太阳石》，首先使人感到的便是诗人那一泻千里、汹涌澎湃的激情。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是其生命力之所在。尽管他没有找到人生价值的标准和改造社会的出路，然而单是对“现实社会的无情揭露和对人类未来的不懈追求”，已经足以使这首长诗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

在艺术技巧方面，帕斯善于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从而使读者对诗句产生动态的感觉。为了取得这样的效果，他将各种手段结合起来使用：明喻与隐喻交替、诗句的重叠、标点的省略，尤其是对千姿百态、色彩纷呈的形象进行剪接。

象征是帕斯诗歌创作的主要艺术手段。从整体上说，太阳石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太阳石又和金星联系在一起。金星就是维纳斯，是爱神，是诗中的梅露西娜、劳拉、艾罗伊莎、伊莎贝尔、玛丽亚和珀耳塞福涅的象征。这些女性，无论是神、是仙、是人，都具有女性的多重品格，既是情人，又是母亲和女儿。她们代表一切女性，又不是任何女性。用金星作她们的象征，最为贴切，因为她同样具有多重品格，既是启明星，又是长庚星，既出现在黎明，又出现在黄昏。作为爱神，她向诗人展示了一个充分表现人类自然本性的“瞬间”。

《太阳石》不是史诗，却具有史诗的气魄；不是情诗，却具有情诗的风采；不是政治诗，却有政治诗的脉搏；不是哲理诗，却具有哲理诗的神韵；不是田园诗，却具有田园诗的舒展和流畅。它能

将生与死、爱与恨、历史与现实、神话与梦幻、孤独与理解、拒绝与接受、追求与绝望融合在同一首诗的字里行间。

在诗歌创作中，帕斯主张将语言从“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这既是他对诗歌创作的贡献，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诗作的晦涩与朦胧。此外，帕斯博学多才、旁征博引，其诗作又颇具玄学色彩，这就更增加了我们理解他的难度。

马斯洛人本主义艺术心理学述评

丁 宁

丁宁，1960年4月出生于浙江宁波市。1988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93—1994年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美术史论系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美术系进修。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5届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一等奖。主要著作有：《接受之维》（1990）、《美术心理学》（1994）、《绵延之维：走向艺术史哲学》（1997）和《艺术的深度》（1999）；主要译著有：《传统与欲望：从大卫到德拉克罗瓦》（1997）、《毕沙罗传：光荣的深度》和《注视被忽视的事物：静物画四论》（2000）。

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流派。它是由A.马斯洛、罗洛·梅、卡尔·罗杰斯等建立起来的具有广泛基础的心理学。它不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那样探求人的意识的隐蔽之处，也不像行为主义的心理学那样注重刺激与反应的模式，而是倾心于人的“高级意识心理”，从而耀眼地成为心理学的第三种力量，即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心理学之外的第三种声音。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本主义心理学也是一种开放的心理学，它对其他心理学流派的吸收仍然是相当明显的。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德国的几乎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均逃离出去，其中不少的心理学家就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马斯洛工作的纽约。当时的纽约有幸获得“心理学世界的中心”的称誉。这给马斯洛提供了极为特殊的借鉴机会。他曾经接触过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Kurt Koffka）、科勒（W. Köhler）、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Alfred Adler）、弗洛姆（Erich Fromm）、霍妮（Karen Horney），以及神经学家戈尔茨坦（Kurt Goldstein）等。

当然，阿德勒对马斯洛的影响最为显著。此外，马斯洛还广泛地接受了人类学的影响。

人本主义心理学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这与马斯洛酷爱音乐和美术有直接的关系。他认为，审美是人类人格的一个重要特点。譬如，他曾由衷地写道：“音乐，在我内心深处是毫不犹豫地被接受的，因为对我来讲，它是最高的艺术，是我生存的缘故之一。它甚至同爱，这一生命中最重要目的相提并论……在音乐中，我找到了最基本的根基……音乐充满了我的生活，它是我生存的缘故之一。在人生旅途中，我们努力拼搏，它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份礼物。由于自然是超越理性的，所以音乐也是超越理性的，它不受人类逻辑规则的制约。”^[1]而且，马斯洛还强调过：“我们关于审美的需要、冲动、愉悦、创造性，以及所有与审美有关的体验，很少能够通过实证进行把握。但是，审美的体验是如此强烈，审美的渴望是如此迫不及待，使得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要设置一些概念来指称这些主观事物。为了解释这些强烈的体验，建立理论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的审美需要，只有一事我们切不可做，那就是置之不理……审美问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一个当今的心理学界应该攻克的问题。”^[2]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马斯洛一度下决心，打算以对音乐心理学的研究作为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但没有被校方接受。校方坚持认为，这个课题虽然新颖，但是毫无“科学性”可言，也就是说，这样的研究与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有诸多不相贴切的地方（这种偏见甚至在今天也依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尽管在以后的工作中，马斯洛很少对美学与艺术等进行过直接而又深入的研究，但是他一直认为，审美的问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课题。1950年1月，他撰写了一篇重要的短文，题目为《我们的审美需要》，不过，此文当时并没有发表，同时属于一些零星的感受而已，也许只是为自己在以后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奠定一种基础的大概想法。

确实，人本主义心理学，特别是在马斯洛的论述中，专门或直接涉及艺术与审美的文本并不算多。但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无疑在诸多方面给艺术心理学提供了独特的启示。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将西方艺术心理学研究中的“人文性”（即与“科学性”相对的

性质)推向了极致的境地,也就是说,对于人的因素的把握已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艺术心理学创立时费希纳的实验研究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以下,我们人本主义艺术心理学思想的荦荦大端作一勾勒。

一、需要层次理论

要了解人的内在的动机,需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侧面。马斯洛充分意识到了需要在人的内心世界中的地位,因而,颇为全面地勾画了人的需要的构成和层次性特点。在马斯洛看来,人的需要可分为七个层次,犹如一座金字塔。它们由低级到高级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识需要、审美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被看作是人的最高需要。^[3]

生理需要作为维持个体生存和种族发展的需要,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需要。作为一种缺失性需要,它可以引起匮乏性动机,例如,对于衣、食、住、休息和性等需要,一旦得到满足,紧张消除,兴奋降低,就失去了动机。这种需要在人类的一切需要中是最需要优先加以满足的需要。

安全需要指的是,人希望有稳定的职业,有生活的保障,喜欢处在安全、有秩序、可以预测的环境中,并愿意选择熟悉和已知的工作。这种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就会产生安全感;否则便会引起威胁感和恐惧感。

归属与爱的需要是指,人希望归属于某一团体,成为其中的一员;希望有知心朋友,和同事保持友好的关系;渴望得到爱并把爱给予别人。爱与性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等同。性行为不仅为生理上的需要所决定,而且还受其他的需要,特别是爱的需要所支配。

尊重需要指的是希望尊重别人,也希望得到别人尊重的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是和人们渴望富有实力、成就、名誉、声望,获得独立与自由相联系的。这种需要的满足,会使人产生信心,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并满怀工作热情,否则便会产生自卑感,使人丧失对自己的信心。

认识需要是人们渴望了解外在与内在世界的要求。这一需要几乎是没有限度的求知过程，因为生而有限，而知识无涯。作为超越了生存满足的要求，它出诸内心，因而持久而又强烈。

审美需要指的是人对于美的事物的观照、品味与享受的需要。这种需要融入了所有的健康人的人格之中，只是不像其他需要那样能轻易地诉诸言词的描述。不过，心跳加快、屏息凝气、全神贯注、舒坦畅快以及激动颤抖等均是这一需要实现时的具体感受。

自我实现需要乃是一种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希望完成和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的需要。各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不同的，有人想成为科学家，有人想成为作家，有人想成为电影或体育明星。只有实现他们最高的理想，他们才会感到最大的快乐。

马斯洛认为，这七个层次的需要，只有较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时，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发生。也就是说，人在满足高一层次需要之前，至少必须先部分地满足低一层次的需要。例如，只有生理需要基本获得满足时，安全的需要才会产生；只有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基本获得满足时，归属和爱的需要才会产生；而自我实现需要则要在前六种需要基本获得满足以后才会出现。总之，每一时刻最占优势的需要支配着一个人的意识，成为组织他行为的核心力量，已经满足了的需要，就不再是行为的积极推动力。

移之以论艺术家的需要：首先，看一看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确实，人们只有满足了生存的需求之后，才能从事艺术活动。巴尔扎克在债务重重的压迫中挥笔不停，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拼命写作；梵·高若是没有弟弟提奥的随时接济，很难在饥寒交迫中创作出精神深刻的杰作；同样，毕沙罗时不时要为了一家人的糊口而不断作画，甚至常常以低得令人不敢相信的价格在夏日炎炎的巴黎的街头绝望地兜售。当然，艺术家不是酒醉饭饱之后才进行创作的，但是，生存的需要的基本或部分的满足却是极为重要的。同时，艺术的创作也使艺术家获得了心情的宁静，仿佛停止写作或画画就是一种最大的失落与痛苦，尽管从艺术中所获取的生存条件并不总是能尽如人意，即使是杰出的艺术家也不例外。

其次，是归属与爱的需要。一方面，艺术家像常人一样有这一需要，但是，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归属感与爱是艺术家建立其博大的情感世界的支柱。艺术家的归属感既是具体而微的，又可以推及开去，包括国家、民族等，从而获得非凡、特殊的意味。同样，爱也是如此。作为一种不能被剥夺的体验，爱是艺术家传达中的最重要的元素。没有爱的渴望（或者爱的剥夺）的体验，艺术作品的动人力量是无从谈起的。

再次，是尊重需要。艺术家所从事的是特殊的职业，其劳动成果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同时也是为了精神上的满足：创造力的确证、普遍的认可以及艺术生命的未来延伸，等等，这些均是艺术家更为在乎的东西。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家获得什么人的赞助并不只是一个金钱数额的问题，而更是一个荣誉的问题。同样，能否进入法兰西学院、能否入选沙龙展等，也是当时的法国艺术家们所在乎的问题。中国西晋的陆机曾断言：“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4]唐代张彦远则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非由述作”，更是将绘画的意义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5]

第四，是认识需要。应当说，艺术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成果。艺术家固然以历险类作品、成长体小说、写实的美术、叙事的舞蹈等作品让人领略丰富的认识意蕴，同时，在抒情类的艺术中，人们也同样可以淋漓尽致地感受到具有特定时代、地域和个性特点的曼妙、深刻或回肠荡气的意绪。艺术家之所以要实现认识的需要，当然还有特别的缘由。对他来说，认识与其说是外在的要求，还不如说是内在的冲动。而且，正是这种出诸内心的认识欲，使得艺术家的眼光尤为特殊：总是别有情致，而且意犹未尽。

第五，是审美需要。无疑，人不能缺失这样的需要，而艺术家更是如此。马斯洛曾经写道：“在某些人身上，确有真正基本的审美需求。丑会使他们致病（以特殊的方式），身临美的事物会使他们痊愈。他们积极地热望着，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热望。”^[6]对于艺术家来说，这种需要就更不是一种随境遇而改变的需要了。这

样的需要几乎就是他的某种天性的成分，甚至构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审美已经是非常内在化了。安格尔八十多岁依然在激情洋溢地作画，透纳和莫奈在后期视力欠佳的状态下画出非凡的杰作，托尔斯泰到了晚年仍然笔耕不辍……想到这些伟大的人物，多少令人有点感慨。

最后，是自我实现需要。在一篇当时没有发表的提纲里，马斯洛指出：“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的身上有无限的潜在能力。如果适当地运用它们，人的生活就会变得像幻想中的天堂一样美好。从有潜能的意义上，人是宇宙中最令人惊异的现象，是最具有创造性、最精巧的生物。多少年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寻求真、善、美，论述它们的力量。现在我们知道，寻求它们的最佳地方就在人们自己身上。”^[7]虽然自我实现也是所有的人的一种需要，但是，它的实现却常常又是有限度，甚至遭遇极大的障碍。因为，不仅是外在的条件，而且还由于所谓约拿情结（Jonah complex）^[8]的影响，自我实现在现实中变得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然而，艺术家却在这一点上与常人拉开了距离。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无法安静。一个人必须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本性——这正是艺术家实现其自我的真实情形。

当然，马斯洛在需要层次论中片面地强调了个人内在价值的实现，忽视了社会理想对人的积极性的作用。同时，马斯洛又把人的需要看作是自然禀赋的。^[9]此外，我们也应该注意，马斯洛的所论是人的意识的“顶楼”（即高级的意识心理），而对潜意识探讨的匮乏又使得这种论述显得不甚完整。再者，他似乎没有顾及某些需要实现中的受挫也可能激起艺术家创造的动机。

二、自我实现理论

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与戈尔茨坦有关，后者用“自我实现”这种说法来描述每个有机体(包括人类)实现自己潜能的内在需求。例如，他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表明，当大脑某一部分受伤后，

另一部分可能接替它发生作用，从而维持理想的总体功能水平。用类似的方式，戈尔茨坦表明，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满足自己生物学天性的潜在冲动。在此，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位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经历的那种强烈的甚至是痛苦的冲动。马斯洛后来在构造他自己的人类动机和人格理论时，采用了“自我实现”的说法，却改变了它原来的含义。对此，戈尔茨坦极为不悦。^[10]

所谓自我实现，是一种指人的自我发挥和自我完善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自己的潜能得以实现的倾向。尽管马斯洛想把自我实现限制在什么范围内并不明显，但是，他却做出了他自豪地称之为心理学领域里最重大的贡献。他觉得，弗洛伊德主义者和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已经精确地描述了当我们的低级需求受到阻挠和挫折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因而他认为没必要针对神经病和精神病更详细地积累资料，近50年来，精神病学和变态心理学一直在研究这些内容，而他对这方面的内容兴趣不大。他更愿意探索未知的心理学领域，研究“最佳人性”的挑战对他极有吸引力，于是，他开始集中注意力探讨自我实现的问题。

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人发展或发现真实的自我，发展现有的或潜在的能力。自我实现的人是人类的典范，是社会上最有价值的人，他们具有以下特征：(1) 接受自己、他人和自然的能力；(2) 建立深厚、融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3) 洞察现实，保持知觉与现实的和谐关系；(4) 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5) 鉴赏的不断更新；(6) 自主性；(7) 创造性；(8) 民主型的性格结构；(9) 高峰体验；(10) 返朴还真；(11) 不受文化和环境的束缚；(12) 同情和爱的情感；(13) 善意的幽默感；(14) 辨别善与恶、手段与目的的能力；(15) 超然独立、离群独处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人类具有真、善、美、正义、欢乐等内在本性，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达到人的自我实现关键在于改善人的“自知”或自我意识，使人认识到自我的内在潜能或价值，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就是要促进人的自我实现。^[11]

马斯洛坚信：“生活的真正成就来自于我们自己的高级需要的满足，特别是自我实现的需要”；“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加合

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那些生活在自我实现水平上的人们,事实上也是最博爱、并在人性上是发展最完全的人们。”^[12]

尽管马斯洛并不反对将艺术家归为自我实现者的行列,但是,他不承认诸如拜伦、梵·高和华格纳这样杰出的艺术家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者”。^[13]因而,他的衡量标准是苛严的,推崇的是所谓十全十美的完人。这就使得他有关自我实现的论述不免显得过于褊狭了。

有不少的艺术家依然可以吻合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者的特征,譬如接受自己、他人和自然的能力,建立深厚、融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洞察现实,鉴赏的不断更新,自主性,创造性,高峰体验,返朴还真,不受文化和环境的束缚,同情和爱的情感,善意的幽默感,辨别善与恶、手段与目的的能力,超然独立、离群独处的需要等,但是,马斯洛所列举的有些特征却未必都是艺术家的秉性。例如,艺术家可能是一种自我感极为强烈和敏感的人,并且在创作中渲染这一点;艺术家能够洞察现实,但是未必保持知觉与现实的和谐关系。恰恰相反,他们的知觉有时就是与现实不相和谐。甚至有时是与现实的格格不入感导致了艺术的冲动。而且,马斯洛显然没有把艺术家的痛苦放到应有的位置上。所以,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特征实际上尚未更加深入地进入艺术家的内心世界的奥秘。

三、高峰体验理论

马斯洛的“高峰体验”说其实与韦特海默有关。1935年,韦特海默写了一篇题为《伦理学理论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我们会感到被唤醒,并突然意识到自身最好、最有价值的品质,就好像它们已经失落了或者长期被忘却了……这就是25年后马斯洛所称的“高峰体验”的先声。^[14]

高峰体验是马斯洛自我实现论中的重要概念,指人在进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状态时可能感受到的一种欢乐至极的体验。马斯洛曾列举能产生高峰体验的情境和时刻有:(1)爱情;(2)审美感受,

特别是古典音乐欣赏；(3)创造激情和灵感；(4)领悟真理；(5)顺产，母爱；(6)与大自然的交融，如在原始森林中，海滩下，丛山中；(7)体育比赛，翩翩起舞时，等等。高峰体验是自我完善过程中的一种自我奖赏，类似宗教皈依时刻的神秘体验。尽管它产生时的刺激因素各不相同，主观体验却彼此相似。它的特征是瞬间产生，转眼即逝，因而往往逃过人们的注意，使人们弄不清它的性质，但这样的时刻到来时能产生强大的冲击波，使人摆脱一切怀疑、恐惧、压抑、紧张和怯懦。这种体验多发生在自我实现者身上。

根据他的抽样调查报告，这些特征包括暂时的时空混乱感，惊奇和敬畏感，巨大的幸福感。在宇宙的壮美面前一时而又完全的无所畏惧与不设防的感觉等等。人们还普遍提到，一些完全相反的事物，如善与恶，自由意志与宿命等都在一瞬间被超越了：一切事物都得到了辉煌的统一。马斯洛还指出，经历高峰体验之后，常会留下深远的影响，对人有脱胎换骨的作用：“尽管生活通常是单调、平凡、痛苦、别扭、不令人满意的，但只要看到美、真理和生活的意义确实存在，一般来说人就会更容易感到活着是有价值的”。也许是由于忘记了威廉·詹姆士在这方面的启发性工作，马斯洛说这种体验“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大量的记载，但是据我所知，还从来没有引起过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注意”。的确，用当时的标准来看，马斯洛有关高峰体验的论述起码是离经叛道的。它没有采用任何实验技术或统计方法，仅仅陈述了他对一种超越的、异乎寻常的心理状态的分析。当然，在以前的科学文献中，从来没有关于这种状态的定义。从马斯洛早期关于自我实现的论文可知，他意识到这种探索是尝试性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勘察工作”。这种高峰体验到底在什么程度上反映了对世界的感知，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幼稚的幻想呢？马斯洛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如果自我实现者能够并且确实比其他人更有效、更全面、更客观地感知现实，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他们当作研究对象。由于他们更敏感、感知力更强，我们就有可能得到关于现实真相的更好的报告……就像金丝雀被用来探测矿井中的气体，因为它比其他生物更敏感。”^[15]

确实，在艺术创造与接受中，人们不难感受到一种短暂的狂喜、

入迷、出神、极大的幸福感和愉快,或者所谓“诗意的狂喧”(rhapsodic communication)。在这种短暂的时刻里,人们能感受到敬畏、崇拜和奇妙的心情,体验到“此时此地”以及真实地而统一地存在的感觉,同时也体会到超越与神圣。无论是灵感或直觉的状态还是心心相印的意会,是不唤自来的神来之笔还是完成的喜悦等,均是确凿无疑的高峰体验。

不过,马斯洛不仅描述了关于高峰体验的诸种普遍特征,而且还把它们与精神的完全健康联系在一起。换一句话说,他把高峰体验提高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认识。在他看来,“一个内心矛盾重重、精神处于混乱状态的人很可能因为达不到高峰体验而失去理智。心绪烦乱的人不会有高峰体验,只有情感健康的人才会有高峰体验。实际上,一个人的情感越是健康,他就越有可能产生高峰体验。同样,我们经历的高峰体验越多,精神世界就越是健康”,

“没有高潮,人类怎么能够得到休息与拥有平和的心境?怎么能享受真正的具有存在性价值的娱乐(Play)?没有高潮以及各种形式的高峰体验来提供一种完成感,我们就会总是感到自己处在游移不定的中间状态。我们总是在努力,总是在坚持,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永远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如同一直在山腰攀登,永远达不到顶峰,得不到休息。事实上,任何真正的满足都带有一种微妙的终极体验,容许人们停下攀登的脚步。有时候,这种终极体验非常尖锐与强烈。但是,真正的完满感、真正的终极状态——真正的无以复加的终极体验,完美的高潮,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高峰体验。完全的高峰体验不仅对精神上,而且对身体上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它是一种完全的释放,全部的耗尽,彻底的满足”。^[16]

可以说,将高峰体验强调到这样的地步,实际上也暗含了对艺术的一种特别的肯定,尽管马斯洛无意进一步地区分艺术的高峰体验与非艺术的高峰体验究竟有怎样的差别。

此外,马斯洛还涉及了高原体验(Plateau-experience),虽然这一概念倒并非他的原创。所谓高原体验,指的是对于感受到的敬畏与神奇做出平静的、稳重的积极反应,是一种平和而又持续的欢

乐心境；与高峰体验相比，它没有那么强烈的感情色彩。相反，它更多地含有理性与认知的成分，也更多的是出于意志的行为。例如，一个母亲静静地坐着，照看她的小宝宝在地上玩耍。^[17]其实，艺术活动中有不少的体验状态恰恰是与此相吻合的，而未必均体现为高峰体验。

四、存在性世界的描述

马斯洛在阐释自我实现的哲学涵义时，是将它同人类的终极价值与存在价值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似乎有一种人类的终极价值，一个全人类努力争取的远大目标，不同的作者给它取了不同的名字，如自我实现、自我完善、整合、精神健康、个性化、自主性、创造性、生产性；但他们都一致同意，这些意味着充分实现个人的所有潜力，也就是他能够彻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充分实现他的一切可能性。”^[18]在马斯洛看来，人类的终极价值就是自我实现，这是全人类都在努力争取的远大目标。它的内涵包括存在价值的一切表现，如“真、美、完整、合二为一（对立面得到统一，仇人化为挚友）、生气勃勃；与众不同、完善、必要、完成、正义、秩序、纯朴；丰富、轻松、诙谐、自我满足等等”。^[19]自我实现者将这些价值融入自身，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同时，马斯洛认为，在超越性体验的时刻，人们直接了解了人类的最高美德与理想。他把它们称之为“存在性价值”。例如，美、正义和完善等。相反，在日常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则是一些次要的“匮乏性价值”，如恐惧、怀疑等。他同时也推断，心理健康的人更容易经历心醉神迷的神秘体验。

马斯洛曾经这样描述他所理解的“存在性世界”：

1. 通过有意识地进入存在性世界，可以走出匮乏性世界。去参观艺术展，参观博物馆，观赏美丽或者庄严的树木，去图书馆读书，到山上或海边去陶冶情操。

2. 默默地体会那些值得赞赏、值得热爱和尊敬的人，感受和思考他们的美德。

3. 进入奥林匹斯山的清新空气，进入纯哲学、纯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领域。

4. 努力缩小注意的范围，全神贯注地陶醉于一些微小的世界，例如，蚂蚁或地上的昆虫。细细地观察花朵或地上的叶片、沙粒和尘埃。专心致志地观察而不受外界干扰。

5. 用艺术家或摄影师的眼光来观察物体的本质。例如，用镜框将它镶起来以把它和周围的环境分开，把它与你的先入之见、预想以及关于它应该怎么样的种种观点分开。把物体放大了看，眯着眼看以观察它的大概轮廓。或者从另一个异常的角度来观察，如把它颠倒过来看一看，或通过镜子里它反射形成的影子。也可以将它放入特殊的背景中，用特殊形式来摆放它。或透过不同颜色的滤光镜来看它，长时间地盯着它，同时特别地进行自由联想，任意发挥。

6. 长时间地与婴儿或儿童呆在一起。他们比其他人更接近存在性世界。有时候，当你与一些动物，如小猫、小狗、猴子或猩猩呆在一起时，你也能感受到存在性世界。

7. 站在历史学家的高度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思，一百年，一千年后它会是什么样的呢？

8. 从别的动物的角度来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思考，如自己在一只蚂蚁眼中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9. 假设你只能再活一年了，你会怎样对待你的生活呢？

10. 思考一下，你的生活在一个远方的人看来是怎么样，例如，一个远在非洲的小山村里的人，他是怎样看的。

11. 当你看到一个熟人或熟悉的情况时，假设你是第一次见到，用一种新鲜的眼光去看。

12. 当看到同样的熟人或熟悉的情况时，换一种方式，假设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了。

13. 以伟大的睿智的哲人的眼光来看问题，如以苏格拉底、斯宾诺莎、伏尔泰的眼光来看问题。

14. 试着与历史上的伟人交流，同他们交谈或给他们写信。例如，与贝多芬、苏格拉底、威廉·詹姆士、伊曼纽尔·康德或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等交流，而不是只与你生活中的人交流。^[20]

在上述的胪列中，艺术无疑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当然，马斯洛也意识到，“自我实现的人，即那些达到高度成熟、健康、自我完善的人，能够给予我们如此多的教益，以致他们有时看上去就像是另一种人。但是，对人性发展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对人性发展的终极可能以及人类抱负水平探寻是一项棘手而曲折的任务……”^[21]

确实，对于存在性价值的提升与实现，艺术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间接的，因为存在性价值更是艺术以外的重大问题了。

注 释

[1] [美]爱德华·霍夫曼,1998:《做人的权利——马斯洛传》，改革出版社，第27页。

[2] [美]爱德华·霍夫曼,1998:《洞察未来》，改革出版社，第127—128页。

[3] 这里，也可将认识需要与审美需要归入自我实现需要。

[4] 见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所引。

[5] 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6] [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7] [美]爱德华·霍夫曼:《做人的权利——马斯洛传》，第184—185页。

[8] 约拿情结：一种由《圣经》人物约拿而得名的情绪状况，它反映了一种“对自身伟大之处的恐惧”，并导致我们不敢做自己擅长的事，甚至逃避发掘自己的潜力。在日常生活中，约拿情结可能表现为缺少上进心，或称“假愚”。

[9] 参见荆其诚主编,1995:《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593—594页；《心理学百科全书》，浙江教育出版社，第1卷，第138—140页。

[10] [美]爱德华·霍夫曼:《做人的权利——马斯洛传》，第125—126页。

[11] 参见荆其诚主编:《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第138页。

[12] 参见[美]爱德华·霍夫曼:《做人的权利——马斯洛传》，第201页。

[13] 参见[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 [14] 参见[美]爱德华·霍夫曼：《做人的权利——马斯洛传》，第 108—109 页。
- [15] 参见[美]爱德华·霍夫曼：《洞察未来》，第 298 页。
- [16] 《高峰体验对于健康的意义》，爱德华·霍夫曼：《洞察未来》。
- [17] 参见《心理学百科全书》中的同名条目，第 1 卷。
- [18] 引自[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第 100 页。
- [19] 同上，第 102 页。
- [20] 参见[美]爱德华·霍夫曼：《洞察未来》，第 146—147 页。
- [21] 同上，第 298 页。

多学科联合攻关 断定夏商周年代

李伯谦

李伯谦，男，1937年3月生，河南省郑州市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新石器商周考古教研室主任，考古系副主任、主任兼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博物馆馆长。现任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夏商考古学的教学与研究，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北京琉璃河、山西曲沃西周晋侯墓地、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青海柳湾等遗址的发掘。出版有专著《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发表论文30多篇，系统构划出了以夏商周文化为中心的中国青铜文化网络体系，探讨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进程。曾出访美、英、德、法、日、韩等国和港、澳、台，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1995年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目前正参与“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文明探源工程：华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课题的前期准备工作。

世人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二百位学者近五年的努力，终于取得阶段性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夏商周年表。在成果即将公布的前夕，作为“工程”的参加者，能利用这个讲台向大家做些介绍，我感到十分荣幸。但说实在的，我的心里也很惶恐。因为“工程”涉及的学科很多，有些学科领域，譬如天文学史、 ^{14}C 测年技术等我基本不懂，讲到和这些学科有关的问题，可能讲不到点子上，甚至出错。好在我讲完后还有提问和讨论的时间，还有更正的机会。

我今天主要讲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提出

什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什么要搞“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课题是怎样提出来的？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依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础。但是中国古史的纪年，西周厉王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以前是不清楚的，古籍中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且互有矛盾，令人难以置信。年代是历史的骨架，年代框架立不起来，许多问题就说不清楚。因此，要想把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全过程搞清楚，把号称五千年文明史的开端弄清楚，首先就应该把年代先搞清楚。而从现有条件来看，解决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应该说已有了较好的基础。“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专门来研究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一个科研题目。

“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项目是 1995 年首先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倡议的。宋健同志曾在不同场合谈到过他提出这个课题的初衷，他说自己到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的博物馆参观，听讲解员讲解，看人家的古史年表，觉得很清楚。而我们自己的古史纪年，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年代却有多种说法，让一般人弄不明白。他说埃及年代学、两河流域年代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得益于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破译，得益于天文学家的参与，后来也运用了 ^{14}C 测年技术。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已有了较大的发展，能不能动员有关的科技专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一起把我们国家古史的年代搞得更清楚一些？宋健同志是两院院士，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提出这个倡议决非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考虑。从 1995 年 7 月提出这个想法，1995 年 9 月专门请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俞伟超、严文明， ^{14}C 测年学家仇士华等学者参加座谈，征求意见，到 1995 年 12 月，和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共同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实施，大约有近半年的时间。为保证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由科技部、教育部、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等

7 个部委机构领导组成的领导小组，由科技部邓楠副部长任领导小组组长，自然科学基金委陈佳洱副主任任副组长，成立了由来自不同学科的 21 位学者组成的专家组。聘请李学勤、仇士华、席泽宗和我本人任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任专家组组长，其他三位首席科学家任副组长。成立了项目办公室，由朱学文任办公室主任。李铁映、宋健两位国务委员任特别顾问。1996 年 5 月 16 日正式启动，1997 年列入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中之重项目。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目标、课题和实施路线

总的目标当然是制定一套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但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研究的基础并不相同，条件也不一样，因此对于夏商周三个朝代年表的要求也自然有别。

对于盘庚迁殷后的商代后期和厉王元年以前的西周，因为有商代甲骨文、商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以及较多的文献记载，我们提出的目标是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对于商前期，虽然没有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等当时的可信的史料，但对文献记载的商前期的几处都邑遗址，通过考古发掘已经有了比较可靠的线索，因此“工程”提出的目标是确定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对于夏代，研究基础最为薄弱，条件也更为缺乏。因此“工程”提出的目标是确立夏代年代的基本框架。

显然，这是在对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研究的现状和实际具备的条件认真分析的前提下制定的，是实事求是的，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

围绕上述目标，“工程”广泛征询相关学科专家的意见，设置了 9 个课题和 36 个专题，在进行过程当中，又陆续增补了 8 个专题，所以最后是 9 个课题 44 专题。这些课题和专题见表。

44 个专题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天文学、历史地理学、科技测年等近十个学科。如何把众多相关学科组织起来，通过具体实施达到预期目标是科研组织管理面临的新问题。通过研究，“工程”确定，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

科联合攻关是工程实施的基本指导思想。具体技术路线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及可信性研究,并结合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选择可靠的有关天象记录,进行天文学回推计算,得出若干年代定点;二是在已有考古研究成果基础上,选择若干重要遗址进行补充发掘,按地层和单位采集系列含碳样品,进行 ^{14}C 年代测定,并以树轮校正曲线校正拟合,提出接近实际年代的日历年代或年代范围。最后将两者整合,以确定夏商周年代框架和商后期及西周的列王年代。

课 题 名 称	专 题 名 称
1. 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	1) 夏商周年代与天象文献资料库 2) 文献中夏商西周编年的研究 3) 有关夏商西周年代、天象的重要文献的可信性研究 4) 夏及商前期都城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2. 夏商周天文年代学综合性问题研究	5) 夏商周天文数据库、计算中心和连网设备的建立 6) 夏商周三代更迭与五星聚合研究 7) 夏商周三代大火(心宿2)星象和年代研究 8) 夏商周时期国外天象记录研究
3. 夏代年代学的研究	9) 禹伐三苗综合研究 10) 《尚书》仲康日食再研究 11) 《夏小正》星象和年代 12) 早期夏文化研究 13) 新砦遗址的分期与研究 14) 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 15) 商州东龙山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4. 商前期年代学的研究	16) 郑州商城的分期与年代研究 17) 偃师商城的分期与年代测定 18) 小双桥遗址的分期与年代测定 19) 邢台东先贤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20) 洹北商城的遥感与物探

课 题 名 称	专 题 名 称
5. 商后期年代学的研究	21) 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22) 殷墟甲骨分期与年代测定 23) 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年祀的研究 24) 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 25) 甲骨文宾组、历组日月食卜辞分期断代研究
6. 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	26) 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 27) 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 28) 周原甲骨的整理与年代测定 29) 丰镐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
7. 西周列王的年代的研究	30)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 31) 天马一曲村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 32) 晋侯墓地分期与年代测定 33) 周原西周文化分期与研究 34) 西周青铜器分期研究 35) 晋侯苏钟专题研究 36) 西周金文历谱的再研究 37) 金文记时词语(“月相”)研究 38)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 39) 西周历法与春秋历法——附论东周年表问题
8. ^{14}C 测年技术的改进与研究	40) 常规法技术改造与测试研究 41) 骨质样品的制备研究 42) AMS 法技术改造与测试研究
9. 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与总结	43) 夏商周年代研究的综合和总结 44) 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三、夏商周断代工程各课题研究的重大突破

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的学科很多,各个学科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取得了重要进展,有的还有重大突破。

我是学考古的,当然最熟悉考古学。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

学是支柱学科,与考古学有关的专题有16个。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五年的努力,特别是顶尖专家们汇聚一堂,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基本取得共识或形成了趋向性意见,从而为建立夏商周考古学分期标尺和 ^{14}C 年代框架奠定了科学基础。这些具有突破意义的成果,我认为至少可以列出五项:

1. 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确认

二里头文化是主要分布于豫西晋南地区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一支早期青铜文化,晚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于二里岗期商文化。自发现以来,学术界对其文化性质和族属一直存在争论,主要的分歧是,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均属夏文化,另一种意见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或一期及早于它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为夏文化,三、四期或二、三、四期为商文化。经补充发掘,重新分期和深入研究讨论,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2. 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始建是夏、商文化分界界标的确立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新中国建立后商前期考古的两项重大发现,但对于二者的性质和孰早孰晚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以邹衡先生为代表,主张郑州商城是商汤亳都,偃师商城是太甲桐宫或亳之陪都或镇慑夏遗民的军事重镇,前者早于后者。另一种意见以安金槐先生为代表,主张偃师商城为亳都,郑州商城为仲丁隰都,郑州商城晚于偃师商城。“工程”经过重新分期和对比研究及 ^{14}C 年代测定,认为二者基本同时,均属二里岗下层早商文化时期,二者的始建均可作为区分夏商文化的界标。

3. 商前期亳都的确定和隰都、相都、邢都考古线索的提出与商前考古分期标尺的构建。

中国古籍记载,商汤建国之后,曾经五迁其都,即汤居亳、仲丁迁隰(囂),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即在今河南安阳之小屯)。殷墟从1928年至今,田野工作不断,出土有青铜器、宫殿基址与商王陵墓,其为商代最后一个王都,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至于商代前期几个都城遗址,通过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特别是“工程”启动后各专题组的辛勤工作,除南庚所迁的奄,其他数都均已有线索可寻。其中商汤所居的亳都,

虽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之争，但根据二者基本同时的情况，郑州商城是亳都，偃师商城是陪都当是接近实际的结论。而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洹北商城和邢台早商遗址的发掘，根据其主要堆积的时代，已有学者研究推断，其可能分别是仲丁所迁之隰都，河亶甲所迁之相都和祖乙所迁之邢都。当然目前要对其作出肯定的结论尚不成熟，但从考古学文化分期角度考察，这几个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的发现确为建立商前期的考古分期标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考古学上商周分界界标的确定与武王伐纣年代范围的缩小。

确定商周分界有不同的途径。从考古学来说，就是要找到典型的文化层叠压关系并对其所含测年标本进行年代测定。“工程”组织的西安沣西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一组从先周直到西周中期的连续文化层叠压关系，其中位于最底层的是灰坑 H18，叠压 H18 的是 T1 第四层。经分析，H18 是先周文化最晚期单位，T1 第四层是西周最早期单位。这就从考古学上构成划分商（先周）、周界限的界标。经对其所含测年标本测定，从商（先周）最晚期到西周早期的转变发生的年代范围应该就是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

5. 沣西、琉璃河、天马一曲村、周原遗址的发掘与西周考古分期标尺的细化。

沣西位于西安市西南的长安县，是西周时期宗周所在地。琉璃河位于北京房山县，是西周燕国早期的都城。天马一曲村遗址位于山西省曲沃县与翼城县交界处，是西周晋国早期都邑，此地发现了 9 组 19 座晋侯及夫人墓。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进入西周以后，仍然是高等贵族聚居之所。通过以上几处西周都邑和大型遗址的发掘，使原来已经建立起的考古分期标尺更为精细和科学。

将考古学上这五项重大突破加以综合，夏商周考古分期标尺就比较完整的树立起来了。而这一成果的取得，就为与 ^{14}C 测年相结合，通过对依分期和单位采集的含碳样品的 ^{14}C 年代测定与拟合，建立夏商周 ^{14}C 年代分期标尺就有了可靠的依据。

除考古学上的重大突破，我们还可以举出 ^{14}C 测年技术、天文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重大进展。

运用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的方法发明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其基本原理是,生物体中含的 ^{14}C 和大气中所含的 ^{14}C 一般情况下处在平衡状态,但生物体一旦死亡,其 ^{14}C 含量即按照 5730 年衰减一半的规律递减。按照这一规律,只要知道已逝生物体如木质、骨头、种子等所含的 ^{14}C 的量,就能求出其具体的死亡年代。 ^{14}C 测年一般只用于史前时期的遗存,因为其测量精度的问题,很少用来测定历史时期遗存的年代。“工程”启动之后,投入较多资金进行了设备的改造和调试,使其误差由原来的 1% 降低到了 0.3%—0.5%,一举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同时还对骨质样品制备作了专题研究,在世界上首次对殷墟出土甲骨进行了测定,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天文学方面的突破,可以举出“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专题组 1997 年 3 月 9 日组织的塔城日全食观测。通过天文学家的实地观测,证明在 3 月 9 日早晨发生的日全食的确会给人有天亮两次的感觉,证实《竹书纪年》所记的“懿王元年天再旦”现象的确是天亮时分发生的一次日全食。而进行天文学回推计算的结果,这一天应是公元前 899 年 4 月 21 日,从而成为推定西周列王年代的一个重要定点。

古文字学方面的突破,可以举出甲骨文武丁五次月食排序的研究。古代发生的月食的时间是可以回推计算出来的,但如果不了解月食发生的大致年代范围,或者五次月食的先后次序排得不同,计算出来的结果就大不一样。“工程”组织有关专家在以往研究基础上,重新对五次月食甲骨进行排序研究,特别是裘锡圭先生对“己未夕皿庚申月食”两个日干中间那个“皿”字应为向义的解释,证明此为由己未日晚到庚申日开始时段上发生的一次月食,从而科学地排定了五次月食的先后关系。通过天文计算,表明在公元前 1500—前 1000 年间只有这一组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它们发生的时间分别是:

- 癸未夕月食公元前 1201 年
- 甲午夕月食公元前 1198 年
- 己未皿(向)庚申月食公元前 1192 年
- 壬申夕月食公元前 1189 年
- 乙酉夕月食公元前 1181 年

四、多学科联合攻关确定关键年代定点， 推出夏商周年表

参加“工程”的各个学科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都充分发挥了作用，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但一些最关键的年代定点都是多个学科联合攻关的结果。

武王伐纣之年是建立夏商周年表的一个关键年代定点。从西汉刘歆开始至今已研究了 2000 多年，共有 44 种说法，其中最早的一个是公元前 1130 年，最晚的一个是公元前 1018 年，前后相差 112 年。之所以未能形成共识，原因就在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自我封闭的研究方法。“工程”为求解武王伐纣之年采取的则是完全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战略。

前面我已讲过，考古学上以沣西 H18 和 T1 四层叠压关系为标志的商周（先周——西周）分界界标的确立和 ^{14}C 测年对其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的测定，已推定出商周（先周——西周）文化交替的时间范围为公元前 1052—前 1020 年之间。商周（先周——西周）文化的交替是由商周政权更迭所引起，也是商周政权更迭的结果。这一年代范围自然也应该是商周政权更迭即武王伐纣之年可能的年代范围。这一年代范围虽不是真的武王伐纣之年，但已经排除了以往 44 种说法中的许多种说法，大大逼近了武王伐纣的真实年代。

求解武王伐纣之年的另一条途径是对文献记载的武王伐纣天象的研究。《国语·周语下》伶州鸠说“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大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对此说法，过去多有怀疑。古文献学者认真研究，认为当有基本事实为依据。经天文学家回推计算，得出两个结果，一个是公元前 1046 年，一个是公元前 1044 年，二者均在由考古和测年确定的公元前 1052—前 1020 年范围之内。究竟那个更符合实际，一时很难遽断。但《西周金文历谱再研究》专题研究结果，武王在位之年为公元前 1046—前 1043 年。故多方权衡，“工程”将公元前 1046 年作为武王伐纣的首选。由于这一结论的取得融合了考古学、 ^{14}C 测年、古文献学、历史学、

天文学等多种学科的成果，从而大大增加了其可信程度。

夏商分界之年也是一个关键定点。这一定点的确定，下可定商前期年代框架，上可推夏朝年代框架。

这一年代定点的得出，首先是在考古学上确定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始建是夏商文化分界的界标，继而进行¹⁴C年代测定，二城始建年代范围的上限均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再参考已确定的商周分界之年为1046年，根据文献推出的商积年为576年之数，最后才将夏商分界之年大体定在公元前1600年。可见这一年代定点的得出，也是多学科合作的结果。

正是由于诸如夏商分界之年、盘庚迁殷之年、武王伐纣之年、懿王元年等一系列关键年代定点的得出，才得以保证夏商周年代框架的确立和商后期及西周列王年代推定的科学性。

我们推出的夏商周年表，诸位从会场上摆放的“工程”情况介绍展板上已经看到了。有的可能觉得很失望，夏代除了始年推定为约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在约公元前1600年，商前期除了开始的公元前1600年和盘庚迁殷的公元前1300年，其他均为空白。情况的确如此。这是因为当前的研究水平还达不到可以提供更详细、准确年代的条件。有的如商前期，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洹北商城、邢台东先贤等遗址的发现提供了不少线索，本来有可能搞得再细一些，但因学术界对其年代、性质与何王对应尚存在不同意见，一时难以形成共识，所以为慎重起见，就没有再公布其他可能与某王基本相当的¹⁴C测年数据。有的可能很满足，认为问题都解决了，以后不必再在年代上花工夫了。应该说，失望不必要，满足更不对。事实情况是，我们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功，即将提出来的夏商周年表，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与历史上或现行的历史年表比较一下，就会知道，它还是根据最为充分更有科学性的一份年表。但同时又须冷静的看到，这份年表的确还有不少空白，对有些年代定点的确还有不同意见，发表的¹⁴C年代数据还存在矛盾。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问题，也有时间仓促，研究尚不深入的问题。正确的态度是既要充分肯定已经取得的成果，这是来自不同学科不同单位的二百多位学者五年心血的结晶，来之

不易；又要足够认识其不足和问题，沿着已经开辟的路子，继续走下去，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填补不足，纠正错误，力求更加完善。

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启示

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五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北京大学是“工程”的重要参与单位之一，由21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中北大有7位，在9个课题中，我校主持和参与的有2项，在44个专题中，我校主持和参与的有22项。技物系重离子所、考古系年代实验室承担了加速器质谱（AMS） ^{14}C 测年和骨质样品制备与常规 ^{14}C 测年的大部分任务。考古系单独或与兄弟单位合作承担了夏文化研究、新砦遗址的分期与研究、商州东龙山文化分期与研究、邢台东先贤文化分期与年代研究、周原西周文化分期与研究、先周文化的研究与年代测定、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天马一曲村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晋侯墓地分期与年代测定等课题和专题的研究任务。这些测年和研究成果以及中文系裘锡圭教授关于“己未夕皿庚申”月食卜辞的考证和其指导下的关于武丁五次月食卜辞的排序与金文纪时词语（“月相”）研究取得的成果，对构建夏商周年代框架、提出夏商周年表发挥了重要作用。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参加学科和人数最多、投入经费最多的一项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课题。参加“工程”五年来的经历，使我受到许多教育，业务上也有不少提高。而对于如何总结“工程”的经验，推进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有深刻的体会。那么，“夏商周断代工程”究竟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1. 领导重视是“工程”能够顺利实施并取得重大成果的保证

由两位国务委员任特别顾问、七个部委领导任领导小组成员，代表了政府对“工程”的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方筹措资金，提供经费保障；一是协调有关单位之间的关系，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这种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并不像起初我自己曾经担心的、现在也还有人怀疑的那样，所谓政府支持是领

导定调子，大家跟着唱。李铁映、宋健两位国务委员多次明确表示：政治不能裁判科学。政府支持就是政府帮助找钱，帮助解决困难。怎么研究，研究的结果怎么样，那是你们科学家的事，是学术界、科学界认可不认可的问题。在实施过程中，领导小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遇到的问题，排除了不少影响“工程”顺利开展的障碍。北京大学也成立有一个由当时的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郝斌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及时研究北大承担任务的专题组提出的需要解决的困难，例如加速器厂房改造、设备购置，都是由领导小组出面协调才得以及时解决，抢了时间，保证了速度。北大领导小组还倡议由各系相关专家组成了一个学术专家组，给北大承担的研究项目出谋划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2.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攻关是“工程”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

当今科学发展的规律是，一方面分化得越来越细，形成一个又一个分支；另一方面又以很快的速度互相渗透。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任何一个学科要想独立发展将十分困难，任何问题要单靠一个学科也很难解决。断代工程冷静地分析了夏商周年代学研究中的难点和学科发展的趋势，果断地采取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针。“工程”从首席科学家的选聘、专家组的组成、课题的设置与内容、研究程序的安排等方面都充分考虑了相关不同科学之间的结合。每个课题、专题提出的结论都是不同学科联合交叉研究的成果，每一个成果都必须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评议才可通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大家都抱着取长补短、虚心学习的态度才能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才能真正做出只有多学科联合才能取得的成果。

北京大学学科齐全，人才济济，理应认真总结断代工程的经验，选准研究课题，动员相关学科力量，联合攻关，去攻克重大学术难点，推进学科发展。如果单是学科齐全，而不实行真正的结合，仍走自我封闭、老死不相往来的老路，恐怕很难会有多大的建树。

3. 通过课题研究培养新生力量是推进学科不断发展的根本

“工程”从一开始，就提出要有青年学者参加，要通过“工程”

培养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五年当中，我们一共招收了十几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们在导师的带领下积极参加所在课题的工作，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在参加工程的一批年轻人中，涌现出了北京大学的刘克新、鲁向阳、刘绪、雷兴山、孙庆伟，中国科学院的景斌、徐风光、徐良高、杜金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勇、刘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方燕明、宋国定，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王占奎、曹伟等优秀代表。他们通过参加工程的实践，锻炼了自己，增长了才干，成为骨干力量。

“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是阶段性的成果，有些课题还要继续研究下去，但作为一个项目很快就要结题。结题之后，会继续断代工程开创的工作，启动“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华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课题，希望有志于此的青年朋友参加到研究队伍中来。

21 世纪的生命科学

许智宏

许智宏,男,1942 年 10 月出生于江苏无锡。196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69 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在生理所工作,1979 年至 1981 年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曾任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95 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7 年当选中科院院士。长期从事植物生理学和生物工程的研究,专长于植物组织和细胞培养、激素在细胞分化发育中的作用机理以及植物细胞的遗传操作,为推动和发展我国的植物组织培养和生物工程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用晚上的时间来给同学们作一个报告。

我选一个题目,讲“21 世纪的生命科学”。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进入新的世纪了,大家都在以不同的心情,从不同的角度展望新的世纪。新世纪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讲,究竟怎么样?政治家,科学家,都在对下一世纪进行预测。我是 1959 年到北大生物系读书的,在我当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生物系的教授们对我们说,下一个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我们等待着这一世纪的到来。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展望一下下一个世纪的生命科学该是什么样。也许大家会想 21 世纪是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世纪,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都认为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是影响下一世纪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今年初在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我国的领导人包括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在他们的讲话中也都曾经多次

提到过。

我想,如果是生物学家在说 21 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别人会认为那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在其他领域工作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也同意这种看法。比如,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去年在中国举行的一个论坛报告里讲,19 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20 世纪仍是物理学的世纪,但 21 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又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先生,他是个化学家,在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说过类似的话,亚洲国家如果在下次经济腾飞中有所作为的话,生命科学技术将是可能取得比较大突破的一个领域。基于这些状况,今天我想先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一看我们人类在新世纪面临的问题,再给大家展望一下未来生命科学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不少科学家认为 20 世纪最富创造性的科学发现是:相对论、量子力学、DNA 双螺旋结构。可以看出是物理学占了主导地位。应该说 DNA 的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其中同样有很多物理学家的功劳。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改变了整个生命科学的面貌。我想这个发现,随着对基因功能、对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深入,它的意义是越来越明显,它无愧于 20 世纪三大发现之一。20 世纪也有几个最有影响的大科学计划:曼哈顿计划,它导致了原子弹的出现;阿波罗登月计划,它使人类有机会到月球上去探索,揭开了人类空间科学的新篇章;第三是人类基因组计划,将破译我们的全部遗传密码,对我们人类认识自身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未来生物医学的发展也会产生难以估计的影响。

我想,要展望 21 世纪的生命科学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看一看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第一,巨大的人口压力。对我们中国来讲,人口即使在实行计划生育的前提下,每年也增长 1300 万—1400 万人,预测到 2030 年,我国人口将会达 16 亿。去年 10 月份全球人口达 60 亿。整个世界一年人口的增长是 7500 万。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到 2050 年全球人口最低 73 亿,最高可能达 107 亿。就是说五十年后,地球上将有 73 亿到 107 亿人。地球上现在是 60 亿。大家可以想一想,要增加

那么多的人，地球拥挤程度将会怎么样？

第二，和这个有关就涉及到食品的供应问题。这么多人要吃东西，我们就一个地球，就那么多可耕地，怎么办？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到 2030 年，如果人口达 16 亿，我们的粮食产量从现在起到 2030 年必须增加 30%。大家想想，要增加 30% 的农业产量，谈何容易。一般来讲，一年增长百分之几就不错了，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可耕地每年都在减少（一年减少差不多一个县的面积），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就是随之而来的健康问题。随着人口的增长，寿命的延长，新的问题不断产生，对健康的要求也高了。过去我们中国人心血管疾病、肿瘤疾病并不是很多，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状况的变迁，在城市里，它们很快上升为主要疾病。另一类上升很快的是老年病，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综合症和其他神经系统有关的疾病。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善，人类的寿命大大增长了，有的科学家预测人可以活到 180 岁。作为生物学家，我觉得现在还难以预测，因为人类的寿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我想 120 岁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增长。从北大人口所索引联合国的一个资料可见，中国 65 岁以上老人人口比例由 10% 增长到 20% 的话，大约需要的时间是 20 年，日本是 23 年，美国用了 57 年，德国用了 61 年，瑞典用了 64 年，中国用了比美国少 30 多年的时间达到同样的老龄化，而我们的经济条件尚远不及美国等发达国家，这就可能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最后是遗传病，对我们中国来讲，特别是由于文化与传统的因素，加上一些山区与边远地区处于隔离状态，这使一些地区仍存在着只能在小的地域范围内选择配偶，乃至近亲婚配的情况，这使我国局部地区遗传病的发病率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前几年我看过一份资料，说即使在沿海一些地区，遗传病的比例也在增加。开头我也很惊奇，沿海地区按道理来讲，是我们的经济发达地区，文化程度也比较高。但是由于我们某种传统的影响，有一些人，他赚了钱，做了老板，又怕自己的钱流到外面去，所以他希望把资产控制在自己的家族范围内，亲上攀亲，也导致了遗传病比例的增加。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危险的疾病不断出现。艾滋病现在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仍呈增长的趋势，包括非洲大陆，还有东南亚、南亚、俄罗斯，也包括中国的部分地区。疯牛病使很多人谈牛色变，最近在法国巴黎，法国的朋友请我吃饭时，常讲今天不用牛肉请大家（笑）。法国人最近也是很恐惧，因为已发现了多起疯牛病的病例。大家知道，人感染疯牛病之后，还没有可以治愈的办法。非洲的埃博拉病毒在 1976 年发现后，连续几次爆发，对这个病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办法，每次爆发大概会死百十来人，过了若干年，又在另一个地区爆发。除了这些我们过去没有听说过的病以外，像肺结核，本来认为它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了，但这些年来，它在世界范围内又死灰复燃，原因是一些结核菌对抗菌素产生了抗药性，使这种病用一般抗菌素很难对付。

最后，环境问题。人口的增长，实际上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最厉害，我想不能讲人类是罪魁祸首，但不可否认人类本身的活动是破坏地球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

除了社会的需求极大地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外，生命科学在 20 世纪以来，特别是 50 年代以后，物理、化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中发展出来的观念和技术大大地改变了生命科学的面貌，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进展已使科学家可以在分子和细胞的水平上来研究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今天的生命科学已经不是像三四十年代那样只要一架显微镜，或仅仅到野外采标本回来进行分类那么简单了。今天的生命科学已经可以在很严谨的条件下，用物理的、化学的和数学的方法进行定量的分析。生命科学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有待研究。生命活动是自然界最高级、最复杂的现象。正由于这样，生命科学有着一种无限的推动力，激励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不光是生物学家，还有很多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参与到生命科学的研究中，这大大促进了最近几十年生命科学的发展。

如果大家看一看，在诺贝尔奖得主中，有关生命科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的背景，不少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同样也可以看一看美国科学院 2000 多位院士在各学科组的分布：数学与应用数学 171，地

球科学 246, 物理和应用物理 267, 经济科学 56, 天文学 74, 工程科学 96, 化学 199, 生命科学与医学 947, 即生命科学与医学占了 43%。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NSF) 经费分布中, 生命科学也占了很大的比重。但美国生命科学经费比例最大的不在 NSF, 而在 NIH, 即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的经费从 1970 年的 10.6 亿美元到 2000 年增长到 179 亿美元, 明年申报 188 亿美元 (注: 实际 2001 年已批准获 203 亿, 2002 年估计可达 230 亿)。

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下世纪生命科学和技术中的热点以及它们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

第一是人类基因组计划。过去认为大科学工程没有生命科学的份儿, 一般都是物理科学和技术方面的, 像我们中国的两弹一星、加速器等。但现在不同了,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第一个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大科学计划, 它最初是在 90 年代美国能源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项目, 目标是用 15 年花费 30 亿美元完成人类基因组 30 亿碱基的序列测定, 完成全部基因的定位, 并开展模式生物基因组的研究。这个计划, 翻开了生命科学研究的新的一页, 极大地推进了生命科学。2000 年 6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共同宣布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建成。江主席也发表讲话表示祝贺, 因为中国参加了 1% 的测序任务。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1%, 实际上人类基因组类似于过去的“核俱乐部”, 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参加进去的, 中国科学家凭自己的技术, 使西方科学家认识到中国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测序。我印象中法国也不过承担了 2%, 德国是占了 4%, 还有日本, 主要是美、英两家。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不是一个两个人可以做成的, 需要大批科学家的合作和资金。由于基因组研究的潜在商业前景, 不少私人公司也投入大量的资金, 总量已远远超过政府的投入。人类基因组计划还带动了对其他生物基因组的研究。随着我们测序技术的进步, 其他生物的基因组测序也已取得很多的进展。譬如微生物, 微生物的基因组较小, 中国已经完成了好几个微生物的测序。还有一些对基础研究很重要的模式生物, 譬如动物中的果蝇, 为我们经典遗传学中很多理论的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 它有很多的突变体。最近在《自然》杂志上报道它的测序已经完成。

还有植物，模式植物拟南芥的测序即将完成，水稻的测序也已取得很大进展，日本、中国都参加了。美国人也参加做水稻，因为它是禾谷类作物中基因组最小的。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基因组的研究，从一种生物的基因组的研究结果，用到其他生物基因组的研究上。这也是研究人类基因组和其他模式基因组的意义。人类基因组就好像一本天书，有大量的信息需要破译研究，这需要计算机科学家的合作，生物信息学也应运而生。原来预计人类基因组大约有 10 万个基因（注：现在测序的结果表明没有这么多，大约只有 3 万—5 万个），要弄清每个基因的功能，以及基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下一步功能基因组研究要做的事。

第二是遗传、发育和进化。遗传是生命活动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通俗地讲，是上一代怎样把它的性状传到下一代去。由于遗传学家的努力，本世纪中叶，已经揭示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发现了三联遗传密码，遗传学已经渗透到生命科学的不同领域之中。下一个就是发育，它是生命科学中最古老的领域之一，它研究一个简单的受精卵的细胞怎样经不断的分裂、分化，发育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物体。现在已经知道，发育本质上是基因组中不同的基因在生物体发育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器官组织和细胞中有序地进行表达，从而展现整个生长发育过程。进化是研究更大时间尺度内，生物体怎样从简单演变为复杂，由低等演化为高等的过程。看起来它们是不同的领域。但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已使三者渐渐趋于一致，即是在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上研究遗传，研究遗传物质的传递、发育和分化的遗传调控，基因组和基因的进化。从这些意义上讲，遗传、发育、进化必须放在一个统一的尺度中考虑。

第三，我想讲一讲对脑科学方面的研究。人类对自身的研究是最不透彻的，而对自身的研究中，对大脑的研究又是最不透彻的。大脑是由几百亿个神经元组成的一个庞大的信息处理系统，它通过复杂的网络结构，为人类提供语言、记忆、认识、情感等高级神经功能。它是生物体中最复杂的结构。揭示脑的秘密，是当代也是下一世纪最有挑战性的项目之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科学家现在可

以用各种新的仪器，在无损伤的情况下对大脑各个区域进行研究。加上对很多神经系统突变体的研究，以及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提供的知识，已使人们对大脑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为阐明脑的功能、治愈人类脑的各种疾病（如帕金森综合症、老年痴呆症等）和脑损伤后遗症奠定了基础。很多人也期望通过对脑的研究来创造脑，即开发“人脑”计算机，这对未来的计算机的设计，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是生物工程。生命科学领域的巨大进展，特别是分子生物学和基因操作技术的发展，已使人们可以按人的意愿来改造生物，或控制操纵生命活动过程。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现代生物工程已在对农业、医药、环境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农业方面，培育抗病虫、高产、优质的农作物新品种是作物育种家的目标，而按照人类的设想来改造农作物则是育种学家梦寐以求的愿望。利用作物基因工程技术，一大批抗病、抗虫的农作物新品种已经育成。比如在我国正在推广的转基因抗虫棉，在田间已收到很好的抗棉铃虫的效果，减少了农药的使用，对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棉花多年来一直是使用农药最多的作物）。现在人们也在积极探索利用基因工程改良作物的品质，比如去年瑞士科学家成功培育出的金黄色大米即是转入了合成胡萝卜素的基因，使大米变成金黄色，营养价值也提高了。现在人们也在谈论健康食品，生物工程专家正在试用转基因植物生产疫苗或其他有用的物质，比如能治腹泻的转基因香蕉和番茄。生物工程在医药上成功的例子就更多了。过去很多医药产品依靠从人体或动物的血液或特定的器官、组织中提取，量很有限，现在可以用基因工程的办法，把相应的基因分离克隆后，放到微生物或动物细胞中去，用大量培养的方法制备药物。比如科兴在深圳生产 $\alpha 1b$ 干扰素，就是使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的药物。我国不久将加入 WTO，我们的医药市场、医药产业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在这方面，生物工程将给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持。同时中医药的现代化也将为我们提供机会，为人类开发更多的新药。

最后讲一讲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从科学内容上说，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人

类生存的基础,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已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根据不同学者的估计,全球生物物种总数估计有 500 万—5000 万种,但现在物种以 1000 倍于自然灭绝速度在减少。有学者估计按现在的速度,20—30 年内生物种将消失 1/4,到 21 世纪末消失在一半以上。中国生物多样性对全球有很大的意义,中国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利用天然动植物资源的丰富经验,但在中国物种的消失速度高于全球,比如我国约有陆生生物 100 万种,约占全球 1/10,全球濒危植物估计达 10%,而我国则达 15%—20%,远远高于欧美国家。自然界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系统。所以,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每一个公民都应有这种环境意识。这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讲保护,也不是为保护而保护,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动植物资源,才能确保可持续的发展。比如,我国有丰富的猕猴桃资源,新西兰人从中国引入猕猴桃发展成一个产业,现在中国的科学家已在武汉植物所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猕猴桃种质资源库,这对于利用我国的资源,培育新的猕猴桃品种会起重要的作用。

21 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生命科学已成为各门科学共同探索的领域,社会公众也越来越关注。有这样一句话: Life science for better life。在新世纪中,生命科学的新的突破将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知识和技术,为我们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现代医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韩启德

韩启德,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医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以来从事心血管基础研究,近年来在 α_1 肾上腺素受体 α_1 -AR 亚型研究领域获重要成果。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论文已被 SCI 引用 1500 余次。1995 年加入九三学社,现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医卫委员会主任与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员。并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常委,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理事长、国际心脏研究学会理事与中国分会主席、国际病理生理学会理事、国家分子与细胞心脏学会理事、国际药理学会受体命名与药物分类委员会委员、中国药理学会常务理事与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现在我与大家聊聊有关医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我想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明天”。因为总的来说大家都是“向前看”,但是我的观点是,如果你对今天不了解的话,就不可能了解明天,而如果你对昨天不了解的话,也不可能了解今天,所以我还是从医学的昨天讲起。但是我得限制一下,我讲的是“现代医学”,而不是“医学”,若从“医学”讲起就不得了了,得从《黄帝内经》讲起了,所以我只讲“现代医学”。

即便是讲“现代医学”,我还得再限制一下,就谈上个世纪。我先讲讲 20 世纪医学发展的历史。在讲 20 世纪时也接着讲点“今天”,讲“明天”时也带着讲“今天”。为什么选择 20 世纪呢?因为 20 世纪对医学来讲实在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今天我们到医院里去,所有的诊断、治疗的方法都是 20

世纪发明的。那么 20 世纪以前是什么样的呢？20 世纪之前尽管已经有了病理学说，也发现了许多细菌，但这些理论还没有运用到实践中来。那时生了病以后怎么办呢？当时有一种流行的治疗方法就是“放血”，尽管工业革命后西方已经非常发达了，但英国人、法国人生了病以后，还是放血，或者饥饿，或者通大便。最先进的大概是吃点药，那些药是什么呢？草药。所以，不光是中国人吃草药，外国人也吃草药。还有一个就是“炼丹”。“炼丹”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到了 19 世纪还有人在那儿炼丹。可以这么讲，只是到了 20 世纪医学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那么为什么 20 世纪医学会有那么大的发展呢？归根结底是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在 20 世纪的前夕，1895 年伦琴发现了 X 射线，1896 年贝舍尔发现了天然放射性元素，1897 年汤姆生发现了电子，这些发现不久就在医学诊断和治疗方面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此外，如果没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波尔量子理论的建立，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如此发达的医疗技术，不可能有后来的 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以及今天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20 世纪医学上的第一个成就就是“病原体”的发现。刚才讲了，19 世纪已经发现了细菌，但是除了细菌以外，其他的病原体，比如说，黄热病、疟疾、血吸虫、丝虫病、黑热病、梅毒等疾病的病原体都是在 20 世纪才发现的。后来又发现了更小的病原体——病毒。一直到 1997 年，美国科学家托斯森还因发现“朊病毒”而获得诺贝尔奖。病原体的发现对医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们知道了就是那些细菌或者病毒引起疾病，想办法把它们杀死，病就好了。所以接下来就是寻找能杀死这些病原体的药物。可以说，化学药是在 20 世纪才发展起来的，最早的化学药品是由德国科学家埃利希（Paul Ehrlich）发明的，那就是 606，可以用来治疗梅毒，这在当时是很伟大的，因为梅毒在当时是无法治的。20 世纪初期发现化学药品，大多是在德国，因为德国这个时候的化学非常发达。接着就是杜马克（Gerhard Domagk），也是一位德国科学家。他的第一例临床试验是在他的女儿身上进行的。他的女儿由于注射引起链球菌感染，百浪息多使她神奇地得到康复。后来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医学

家发现百浪多息对链球菌的作用是通过其分子中的苯磺酰胺部分发挥作用的，从而发明了磺胺类药物。青霉素的发现是一个更为广泛传颂的故事。弗来明（Alexander Fleming）是英国伦敦圣玛丽医院的细菌学家。他发现了青霉素，但他没有方法把它提纯，所以，也没有办法应用到临床中去，这是在1928年。到了30年代，一位英国科学家和一位澳大利亚科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来又跑到美国去寻求基金会的资助，最后他们终于把青霉素提纯成晶体。到了1943年，青霉素正式用于临床。那时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青霉素的应用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后来科学家又从土壤微生物中发现了链霉素，这是很了不得的事件，因为当时肺结核病非常普遍，而且没办法治疗，被称为“白色瘟疫”。由于链霉素治疗肺结核十分有效，它的发现者在195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药物方面除了抗生素以外还有维生素的发现，人们发现在实验中给老鼠非常充足的糖、脂肪、蛋白质和矿物质，把人们当时认为重要的物质都给它，但老鼠还是活不了。后来发现，还必须要有东西来维持他们的生命。因此叫做维生素。首先是维生素B1的发现，缺少B1，人就会得脚气病。这种脚气病不是我们平常说的“脚气”，即脚癣，而是心脏的病变。后来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其他的维生素，如维生素C、D、A、K等，这些维生素对维持人类的健康都有很大作用。

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激素的发现。激素是首先在肠道里被发现的。肠道有一种物质能够引起胰液的分泌，使胰腺细胞活跃起来，所以叫激素。后来又发现了很多激素，比较重要的是胰岛素的发现。1921年，加拿大的一位叫班丁（F.G.Banting）的年轻医生对糖尿病发生了兴趣。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糖尿病的发生与胰腺中的激素有关，但口服动物胰腺提取物治疗糖尿病却不奏效。班丁认为原因可能是胃中的胰蛋白酶破坏了其中的有效成分，因此他提出通过注射的方法使胰腺的提取物进入病人的血液。他先切掉狗的胰腺使狗出现糖尿病，再把胰脏的提取物给狗注射，狗又恢复了健康，从而证明胰脏的提取物的确有降低血糖和尿糖的作用。1922年，班丁把从狗的胰脏提取出来的化合物给一个得了糖尿病的小男孩注射，那个小男孩当时已经是皮包骨头，很快就要死了，注射了这种化合物以后，

不久就恢复了健康，而且终身没再生这种病。班丁也因此获得了1925年的诺贝尔奖。

除了药物以外，诊断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最早是X射线，然后是X射线与计算机结合起来的，现在还有导管术。目前最先进的是正电子扫描，脑子里哪一块区域在活动它都可以看出来。

外科手术也取得长足进步，20世纪初发明了血管缝合技术。血管内的压力是100多毫米汞柱，这么高的压力要把它缝住很不容易，发明这种技术的人也得到了诺贝尔奖。从这以后，临床医生一直没有得到过诺贝尔奖。一直到1975年，做肾脏移植手术的医生才再次获奖，其他的都是科学家，没有医生的份儿。还有一个就是显微外科也发展得非常快。我们国家于1963年在世界第一个实施了断手再植手术。1986年，我国又完成了双手十个手指离断的再植手术。现在还能把一个人的胳膊给另一个人移植上去。目前，我们国家有的县医院都可以做断手、断指再植，这种手术已经非常普及了。还有一个就是器官移植，以前觉得器官移植是不可思议的，到30年代，角膜移植成功，其他器官移植都不行，一直到1954年，美国的一个医生首先在一对孪生兄弟的肾脏移植手术上获得成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1961年完成了第一例的肝脏移植，后来又完成了肺、胰腺的移植，1967年首例心脏移植获得成功。现在，器官移植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而且已经分化出来一门“移植外科”。一个人老的时候，他不是所有的器官都是老的，而是有些器官老了，那么换一个，他又可以活很多年。如是你心脏有病了，换一个心脏就好了。现在开刀，也不用整个地剖开了，只需剖开一点点，插几条管子进去，在腔镜下完成手术，这样恢复起来也很快。

再就是精神科学的发展。我也看弗洛伊德的书，但是并不太懂，大致意思是，人的精神障碍大多是在幼年得的，是由于“性”的压抑，是一种潜意识方面的障碍，然后才会发展为精神障碍，到底为什么精神障碍会与幼年的“性”联系起来，我现在还搞不懂，但是人家的经验告诉我这很有道理的，包括分析人们的梦，很有讲究的。中国也有解梦，但精神分析是科学研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钻研。在弗洛伊德的启发下，现在我们在精神病治疗上一个重要手段

就是谈话。跟病人谈话，把他从精神障碍中带出来。但弄得不好，精神病大夫自己也会变成精神病。今年的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是“精神卫生”。现在造成劳动力障碍的首位原因不是癌症，不是心脏病，而是精神障碍。精神病有多少呢？有人说 100 个人里面有 30 个，有人说有 10 个。我们比较保守地估计，比较明显的精神障碍，100 个人中大概有 2、3 个。这也了不得。从前我们老讲思想问题，其实是精神障碍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法轮功”的练习者也有精神障碍，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才能让他们真正走出来。

20 世纪免疫学的发展，首先是疫苗。虽然在 18 世纪就有了牛痘，但疫苗技术的重大发展都是在 20 世纪。在 20 世纪的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中最多的就是免疫学。

生物医学工程则是科学技术与医学的融合。现在心脏瓣膜都是可以人工做的，包括现在做的人工心脏，在体外代替心脏。又如对冠状动脉堵塞，以前治疗是靠“搭桥”，后来发现用一根导管从外周动脉进入，一直送到冠状动脉里边，导管前面有个气囊，到了狭窄的地方鼓起来把狭窄的血管扩开，称为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PTCA），现在很普通了，后来发现 PTCA 后有的会发生再狭窄。怎么办呢？拿一个金属的弹簧把它撑住，不让它变窄，这还不行，它绕过不锈钢金属还要增生，怎么办呢？在做支撑的时候，再进行局部的放射性照射，把那些增生的细胞给抑制住，现在还有人把药物涂在架上，抑制增生的细胞。意大利的科学家最近把一个微型机器人放到肠道里面。随着它在肠道里运行，它可以发射出信号，肠道内的所有情况都可以在计算机中看到。不久的将来还可以把机器人放到血管里去，随着血液循环流动，发现有问题的地方。还可以通过机器人把它修好。这些都是生物工程应用的例子。

另一个重要领域就是神经科学。20 世纪发现了脑的左半球、右半球具有不同功能。左脑管语言的比较多，还有逻辑思维；右脑是管空间的，音乐啊、艺术啊。所以一般左撇子的艺术细胞多一点，惯用右手的人抽象思维强一点。你要是右优势者，就多用左手，让左右脑子都发达起来。在 20 世纪神经科学取得了巨大进步，从神经元的发现，到神经元电的活动，从神经递质的化学物质释放，到它

的细胞的电位变化等，科学家在这一些方面的重要工作都得到了诺贝尔奖。

下面我想重点介绍一下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它们对现代医学的重大影响。孟德尔研究豌豆的遗传性状揭开了现代遗传学的序幕。他把黄色的与绿色的、高个的与短个的、光滑的与破皱的豌豆杂交后，发现了不同的性状之间都有非常明确的数量关系，于是他提出了遗传分离规律和组合规律。20 世纪初，摩尔根在果蝇的实验方面，提出了染色体的遗传性理论。到了三四十年代，细胞里的染色体逐渐被分离出来，到了 50 年代染色体检查已成为常规的临床检查。每一个染色体分离出来以后，给它拍照，然后把它的图形弄出来，它都有一定的形状和长度。有些遗传病会多了一条染色体或者缺失、断掉一块，就可以用这个来诊断遗传性的疾病。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不满足于只观察染色体的外观变化，想看看染色体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到了 50 年代初，英国科学家威肯斯用射线衍射的方法来探测 DNA 的结构，他发现好像是一个螺旋结构，但是再进一步，他就弄不清楚为什么了。当时不少人，包括沃森跟威肯斯讲，你根本不可能得出结果，因为当时的技术不可能提纯 DNA。大家知道做 DNA 检测首先要把样品提纯，不能提纯的话那实验的结果就不可能是很精确的。但 1953 年 4 月，沃森和克里克终于根据他们的计算和推测，建立了 DNA 的模型，第二年他们获诺贝尔奖，他们的主要的结果就是提出这样一个模式：DNA 是由两股链组成的，每股链是由核苷酸连接而成，而核苷酸则由核糖、四种碱基中的一种与磷酸组成。由于碱基之间氢键的顺序使得它们必然是双螺旋的结构，而且碱基上面一定是腺嘌呤（A）对胸腺嘧啶（T），鸟嘌呤（G）对胞嘧啶（C），双股螺旋可以解开。在细胞分裂时，两股分离开来，由每股再去合成与它对应的另一半。另外，它还可以合成 RNA，再根据 RNA 序列翻译合成蛋白质。由于每三个碱基对序列编码一种氨基酸，因此可以根据 RNA 上碱基的顺序决定所合成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关于 DNA、RNA 的研究发展得非常快，接二连三地获得诺贝尔奖，从而根本地改变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到了 80 年代中，科学家们开始进一步考虑，是不是有可能把我们人类染

染色体上的所有碱基对都测定出来。1990年时，美国决定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用30亿美元的投入和15年的时间，完成全部核苷酸序列的测定。先是根据现在已有的遗传信息在染色体的定位建立遗传图，然后建立物理图，最后把全部的序列测定出来。到1998年，遗传图谱、物理图谱都超额完成，但是DNA序列测定工作用了一半的时间却只完成了大概1%。所以当时美国主持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担心在2005年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后来由于PE公司研制的测序仪将测序速度大大加快，加上其他方法上的创新，使测序工作进程大大加快。1999年9月9日塞莱拉公司宣布已经完成了果蝇DNA全部序列的测定，并开始人类DNA测序。到10月20日，在短短的40天时间里，他们就完成了19亿个碱基对的测试。到2000年4月6日，30亿碱基对全部测试完毕，然后进行组装。2000年6月6日人类基因组与塞莱拉公司同时宣布基本完成人类染色体DNA测序。又经过半年工作，2001年2月中旬他们又分别在*Nature*与*Science*上发表文章，公开结果。经最后测算，人类染色体上的碱基对为29.1亿对，特别有意思的是经计算认定，人类的基因大概只有3万个左右，与原来根据蛋白质数量推算的10万个基因相差很远。人类所有的基因仅比线虫与果蝇多一倍，人有而鼠没有的基因仅300个左右。基因在染色体上的分布很不均匀，第17、19与22号染色体上基因密集，以第19号染色体尤为丰富；而第4、8、13号及X、Y染色体上则基因较少。实际上在染色体的29.1亿个碱基对中仅1.0%—1.5%直接编码蛋白质，而98%以上为非基因DNA，在基因组序列中存在大片的“荒漠区”，有300多万个长片断重复序列。染色体中约有210万个单个碱基对部位可随个体而有所不同（称为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正是由于这些不同造成了个体间的差别。染色体碱基对序列在个体间的差别不超过0.1%。这种差别大于人种间的差别。上述结果来之不易，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对了解人类遗传奥秘还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目前人类染色体碱基对中约有9%的序列尚不能保证正确；基因的确切数目尚不能最后肯定，更没有全部得到克隆，对已克隆的基因也有一半左右了解它们的功能；对基因数少于蛋白质数的事实尚不能解释，

是一个基因在转录、剪切、翻译过程中可合成多种蛋白质呢，还是由于蛋白与蛋白相互作用而产生新的蛋白呢，还是还有别的机制，目前还不得而知。更重要的是，人体内真正发挥生理功能的是蛋白质，而对人类蛋白质组学（Proteomics）工作还刚开始。所谓蛋白质组学，就是要研究清楚人类体内存在的全部蛋白质的种类，它们的结构，它们的结构—功能关系，以及各种蛋白质的相互关系。相对人类基因组计划而言，蛋白质组学的意义更大，但难度也更大。目前虽然已经有不少科学家开始这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认为真正解决问题还有待于方法学上根本性的突破。

那么人类基因组计划有什么意义呢？且不说它对蛋白质组学研究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就让我们来看看目前能够看到的几方面具体应用价值。首先是基因诊断。最直接的是对遗传疾病的诊断。人类目前已经发现的单基因遗传疾病有 6000 多种，抽取羊水，甚至从母体血中都可获得胎儿细胞，检查这些细胞的该基因是否有缺陷就能确定胎儿是否从亲体获得遗传性疾病，如是，则可立即终止妊娠。当前更先进的方法是进行体外受精，然后取早期胚胎细胞进行基因检查，选取正常的早期胚胎植入母体妊娠。此外，通过对病原体 DNA 的检查，可以使传染病的检出率、检出速度大大提高。例如对结核杆菌感染的诊断，以前要靠痰、粪便或血液培养，耗时两周以上，现在用 DCR 方法扩增结核杆菌 DNA，不仅敏感性大大提高，而且在一小时内就能得出结果。基因检查对非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也有帮助。例如美国前总统杰佛逊，因血尿查得有新生物，但经组织活检，诊断为良性息肉，遂做姑息治疗而愈。但是十几年后发现膀胱癌，终因治疗无效而死。到那时再拿出当年的标本进行癌基因检查，发现其中 P53 基因（一种抑癌基因）存在突变。如在当年就能做此检查，肯定会据此做根治手术，就可避免以后膀胱癌的发生。目前基因诊断已扩大到疾病易感性基因的检查。有些基因改变本身并不致病，但有这些基因改变的个体容易受某些环境因素的作用而得某种疾病，例如现在发现 17 号染色体上的 BRCA1 基因发生突变的女性易患乳腺癌。据此可筛选出乳腺癌易感人群，加强预防。现在已发现糖尿病、骨质疏松、高血压、白血病等多种疾病的易感

基因。第二方面的应用是基因治疗。可针对疾病发生的各个关键环节导入相应基因。例如对外周血管阻塞病人，导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基因，就可使局部血管增生，形成侧枝循环来恢复血供。这在国外已有病例成功，我们的工作已进入临床试验Ⅱ期，不久也可用于临床，并有可能将此基因导入心肌坏死部位来帮助心肌梗塞恢复心脏功能。对于晚期恶性肿瘤患者，现在也已有不少临床试验，将一些细胞因子基因导入体内，通过增强机体免疫功能而使肿瘤得到抑制。我们在实验室中证明，在破坏胰岛素而造成的糖尿病大鼠模型中，导入胰岛素前体基因，可使大鼠血糖持续显著下降。将瘦素基因导入遗传性肥胖患者，则见到肥胖完全消失。第三方面的应用是基因预防。除上述检出易感基因外，还可将病原体的非致病部分基因导入人体内使机体产生对该病原体的抗体，即是基因疫苗。目前关于艾滋病与肝炎基因疫苗的研究已取得相当进展，不久的将来可望广泛用于人群。第四方面的应用是帮助用药个体化的实施。同一种药物用于同一种疾病的不同病人，有人有效，有人无效；有人副作用大，有人副作用小，这是由病人的基因差异造成的。服用同样剂量药物，不同病人的血药浓度、持续时间也不相同，这主要是由于肝脏中决定药物代谢的 P450 基因类型不同造成的。目前科学家们正努力寻找决定上述差异的基因差别，特别是单核苷酸多态性，当这一问题获得解决时，医师就能根据每个人的基因特征来选择药物及药物剂量，也即真正做到用药个体化。

近年来另一个发展很快的领域是关于干细胞（Stem cell）的研究。人体在发育初期，受精卵一分为二，再为 4，再为 8，再为 16，到后期逐渐分化为外胚层、内胚层、中胚层中不同的细胞。但是开始时，细胞间没有差别，没有分化，这些细胞即称为干细胞。可不可以把这些细胞拿出来，控制他们，让它们分化成需要的细胞？1998 年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在实验中证实了这种可能性，成为当年科学界最轰动的新闻，因为潜在的应用价值非常大。比如一个人肝脏不好，就可能拿胚胎干细胞来分化为肝细胞，再移植于这个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别人的细胞给你用时还是会排异。1999 年，又有了更轰动的消息。科学家发现在每个人的成熟的器官里面也存在干细

胞。这些干细胞可以定向分化为别的细胞，如骨髓细胞可以分化为心脏细胞，神经细胞可以分化为肌肉细胞。这样，从理论上讲，同一个人，拿出你的骨髓、你的肌肉或神经细胞，定向地分化为你所需要的细胞，然后给自己使用。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这项技术可能比人类基因组技术的应用还要快。

说到明天，明天是更美好呢？还是明天会有更大的问题呢？一般我们都乐观地认为明天会更好。但明天究竟怎么美好呢？我们能否具体展望一下 21 世纪的医学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我的观点是，实际上我们是无法具体预言明天会出现什么新的东西的。我不是随便这样说的。在 19 世纪末的时候，也有人预测 20 世纪医学发展的前景。但没有人想到会有化学药品，更没想到我们会有基因工程。1987 年时，一家大医药公司组织二十多位知名医学家预测医学的发展前景。他们预测到 2000 年时：（1）艾滋病、麻疹将被消灭；（2）癌症的治愈率提高到 $2/3$ ；（3）多数状况下冠脉搭桥术将被微创技术或溶栓药物治疗所取代。这只是预测 13 年后的事情，偏差竟然那么大，要是预测 100 年又会怎么样呢？1971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Burnet 预言生物研究在未来并不会给医学带来多大的利益，即使它们能带来利益，也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这与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差别实在太大了。但如果一定要我展望与预测 21 世纪医学发展的话，我愿意做以下几点预言：

第一，21 世纪医学的发展依然取决于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未来医学上突破性的进展有赖于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结合。21 世纪将是生物医学的世纪，但生物医学成果的取得，不仅取决于生物学家与医学家的努力，而且，甚至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学、物理学、化学、计算机技术等的发展以及与生物医学的结合。就拿信息科学来说，其与医学的结合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远程医疗将得到普及，智能机器人用于诊断与治疗已初见端倪，生物信息学不仅将用于大量生物医学数据的处理、分析与储存，而且将直接融于医疗技术中。

第二，21 世纪的医学一定会越来越重视有关复杂系统的研究。长期以来，现代医学遵循现代科学“还原论”的模式进行研究，对

人体微观的了解越来越深入, 分析研究越来越细。但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 作为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单元的细胞也是一个复杂系统, 只有将分析研究与综合研究结合起来, 才有可能完全了解人体。人们并不是不知道综合研究的重要性, 只是缺乏实施综合研究的条件。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与循证医学的提出, 只是在目前条件下医学家不得已而选择的医学综合研究措施。21 世纪随着人类基因组学与蛋白质组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对人体复杂系统的组成元件将得到足够的信息量, 加上数学与计算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复杂系统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人们将有可能在人体与细胞复杂系统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随之将使医学得到一次新的飞跃。近来日本与美国的科学家相继依据海量的生物学信息, 采用计算机技术, 在计算机上模拟细胞代谢等生命活动获得成功, 大大增强了对人们生命复杂系统研究的信心与决心。

第三, 补充与替代医学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 将在 21 世纪得到很大的发展。现代医学治疗方法基于纠正单一致病因素, 尽管对有些疾病取得好的疗效,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 难免引起复杂系统中其他因素的改变, 这些改变或者影响疗效, 或者产生副作用。在这种作用下, 人们很自然地试图采用天然药物或从长期实践中总结与产生的一些治疗方法。因此, 近年来补充与替代医学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与重视。中医药经过几千年的实践与发展, 无疑是补充与替代医学中最为绚丽的瑰宝。中医药一经与现代科学相结合, 必将对现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另一方面, 现代科学的发展, 也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第四, 医学伦理学问题将越来越突出。21 世纪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 将使很多原来不可想像的事情得到实现的可能。但要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则将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涉及的面很广, 只能举下面这些例子:

1. 关于基因歧视问题。越来越多易感基因的发现, 使人们对自己容易得什么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极大地有利于对这些疾病的预防。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基因歧视问题。例如一个女孩发现

有乳腺癌易感基因，就可能找不到对象；另外，保险公司可能不愿意接纳她的投保；找工作时也可能没人会要她。最后，她整天为是否得乳腺癌而提心吊胆，与不知道这一易感基因而突然得乳腺癌相比，可能生活质量更低。

2. 关于基因修改问题。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人类完全有可能修改自己，特别是后代的基因，这对预防与治疗疾病，对人体性状的改善，是非常诱人的。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对整个人类的危险性，如在修改基因的过程中，产生出一种新的生物病原体，其与艾滋病病毒相比，毒性还强 1000 倍，传播速度也强 1000 倍，而人类对此病原体尚无准备，那么就有可能毁灭人类自己。此外，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改变一个基因后会不会引起一系列其他基因结构或功能的改变，在未搞清楚整个系统的情况下，改变单一基因自然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再则，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哲学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好的基因。例如，从技术上讲，完全可能修改基因，得到“漂亮”基因、“聪明”基因，但如果人人都变得漂亮了，漂亮还存在吗？如果人人都变得聪明了，聪明还存在吗？

3. 关于医学的根本目的。医学的目的常常被认为是治好疾病，最多也是加上预防疾病的发生。在现代生活条件与医疗条件下，人们的平均寿命得到显著的延长，但与此同时，老年痴呆越来越多，肿瘤病人越来越多，糖尿病、骨质疏松症、风湿症等慢性疾病患者越来越多，很多老年人长期生活在痛苦之中。现代医学面向一个一个现有条件下可以诊断的疾病，常常是找到一种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却产生与发现更多的疾病，而且对亚健康状态置之不理。其实，医学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保障人类持续的健康，而健康的概念应是“一种躯体、精神与社会的完好状态”。看似很简单的道理，但在面对具体问题上却不是那么简单。医生们常常为了挽救生命，不惜昂贵的花费，但常常换取的只是病人更大的痛苦和苦恼。而不是真正的健康。如果从维护健康这一医学的根本目的出发，那么关于“安乐死”的争论大概就比较容易得到统一，我国对确定“脑死亡”为死亡标准的反对声音也不会那么强烈了。

4. 关于医学公平问题。现代医学的发展，一方面大大提高了疾

病的诊断与治疗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医疗费用飞速增长。即使在经济发达国家，财政能力与公众福利费用的增加也难以满足医疗支出的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矛盾就更为尖锐。有限的医疗资源只能满足少数人的需要，这就使医疗公平问题变得异常尖锐。是首先满足有钱人、发达地区的人？还是病重的人、年长的人？或者年轻的人、贡献大的人？似乎没有一条原则是公正的。一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及医疗公平问题。他声称研究过中国的卫生事业，他认为中国 60—70 年代的医疗是最为公平的，是全美国人羡慕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这种公平已无法维持。60—70 年代，我正好在西北农村基层当医生，亲身经历过那一历史时期的医疗实践，可以说农村合作医疗确实是相当公平的，但那是一种贫穷状态下的公平，是以大家都得不到好的医疗为前提的，这一点美国人是体会不到的，因此才有后来公平的打破。在现在条件下如何实施最大限度的医疗公平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困难而极为重要的问题。

中国人的人格结构

王登峰

王登峰,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1981年9月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本科学习,1990年7月取得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格和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已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4部。

一、人格的界定

讲到人格,是指我们在描述一个人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什么特点。这里有三个概念经常容易混淆,一个是人格,指一个人的比较稳定的特点。第二个概念是性格,指的是我们对这个人的特点的评价。换句话说讲,人格是指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什么,而性格是我们对这个人表现出的特点的评价,是好还是不好。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个性,也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指的是这人有别于其他人的地方,也就是说他的独特性。^[1]从这三个概念来看,最基础的就是一个人的人格特点。心理学里面讲到人格的时候,它一般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这个人跟其他人相比,他的外在行为上的特点,或行为的倾向性。这些特点可能在每个人身上都是有的,但是每个人身上的表现程度又不同。

第二个方面,人格指的是一种内部的整体性。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地点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这个人的整体来讲,他又有其内部的一致性。因此讲到人格的时候,既是表现在外在的一种特点,同时也是一种内在的体验,或者内部的一致性。人格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的方式,以及他内心

体验的特点。人格实际上就是讲这个人他的特点，而且了解了这样的特点，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到我们应该如何跟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打交道。

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注重管理理论，对别人的管理应该怎么来进行呢？实际上讲到管理的时候，就是讲我们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问题，而人际关系的表现，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的人际关系和中国人的关系，有它各自不同的特点，因此用一套管理西方人的模式、方法来管理中国人，从直观上来讲肯定是不合适的。就好像说，我们对于一个外向的人应该会比较多地跟他交流，跟他沟通，跟他一起去做一些事情。而跟一个内向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套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当我们了解了中国人的人格特点之后，首先我们可以了解中国人的人格特点与中国的文化的内在联系，同时，我们在跟这样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针对这样的一些特点来进行。

二、研究人格结构的途径

到目前为止，西方研究人格结构的方式有很多种，也已经有了很多成熟的人格理论，但是比较引人注目的，或者说有着比较实际的、实证经验支持的人格理论，也就是后面讲的特质理论。特质理论看来，人的特点是非常多的，但当人们有某一个特点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一个词来描写这样的一个特点，而这样的词，它最终会落到字典里面去。同时，在人们的进化过程中，在跟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人们的某一个特点，可能会跟他适应环境有着更密切的联系。那么，这个特点跟他适应环境的关系越密切，语言中对这个特点的描述也就越详细，越准确，描述的词可能也就越多，也就越有可能进入到字典里面去。这就是人格研究的“词汇学假设”。^{[2][3]}例如，在中国的语言文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关于个人特点的描述，比如说“路遥知马力”，“板荡识忠臣”，等等，类似这样的话很多。这说明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能不能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重要程度越大，这样的词就越多，描写得也就

越详细。因此，在某种文化下生活的人们，只要他们有了某一个特点，那么就一定会有一个词来描写这样的一个特点，而且这样的——一个词最终要落到字典里面去。

按照这种“词汇学假设”，如果我们想了解人们的所有的特点，我们可以让很多人来描述，最后我们把所有的这些描述都加在一起，这就是人们所有能够表现出来的特点。但是这个做起来很难。有一种办法很复杂，但是也很简单，就是把字典里面所有的用来描写人的特点的形容词，全部挑出来，这些词就代表了人们所能够表现出来的所有的特点。然后再把这些特点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到一个人的人格结构。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做法在西方已经有人采用，并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1936年，两位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和奥波特从韦氏国际字典第二版里面，把所有用于描写人的特点的英文形容词全部挑出来，一共是18000多个。然后他们又把这些词进行了分类，有些是描写人们的稳定的特点，有些是描写人们的一种暂时状态，或者人们的行动的，这些都是“一过性”的特点。其中描写稳定特点的词一共是8000多个。^[4]通过分析，最终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努力，研究者们得出了西方人一致认为比较稳定的五个人格特点，这五个人格特点就构成了西方人的人格结构，反映了西方人在描述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第一，外向性（extroversion）。西方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外在的行为表现，也就是外向还是内向。这个英文的词也很有意思，energetic——是不是充满活力，talkative——是不是非常愿意跟别人交流。也就是说，当描述自己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我留给别人的印象是什么，我的外在表现的特点是什么。

第二，愉悦性（agreeableness）。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人，给别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我在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我能不能给别人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也就是说我能不能让别人觉得见到我很高兴。这是西方人的人际关系的特点。

第三，公正性（conscientiousness）。公正性实际上指的是一个人对待工作和事物的态度，这里包含了一个人的责任，一个人是否

很努力，一个人是否很愿意追求成功等。另外，在做事的过程里面，应该遵守的规矩是什么，都包括在这个维度里。

第四，情绪稳定性（neuroticism）。个体是很容易发生情绪波动呢，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平稳。

第五，是西方人比较独特的，就是他的创造性（Openness）。这个维度有很多种描述的办法，有一种叫做 opened to new experience 或者叫 originality，是一种原发性、原创性，它是指这个人有没有高雅的情趣，有没有修养，有没有对新的经验的接受和开放的心态。这是西方人的人格结构。^[5]

三、中国人的人格结构

按照人格的词汇学假设，如果将所有用于描写人类行为特点的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选出，通过被试评定和统计分析，应能揭示出中国人的人格结构。1995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发表了中文人格形容词的挑选结果。^[6]研究采用《现代汉语词典》及其《补编》（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中小学语文课本，当时的报纸、杂志、小说，以及大学生描述他们自己及其所熟悉的人时所用的词，从中共抽取出 7794 个人格特质形容词（其中从词典中获得的词共 6156 个，占词典总词数 70000 余个的 8%）。这些形容词中有 1542 个是描写稳定的人格特点的，约占 20%；描写活动、状态的词 2779 个，约占 36%；对人格特点进行评价的词 2478 个，约占 32%；另外还有 995 个词不能归为以上三类，约占 12%。

这一结果与从英语中选取人格特质形容词的结果相比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中描述性的词与评价性的词所占的比例与英文中的结果有很大的差异。英语中这两类词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 25% 和 29%（1:1.16），而在中文里两者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 20% 和 32%（1:1.60）。^[7]这说明对中国人来说，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对一个人的客观描述。这使得在很多情况下，让中国人去客观地描述一个人往往是很困难的事情，特别是面对一个很熟悉的人时，“描述”往往就变成了“评价”。例如，让大学

生描述他们所熟悉的人时，他们所用的词中竟有 75.6% 是评价性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在认识事物（特别是社会现象）时“综合”重于“分析”的特点，而且相关的研究也已表明，中国人在面对客观事物时，往往注重对它们的评价，而不是客观地反映它们的特点。^{[8][9]}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与西方人相比，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来自他人的威胁可能更大，因此需要及早作出评价和决策。

第二，中文人格形容词的数量远远少于英语中的形容词，这固然与选词时所依据的词典的总词量有关，但也可能反映了中国人的独特特点。其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中国人对他人的描述是综合性的和评价性的，反而使得对人们具体行为特点的描述并不精确。这与西方人对人的行为特点的具体、细致的描述是有显著差异的。

为了更进一步系统地探讨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将台湾学者杨国枢所收集的用于描写稳定的人格特质的形容词与大陆的词表合并，从中抽取出 410 个形容词，作为中国人描述他人（及自己）的代表性样本。由大陆和台湾被试共 1441 人（包括大学生和社会人士）就每个词能够描写自己及他人的程度进行评定。通过因素分析得出了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其中大陆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包括如下七个维度（按其在因素分析中出现的顺序），反映的是我们在描述自己的时候大致上采取的顺序。

当我们在描述自己的时候，首先我们会想到的特点是精明干练——愚钝懦弱，即我们的能力和知识方面的特点。第二，严谨自制——放纵任性，即自己的做事风格。第三，淡泊诚信——功利虚荣，即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和个人的动机水平，有的人做事就是为了追求名利，追求一些虚荣的东西，而另外一些人相对来讲非常的诚实，非常的愿意把自己的真实的面目表现出来，而不会去为一些虚名努力，这是一个志趣水平的问题。第四，温顺随和——暴躁倔强，反映在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是很温顺，很随和呢，还是很暴躁倔强，即我们的人际关系特点和情绪稳定性特点。第五，外向活跃——内向沉静，反映我们的人际关系特点和内外向的特点。第六，善良友好——薄情冷淡，反映我们的伦理和道德修养水平。最后，积极豪爽——退缩自私，反映我们的个人风格，是很粗犷豪迈呢，还是比

较计较、自私。这实际上是描述了人们的一种情绪的稳定性。对于比较豪迈、比较粗犷的人来讲，他不太会为一些小事去斤斤计较，他的情绪状态也不会因为一时的或者一点点小事就发生很大的波动，所以他相对来讲，是情绪比较稳定的。而后面那种计较、自私的人，可能整天在那儿嘀嘀咕咕，琢磨琢磨的，这样，他的情绪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10]

四、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人格结构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人格结构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见表 1。人格特点可以分为事物指向、他人指向和自我指向三类，分别代表人们在处理与事物、他人、及自己有关的问题时所表现出的特点。^[7]首先，从自我指向的特点来看，中国人的自我结构跟西方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人自我指向特点包括五个方面，首先一个是能力，即精明干练——愚钝懦弱；第二个是个人的动机和志趣水平，即淡泊诚信——功利虚荣；第三个是行为的外在表现，即外向活跃——内向沉静；第四个是伦理道德水平，即善良友好——薄情冷淡；最后是个人的情绪稳定性，即积极豪爽——退缩自私。而西方人的自我结构中，一个是外在表现，就是外向和内向，这里包含了热情、合群、自信、活动还有积极情绪；第二个是情绪稳定性，也就是中国人（人格特点）里面的第五个；第三个是创造性。

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自我结构有两个共同的维度，一个是外在表现（内外向），第二个是情绪稳定性。中国人有自己三个独特的方面，一个是志趣水平，一个是道德品质，还有一个是能力。西方人有一个独特的维度，就是创造性。而且从看重程度上来讲，中国人最看重的自我特点，首先是能力，然后是一个人的追求的目标，也就是志趣水平，其次才是外在表现，然后再往下才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人不是很看重道德修养吗？为什么排到后

面去了？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我们在评价别人的时候，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但是当我们在评价自己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能力，所以它往后一点。第二个原因，可能跟现在社会的状况有关系，在市场经济刚刚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大家比较看重的是一个人有没有能力，能不能胜任工作，能不能做出成绩，能不能被大家所承认。相对来讲，现在对伦理道德的看重和重视程度有所下降。

表1 中国人与西方人人格结构对照

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王登峰、崔红，2001）	西方人的人格结构（Costa & McCrae, 198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u>自我指向特点</u> 1. 精明干练—愚钝懦弱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精明果敢—退缩平庸 • 机敏得体—羞怯保守 • 优雅多才—肤浅愚钝 3. 淡泊诚信—功利虚荣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淡泊客观—贪心虚荣 • 诚信公正—功利虚假 5. 外向活跃—内向沉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活跃随和—安静拘束 • 开朗热情—拘谨多虑 • 主动亲和—被动孤僻 6. 善良友好—薄情冷淡 7. 热情豪爽—退缩自私 • <u>人际指向特点</u> 4. 温顺随和—暴躁倔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温和宽厚—好斗计较 • 含蓄严谨—直率急躁 • <u>事物指向特点</u> 2. 严谨自制—放纵任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坚韧自制—浮躁任性 • 严谨自重—放纵狡猾 • 沉稳严肃—活跃轻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u>自我指向特点</u> 1. 外向性：个体行为活动的外在特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热情/合群、爱交际 • 自信/活动性 • 追求兴奋/积极情绪 4. 情绪性：个体的消极情绪和敏感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焦虑/愤怒、敌意 • 抑郁/自我意识 • 冲动/脆弱、敏感 5. 创造性：个体的创造性以及思路开阔程度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幻想/爱美、有美感 • 情感丰富/行动 • 观念/价值 • <u>人际指向特点</u> 2. 愉悦性：个体的人际关系特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信任/诚实、坦诚 • 利他/顺从 • 谦逊、质朴/温和、亲切 • <u>事物指向特点</u> 3. 公正性：个体做事的风格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能力/守秩序 • 负责任/追求成功 • 自我控制/严谨、深思熟虑

第二，从他人指向的特点来看，中国人的人格维度就是温顺随和——暴躁倔强，而西方人是愉悦性。这里有两点不同：对中国人来讲，人际关系的特点反映的是总体的修养水平，是一种内在的品质。讲到温顺随和——暴躁倔强的时候，是讲这个人是很温和、大度，还是很计较；是很文雅、含蓄，还是很急躁。这是指的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一种内在的品质。而西方人的愉悦性，指的是自己作为一个对象，在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给别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是不是可信任的，是不是很坦诚，能不能做出一些对别人有利的东西，就是利他的行为。这是一个差别。第二个差别，从出现顺序上也有所不同，西方人的第二个维度就是人际交往的特点，而中国人则排在第四。

可以想像，现在很多人都很强调所谓的礼仪培训。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就说，你在街上，在什么地方，见到什么人都要做出笑容。他说，这是美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对人要友好。开始的时候我不一定都能做出笑容，但可以练习，实际上做出笑容很简单，就是嘴角往上一翘，就行了。后来我就学着这么做，做得多了，觉得也就习惯了。但是回国之后，我觉得这样做就很不合适。我们可以想像一下，我们每天见到一个人，他总对你皮笑肉不笑，拼命做出那样的一种表情，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回事啊。在中国人看来，人际交往、人际关系，主要还不是看你外在的表现是什么，而在于内心品质到底如何。所以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人际关系的看重程度和看重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礼仪培训对于缓和人际关系、人际交往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它的重要性在中国和在美国绝对是不一样的。因为即使你的外在表现再好，可能也不会有太多的朋友，因为中国人注重的并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心是如何的。

第三，从事物指向的特点来看，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差别最大。首先，中国人的人格维度最直接有关的就是严谨自制—放纵任性。它包括三个层次，即坚忍和浮躁、节俭和放纵，以及沉稳和冒失。这些特点反映的是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投入程度或者做事的风格。而在西方人的人格中的公正性维度，它的内容是非常

丰富的，第一，它包含了能力；第二，它包含了要负的责任和要遵守的规矩；第三，还包含了一种做事的风格，就是严谨、深思熟虑；另外还有能不能自我控制。

从西方人的做事风格来看，实际上包含了做某件事所要遵守的规矩是什么，做这件事所应该对自己进行的约束是什么，另外也包括了做这件事所要具备的能力。即完成一件事所需的所有条件都包括在内。而在中国人看来，做事的风格仅仅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因此，在中国人要做事的时候，还必须有另外的三个维度来支持：一个是能力，一个是志向，另一个是品质。这也就是说，中国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他这四个方面是分开的。换句话说来讲，当我们去看中国人做事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注重的是他的能力，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做好。但在另外的情况下，我们可能看重的是这个人是不是很勤奋，是不是很投入。在很多情况下，可能觉得，这个人尽管他有能力，但他的工作态度不好，所以我们也不用他，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两个可能并不是一致的，而在西方人那边，这两个本身就有内在的联系。最要命的是第三个，可能你既具备了能力，又非常的投入，但是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完全可以不守规矩，你也可以很守规矩，这也是看你自己的道德修养的问题。因此跟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做事的时候会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或多样性。这就是说，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要根据现实情况的不同来作出判断，而没有一种一致性的原则。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西方人做事比较刻板，没有灵活性，而这恰恰是反映了我们有太多的灵活性。可以想像的是，如果什么事都追求灵活，都没有一种一致性的东西，这样整个社会秩序也会非常成问题。

现在我们从总体上来比较一下，中国人和西方人在人格结构上的一些特点。第一，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的人格结构、人格特点，最主要的还在于他的内在的品质，包括个人的能力，是不是很勤奋，是不是很善良，是淡泊名利，还是追求功利虚荣，还有就是比较大度还是比较计较，这都是从内在品质来讲的。

而西方人在看一个人的时候，更多的是看他表现在外的一面。也就是说，中国人是要追究你内心在想什么，而西方人首先想到的

是你外在的表现是什么。那么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觉得中国人活得很累，而西方人好像整天都朝气蓬勃的。因为西方人很看重外在的表现，所以他们的表现一般都是比较外向、比较外在的；而中国人呢，你表现得再有活力，可能你这个人品质不好；你表现得再有活力，你能力可能很差；你表现得再有活力，别人可能觉得你是一个很计较自私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在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表现在外的特点，看上去很重要，但实际上它起的作用很小；而内心的东西，看不见，你又必须得很在意，所以就活得很累。

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因为西方人比较“表里如一”，因此看重外在表现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而中国人的外在表现往往与其内心想法有很大的出入，因此中国人必须深入了解别人的内心想法才能真正了解这个人。当然，这种说法还需进一步的证明。

在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之后，会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人的人格结构跟西方人有着明显的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人的东西。现在中国心理学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根据中国人的实际的情况，来研究和发展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理论体系，自己的测量体系，然后把它真正应用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中去。谢谢大家。

五、提问与答复

问：感谢王教授让我们这么清晰地了解了我们自身，同时让我们了解了我们和西方人有哪些异同。我对中国人的种族研究很感兴趣，我听说华夏民族有四种种族特征，但我只知道其中两个，一个是“铲形门齿”，大概就是门牙是铲子形的，一个是“小脚趾指甲分成两瓣”，我不知道后两个特征是什么，但听说都在头部。一位网友对我说，华夏民族头部的两个特征，一个是聪明而不说实话，一个是利益当先，因而勾心斗角。我觉得，这倒是为您的中国人格研究很有帮助。

答：这两点在中国人身上是会有一些表现，但并不是说西方人

就没有，只是从程度上来讲，可能中国人更容易表现出这样的一些特点。就从勾心斗角来讲，中国人比较注重的是内在的体验和内在的特点，而跟外在的表现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也就是说，你外在的表现既然跟内在的体验可以不一样，那么当两个人在一起谈得非常热闹的时候，可能内心里面想的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相比之下，西方人可能更容易交流，更容易了解和把握一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

问：我发现您 1993 年写了一部《变态心理学》，我对这本书倒是挺感兴趣。另外，我也挺替您担心的，我听说研究变态的人容易变态，搞心理咨询的人容易自杀，可这两样您都干过，所以您既容易变态，又容易自杀。您可千万别想不开呀。言归正传，我还想知道，变态心理学的研究，有助于对中国人格的分析吗？

答：首先感谢这位朋友的忠告，我一定努力不去变态，也一定努力不去自杀。你说的有道理，在国外做过一个统计，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如果紧张性比较高的话，比较容易得精神病，也比较容易自杀，像牙科医生、心理咨询医生等，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讲到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实际上我们有两种路径，一种就是研究正常人的特点，把人们平常表现出来的正常的特点，进行分析综合，然后抽象出几个一般性的维度。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从异常现象来进行研究，研究人格的变态和人格的不正常，看到底是怎么样产生了这种异常以及产生异常的机制，这对于我们了解正常的人格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说，在心理学里面，有正常心理学，也有异常心理学，也叫变态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的研究就是从心理障碍者身上去发现，再回去反观正常人的性格、正常人的心理过程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以及如何发生变化的。应该说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就正反两方面来进行研究，对于了解人们的心理结构、心理特点、人格特点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问：王教授，您刚才谈到正常心理和异常心理、正常人格和异常人格问题，我一直对正常和异常划分的标准比较疑惑，像在心理学里面，精神分裂应该是一种病态的现象，但是我看来好像每个人都多少有些精神分裂的倾向，就是程度的问题。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您看来正常、异常划分的标准是什么？谢谢。

答：正常和异常划分的标准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对于那些明显的异常，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而如果在刚刚开始出现有些不正常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现，然后及时进行治疗，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从临床上来讲，需要有一种能够及时地发现不正常的方法，但是现在还没有。原因在哪儿呢？其实在每个人的一生里面，谁都保不准自己在什么时候会有一些不正常的表现。我举个例子来讲，有的时候我在家里锁门，锁完门之后出来，好远了，我又想我是不是把门锁上了，我又回去检查一下，检查一下锁好了之后，我就走了，这没问题，也不能说不正常。但是如果我要回去检查十几次，甚至二十几次，那我就有毛病了，那我肯定是不正常了。所以，正常和异常的临界状态是很难判断的，而且绝对的不正常的和绝对正常的人都很少，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在某些时刻，在某一个阶段里面，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情绪的困扰，或者有行为上的一些觉得受控制或者怎么的。这样的一些想法，或者这样的一些行为表现，不一定就是行为不正常。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你感觉到跟平常不一样的想法或者行为，是不是明显地影响了你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明显的影响，那可能就需要专家的帮助。

另外，你刚才讲的“精神分裂”是最严重的，这是对的。但是“精神分裂”不是指的我们内心的感受会分裂成几块。“精神分裂”的含义是指整个的心理活动跟现实环境之间是分离的。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跟他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的关系，那肯定不正常。本来大家很高兴地在一起，他却放声痛哭，因为他跟现实环境没有接触。大家都很悲伤的时候，他在那儿哈哈大笑，这也是不正常的。所以所谓的“精神分裂”，实际上就是指个人的内心活动和他的周围环境分离了，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心理障碍。

问：美国人明恩溥曾在中国生活了将近五十年，他是最早建议美国总统退还庚子赔款的人。他说“猜疑”是东方民族的一个人格特征，在中国盛行一时，随处可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们遍地都是围着城墙的城市。他认为，“猜疑”是打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特性，因为他们受到的伤害太多太多太多，您同意这位美国佬的说

法吗？

答：就这个具体观点来讲，我现在还想不好，但是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所谓的到处都是围着城墙的城市，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就毫不奇怪，连年的征战不休，到近代又受到列强的入侵，应该说，中国人一直没有安全感。包括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及到后来的朝代的更替，都反映了这样一种心态，而且每个朝代之间，在比较和平、比较繁荣的时期以及战乱的时期，又会有不同，而且这个间隔一般都是比较短的。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国人已经饱经了战乱之苦，从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里面，就在这么大的一个圈子里面，相互之间的征战，以及到后来的外敌的入侵，这样的一种内部的交融和与外部的碰撞，应该说形成了中国人对自己未来的命运、对人际交往过程中的相互之间的信任都存在这样的一种担心和猜忌，应该说是必然的。是不是说，就单纯因为这样的原因，以及这样的猜忌是否可以作为中国人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国民性，我还不太好讲，但至少，这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的现实。

问：我想问，如果我这个人不希望自己活得很累，最简单的办法，是我脱离开中国这个大圈子，还是应该真正改变我自己？

答：这两种方法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可行的，但是又不那么简单。假如你到美国去，实际上你所接触的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华裔，还是中国人，这个你是逃不掉的，你到全世界各地去，只要你这张脸一出现，马上就会有很多的人，你愿意不愿意，都可能会跟你打交道，会跟你在一起。另外，当你去改变自己的时候，一个大的环境的变化，和每一个人个人的努力，它一定会有一个缓冲的过程，而这个缓冲的过程可能会相当的长。也就是说，在改变环境变得不可能的时候，我们要求助自己，改变自己。但首要一点就是，这种改变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可能就是你周围的人会对你有另外的看法，那你能不能忍受这一点，如果能够忍受，或者你只能忍受某种程度，那你自己的改变也要达到某种程度。另外还有人讲，说我们教育小孩子，父母不要管得太多，比如到了上小学之前，他就在家里，父母可以说，摔倒了自己爬起来。但是一上小学之后，所有的同学一比较，哎呀人家的父母都来接送，你不接送的话，他

就觉得这根本不可能。所以父母可能也要投降，那也得去接送。在改变大环境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至少，你自己可以调整，你有你自己调整的余地。从效果上来讲，改变客观环境，相对来讲难一些，同时还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也要去适应。改变自己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同时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问：王老师，我想问一下，究竟什么叫“人性”？到底是中国的人格和人性更接近，还是西方的人格和人性更接近？人格如果和人性很接近的话，是不是它就是说，人格达到一种很完善、很美的境界？谢谢。

答：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其实“人性”是指的人的本性，当对人的所有的行为不加任何地限制时，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特点，就是人性的特点。人格必定要包含了对人性的看法。从目前来讲，对人性的看法大概有三种，精神分析理论讲到人性时叫“人性本恶”。在精神分析理论看来，人的行为如果不加任何约束，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两种，攻击性和性，那么这个世界将变成充满了仇恨、凶杀、色情的一个社会，这就是精神分析，就是弗洛伊德对人性的看法。第二种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看法，“人性本善”，人的行为如果不加任何限制，这个社会将充满建设性，人人友爱互助，每个人都会尽可能地发挥出自己的潜力，为这个社会作出贡献，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人生的境界。第三种是行为主义的理论，它认为，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人们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逃避惩罚，获得奖励。这是三种不同的人性观。

讲到人类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不能回避人性的问题，讲到管理的时候也不能回避关于人性的问题。比如我们所采用的西方人的管理理论，其对人性的基本看法就是，人都是自私的，如果不加管理，不加限制的话，那么他会偷懒；或者说，你只有给他很多的钱，他做的事情和他的钱有关系，他才能够拼命地去做事。这是管理上的一种假设，是对人性的认识。而另外的说法，我们要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为这个事情共同地来努力，这是从人性的善的方面来讲的。这样的一种管理制度，和我刚才讲的另外一种管理制度，它所依据的对人性的看法是不同的，因此它会采取完全不同的路径。实际上

在西方的管理理论里面，这两类是并存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人性的看法，实际上就会影响了你对人的方式，你管人的方式，跟人打交道的方式。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一定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说人性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潜隐在内部的，不仔细去想，可能根本不会去注意。我到底是一个自私的人还是一个高尚的人，那你就不断地反省，像孔夫子讲的，“吾日三省吾身”，每天都要多次地反省自己，我今天哪件事做得好，哪件事做得不好，哪件事说明我是圣人，哪件事说明我是小人。“到七十岁的时候才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啊”，才能够不管怎么做，都不会越雷池一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并不一定很清楚地意识到，而且当你仔细分析一下你自己的所有的行为的时候，你会对人性有一个看法的。当然这个很难，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这样的一件事，因为当你发现自己人性很恶的一面的时候，你会很难过的。

问：请问王教授，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爱说这个人非常固执，“不撞南山不回头”。还有时候，人们评价他的时候会说，这个人对目标追求坚韧执着。那您能不能讲一下“固执”和“坚韧”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呢？

答：“固执”和“坚韧”是在一个维度上，都反映同一个方面的特点。如果在认定了一个目标，而且在认为这个目标是他必须达到或他非常看重的；同时又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这时能够坚持下来，就是“坚韧”。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在坚持的过程中，他是能够根据周围环境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策略的，否则就是“固执”。例如，今天晚上这道题解不出来我就不睡觉了，那么，可能我今天晚上不睡觉还没解出来，第二天晚上我还不睡，这是固执。而坚韧则是，我今晚解不出来，我该睡觉时就睡，但是第二天早上我还要继续解。我想，这是“坚韧”和“固执”的区别。

问：我不能理解一个现象。我们几个同学挺要好的，隔一段时间会凑在一起，讲一下对理想的追求，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当然我们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让人生充满快乐。我们每一次都是从晚上八九点一直谈，会谈到（半夜）两三点，都谈得非常开

心。可是，有一次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其中的一个同学，她叫小康，我们整个谈话过程都是一直在笑，她最后说一句话，她说我们笑到现在，我们没有一声是笑自心底的。经她这么一说，我再回想刚刚的谈话过程，我发现我真的没有笑自心底，这是怎么回事？

答：中国人在看人的时候非常注重内心，总是希望了解别人的内心，这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同时还总是不想让别人了解自己，这也是每个人都一样的。你刚才讲的情况跟这方面有关系，不太想让这么多的人知道你有这样的问题，你问过这样的问题。而在你看来，可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反映了你内心的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或者一种感受，而这样的感受你可能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想在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中，有的时候会是非常高兴、非常快乐的，但是这种高兴和快乐是有不同层次的。有一种高兴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你所追求的，你所盼望的一种友情，一种友谊，或者一种很看重的目标。如果你达到了，你实现了，你会有一种由衷的兴奋、由衷的幸福感。还有一种，就是这件事很好笑、很可笑，这是比较浅层次的。在这两个之间，还有一种层次，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同时又没有太多的让你烦心的事，讲到某件事又非常的引人入胜，所以你就会非常的高兴。那么真正的笑自心里，可能就是那种真正的深层次的兴奋和愉悦，也就是说，你对生活是满意的，你对你自己是满意的，你对周围的人是满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从心里笑出来，如果不是的话，任何一个方面的欠缺，你都可能只是快乐，而不是幸福。

问：王教授，如果难为你的话，让您用一句话描述一下中国人的人格，你将怎么回答？只能是一句话。

答：中国人非常注重内在的品质。

注 释

[1] 陈仲庚，张雨新：《人格心理学》，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
- [2] John O. The "big five" factor taxonomy: Dimensions of personality in the natural language and in questionnaires, in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ed. By L. Pervin, Guilford Press, 1990.
- [3] 王登峰, 崔红: “文化、语言、人格结构”。北京大学学报, 2000 (4)。
- [4] Allport G., Odbert H. Trait names: A psycho-lexical study, in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Vol. 41, No. 1, 1936.
- [5] Costa P., McCrae R. *The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Manual*. Odessa, FL: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1985.
- [6] 王登峰, 方林, 左衍涛: “中国人人格的词汇研究”。《心理学报》, 1995, 27 (4): 400-406。
- [7] 从词典中所选的词中, 描述性的和评价性的词各占 22.8% 和 21.2%, 与西方的结果类似, 而从其他渠道所获的词中, 这两个百分比分别为 16.4% 和 75.6%。
- [8] 王登峰: “社会文化环境与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特点”, 《社会心理研究论文集》, 香港: 时代文化出版公司, 1993。
- [9] Yang K., Bond M. Exploring implicit personality theories with indigenous or imported constructs: The Chinese case, 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8, No. 6, 1990.
- [10] 王登峰, 崔红: “编制中国人人格量表的理论构想和初步结果”, 第七届全国心理学大会报告论文, 2001 年 10 月, 广州。

21 世纪新药研究的前景与展望

张礼和

张礼和，男，有机药物化学家、博士生导师。1937 年 9 月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67 年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研究生毕业。199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核酸化学及抗肿瘤抗病毒药物研究。主要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药学学科召集人，国家新药评审委员会委员，《药物化学杂志》主编，《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副主编，《国外医学·药学分册》副主编，亚洲药化学会主席（1998—1999），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生命有机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兰州大学应用有机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等。1993 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同学们，晚上好。今晚我将主要讲一些新药方面的问题。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专业，但都离不开医药；卫生保健事业在我国的建设中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今天是周末，这么多同学赶来，我很感动。我想尽可能说通俗一点。

医药问题，不光大家关心，媒体炒作也很厉害。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大家可以在宣传中看到，很多地方把制药工业看作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很多高新产业区、开发区，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制药工业。这往往给人们一个印象，制药工业可带来很大利润，而且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效益。同时媒体宣传也给人们造成了一个错觉：“神医”、“神药”实在太多，从治疗“智力低下”到使人“长生不老”，什么药都有。我觉得，这种宣传实在是一种误导。的确，有些药给国家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比如治疗胃溃疡的药雷尼替丁，在国外一个产品就是几十亿美元的收入。但并非所有的药都如此。一种新药的诞生需要十分艰巨的劳动，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那些几个月可以搞一个产品，产品一

制成即能在市场上占取很大份额，百病能治的宣传，都是不恰当的，甚至有害的。学医药的同学们，绝大多数毕业后都以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做研究工作，为人民造福，但也有的受到这种误导的影响，急功近利，往往忽略了根本的问题。医药的着眼点，是救死扶伤，为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利。我们国家“打假”，打假药劣药是重点之一，而假药的出现，实际上就是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希望通过今天的讲座，大家能对这个问题有个更清醒的认识。

一种药物的研究，需要长时间的辛勤劳动，特别是现在。我们承认的药物，第一要有效；第二必须安全，不能有副作用；第三，必须质量可控。药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要推向市场，必须质量可控，同一种药，今天有效，明天无效，就不行。这三点是对药物最基本的要求。

回顾历史，最老的药是中草药。传说中药是通过“神农尝百草”获得的，即通过神农的自身体会来判断药效。也即就是说，在最早的药物使用中，人们是通过不断实践发现药物的。这样出现了第一批“植物药”。比如从罂粟果实中提取的镇病药鸦片，金鸡纳树皮中提取的抗疟药金鸡纳。阿司匹林则最早来自杨树树皮。通过这样的实践发现，最早的药大多数都是植物药和矿物药。

随着科技发展，近代药物出现。多种科学的共同发展，为药学的发现提供了良机。显微镜的发明使细菌被发现，促进了一系列抗菌素的产生，而染料工业的发展，则促进了磺胺类药物的产生。从经验地“尝百草”，到科学地产生药物，我们可以看到各学科所起的综合作用。所以我们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药物发展史上第一个高潮。

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病理过程的研究日趋细致。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药物发展出现了第二个高潮。这样产生大量的抗肿瘤、抗感染、心血管系统、精神系统等新药，同时也带来巨大利润，原因何在？生物学、医学及其他基础学科的发展，使我们根据发病机理来进行研究，这就比前一个时期更近了一步。

现在，“人类基因组计划”把医药发展推向第三个高潮。人类

基因组计划，就是要把染色体上的核苷酸排列顺序定位，这对进一步研究人的正常生理作用和疾病发生发展都有重要作用。然而这只是第一步，弄清基因的组成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弄清每条基因的功能。这就是紧接着的“后基因组计划”的目标。知道了疾病在基因水平的变化，我们才能做到针对疾病来发展有效的药物。所以，21 世纪的药物，可能正面临一个新的发展的黄金时代。不同人群每个基因大体一致，但多少有不同，称为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所以同样的病，同样的药对不同的人疗效会差异很大。故对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的研究已成为一个十分前沿的问题。如果能够成功，个体化的医疗终会实现，“基因卡”的使用将不再是梦，医药使用将更加合理。这种背景促进了各大药业公司的兼并。将来，全球的药业公司，可能就 50 家左右，即能将全球大部分销售额控制住。这种发展的主要优势是它能集中人物、物力，并能降低成本。科学发展，使这些企业有强大竞争力，把那些与药物发展有关的研究所、企业都集中到它一个集团中来，有针对地寻找药。人们对病的发生发展机制了解更清，对药作用的“靶子”了解更为明确。许多新技术，在医药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比如信息学技术，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分析、提取基因组计划带给我们的大量信息。它还可以模拟药物对“靶子”的作用。药物进展只有和这些新技术紧密结合，才能更好地向前迈进。

科技进步，发现新药的可能性更大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上的创新药物越来越多。我曾做过一个统计，1990 年到现在，市场上完全新的药，一年也就 50 个左右，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对药物的要求越来越高。刚才我讲到了新药的三个条件：有效、无副作用、质量可靠。但现在还得加上一个条件：必需有市场竞争力。一种新药必须比老药更好，才能在市场上站住脚。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药物的竞争更加激烈，不仅是能够出药的问题。这就要求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现在的市场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很好的机遇。

我们国家的情况，刚解放时还没有自己的制药工业，绝大多数药都是进口，包括制剂。解放后这几十年来我们已建起了比较完整

的医药工业。现在的药，只要国际市场上有，我们都能做，还有一部分原料出口。这是好事，但也带来两个问题：第一，过去我们因为没参加国际组织，不受国际社会法制的抑制，可以大量地去仿制，而不存在侵犯专利权的问题。但自从我国敞开国门走向世界，参加到国际社会中去，就要遵守国际公约，别人的知识产权不能侵犯。第二个问题，长期的仿制使我们自己开发的能力非常之弱。我们知道药物有两个部分，一是原料药，二是制剂。仿制能力强，原料药产量高，很多其他国家就买原料药，将许多化工污染留在中国；而它们将原料药做成制剂再返销回中国，牟取大量利润。现在中国的西药，我们自己创制的只占3%，其他97%都是仿制。所以从1900年以后，我们便非常注意知识产权问题，有些在专利保护期内的仿制药不能再做。90年代以来，我国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开发自己产业。1990年至今，已有十几个我们独立开发的新药上市。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国际上的差距还很大。

另外，大家可能会说，中国的优势是中草药，但这个问题也不容乐观。第一，中医中药使用的主要部分是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华人地区，在欧美市场上也主要是华人使用，而且仅被当作“补剂”或健康食品使用，所以中医中药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进一步改造。而国外也有它们的“天然药物”，我们的竞争力就相对十分低下了。1998年的统计数字，天然药物的世界年销售额是164亿，中国仅占3亿多一点。而我们出口的中成药还不如日本。日本有一家很有名的生产“汉方药”的药厂叫“津村顺天堂”，一年出口额就有6亿。究其原因，第一，很多中医术语外国人不懂，什么“清热解毒”、“扶正祛邪”，他们无法理解，当然也不能接受我们的药。所以必须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加以诠释。第二，我们知道中药是“丸散膏丹”，一大锅汤，苦得要命，谁也不愿喝，如果做成咖啡味道，大家也许就愿喝了。（笑声）但做成这样以后疗效又不能消失，所以，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整理中草药，使它走向国际，进入国际市场，是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中药现代化”计划由此提出。关键是要做到有效、低毒、质量控制。但中药有一大难题是质量很难控制。中药成分极复杂，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其中哪些成分起作用，

怎样确保疗效，这些问题若都不加以研究清楚，是不可能有竞争力的。可见，我们虽已有很大进步，犹需加倍努力。

现在科学发展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它的多学科性质，任何一种科学，要突破、要进展，必须多学科合作，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第二，基础研究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比过去快多了。从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到和平利用原子能成功，其间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而“人类基因组计划”，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不过十几年时间，现已做出大量实质性的工作，转化速度非常之快。这个原因，当然与各方面技术的发展有关系。我们应该在这里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提出一点看法。我现在所从事的研究主要是核酸化学。对我启发最大的是瑞典科学家米歇尔，他是做核酸化学的第一人。米歇尔是学医的，医学院毕业后他没有去搞医，而想研究细胞里到底有些什么。要研究细胞首先要搜集细胞，而活体细胞是很难搜集的。于是他到手术病房，把病人带有脓血的绷带找来。大家知道，脓血白细胞的细胞核非常大，他把脓血洗下来作为实验材料。他把脓血细胞用碱处理后用酸沉淀，结果出现一种胶状物——核酸，为了进一步获取核酸中磷含量数据，他长期在地下室利用简单的实验设备工作，并获得了与现代测量值相近的结果。可见他工作的细致与踏实。米歇尔的这种科学研究精神是很可贵的。为了实现自己的科学追求，他可以牺牲医生的职业，去做又脏又臭又累的工作，持之以恒地在极恶劣的实验环境工作。正因为如此，他很年轻便去世了。但自米歇尔以后，在核酸方面获诺贝尔奖的人已有十几个，可见核酸工作的重要性。另外，我们的研究工作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些药品叫“666”、“914”等等，这表示这种药通过多少多少次实验才成功。现在药物也是这样，除了艾滋病药和肿瘤药，一般药物都要经过 8 年到 12 年的研究周期，耗资也很巨大。新药的制得需要几个过程。第一，要找到一个有活性的药，首先经过体外实验，然后在动物模型上试验药的效用，进行严格的安全性评价。这方面曾有惨痛的教训。60 年代有一种药叫“反应停”，可以有效地抑制孕妇的妊娠反

应，一时风靡欧美，但不幸的是，后来发现很多服用这些药的妇女生下来的婴儿都是畸形儿，造成一个很大的灾难。从此，人们对药的安全性更加重视了。在药物研究中不可忽视安全性，通过动物实验后进入临床实验阶段，一般要做三期到四期临床，一期临床用健康的志愿者试服，如果没有严重副反应则进入二期临床，找出此药的适应证。三期临床则需要做大面积的“双盲法研究”。有些病因精神作用会出现好转，有些病例则可以自愈，所以不经过严格的双盲法对照就说一个药有效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三期临床就是把患者随机分组，在医生和病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组使用安慰剂，一组使用新药，最后把盲底揭开比较，看是否有显著性差异。只有在“双盲法”实验中有效，这种药才是临床有效的。这个阶段过后即进入“试生产”阶段，而四期临床，将药物大面积试用。许多问题就暴露在这个阶段，将这些问题进行总结，最后才能拿到正式生产证书，正式进入市场。你们看，做一个药，要经过这么多步骤，所以一开始我就讲，不要认为做药是轻而易举的生财之道。

现在随着病人素质的提高，对药物要求也越来越细，这样就对制药业提出了挑战。现在市场上有些药，吃了既有害，也不治病，并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但要让我们国家的药进入世界前列，光靠这种药是绝对不行的。我们的研究机关，特别像我们北大这样的学校，如果光研究那种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的药，能振兴我们国家的医药事业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必需付出艰巨的劳动，踏踏实实去做研究工作。我又想起一个故事，青霉素是第一代的抗菌素，但后来出现第二代、第三代抗菌素。第二代抗菌素又称“半合抗”。青霉素有个缺点，在人体内极易失活，作用快而不持久。而半合抗则在青霉素母核结构上把侧链改换，达到更好的效果。最早发现获得青霉素母核方法的是个日本人，但他没将母核连接不同侧链。而这个信息却被欧洲科学家抓住，发展了“长效青霉素”，在抗菌素工业上迈进了很大一步。日本人对此事进行了反思，现在日本的医药事业也已有很大发展。中国的中草药有几千年历史，但为什么“银杏叶”这些药出现在欧美市场而不是中国？为什么我们全国中草药出口量还顶不上日本一个公司的出口量？这个问题很值得

反思。

不知我们的领导是否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还远远不够，我们很多时候太急功近利。这样的工作就往往会造成我们电视里那些东西：既治不好人，也吃不死人。利润可能很不错，但对我国的新药发展毫无贡献，所以在新药发展中，扎扎实实的基础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个想法，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做出很多成就来，比如中草药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从中草药中寻找出有利成分。中国在中草药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据统计，我国有可药用植物 16000 多种，从寒带到亚热带，各种植物都有。海洋生物也是一个重要的药物来源，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海岸线，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我们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供制药，陈竺院士新近就发现砒霜可治白血病。砒霜是矿物质。这样丰富的资源，为我们药物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另外，我们有庞大的研究队伍，也有很多企业愿意投资搞药，我们只要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真正地把基础打扎实，还是很有希望的。第二，我们有一个宝库：复方。复方至今未得到很好的研究，有很大的研究潜力。“一病多治”与“多病一治”是复方的特点，很值得进一步思考、研究。总的来讲，复方研究非常难，但也有很大的空间。另外一个问题，如何将中医的医治原则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表达出来，这难度很大，也是中药研究的一个空白，值得我们大力去做。我们从 60 年代开始做核酸药。但真正搞科研也就是 80 年代以后。我们从 1985 年开始做，现在刚刚进行到一期临床。有人问我：“你对这个药怎么看？”我说：“科学研究，本来就是探索未知，如果成功了当然很好，如果不成功，至少也为后人提供了一条不成功的道路，告诉他们‘此路不通’，你们以后走别的路，就不要再走这条路了。”科学研究本身就是这样。在研究药物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持之以恒、不怕失败的精神。科学研究如果都能很快成功，也就没有它的魅力了。科学的魅力就在于让你不断地去探索，不断地去争取成功。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当然也碰到了很多的失败。你要做一个药，很多东西要从基础研究做起，你如果老是捡现成的，就不可能做出自己的东西，也许能有发展，但相对的创新程度就不一样。常有人问我：

“你这药什么时候上市？产生了多少经济效益？”常让我们感到一种压力：做药，就是为了产生经济效益，去占有市场。做基础研究工作，要有这样的适应能力。你老是希望在别人成果的基础上很快摘到果子的话，果子早就被别人摘完了。另外，我们进入 WTO 以后，这种知识产权的概念应当增强。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发掘自己创新的药。另外，现在这种缺乏制药道德的情况往往渗透到各个领域中去，医药业本是一个崇高的行业，救死扶伤。如果你完全不是减轻病人的痛苦而是乘人之危，那是应该受到严惩的（掌声），而那种假造数据，不实求是的情况，在各个领域中都是有的。这种情况十分普遍，我国也曾曝光了很多起。所以今晚，我要借药这个话题，一方面想和同学们沟通一下药物研究情况，另一方面谈谈我对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看法。

近年全球毒品问题动向

蔡志基

蔡志基，男，1930年1月出生广东。现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名誉所长，药理学教授。兼任世界卫生组织药物依赖性与酒精问题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国际成瘾医学会常务理事，卫生部麻醉药品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毒理学会副理事长、药物依赖性毒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理学学会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主要研究方向为神经药理学、药物依赖性。

毒品问题包括两大方面问题：（1）大量人群滥用毒品（我国俗称“吸毒”）；（2）一小撮犯罪分子非法种植、制造和贩运毒品。对毒品滥用者（以下简称吸毒者）来说，他们是中了毒的病人，社会有责任将他们的病治好，把毒瘾戒掉，重新回到正常社会中来，因此它主要是医学上的问题，当然应严格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换句话说，对吸毒者应该把他们当成是病人，而不应该将他们当成犯人，这已在全球范围取得共识。但是，对非法种毒、制毒和贩毒的犯罪分子来说，则应按敌我矛盾严加惩处，予以严厉打击和法律制裁。当今世界，毒品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社会公害，我国也不例外。

医生用药来治病，这是众人皆知的普通常识。药物均为化学物质，任何化学物质在用量达到一定程度时，都会产生毒性，因此从医学的角度看，药物与毒物是同义语，任何药物当剂量加大超过界限就可使人中毒，从这意义讲，药物就是毒物，医学是一门使人能巧妙地使用药物（即毒物）来治病的学问，用量得当就是药，使用不当就中毒。药物的毒性有各种各样，有的毒害内脏，有的毒害脑部功能。目前已知有相当多作用于脑部的药物具有一种称为药物依赖性（drug dependence）的毒性，人们中了这类药的毒时就会处在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表现为中毒者产生欣快感（euphoria），并对

毒品产生强烈渴求 (craving)，出现控制不住的不断寻求和使用毒品的行为 (drug seeking and taking behavior)，即吸毒，这种对毒品成瘾状态在医学的专业术语叫做“精神依赖性” (psychic dependence)，也叫“心理依赖性” (psychological dependence)，通常所说的药物成瘾性 (drug addiction) 所指的就是药物的精神依赖性。药物依赖性还表现出另一种状态，它在反复多次使用毒品之后发生，是人体对毒品产生的一种生理的适应性，此时机体将毒品当成必不可少的物质，一旦突然中断毒品时，机体就会发生强烈反应，出现“戒断症状” (withdrawal syndromes)，医学上称这种依赖状态为“身体依赖性” (physical dependence) (或称躯体依赖性)，又称为“生理依赖性” (physiological dependence)。有依赖性特性的药品或其他物质被人们滥用即成为毒品，由于毒品问题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必须进行国际管制，各国签订了国际禁毒公约并按公约条文开展全球性禁毒斗争。国际禁毒公约将毒品分布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两大类进行管制，前者分为阿片类、可卡因与大麻三类；后者分为镇静催眠药与抗焦虑药、中枢兴奋剂和致幻剂三类。另外，禁毒公约还将用于毒品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化学物质也列入公约管制，这些物质包括毒品的前体例如麻黄碱 (用于制造甲基苯胺即“冰毒”) 以及毒品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化学试剂例如硫酸等。除此之外，还有三类具有依赖性特性的物质未列入国际禁毒公约管制，它们是烟草、酒精和挥发性有机溶剂。从上面列举的名单不难看出，有依赖性特性的物质除众人皆知的臭名昭著的毒品如海洛因以外，还包括相当多人常用的药品如镇静催眠药，更包括日常生活中不少人习惯用的烟酒等物品。曾经有过一种不全面的论调，把毒品滥用问题简单地归结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实际上应该把吸毒看成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某种特殊的流行性脑部疾病，从医学角度看，它与过去从未见过而在近几十年才出现并蔓延全球的艾滋病一样，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形形色色疾病中的一种。在这里必须严肃告诫人们，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千万别因好奇心或逞英雄或被他人诱惑去尝试毒品，因为药物依赖性 is 毒品所具有的客观存在的特殊毒性，只要使用它这种毒性就必然会表现出来，不可能用主

观意志去控制，许多吸毒者就是由于上述原因去试用毒品而陷入泥坑不能自拔。

当前在全球范围滥用最广的受管制毒品为大麻（估计滥用人数约 1.4 亿），海洛因与可卡因是给滥用者带来严重危害的毒品（滥用人数分别约 920 万和 1400 万），以苯丙胺类为主的中枢兴奋剂是近十年来滥用人数剧增的毒品（滥用人数估计达 2870 万），甲基苯丙胺（冰毒）和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摇头丸）为主要代表。据联合国禁毒与犯罪预防署（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rug Control and Crime Prevention, UNODCCP）的 2000 年度报告估计，阿片类、可卡因、大麻和中枢兴奋剂四类毒品的滥用人类约占全球人口的 3.3% 或全球 12 岁以上人口的 4.7%（表 1）

表 1 90 年代后期全球几种毒品滥用者估计数

毒 品	人数（万）	占人口%	占>12 岁人口%
大 麻	14410	2.4	3.4
ATS （苯丙胺类兴奋剂）	2870	0.5	0.7
可卡因	1400	0.2	0.3
阿片类	1350	0.2	0.3
（海洛因	920	0.15	0.22）
共 计	20030	3.3	4.7

滥用阿片是旧中国存在的严重问题，它给我国民众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据粗略估计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全国约有 2000 万阿片成瘾者。解放后我国政府作了很大努力在 1950—1952 年的三年内通过开展一个全国性禁烟运动有效地解决了毒品问题，从那以后国内保持着 30 年无毒状态。世界毒品问题在人类社会中存在已久，但它从 70 年代开始恶化，在近 30 年期间迅速演变成为全球性严重问题。在这种国际大环境影响下，国际贩毒分子利用我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之机，将海洛因从位于缅甸境内的“金三角”地

区走私贩运进入我国，在我国境内开辟了一条过境贩毒通道（由缅甸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香港），造成毒品问题在我国死灰复燃，并以云南省为起点迅速向全国范围蔓延，到 90 年代我国毒品问题愈演愈烈，已波及几乎全国所有省份，以海洛因为主的毒品滥用人数逐年增加，根据国家禁毒委员会的报告，全国登记在册的毒品滥用者人数由 1990 年的 7 万人增至 2000 年的 86 万人，10 年中增加了 11.3 倍（表 2）。

表 2 90 年代中国历年登记的海洛因成瘾者人数

年 份	登记的成瘾者人数	+%
1990	70 000	0
1992	148 000	+11
1993	250 000	+257
1994	380 000	+443
1995	520 000	+643
1997	524 000	+649
1998	596 000	751
1999	681 000	+873
2000	860 000	+1129

我国的海洛因成瘾者中男性始终占多数。然而，女性成瘾者所占比例在 90 年代不断加大，至 90 年代末由 1991 年的 12.5% 增至 1999 年的 23.1%，加大了一倍。成瘾者在 21—30 岁年龄组的分布比例最高，占全部成瘾者的将近 2/3，约 1/4 的成瘾者分布在 31—40 岁年龄组，分布在上述两个年龄组的成瘾者总和占全部成瘾者的 90% 以上。成瘾者的平均年龄在 26.4 至 30.0 岁之间。多数海洛因成瘾者的文化程度低，初中以下程度者约占 3/4，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成瘾者所占比例逐年增加，高中（包括中专）和大学（包括大专）程度的成瘾者所占比例由 1995 年的 17.2% 和 1.2% 分别增

至 1999 年的 22.8% 和 2.8%。海洛因成瘾者当中无业人员占第一位（约占半数），其次为个体户（约占 30%）。据戒毒所的报告，90 年代后期入院戒毒治疗的吸毒年限长的成瘾者所占比例增大，吸毒 4 年以上者由 1995 年的 12.1% 增至 1999 年的 26.7%，增加一倍以上。调查结果还表明，1999 年入院戒毒的吸毒者过去经过多次戒毒治疗（3 次以上）的比例为 50.8%，是 1995 年（23.3%）的一倍多。吸毒者戒毒治疗后的复吸率很高，一项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吸毒者戒毒出院后的期限越长者，其复吸率越高，复吸次数多的成瘾者，复吸率高于复吸次数少者，3 次复吸的成瘾者在戒毒出院 3 个月后的复吸率高达 98.8%，复吸率是当前戒毒工作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滥用毒品给吸毒者带来相当多合并症，包括局部感染、肺部感染、乙型或丙型肝炎、艾滋病毒感染、性病、致残等，较常见的三种合并症为局部感染、肺部感染和乙型、丙型肝炎。

毒品问题严重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毒品的缉获量增加，这是吸毒者数量增加带来毒品非法贩运增加以适应吸毒者日益增加的非法需求所必然产生的结果。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在现代化交通运输空前发达的条件下要做到百分之百地缉获全部走私毒品已经完全不可能，估计一般只能缉获 10% 左右，因而缉获量越多就意味着漏掉的毒品数量越大。1991—1994 年我国缉获的海洛因数量平均为每年 3644.7kg，为全球总缉获量的 25.5%，名列世界第一位。根据联合国禁毒和犯罪预防署（UNODCCP）的 2000 年度报告，1994—1998 年全球缉获海洛因与吗啡的数量平均每年 47177.4kg，其中我国平均每年缉获 4897.6kg，名列全球第三位，占全球缉获量的 10.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五年的海洛因和吗啡的平均缉获量是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缉获量的 71.4%。众所周知，这一地区的阿片类毒品均产自“金三角”，这意味着“金三角”地区非法生产的大部分海洛因与吗啡（约 70%）在我国被缉获。在过去十年中兴奋剂特别是苯丙胺类兴奋剂（amphetamine type stimulants, ATS）的滥用问题恶化，ATS 缉获量及滥用人数剧增。联合国禁毒计划署（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Drug Control Program, UNDCP）在 1996 年报道，32 个国家中有 21 国（占 65.6%）的 ATS 滥用者人数超过海洛因与可卡

因滥用人数之和，国际上预测在 21 世纪 ATS 将成为全世界范围第一号被滥用的毒品。中国的兴奋剂问题始于 90 年代初，在 1991—1993 年期间中国平均每年缉获 ATS554.5kg，分别为全球与东亚及东南亚缉获量的 13.9%和 33.4%，中国的缉获量占世界第三位；UNODCCP 的 2000 年度报告列出 1991—1998 年中国的 ATS 每年平均缉获量平均每年 1089.9kg，占全球平均年缉获量 8473.6kg 的 12.8%，占同时期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年均缉获量 3202.5kg 的 33.9%，名列世界第四位。毒品的黑市价格高昂，尤以海洛因为最，据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NIDA）的资料，90 年代中期美国大城市中的海洛因黑市价格按纯结晶计算每千克一般都要数十万至数百万美元，在得克萨斯州的大城市达拉斯，海洛因黑市价格在 1996 年竟高达每千克 654 万美元。

毒品问题给人类带来严重危害，静脉滥用毒品带来艾滋病病毒感染迅速扩散是近年来毒品问题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个发展动向，它对人类健康产生严重威胁。UNODCCP 在 2000 年度报告中指出，全球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已超过 3300 万例，其中因静脉注射毒品导致感染 HIV 者超过 330 万。我国最近（2000 年）的数字表明，在调查到的 HIV/AIDS 患者 20711 例当中，静脉注射毒品者所占比例高达 72.1%。毒品问题近年的另一种动向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主要在西欧）出现一股“毒品合法化”的逆流，有人公开主张“吸毒自由化”，是“人权”，这股逆流甚至得到西方一些政府的支持并采取行政措施落实。但国际社会的主流仍是毫不动摇地向毒品问题坚决斗争。联合国确定了禁毒两大战略：（1）减少毒品的非法供应；（2）降低对毒品的非法需求。近年由于出现静脉滥用毒品带来艾滋病的迅速蔓延，有人提出将“减少毒品危害”作为禁毒第三战略，实际上它是降低非法需求战略的延伸。长时期以来各国政府比较重视第一禁毒战略，把大部分禁毒经费投入这一方面，忽视降低非法需求战略的重要性，从多年实践中大家逐渐有了正确认识，1998 年联合国特别大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与会各国对此取得共识，禁毒第二战略得到普遍重视。

流行病学调查、预防、治疗是降低非法需求战略的三大支柱。

通过对毒品滥用的流行病学调查（包括对毒品滥用的监测和流行病学研究），才有可能掌握实情和据以制定对策和采取正确有成效的措施把问题真正解决好。预防是降低非法需求战略的核心，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预防三个层次。一级预防针对未接触毒品的广大人群，特别是青少年这一高危人群，需要长期地坚持不懈地开展多种形式的预防教育，使全民认识毒品的危害，远离和自觉抵制毒品。二级预防针对吸毒者，通过科学的方法戒除吸毒者的毒瘾，使他们回到正常社会中。根据国际上多年积累的经验，戒毒全过程必须包括脱毒、康复和回归社会三个连续环节，是一种综合性系统工程，三个环节缺一不可。脱毒只是戒毒治疗的开始环节，是不可缺少的但不是决定性环节。单独进行脱毒治疗，只能解决身体依赖性造成的戒断症状，对毒瘾即精神依赖性的消除所起作用不大。我国十年来在戒毒治疗中只着重抓了脱毒环节，忽视了戒除毒瘾的康复与回归社会两大重要环节，因而复吸率很高。

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面对毒品问题在我国死灰复燃及迅速蔓延的局面，国家采取下列强有力禁毒措施和进行各项活动向毒品问题作坚决斗争：

1. 在立法方面，我国政府在 1985 年宣布加入两个国际禁毒公约，即：《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随后在 1989 年加入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在国内，制订了有关药品的法律和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部药品管理法于 1985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第二部药品管理法将于 2001 年 12 月 1 日起执行），《麻醉药品管理办法》（1987），《精神药品管理办法》（1989）。

2. 建立国家禁毒机构。1987 年国务院设立麻醉药品管理与禁毒协调会议，由卫生部、公安部、外交部和海关总署组成，卫生部担任会议主席。1990 年国务院决定设立国家禁毒委员会取代原来的麻醉药品管理与禁毒协调会议，由十几个部委组成，公安部担任主任委员。

3. 禁毒执法。国家对毒品非法贩运加强了执法措施，在海洛因缉毒工作中成绩显著，并摧毁了数个制造甲基苯丙胺的地下实验室，

将不少毒品走私犯绳之以法。

4. 宣传教育。国家禁毒委员会开展了一个全国性对公众进行有关禁毒的宣传教育运动，并坚持不懈地每年进行，举办全国性禁毒展览会，教育公众认识滥用毒品的危害，自觉抵制毒品，动员公众积极参加禁毒斗争。

5. 开展科学研究以及学术活动。卫生部在 80 年代建立了三个国家级研究药物依赖性和药物滥用的机构，它们是：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设在原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药物依赖性治疗中心（设在北京安定医院），国家麻醉品实验室（设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90 年代成立了两个学术组织：中国毒理学会药物依赖性毒理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出版了两种学术期刊：《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和《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此外，从 90 年代初开始每 1—2 年召开一次全国性药物依赖性和药物滥用问题学术会议，对国内的学术研究与交流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6. 培训专业人员。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研究机构多次在国内举办培训班和研讨会对专业人员进行有关戒毒、药物滥用的流行病学研究以及药物依赖性的实验研究等方面的培训。许多中国专业技术人员被派送出国到美、英、日等国进修有关药物依赖性的专业知识，回国后在此领域发挥了骨干作用。

7. 研究开发中药戒毒药。在 90 年代期间，我国重点开展对戒毒中药的研究开发，此项工作得到政府的鼓励。为此目的国家药政部门建立了一个开发中药戒毒药的评审体系，十年来中药戒毒药的研制开发取得初步成效，已有十几个中药戒毒新药获得药政部门批准上市并在戒毒所中应用，这些中药戒毒都能减轻或缓解海洛因的戒断症状，它们的脱毒效果与西药可乐定相当，初步的临床研究还表明，某些戒毒中药对疼痛、焦虑、失眠等稽延性戒断症状有一定治疗效果，中药戒毒药的研制开发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8. 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我国在过去的 20 年中积极参与联合国及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在禁毒方面的国际合作。有 2 名中国药理学家被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选举担

任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Board, INCB) 委员 (1985—1995, 2000—2005), 数名中国专家受聘为世界卫生组织药物依赖性与酒精问题专家顾问委员会 (WHO Expert Advisory Panel on Drug Dependence and Alcohol Problems) 委员。我国学者积极参加有关药物依赖性与禁毒的国际会议, 与外国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主要参考资料

1. Leshner Al. What we know: Drug addiction is a brain disease. In: Graham AW et al., eds. *Principles of Addiction Medicine*. 2nd ed. Chevy Chase, Maryland: Am Soc Addict Med, 1998: XXIX-XXXVI.
2. UNODCCP. *World Drug Report 2000*.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1-172.
3. 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药物滥用监测报告书 1995-1999. 2000: 1-40.
4. CEWG of NIDA. Epidemiologic Trends in Drug Abuse. Vol 1. *Highlights and Executive Summary*. December 1996:10.
5. UNDCP. *Amphetamine-Type Stimulants: A Global Review*. Vienna, 1996:1-139.

互联网经济与创业机遇

方兴东

方兴东，男，1969年生于浙江省义乌市，1987至1994年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获工学学士、硕士学位。1996年3月考入清华大学，现正攻读电机系和工商管理学院的联合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对中国信息产业的分析，曾经是《南方周末》、《南华早报》、《计算机世界》、《个人电脑》、《中国青年报》、《电脑报》、《上海证券报》、《财经时报》等报刊的特约记者和专栏作家，并出版了多部分析中外信息产业的著作。方兴东是“数字论坛”的发起人之一，被誉为“中国信息产业最具影响力的独立评论家”。2000年，香港《亚洲周刊》称其为“中国重要的高科技企业家”，同时被《新周刊》评为“中国十大新锐人物”之一，被《中国计算机报》评为“影响中国互联网十大人物”之一。1999年9月，与王俊秀、叶爱民、许琳等创建了中国第一家从事互联网研究和咨询的专业公司——互联网实验室，并任董事长首席分析家至今。目前兼任浙江省金华市决策咨询委员、中国电子商务学会成员专家委员会成员等多项社会职务。

一、网络经济最新趋势

今天我主要讲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网络经济最新趋势的一些归纳与总结。第二部分讲互联网与创业的关系。

泡沫退却了，光环消失了，是不是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更加清醒了？道理上是如此，但实际却恰恰相反：现在对互联网的认识从来没有如此糊涂和混乱过！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互联网的趋势，无疑是自讨没趣。但是，我们还是想在尘嚣与死寂之间，努力摸索出一点互联网发展的新轮廓。

首先，互联网壮观的“数字时代”结束。与互联网相关的数字大概是这个时代最壮观的奇迹。几何级的增长、数量级的跃升、短时间的翻一番等都是最平常的表现，但是随着基础规模的日益膨胀，“数字效应”开始明显下降。互联网虽然增长强劲，但速率已经放缓。尤其是最有代表的互联网用户增长，依然强劲，但速率开始放缓：2000年全球互联网用户增长速率为40%；2001年估计将降低到27%；2002年估计为23%，2003年只有19%。互联网增长的数据开始越来越向传统领域靠拢，“三个月一年”的互联网速度成为永远的过去。速度观念的改变是我们适应新形势的首要任务。

第二，质量增长重于数量增长：互联网应用程度的增长意义超过用户数量增长。一方面，是用户使用程度和使用时间（广播电视76%，音乐8.3%，报纸4.6%，互联网2.2%）增长意义凸现；另一方面是互联网应用的重点开始由个人应用转向企业应用，使互联网“商机”大增。这种“钱眼”的转移是所有互联网公司生存发展战略首要的关注重点！

第三，神奇的“概念时代”结束：资本市场调整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互联网产业的创新活力和以前相比出现明显下降。自90年代中期以来，互联网经历了五年疯狂的创新期，新概念、新技术、新模式、新企业喷涌不已，充分体现了互联网革命的活力，也成为资本市场最主要的“激素”，但从2000年开始，创新技术与模式很少出现。没有足够的活力提供新的概念、新的模式，资本市场肯定会受到很大压力。反过来说，资本市场的下跌对互联网的创新支持程度产生大幅度下降，总的来说，目前处于负循环的过程中。

第四，壮观的“圈钱运动”正式谢幕。充足的资金是互联网浪潮的力量源泉。从1995年8月到2000年3月，共有412家互联网公司公开上市，目前市场价值约5000亿美元（一年前最高点为13000亿）。目前，只有22%公司高于发行价，而78%的公司则低于发行价。美国整个股市共跌60000亿美元，互联网公司跌去8000亿美元，比例只在15%左右。这跟大家平时的印象和国内媒体的宣传有很大的偏差，因为在国内，大家认为纳斯达克每天在跌，都是互联网公司在那引导跌势。实际上，真正让投资者遭受重大打击的不是互联

网公司，而是那些传统的大型高科技公司。比如最高时，Cisco 公司市场价值为 5600 亿美元，现在大概跌至不到 1000 亿美元，它一家就跌掉 4000 多亿美元，相当于 400 多家互联网公司跌掉的一半还多。英特、微软两家一共也跌去了 4000 多亿美元。其实只有美国在线、雅虎、亚马逊等极少数几家互联网公司能真正影响股市指数，特别是从 2001 年下半年开始，整个美国股市的大跌主要是因为大公司的下跌造成的。

第五，“赢者通吃”效应开始呈现。整个资本市场调整过程中，互联网公司市场价值开始快速集中，赢者通吃现象越发明显。大概一年前，4%的互联网公司只占总互联网公司市场价值总额的 20%。如今已提升到惊人的 70%。虽然美国在线、雅虎、亚马逊等跌得很厉害，但它们相对于整个市场的比重还是有很大上升。目前，在互联网十大主要商业模式中，前两名的大公司其资本总额都已超过总额的 50%以上。一般来说，商业模式越成熟，资本越集中，其中在门户这一块，美国在线、雅虎大概占全球上市的 20 家门户里的 93%，其他 18 家门户只占 7%。

第六，从美国资本市场下跌的规律来看，从正循环转变到负循环，都是从投资预期比较远的板块开始领跌。在所有领域里，当然是互联网公司投资预期最远。从 2000 年上半年开始，互联网公司开始下跌；下半年开始，预期较远、市盈率较高的电信公司和高科技公司也开始下跌；今年上半年，传统企业（包括传统媒体）开始大幅下跌。如果整个负循环能够结束，高科技公司会最先反弹，预期最远的互联网公司才会最快反弹，目前已经基本可以定性，美国经济的衰退是 U 型，而不是 V 型。目前基本上是摸底阶段，但这个低部有多久，比较中立的观点认为还需要半年到一年。因此虽然是互联网股票启动了经济的负循环，但现在是互联网被压在整体经济庞大的身体之下。现在，整个互联网股票要起来不在于互联网商业模式如何，甚至不在于公司业绩增长怎样。根本的因素在于美国总体经济能否出现好转、何时出现好转。目前影响互联网公司股票的重要原因是，传统企业信息化投入的增长率明显下降，而这个下降是由于整体经济下滑造成的，从而大大增加了资本市场复苏的难度。

第七,总的来说,受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互联网领域新的风险投资的走向开始从高风险领域流向低风险领域,由投资预期远的模式转向投资预期比较近的模式,主要由于市场形势比较恶劣。目前投资主要是一些相对传统领域,包括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宽带、无线、光纤设备等。这些领域收入模式比较稳定、比较成熟,风险较低,当然可能的回报率也会相对低一点。

接下来,我讲讲中国信息化的最新发展趋势。

第一,“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口号无疑是中国信息化的第一利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成为基本国策,这就决定了未来5—10年将是中国信息化的高潮。“十五”期间,这个政策从概念到落实,必然有巨额投入。有消息称,未来5年内,国家计划在信息化方面投入约4万亿人民币,这4万亿相当于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么大的数字不但是中国IT业的福音,同时足以影响国家经济的整体走势。而且,目前中国IT产业大概已达到1万亿的规模,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8左右,因此,未来信息化投入将成为刺激内需的重要手段。以前的手段主要是将资金投向传统基础设施,俗称“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今后,可以将信息化投入作为拉动内需的有效手段,其效果将更佳。

第二,影响IT产业发展主要有两股力量:一是拉动力,由风险投资引导,主要推动技术创新和创业,通过创新改变市场竞争格局,刺激各行各业的发展,包括传统产业,这股力量会随着资本市场而起伏,有高潮有低潮。二是推动力,主要是应用市场本身,尤其是传统产业的信息化,这是IT产业的主体市场,这股力量会一直上升,只不过有时快、有时慢。风险投资这股力量大概在百亿数量级,后者大概在万亿数量级(美国:美元,中国:元)。虽然两者有数量级的差别,但在IT产业发展中两者的影响力不相上下。前几年,主要是风险投资成为龙头。现在,传统信息化市场相对浮现出来。目前,美国是两股力量同时出现减缓,不但风险投资在下降,企业信息化投入也在明显趋缓,处于两面夹击,造成全局性的负循环。所以整个IT业步入衰退。而中国与美国有一个很大不同,中国风险投资比美国跌得更厉害,但传统领域信息化投入依然以很高速度上升,

确保产业仍有一定的活力。

第三，中国互联网市场是美国的一个附属市场，不是自己的资本、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步伐，而跟随美国走向。受国外资本市场影响，国内 IT 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创业活动受到很大抑制，传统领域信息化力量开始凸现。在政策问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国外资本主要是参与前期互联网公司的资本整合，对新兴企业投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风险投资的低潮继续，产业资本的承接能力和传统业务的支撑能力成为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关键。由于缺乏国外风险资本的支撑，宽带互联网与无线互联网的发展虽然热闹，都缺乏足够的创新活力和动力，暂时无法成势。

第四，今后一年内，资本市场无法很快复苏，国家政策将代替风险投资，成为中国未来信息化的第一推动力。这一点有好的方面，毕竟在风险投资下滑的同时，国家政策及时顶了上来，继续推动信息化的进程。但另外也有不利的方面，因为非市场力量介入太多，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过于强势，这一领域的创新活动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非市场力量是一柄发展的双刃剑。非市场因素的长期主导会直接影响信息化的产业发展和有效应用，长期代价也会很大。过去互联网领域没人管，因为这是很新的领域，到处都是灰区、禁区。但现在又走向另一极端，太多政府部门想进入这一领域，想管事情。比如，要搞电子商务，涉及到信息产业部、经贸委、科技部和计委等，这个极端必然会出现管理混乱。

第五，“政策效应”明显。虽然今年国家大力推行企业信息化，但由于信息化投入大，直接效益慢，因此企业信息化还需要一段时间预热。一些经济实力比较好的上市公司会走在前边，但政府信息化和教育信息化启动会比较快。一是对政策较敏感，二是对效益不敏感，尤其电子政务是最亮的热点，如何利用中国信息化的“政策效应”是市场成败的重要因素。

第六，“边缘效应”不容低估。过去，互联网创新和创业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极少数中心城市，他们聚集了主要的资金和人才，因此其他地区只有看热闹的份儿。但是，随着风险

投资的衰退，传统信息化力量凸现，区域市场开始启动，中心效应开始弱化。而且政策效应本身就有“边缘效应”。比如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无论省级、市级、区级还是县级，都会“闻政策而动”，形成全局性的联动。信息化本来就不是发达地区和中心地区的专利，甚至信息化的效益在非中心地区会更加显著。单从互联网角度也是如此，非中心地区，尤其是国内地区、县市一级的地区的网民已经开始规模增长，尤其是沿海一带，活力非凡。其后劲与能量不可低估，也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网民的主要增长点。

第七，过去中国的互联网市场主要是靠风险投资推动的，是美国市场的附属，不是靠自己的资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步伐推动，而是跟随美国的走向。美国这块市场不好，美国同类商业模式公司股票不涨起来，中国的创业者、投资者就没有整体意识来推动，必须得等美国好起来之后，国内的媒体和舆论才会发生根本转变。但从整个世界来说，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有投资潜力的互联网市场。美国在分析互联网市场投资潜力的报告中，出了一组系数：美国的系数大概是 1.86、日本 0.8、中国 0.6、德国 0.41、英国 0.3、韩国 0.2，在潜力里中国排第三。很重要一点，在这六个市场里，目前只有中国能保持 100% 增长速度，其他市场增长也都在 20% 以下，所以中国在一些重大政策上能有所突破，比如像加入 WTO 等。国际资本依然会有很大的兴趣。

第八，对于中国 IT 业会不会像美国一样步入 10 年来最严重的衰退，目前形势不太明朗，但是却格外值得重视。乐观的观点认为，中国信息化刚刚起步，市场刚刚在发展初期，潜力巨大。而且互联网热度无法与美国相比，国内资本市场介入有限，损失不大。但是，悲观的人却认为，互联网萧条的影响力将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期，中国 IT 业也将表现同样的“失重”症状，会被拖入类似的负循环中。因为目前各种症状已经出现：风险投资停滞、互联网公司全面萧条、IT 产品增长明显放缓、盈利大幅下滑、库存问题凸现、IT 广告显著下滑、电信设备厂商感受压力。因此，中国 IT 业如何在一个减速的情况下继续发展，已经是最现实的挑战。虽然，中国不一定会出现美国这样的 U 型衰退，但会出现 V 型的调整走势。总体来说，互联

网发展到现在，我们把过去5—10年叫做网络商业化阶段，这是互联网浪潮的一个前峰。这个前峰最重要的特点，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许多创新技术、创新模式，这些新技术、新模式怎样进行商业化，怎样进行产业化是这个阶段的整个主题。在这个阶段，整个动力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来推动，一些敢于冒险的创业、投资人在推动创新。这个阶段是新模式、新技术的试验阶段。现在全球网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把它称为网络社会化阶段，这是浪潮的真正中央。新技术出来以后，通过资本市场的检验，通过它的商业化、产业化，被证明成功的模式应该在方方面面运用起来。整个主题不再是创业创新，而是技术应用、技术渗透，不只是互联网的商业化、产业化问题，而是整个传统产业方面怎样应用互联网进行范式转变的问题。不再是新的创业者，而是在传统领域里，具有技术敏锐感，敢于创新的实用主义者成为新的主要推动者。从整个社会意义来说，这是应用推广问题，经过一个比较长的阶段，整个网络能够在方方面面，包括在政府、企业、教育各个领域里深入应用，然后会真正进入网络全球化阶段。这时会出现很多问题，不是一个产业问题，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互联网的应用，国家与国家之间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范式转变是指互联网造成基础的、根本的变革，互联网的范式转变主要因为开放式的、动态的、相对自主型的网络化基础设施的建立，使整个流程的透明度发生质变，引发组织形式、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重构。

从这个角度来说，互联网虽然遭受很大压力，但传统产业并未简单获得胜利，将面临更艰巨的范式转变的挑战，互联网企业也不会简单地消失。网络社会化为互联网发展提供一个发展舞台，但它不再是以前的绝对中心地位，包括游戏规则、参与主角都会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像新浪、搜狐等大公司发展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健康，但这些公司包括张朝阳这些人会逐渐边缘化。这不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产业规则发生变化。

在范式转变过程中，不是风险投资家，不是技术专家，不是传统产业领导，主要是传统产业里具有技术敏锐感，同时具有创新决

断力的领导者，他们可能会成为新的中心。范式转变分为四阶段，从形式信息化、手段信息化、流程信息化，到机制信息化。组织形式的变化，从低级组织到网络组织的变化，比如一个企业对应这四个阶段，办一个简单的网站，到以交易为主的电子商务，到流程信息化即电子化的企业，到未来比较成熟的所谓的虚拟企业。包括供应链管理、ERP、客户关系管理等，各个流程环节充分信息化以后，可以形成虚拟企业，对一个政府来说，也是经历这四个阶段。从简单的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到办公自动化，到整个政府的电子化，再进入一个真正体现范式转换机制性的虚拟政府阶段。

在中国，网络社会化可能和全球尤其是美国网络社会化有很大区别。他们是在完成网络产业化后进入网络社会化。中国缺乏真正的网络产业化阶段，前两年只是互联网商业化的一个阶段，出现很多新的运用，但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互联网产业，这样一个阶段开始网络社会化的话，由于缺乏网络信息化的基础，所以与美国会有很大区别。

在中国，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说，目前互联网的各种商业模式处于不同阶段。许多人对互联网误解是因为把一个很长的时间轴的问题放在同一个时间点上考虑。如把三五年后发生的事放在今天同一时间点上考察，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美国门户和中国的IT进入成熟期早期，这个行业已经开始有一定利润，这些领域者已经能够大规模的盈利。美国的B2C和中国的门户还处于从接受期到成熟期早期的跨越断层阶段，这阶段不是这个商业模式有没有用，而是能不能成为主流的问题。亚马逊的股票跌得很厉害，它跌的原因不是商业模式有问题，而是网上这种模式未来会不会成为美国人的主流消费方式，还是一种作为补充的消费方式，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如果说认为这种模式未来会成为主流消费模式，像亚马逊这种公司的股票肯定会上涨。

二、网络经济与创业

第二部分，我想讲一下互联网与创业的关系。互联网在中国最

重要的贡献是带来一种全新机制，即所谓的新经济。通过金融与技术的联姻，以风险投资推动创新企业，互联网创业就像体育比赛，只有少数人能拿冠军，大部分人默默无闻，一辈子什么都得不到。这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机制，互联网把两种不同的机制第一次全面带进来。人们的误解主要是把这两个层次混合到一起。从最直观的角度，2—3年内利用这种机制可以办成一个很有规模的大型企业，3—5年内办成世界级企业第一次成为可能。这种新的机制与传统机制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层次，不要把它们简单对立，不要相互代替，两者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比如说创业，你要做B2C，要投资B2C，但B2C这种模式可能已经不适合投资，但作为传统企业来说，B2C可能是最合适的模式。再比如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大的项目，把整个地区的农业信息化，马上见效益的是把农民的信息收集上来，或有的农民买了电脑，让他利用自己的网页，进行网上销售，这块效果非常明显。我们附近一个村去年到泰国做了600万农产品的交易，他只是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沟通，如果没有互联网，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他在应用互联网，与8848公司用B2C做一个上市公司，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8848可能会失败，但农民用B2C非常好，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并不是B2C模式完全不行了。

总的来说，不管互联网在目前中国有多大争议性，我觉得由于互联网的起来，全国第一次出现创业激情和较纯粹的创业精神。

过去中国，只有有权、钱、势的人才有创业的条件，现在有的人一无所有，有新思想新创意就有创业的可能性。过去，一个企业家失误一次，就可能永远被舆论与债务打入地狱，不可能东山再起，但在现代机制里，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失败一次是很正常的，引进风险投资，失败一次可能一年精力白花了，投资者受到一定损失，但仍可以重新创业。拥有创意的年轻人，就能获得一笔很大投资，把它进行商业化，办成一个很大的公司出来。现在一两个创意在一两年内转换成一个很大的公司，在互联网领域，把这一切变成可能，这种创业文化非常初级、非常幼稚，整个资本市场出现后，遭受很大打击，整个创业精神的本质就是敢于跨越界限，包括世俗观的界限、现在技术的界限。当你要跨越的同时，肯定要承受巨大风险，

不能接受失败的话，就不敢跨越风险。这种创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紧密相容，刚出来的大学生，敢于跨越这界限，什么都敢想，在创业中，这非常重要。从整体来说，中国以前的企业文化、创业文化是半个老板加半个资本家，必须有老板、企业家的素质才能把企业办好。现在新的创业文化能改变这种格局，要认识这个格局很重要一点是敢于跨越这个界限，宽容失败。

目前为止，尤其是大众来说，只接受成功，不能接受成败，这跟风险投资游戏规则本身是不相适应的。在这个领域里，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不能把创新和创业视为个人行为，应该变成社会的工程，应该由社会方方面面分担风险，来提供资源，把一个国家创新活力最大化。成功了，回报非常高，刺激风险投资，因为有了投资的动力，失败以后损失也比较小，这样才让大家敢于创新。目前，风险创业的最大障碍还是社会观念的问题，不管是投资者、创业者，还是新闻媒体、公众，都还是第一次面对这种创业模式。

我再简单谈一下自己的创业体会。在1999年7月，互联网热潮开始起来，我们认定未来围绕互联网的研究与咨询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在成立互联网实验室时，把它定位于互联网的咨询，那时很多人说我们定位范围太窄了。今年来看，这个范围已经非常大，因为要替各个传统领域进行互联网咨询，这个范围非常广。在这个明显的创业机会面前，我觉得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业模式。一种是走传统模式，一开始我们有几个比较核心的创业者，在互联网领域都比较有影响力，我们几个办一个公司，租一个房间，办业务，一年挣几百万也是非常轻松的。遇到像现在这样不利的形势，我们可以把规模缩小，可进可退，走得从容，不需要很大压力。另一条就是引进风险投资，快速扩展市场，短期内不追求利润而占有市场，在市场里能够确立成为第一品牌或者更大的时候，想办法让公司上市，这条路必须承受巨大风险与压力。一方面要引进很多资源，包括资金、优秀人才，同时要确保公司的快速发展，不管情势怎样变换，都要发展。最后我们还是选择运用风险投资这种模式，现在大概已经将近50人。在互联网咨询方面比较领先，有一定影响力，但对我们来说，风险依然是巨大的，若50人的公司盈利得好，应该没

有任何压力，但在这个市场环境下，整个压力会非常大。

当时很热的时候有很多的资源，风险看起来很小，现在风险回来了，两面都承受，很热时可高兴，冷时也应坚持让公司发展起来。虽然已到了 50 人，但我觉得未来还是可能会创造出一个奇迹，创造一个很大的互联网咨询公司，当然也可能最后会失败。

这种模式应该成为中国很重要的创业模式。要用新模式，才能设法跟外国像雅虎、亚马逊等这种创新模式竞争。目前，整个互联网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全球舆论处于否定状态，主要是创业者、投资者等市场适应力不够。在前两年很热的时候，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热潮，大家习惯这种热潮可能会永远热下去，现在市场一冷下来以后，第一次经历这种低潮，也认为会永远冷下去。

中国的创业者、投资者、大众反复经历过几个高潮、低潮以后，面对这样的形势，适应能力会更强一点。如今第一批创业者和投资者遭受很大打击，创业者去融资，一听到互联网，再好的商业模式，他都听不进去。

两年前，哪怕再小的一个商业模式，大家听起来都是美好的，现在再好的商业模式也认为问题多，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力量开始重新占据这种主导。在一两年内，引导热潮的是 20 岁、30 岁年轻人。在目前形势下，这些人会遭受很大压力，一两年前，张朝阳一发话，大家都会把它当作重要的话来听，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信了，在各种场合，官员、传统企业领导者重新走上互联网的舞台，许多新观念会更加困难，目前形势对创业者会更加困难。

总的来说，经过这一两年，大家应该学会用市场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从简单的道德、普通情理来评判。从市场角度，没有什么错和对，是和非，过去我们没做错什么，现在的观点也未必是对的。无论创业者，还是投资者，都应该按照市场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对于创业者、投资者只有成功和失败，没有对和错。

很多人认为过去互联网烧钱是错误的，但我认为当时烧钱是对的。在很热的时候，容易得到很多资源，就应该更好地利用资源，让企业快速发展。像搜狐、新浪等成功公司，我认为都是烧钱烧出来的，目前大家不谈烧钱谈盈利也是对的。目前形势下，谈盈利能

够得到投资者、媒体的认同，能够获得资源，也应该根据市场形势进行调整。过去股市升得很高，那没有什么错误，今天大跌也不是它就是对的。很多人认为 Nasdaq 100 是错的，20 就是对的，这也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如果股市完全按市盈率算，那这个股市就是死股市。市盈率也是市场推动的，就应该充分利用市场机会。索罗斯认为网络是个泡沫，很多人认为他很有眼光。从市场眼光看，如果索罗斯真的有市场眼光，就应该在网络股很低的时候把它买进，很高的时候卖掉，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为投资者利润最大化，你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市场机会，而不应该互联网股票涨了这么多年，也没挣到钱，升得很高时，反而去买股，受到损失。这不能证明互联网泡沫的问题，也不能证明他对互联网超凡的能力，我觉得对互联网的认识目前虚拟的太多，面向过去的东西太多，不能用现在批判过去，也不能用未来批判现在。过去一两年内机会很多，很多人创业，现在机会不好，没人去创业了，这也是对的。公司维持不下去，先关门，这也是对的。用市场眼光看，大家会更理智一点。市场永远是对的，错误的只能是没有跟上市场节奏的我们。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任重道远。

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走进创业

黄 斌

黄斌,男,1969年5月出生于重庆。1987—199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93年担任北京爱必得电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1998年爱必得电脑被评为“中关村十大知名品牌”。1999年起担任北京北大天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长期从事IT行业,具有该行业丰富的高层管理经验,对信息革命具有丰富的洞察力和理解力。作为团队的组织者,凭借卓越的组织管理能力和亲和力,团结了一大批业界精英,完成了具有深刻意义的包括MAIL2G、VOD等在内的项目。

今天来到这里,要感谢同学们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把我们天正公司和我本人的一些经历和大家谈一谈。在这里我想先举一个案例,就是我自己1992年的时候,当时,我最早成立的公司叫“天高”,因为北京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叫“地厚”,我就开玩笑,说我们是一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但这个公司很不幸,因为我当时只有1万块钱,这1万块钱还是从亲朋好友那里凭着我当时的信誉借来的。当时,拿到这第一笔钱之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很好的地方作为公司的地点,就找了个人进行装修,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中央美术学院作设计,他为我装修花了5000多块钱,他热情是很高的,但是这件事注定是失败的。因为,第一,我的这个朋友是一个学美术的画家,他的装修风格比较偏向“学院派”,就是说像一个咖啡厅,大家可以想想一个做IT的公司像一个咖啡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另一个方面,当时装修就花了5000多块钱,而一共只有1万块钱。只剩下5000多块钱,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动员了很多同学来抄信封,拿着一个邮政编码簿,发了1万多封信,力图通过这种发信的方式来促销——就是现在所谓的直邮,这在美

国是一种较发达的营销方式。但这样也于事无补，产品只卖出去三分之一，一个季度之后，公司就关门了。我不清楚所谓的“名字学”，他们说起名字一定要请风水先生看一下。大家知道，“心比天高”下一句话不就是“命比纸薄”吗？当然就是说不可能命长的。这就是我第一次创业失败的经验。

从这里面，我自己也在思考，因为失败不可怕，创业精神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自我安慰说，我创业失败了是一个无所谓的事情。因为这毕竟是钱，我没有浪费国家的财富，但是我浪费了亲朋好友的财富。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为什么会失败？谈到这里，大家知道，我们天正公司是1999年下半年成立的，我们再一次创业的时候，我就在中关村，我本人的经历是多次创业，好像很奇怪，我总是把一个公司创业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去创建一个新的公司。所以在中关村，我到目前为止，算上我第一次创业的公司，我一共创建了5家公司，其中有3家是比较成功的，天正还不算，天正是未知数。

所以，作为一个创业的团队，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们企业的理想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企业都应当有自己的理想，而我们当时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理想，我们纯粹是为创业而创业，是因为我当时一时的冲动和热情，我想我应该去创业，所以我就去创业。这样，你一个没有理想的企业，你如何去构建一个企业的竞争力，你如何去把握市场的需求？一个很大的公司，例如微软，他有一个理念，就是要把他的操作系统要放到每一台PC上，而IBM希望电脑技术能够推动未来，思科公司希望能够成为网络最大的供应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也和很多创业团队聊过天，我发现很多创业团队来找天正的目的地是因为他们认为天正是一个idea，天正靠这个idea来融资，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是非常成功的。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这是一个误解，我们的创业观念，大多数来自误解。而这种误解，就为我们最后的失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希望有机会把这些误解描述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误解：idea能够成为一个创业公司的基石吗？这个问题

非常关键。实际上，对于一个成熟企业来说，他更多是靠市场推动而不是产品推动，这个概念是一定要区别开的。很多人说，我幻想有一个科技型的产品，这个产品有市场，能够去创造价值。但是刚好可能这个顺序是相反的，你必须先去搞市场调查，不管是自己做的，还是委托第三方做的；然后，根据这个调查的结论，找准你产品的卖点，然后才能去创造价值。一个企业，绝对不可能靠一个 idea 来构建他的基石。

第二个误解，就是我们对热门的认识。我们有时候会去选择一些很热门的行业。比如说，我前两天和一个朋友交流，他就提出一个智能家居的概念，他靠自己发明的一个已经成熟的技术——用电话来控制家居。这个智能家居就是说通过电话去控制，或者你设定一些功能，它可以在你指定的时间里把你的窗户打开，在你指定的时间内为你做上饭，给你打开微波炉，打开冰箱，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但是这种智能化家居的理念，作为一种产品来说，应该是三年或者五年以后的产品，它虽然是现在我们谈论很热的一个话题，但是它未必能帮你实现利益的创造，所以我给他提了些建议，泼了些冷水。

另外还有一个规律，就是据统计，只有 10% 的被风险投资公司投资过的公司能够上市，有 90% 的公司可能会面临失败，或者是破产，或者是并购。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创业家的角色在进行变化，你在创业过后，你可能要做好准备，让更有才华的人来取代你。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要创办一个企业，一定要有养女儿的心态，你是要把女儿嫁出去，而不要有养儿子的心态，要把媳妇娶进来，这就是做企业的心态。

另外一点，我有个经验，据统计，博士生创业失败的概率比硕士生、本科生要高。这一点可能跟我们的想像刚好相反，不是你的学位越高，学历越高，你创业的成功概率就越大。另外一点是我们常见的，他有非常执着的信念，他希望投资人把钱投进来，但是他又希望投资人介入公司的管理，大多数创业公司都有这一个观念，就是希望你投资，但是不希望你干扰我的经营，从理论上来说，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在这里面，你起码要表达你对投资人的尊重，

他把钱给你了，他要介入你公司的管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这不要去拒绝。实际上，大多数的风险投资公司不会想介入公司的管理，因为一个风险投资公司要投资于很多企业，他的主营业务是投资，要获取资本利润，他也没有必要对一个企业进行深入的管理，除非是这个企业的团队已经不行了。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要去盲目地拒绝这种投资人对管理的看法。

还有一点，创业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比较关键。我认为对于一个创业团队来说，除了说作为一个商人，我们要去创造社会财富，我们还要想一想创业有没有其他的目的。我们对商人不要带有一种贬义的看法，认为商人只注重利益，我认为商人在这个社会中的角色是非常崇高的。因为他在一种公平和公正的环境下为社会工作，尽管他一定要把赚钱作为中心。

我们要有一种良好的心态，就是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学生创业，既然是学生创业，社会就应当支持，就应当开绿灯，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作为创业者来说，社会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你是学生他就对你格外关注，也不会因为你是学生你就更容易成功。相反，学生创业可能是一个更大的误区，因为通常人们认为学生应当是被同情，说得不好听一点，是被怜悯的对象。而同时，人们对学生又是极不信任的，因为他认为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把这个产品做好吗？所以人们在做实际的销售活动的时候，就不愿意跟你签订单，就是我们说的大单。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要以为我们跟学生创业沾沾边我们就能怎么样，可能我们会浪费很多时间，浪费很多效率，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另外一点，我们还要掌握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这些知识非常重要，比如说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我想，我们创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智力资源在发挥作用，这就涉及到一个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说到底，风险投资公司看中的，是最后你这个专利证书。如果没有这个专利证书，你这个 BP 可能一钱不值。因为现在技术没有什么不可预见的，你要复制一项技术、破译一项技术是非常容易的。

同时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不要滥用媒体。作为一个企业

来说，你要做企业的宣传，肯定要利用媒体来宣传你企业良好的品牌形象，来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但是，媒体是有害的。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大家知道，1999年的时候，媒体对学生创业是一片叫好，但是到了2000年的中旬，又是媒体，对学生创业提出了很多置疑，当时很多报纸上都有触目惊心的大标题——《中国第一家学生创业公司倒闭》，所以你会感觉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要善于利用社会资源，但不要去滥用，更不要盲目地去用。可能你不经意的一些做法会对你的企业造成损害。

谈了那么多都是我们所可能有的误解，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你怎样去挖掘你的第一桶金，这是非常关键的。当时李嘉诚和比尔·盖茨可能都是成功地挖掘到了他们的第一桶金。对于成功的企业来说，我们套用一句话，就是成功的企业都是相似的，所以提高竞争优势是非常必要的，作为一个企业，一定要明白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因为你是创业的企业，你会在资金的运用上，在品牌上，在销售渠道的建立上处于天然的弱势，你一定要明白你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第二点，对市场一定要有了解，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一个 idea 或者有一项产品就已经对市场了解了，相反，我觉得要先对市场了解，要根据市场，对我们的产品重新进行设计、进行包装可能更有必要。第三，正如 Intel 的领导说的一样，你处在关键点上，你一定要知道失利的来历，并且要为失利做好准备，我们知道，尤其是 IT 行业，信息产业的变化非常快，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一套应变机制的话，一个再大的企业很快都会破产。比尔·盖茨说过，微软永远只有 18 个月的寿命。再有一点，就是要非常冷静务实。

我还想跟大家讲讲，创业绝对需要的是热情、耐力、理念、智慧和经验，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具备的，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具备的。如果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具备了热情、耐力、理念、智慧和经验，我们就能享受创业的乐趣。

我有一次很不幸的经验，就是在 1993 年的时候，我第二次创业。第一个客户，当时是长春的一个用户，到我这儿来，给我下了一个订单，当时我特别高兴，因为这是我第一个用户，我很重视他。等

到我们签完协议，用户回去的时候，我就后悔了，因为我把价格算错了，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卖给他了。所以当时我就面临一个很难的选择，因为这是第一笔生意，同时又没赚钱，因为对行情不熟悉，把价格算错了，怎么办？当时有几个选择，第一个选择，你可以给客户打电话，说我把价格算错了，没法完成你的订单，我想这个客户也是会理解的，但是，我当时想到的是，作为一个刚刚创业的企业来说，诚信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企业家和社会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很大。我觉得诚信是第一选择，所以当时我们咬着牙，把这个单子做回来了。这件事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机遇，大家知道，IT行业变化很快，但是这个客户在下一季度给我下了一个十倍于原来订单的订单，一个更大的订单，还是以同样的价钱跟我做的。当时那个客户非常惊讶，因为在中关村能找到那么低的价钱和那么好的服务，他觉得不可想像，所以他回去下了一个更大的订单给我，这个时候，他已经不跟我砍价格了，他觉得我们价钱已经足够低了，而我们这个时候成本也已经降得很低了。靠这笔订单，我们赚到一笔钱，后来我们算了一下，还是赚得很多的。所以，创业过程中充满了乐趣，充满了对智慧的运用。为什么当时我们选择了信息产业？我想，在座的诸位，不会去选择炒股票，炒债券，炒房地产，因为这些传统行业需要的不仅仅是智慧，需要的，比如说，社会关系的建立，我想这个公关成本你可能是建立不起来的。而且这种灰色交易，大家可能觉得我从人格上还不能去做这种事情。但是信息产业的门槛非常低，只要你对市场有非常好的理解，加上你自己所学过的市场知识，就可能构建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出来。我们也知道，在信息产业里面，有一句俗话，就是“变化是永远不变的”。朝夕之间，强和弱的转化，大和小的转化经常在发生。我们今天看见一个企业，号称世界第一，但是明天它的股票的市值就可能会大跌。它的竞争非常残酷，这种竞争是对人的智慧的一种考验。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作为学生，没有更多的背景，没有更多的资金可以利用的话，确实做信息产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可以让你的智慧得到充分的放大。

我想再讲一讲对团队的理解。在中关村，我们每天会看见很多

团队的分裂，在创业的时候，大家能够很容易地走在一起。但是当企业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包括我们北大校友（都可能分开）。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北大人是最不善于合作的，尤其是北大校友之间，这些话是不是事实我无从查考，但我确实看见了几个北大校友之间“分家”的经历，这种分家在一般程度上对企业是没有好处的，因为他会大大削弱一个企业的竞争力。我知道这里的诸位很多都不是北大人，我建议，北大人一定要忘记自己是北大的，作为一个创业家，你不管是北大的，清华的，还是其他学校的，你就是一个创业家，你面对的创业压力是一样的。可能你面对的创业成本还要高，因为你没有经验，需要交一些学费去学习更多的东西。同时我也套用一句话，就是“书生不要带书卷气”，我们是有智慧的，我们是文化人，但是，我们要忘记自己文化人的身份，要记住你是一个商人，你在为企业创造价值、为股东谋求利益的同时在为自己寻求利益，同时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一份力量。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在天正我们在一定范围内经常会去宣传这三句口号。当然这只是小范围的，因为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去大范围地宣传。我认为，我们要讲“三气”：第一，英雄气。什么叫英雄气呢？就是大家要有理想，有抱负，有做大事业的决心；第二，就是江湖气。所谓江湖气，就是大家要同舟共济，把企业做大，团队也需要这种同舟共济的理念；第三，书生气。所谓书生气，就是我们要有智慧，要有谋略。这就是天正里面讲的“三气”。

我要再探讨一下如何赢得投资，这是一个创业团队非常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大家对投资有很多误解，大家总会把自己的商业计划书写得很多，以为写得越多越好，实际上投资商无法去处理那么多的信息量。我曾经碰到一个上海的投资商，他告诉我他们一年要处理几千份的案子，大多数的商业计划书他看都不看就搁下了。刚好我们去香港，我们在电梯里面，也是去找他们的，他在电梯里就发明了一个“电梯理论”，他的公司在23层，他说，你在电梯里，从1层到23层，你能把我说得心动，我就听你仔细讲，我的时间很忙。大家都要明白，投资商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他能给你的时间就是那么一点，而如何非常简明扼要地把你的计划理念清晰地表达

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非常准确地描述自己的商业计划，告诉他你的公司在未来的市值会有多大，价值会有多大，能给投资人带来什么样的回报。我们确实是比较有经验的，我们去香港，谈过香港的很多投资公司，我们总是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投资人说，我很忙，我就给你一刻钟的时间，我们比较幸运，我们总能在讲完 15 分钟之后，投资人还会听我们讲两个小时，还会让我们再讲下去。所以投资人往往说，我们浪费在你们一家公司上的时间，我们可以谈 10 家公司。

另外一点，我想讲一讲创业与失败的关系。创业不要怕失败，因为天正实际上就是诞生在这样一个理念下并发展起来的。1999 年，天正成立的时候，我们学校的领导曾经跟我交流过，他说年轻人不要怕失败，他鼓励我们把天正做好。我想，在创业遇到挫折，处于低潮的时候，往往是对一个创业的企业提出挑战的时候。而且，转机可能马上就会到来。所以大家在面对低潮的时候，要想到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那就要继续下去，不要做虎头蛇尾的事情。

谢谢大家！